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九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严如平 宗志文 主编

中华书局

中 华 民 国 史 资 料 丛 稿

民 国 人 物 传

第 九 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严如平
宗志文 主编

中 华 书 局

责任编辑/朱 慧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九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严如平 主编
宗志文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怀柔桥中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15 $\frac{3}{4}$ 印张·319千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21.00元

ISBN 7-101-01504-2/K·656

前 言

一九七二年八月，我们接受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当即召开座谈会研究。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根据这一认识，我们提出了如下的初步设想：

一、编写《中华民国史》，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针，绝不能因袭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修史方法。

二、写一部书，定名为《中华民国史》，拟分三编：

第一编 中华民国的创立（1905 — 1912 年）

第二编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 — 1927 年）

第三编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1927 — 1949 年）

三、编三种资料：

第一种 《中华民国大事记》

第二种 《中华民国人物志》

第三种 《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

关于人物志，需要写传记的约一千人；列入人名辞典的约四千人；另外还拟编制若干人物表。

如何写传记，我们毫无经验，只预先提出了几点要求：

一、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一个人写传记，必须充分占有材料，认真进行研究。只有对这个人的一生有了总的概念、对他的主要言行有了具体的判断、并且自信这个概念和这些判断是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然后才可以下笔。

二、要求用记叙文，不要写成评传。要通过具体的事实把正确的观点表现出来。不要离开事实材料，作过多的评论。对事实的取舍、详略以至措辞用字，都必须仔细斟酌，务求妥贴。

三、要求真实可信。传记中所写的事实，要经过反复核对，有的还要经过调查研究，务求做到确实无误。凡是有疑问而又查不清的，宁可写或存疑，不要以讹传讹。

四、要求反映一个人全貌的同时又有重点。一个人的传记，要把他的家庭情况、上学情况、主要的经历和言行，总而言之，要把他的生平事迹如实地反映出来。但又不要写成流水帐或年谱。要把最能反映本质的事情，选其中最重要的一两件写得详细、生动些，其余的不妨简略。

五、要求用白话文写，文字要力求简练。没有必要就不要用引文，引文要注明出处。一般每篇以二、三千字为准，不要写得太长。

六、初稿后面，要附主要参考资料目录。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编写《中华民国史》，非全国大协作不能成功。即以写人物传记而论，哪个行业的人由哪个行业的人来写最好，哪个地方的人由哪个地方的人来写最好。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我们希望这批初稿，能引起各方面和全国各地方的兴趣，大家都来写，尤其是熟

悉情况的人动手写，那么《中华民国史》就不难完成了。我们还希望从事史学工作的同志，不但自己动手写，而且要把有关这方面的组织工作承担起来。

（一九八〇年五月修改）

目 录

蒋介石	严如平 (1)
杨衢云	袁鸿林 (42)
范光启	史全生 (49)
沈缦云	汪仁泽 (55)
李书城	李丹阳 (62)
	刘建一
叶楚伦	郑春燕 (71)
邓泽如	姜献阁 (78)
丁贵堂	任嘉尧 (85)
伍朝枢	郑则民 (91)
王乐平	刘培卿 (98)
	刘 镇
易培基	马复华 (105)
徐 堪	马宣伟 (113)
黄展云	李锡贵 (118)
诺那呼图克图	周锡银 (125)
孙道仁	黄国盛 (131)
卫立煌	严如平 (137)
张之江	宗志文 (148)
李鼎新	陈孝华 (154)

吕 超	马宣伟 (160)
邓锡侯	林松柏 (166)
赖心辉	马宣伟 (172)
田颂尧	马宣伟 (179)
范绍增	陈章文 (185)
王陵基	刘识非 (190)
黄百韬	王家鼎 (198)
上官云相	王家鼎 (206)
李延年	王家鼎 (214)
邱清泉	颜 平 (222)
刘茂恩	郭熙生 (229)
姜桂题	宋 岑 (229)
赵 倜	钟碧容 (233)
老 倜	邢汉三 (238)
老洋人	李国强 (243)
褚民谊	黄美真 (250)
孙殿英	张 云 (250)
郝鹏举	熊尚厚 (258)
	邢汉三 (258)
	王家鼎 (266)
卢作孚	周凝华 (273)
李烛尘	熊尚厚 (281)
杨寿枬	朱复康 (289)
薛明剑	朱复康 (296)

叶鸿英	程庸畴 宋紫云 (303)
马应彪	熊尚厚 (306)
蔡 昌	汪仁泽 (313)
吴晋航	袁嘉新 (318)
何北衡	袁嘉新 (323)
周宝箴	张钧陶 (329)
虞洽卿	汪仁泽 (332)
苗杏村	王家鼎 (343)
刘海楼	邢汉三 (350)
邹韬奋	宗志文 (353)
马叙伦	宗志文 (364)
侯德榜	熊尚厚 (372)
谢无量	杨伟立 马宣伟 (380)
陈 达	汪仁泽 (385)
凌鸿勋	姜献阁 (392)
严 修	姜献阁 (401)
钟荣光	李 坚 余齐昭 (412)
刘湛恩	陈 敏 (418)
周鲠生	虞崇胜 (424)
聂 耳	查建瑜 (430)
冼星海	查建瑜 (436)
张恨水	宗志文 (445)
王云五	熊尚厚 (453)

汪康年	汪仁泽 (462)
赵紫宸	寿祝衡 (469)
孟目的	寿祝衡 (474)
《民国人物传》第一至九卷目录索引	(479)

蒋 介 石

严如平

一

蒋介石，谱名瑞元，字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生。父亲蒋肇聪继祖业在奉化溪口镇经营玉泰盐铺，于蒋介石8岁时去世。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①抚育成人。王采玉笃信佛教，对子管教甚严。蒋介石对母亲颇为孝顺。

蒋介石5岁入塾，自称“幼性顽钝，弗受绳尺”。^②他爱好玩弄刀棒，常常聚集小伙伴玩打仗的游戏，喜欢自封为大将登台指挥。他在私塾诵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典籍十余年，深受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熏陶。1903年起，先后转入奉化凤麓学堂、宁波箭金公学、奉化龙津中学堂读书，学习一些新知识。时值《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腐败，民族危机严重，他因丧父后家庭的社会地位低微，^③乃决心出国学习军事。1906年4月东渡日本，肄业于东京清华学校。他在东京结识了在警监学校学习的陈其美，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蒋同年冬返国，翌年夏考入清政府开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前身），习炮兵。1908年春被选送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学军事；随即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10

年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1911年10月，蒋介石在日本闻讯武昌起义的消息，即整装回到上海，奉陈其美派，任敢死队队长，与王金发等人率领队员百余人赴杭州，参加11月4日光复浙江之役。旋返回上海，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他与沪军都督陈其美、督署参谋长黄郛甚为相投，遂结为异姓兄弟。蒋一切惟陈其美马首是瞻，曾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于1912年1月14日将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杀害。^④案发后蒋避往日本，在东京办《军声》杂志，鼓吹俾斯麦的铁血主义，年底回国。

25岁的蒋介石，血气方刚，自结拜陈其美后，更是亦步亦趋，追随陈其美参加各种革命活动。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蒋介石受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指派，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役。8月各省讨袁军先后失败，党人纷纷逃往海外。蒋介石于10月在上海加入正在筹建的中华革命党，11月亡命日本，闲时阅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著述。1914年春他奉命回国组织反袁军事活动，先后参与策划肇和舰起义、攻夺官署和江阴要塞等。1916年5月陈其美被害后，蒋去山东潍县，在居正、许崇智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参谋长职。

袁世凯死后不久，蒋介石回到上海，先后与张静江、许崇智等人焚香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以取得攀附。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蒋介石奉孙中山派遣，于1918年春到粤军中工作，先任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曾拟“援闽”作战计划。“援闽”之役，蒋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指挥所部进攻

大埔、永泰。因军事受挫及受粤军将领排挤，几度辞职回沪；曾向孙中山要求出国留学，未获同意，意志消沉。1920年他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经营证券投机生意，成为交易所的“恒泰号”经纪人，曾以所获部分资助粤军及其他革命事业。期间他结识了虞洽卿、杜月笙等人。

1922年1月，蒋介石应孙中山之召抵桂林，参与拟订北伐作战计划。蒋建议先回广州巩固后方，再图北伐，未被孙中山采纳，遂于4月返上海。6月16日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炮轰孙中山总统府，孙避往永丰舰与叛军相持，18日电蒋“盼速来”。^⑤蒋于29日抵广州，登永丰舰侍卫孙中山，直至8月10日护送孙离粤返沪，并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亲为作序，称蒋“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⑥蒋由此博得孙中山的很大信任和重用，也大大提高了政治声誉。10月，孙中山将进入福建的北伐军组织为“东路讨贼军”征伐陈炯明，任许崇智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第二军参谋长。蒋到职后，感到“军中将领，界限甚深，每相排挤”，^⑦不久便离闽回沪。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但蒋此时心绪纷乱，加之“久困目疾，不能阅书，不能治事，愤欲自杀者再”。^⑧直至4月20日始抵广州。8月，蒋介石奉孙中山派遣，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四人赴苏联学习考察，访问了苏联党政负责人和共产国际负责人，考察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和革命后的建设，参观了工厂、农村和苏维埃组织，并着重了解了苏联红军的组织、训练和装备，以及红军的政治工作等，历时3月余。他对苏联军队实行政治委员、党代表

制深表赞赏；对其军械武器的研究与进步，也认为可与欧美各国相竞争。但是他对于苏联的外蒙古政策很反感，认为苏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因而认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别有用心，是没有诚意的。他还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是专制主义，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不能仿效。总之，苏联之行反而加深了他对苏联的疑虑和偏见。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广州黄埔，通称黄埔军校），为建立一支革命军队造就骨干力量。蒋介石被派为建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他嫌办军校没有军政实权，提出辞呈擅自离粤去沪，谓“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②在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等人一再劝导和催促下，他4月下旬回粤，被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这时，蒋介石逐渐认识到培训骨干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对军校工作抓得很紧。他发表大量训话和演讲，一再表示自己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声言“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③同时极力树立校长权威，培植个人势力，重用何应钦、王柏龄等人为军事教官，戴季陶、邵元冲等人为政治教官，刘峙、陈诚、钱大钧、顾祝同等为队长。这些人不断得到提拔，成了他的嫡系亲信，为他后来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黄埔系打下了基础。

蒋介石主持黄埔军校后，把师生编组成教导团，成为保卫南方政权和统一广东根据地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他于当年10月率领军校师生与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等合力平定了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于1925年2月指挥黄埔军校教导团参

加东征讨伐陈炯明，于6月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保卫南方政权。

是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南方政权的大元帅府于7月改组为国民政府，所辖各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学生军等组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害，国民政府组织“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兼任广州卫戍司令的蒋介石与汪精卫、许崇智三人为委员，被授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廖案及时局。蒋在查办廖案中，先支持汪精卫将胡汉民驱送出国，又将握有军权的许崇智逐往上海，收编了粤军部分师旅，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握有军事实力的首要人物。接着于10月任东征军总指挥，再次讨伐陈炯明，将粤境叛军全部肃清。

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进一步提高了蒋介石的声誉，而他的权力欲也逐渐上升。他把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的中共党员视为自己进一步攫取权力、建立个人统治的阻碍。他在军校支持一批师生组建“孙文主义学会”，以牵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师生组建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他虽然表面上也谴责西山会议派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反革命”，^①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步西山会议派之后尘，要求校内的共产党活动应公开，规定国民党员要加入共产党者须向党部声明并请准等，是为蒋介石限共、防共之滥觞。

1926年1月，蒋介石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接着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随着地位的上升，他的野心大大膨胀起来。为了进一步夺取军政大权，

他处心积虑地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3月20日，他捏造事实，诬称中山舰擅自行动密谋叛乱，宣布广州戒严，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卫队和纠察队的枪枝，还扣押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汪精卫于事件后借口生病就医而隐匿不出，蒋乘机取代汪担任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职。他意识到自己羽毛未丰，还必须依靠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就采取两面手法：在联合共产党的同时，又设法限制共产党。在5月15日开始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等提出了《党务整理案》，规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中央和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的名额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不得充任中央党部的部长；共产党发给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一切训令，应先交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一系列限共防共措施。蒋就此接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职，他的结拜兄弟张静江被举为中央常委会主席。一个月后，蒋又任中央常委会主席，大大加强了他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

在蒋介石的竭力主张下，7月，国民政府宣布出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统率8个军约10万人。北伐战争的战略是先以主力攻击占据湘、鄂、豫等地的吴佩孚，再及苏、浙、赣、闽、皖的孙传芳和北方的张作霖。蒋介石派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为主力，先期进入湖南，配合唐生智第八军北进。在7月11日攻克长沙后的半个月，蒋介石率总司令部人员离广州赴前线指挥作战。8月23日蒋在长沙召集军

事会议，决定北上进攻武汉。北伐军经过4天苦战，29日攻克吴佩孚重兵据守的汀泗桥，继夺贺胜桥，乘胜追击，于9月初进抵武汉近郊，6日占汉阳、汉口。吴佩孚军主力被歼，残部死守武昌城负隅顽抗。蒋介石急于破城，几次下令北伐军攀城强攻均未奏效，死伤累累。9月17日他离鄂赴赣，直接指挥江西战事。他下令第一、二军强攻南昌，连攻3日未克，牺牲甚大，被迫下令撤退，重新部署。这时，攻打两湖的第四、第八军于10月10日光复武昌，蒋介石乃调第四军入赣助战。11月初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发起总攻击，4日占领九江，8日克复南昌。

江西战事奏捷后，蒋介石趾高气扬，力图把党政军控制于一手，先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驻南昌，还想把广州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迁来南昌，而拒不执行迁都武汉的决定。1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在武汉成立，作为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但蒋介石仍然截留取道江西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于1927年1月3日擅自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非法作出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移驻南昌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被否决，但他持抵抗态度，拒不出席3月10日至17日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无视全会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集体领导、取消常委会主席制度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和《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这时，占领湘、鄂、赣、闽的北伐军乘胜向浙、皖、苏推进，攻取浙江的东路军进抵上海附近。上海工人阶级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于3月21日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解放了上海。与此同时，北伐军24日占领南京。

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迅猛发展，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也因惧怕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而动摇起来。他们对拥有军事实力而又反共的蒋介石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蒋介石也不断派人与英美法日等国联系，还与江浙财团达成默契，以期取得支持。此时，他发动了一连串暴行：3月6日密令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16日强制解散了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17日唆使暴徒捣毁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23日又派人捣毁安徽临时省党部和总工会等。对于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时遭到英美等国军舰炮击的“南京惨案”，他在接见新闻记者时则表示：对南京之排外暴行，愿负全责。他到上海后即派白崇禧拜会各国领事，取得谅解。英美等国要蒋介石出来“维持秩序”“镇压暴行”，蒋即表示：不用武力或任何群众暴动改变租界之地位。因而上海《字林西报》3月28日认为：“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蒋在会见虞洽卿和江浙财团代表时又表示：“本人亦抱维持资本家主张”，“不使上海有武汉态度”，^⑩从而取得了上海的买办豪绅和附和他们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蒋介石立即从他们那里得到1500万元经费，还获得保证将再得到3000万元作为建立政权的资本。同时，“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组织了“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纠集流氓打手，准备为蒋介石发动政变提供人力。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蒋介石积极准备在上海发动政变。3月29日，他下令取消上海人民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2日指使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通过吴稚晖提出的《查办共产党案》。蒋连日召集秘密会议，与汪精卫、李宗仁、李济深、古应芬等人商讨“反共清党”问题。他采用两面手法，麻痹工人群众。当时盛传要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他则假惺惺地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③4月6日，他还把亲笔题有“共同奋斗”的锦旗送给工人纠察队。与此同时，他又下令查封北伐军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另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总揽上海军政大权。9日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一切布置就绪后，蒋介石离沪赴南京，11日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12日凌晨上海全副武装的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蒋介石的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进行血腥大屠杀。在蒋的密令下，东南各省和广东也先后发动“清党”，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半途而废。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胡汉民等为国民政府委员，自己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实际上独揽党政军大权。他以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相号召，而实际上“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④把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改变“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

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⑧

7月，被北伐军击溃的孙传芳在直鲁联军张宗昌帮助下，在津浦线上发起反攻，24日陷徐州。25日蒋介石赶赴前线亲自坐镇督饬，力图收复。不料旬日之间，一败涂地，8月6日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既羞且愤，乃将战败责任，归之于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将其扣押枪决，以泄其无谓之愤”。^⑨蒋介石威信骤降，拥兵自重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蒋下台；在武汉的汪精卫和唐生智又组织东征军通电讨蒋；而何应钦等嫡系亲信，此时亦不愿出来维护蒋的地位。蒋感到“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⑩被迫于8月13日辞总司令职，宣布下野。

为了进一步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蒋介石于9月28日赴日本访问了一个多月，与日本朝野各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还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举行了会谈。蒋还至神户拜访了在日本休养的宋美龄的母亲，获允娶宋美龄为妻。蒋追求宋美龄有年，因他早有妻妾，^⑪宋母一直未同意。这次他向宋母表示，他已与妻妾离异。宋母要求他加入基督教，他答应先研究教义。^⑫1927年12月1日，蒋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从此，他与宋子文、孔祥熙联姻，并通过他们加强了与美国的联系，后来成为亲美派的首脑。

蒋介石离职后，国民党各派系之间仍然纷争不息，以汪精卫为首的粤系与李宗仁的桂系以及西山会议派的沪系之间，争夺十分激烈，而谁也不能控制政局。蒋介石从日本返回上海后，利用这个矛盾，纵横捭阖，并得到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28年1月返南京复职。2月2日国民党二

届四中全会上，他被正式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重新掌握了党政军大权。

1928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四派联合进行对奉系军阀的北伐。5月初蒋率部进入济南后，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寻衅，制造了震惊一时的“济南惨案”。蒋介石下令部属“忍辱负重”，将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上。6月初，北伐军队分三路向京津推进，战胜了奉系，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10月，蒋介石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⑨

二

蒋介石完全掌握了统治全国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宣称要按照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规定，实施“以党治国”的“训政”。但是，各个地方实力派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蒋介石要想实现对全国的统治，首先要削弱、消灭其他各派的军事力量。1929年1月，他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声称要将全国82个军205万人改编为60个师（每师1.1万人），想要利用改编来装备和扩充自己的嫡系部队，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他将各派军事首领委予高官，但夺掉了他们的兵权。这就大大加深了他与冯、阎、桂之间的矛盾，遂至兵戎相见，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1929年3月、11月）、蒋冯战争（1929年5月、10月）、蒋唐战争（1929年12月）等多起。蒋介石以“统一”相号召，运用手中的权力，以封官许愿、收买拉拢、分化瓦解、重兵进攻等办法，一一战胜了对手。然而，蒋介石和各地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

解决，反而进一步加剧。1930年终于爆发了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蒋调集数十万兵力抗衡，设行营于徐州，亲自坐镇指挥。他还凭借英美等国和江浙财团的支持，利用反蒋各派之间的矛盾，施展了分化瓦解的策略。这时，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和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也活跃起来，利用阎、冯的军事力量联合倒蒋，于8月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但在蒋介石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软硬兼施之下，阎、冯军在陇海线、津浦线相继受挫，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挥师入关，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反蒋各派大势已去，“扩大会议”无疾而终，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结束。

蒋介石将各派系军队收编改组，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后，即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军事“围剿”。他自恃握有重兵，妄图三个月至六个月内消灭中国共产党。虽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亟，民族危机严重，蒋仍把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当作心腹之患，奉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从1930年12月至1934年10月，连续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围剿”。他先后调动上百万军队，两次自任总司令，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向江西中央根据地和鄂豫皖、洪湖根据地发动进攻。在一次又一次失败后，第五次“围剿”时，他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采取“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用层层筑堡、逐步缩小包围地区的办法，向前推进。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左”倾路线的错误，经过一年的战斗，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蒋介石一面在各根据地进行反复“清剿”，大量屠杀革命群众，一面命令西南地方军队堵截

长征的红军；他借机“整理”西南诸省军政，把长期未能控制的云、贵、川三省逐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蒋介石在对红军进行“围剿”的同时，对于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和纷争，想采用自己当总统以便高度集权于一身的办法来加强控制。在1930年11月12日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他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的主张，遭到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反对和抨击。蒋十分恼怒，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软禁于南京汤山，蒋胡两派骤然尖锐对立。反蒋各派系又一次联合行动，以“护党救国”、“打倒独裁”相号召，5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调兵遣将部署对粤进剿，一场大战迫在眉睫。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害怕事态扩大，实行不抵抗主义，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于12月15日再次辞职。一个月后，他利用政局的不稳，和汪精卫在杭州举行秘密会谈，决定两人合作掌权，形成蒋主军、汪主政的局面。实际上，蒋介石凭借军事实力，仍然控制着党政军大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华，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继于1933年初侵占山海关、进犯热河，随即分兵攻击长城各口，遭到我国各地军民的奋起抗击。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施“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外交方针，一味妥协退让。他还阻挠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御日本侵略，镇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

蒋介石为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力谋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允许的范围内，在外交和内政上采取一些措施。他督饬外交部分别与有关国家谈判“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批准财政部门改革税收制度，统一盐税，征收统税、印花税、所得税等；1935年在英美的帮助下进行币制改革，统一了币制。为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他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并决定在全国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使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经济的微弱增长远远赶不上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财政收入不敷支出。在1927年至1936年间，公开举借外债14笔，约4亿美元，国内发行公债25种，约26亿元。蒋介石还竭力支持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建立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从建立独占的金融体系开始，继而投资工商企业，利用政治权势和通货膨胀等手段，大量聚集财富，逐渐垄断了全国国民经济的一些主要部门，形成了官僚垄断资本集团。

为了强化统治，蒋介石在全国推行保甲制度，进行清查户口、编练民团、抽送壮丁、检搜缉捕等活动，还推行联保连坐法，要各户互相监视。他还建立了两个特务系统：一个是以陈果夫、陈立夫“CC”系为中心的“党方”特务系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后扩为处）是它的活动阵地；一个是以黄埔系为骨干的“军方”特务系统，“复兴社”特务处是它的活动阵地。这两个组织于1938年8月分别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他们专事破坏共产党和民主运动，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并防范国民党

内的反蒋派系，翦除异己力量。

蒋介石还在全国发动文化“围剿”，以加强其思想统治。1930年9月他密令取缔“左联”等团体；12月下令颁布《出版法》，查禁“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的书籍。1934年2月他发起了一个谋求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新生活运动”，鼓吹以恢复中国封建传统的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实践“礼义廉耻”（“四维”）；以“四维”“八德”来革新个人、改造社会、复兴民族。蒋介石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在全国各地建立分会加以推动，但收效甚微。

蒋介石对日本侵略的一再妥协退让，并不能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婪野心；相反，日本对我国的侵略有增无减，1935年10月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直接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高潮，蒋介石不得不调整其对内对外政策。在这年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作外交方针演讲时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④表明他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在1936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对外交方针又作了新的解释：“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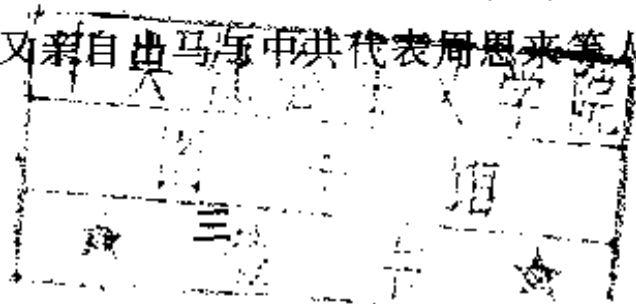
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②蒋介石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有了明显的变化和进步，受到全国爱国军民的拥护和欢迎。

为了防范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蒋介石在此前后曾下令国民政府制定三年国防计划，采取准备抗战的某些措施，如在一些战略要地修筑国防工事，加速新建和修复铁路、公路，整编军队，修建和扩大兵工厂，开始转移文化古物，为撤退沿海地区高等学校作准备，等等。1935年春夏，他视察了川、云、贵、陕等省，计划在必要时把这些地区作为抗战基地。他还谋求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争取苏联成为抗御日本的盟国。他也试图调整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派陈立夫主持，通过多种渠道打通与中共北平、上海地下组织乃至陕北中共中央的关系，试图收编工农红军、取消根据地政府。

但是，蒋介石仍然想要武力“剿灭”工农红军。他在西安成立“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一再督饬张学良、杨虎城进兵陕北。“剿共”受挫的张学良、杨虎城受全国抗日运动的推动和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主张联共抗日。1936年冬，蒋介石赶到西安，催逼张、杨出兵。张、杨反对继续内战，向蒋苦口极谏，蒋严加申斥。张、杨乃发动“兵谏”，于12月12日晨将蒋捉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极为恐惧，以死相抵，立下遗嘱。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以及宋子文、宋美龄等多方面努力下，达成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蒋介石表示承认六项协议，声称愿以人格担保，但为顾全体面不

肯在协议上签字；他还许诺“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②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离开西安。但是到南京后，他扣押了张学良，随即加以软禁；继又迫杨虎城辞职、出国，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化瓦解，调往豫、皖。

然而，迫于全国军民要求抗日的形势，蒋介石不敢公然撕毁协议。1937年1月5日他下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2月中旬，他主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结束内战和调整国共关系问题，在对内对外政策上都有所转变，确定“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向着联共抗日的方向变化。为解决国共两党合作中的各种问题，蒋先派顾祝同等、以后又亲自出马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进行多次谈判。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筹划的抗战各项准备工作远未就绪，但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势焰也不敢再作退让，决定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应付时局。他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命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即赴保定指挥，“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坚持到底，处处固守”；^③密令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两个师北上向石家庄、保定集中，第四十军庞炳勋部一师及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开往石家庄；决定在石家庄设立行营，督导冀察军事行动；并电召何应钦自四川返回南京，着手编组部队。7月17日他在庐山发表谈话，举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条件：“（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

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他严正表示：“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⑤

但是蒋介石对日本还存有幻想，希望卢沟桥事件能就地和平解决，企图以牺牲局部换取全局之苟安。他从庐山下来后，忙于和平外交活动，连续接见英、美、法、德国驻华使节，希望列国出面调停。他对宋哲元在北平擅自与日方进行的谈判活动也“不予反对”、“极度容忍”，期望能使军事冲突就地解决。他命令第二十九军就地抵抗，只是“应战”。他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及时调遣大军北上，不敢冲破“何梅协定”的约束将增援部队进入平津地区，没有下决心与日军在平津地区打一场硬仗。结果大大延误了战机，使得大批日军从容入关，轻易击溃二十九军而侵占平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蒋介石急于取得中国共产党和各党各派势力的合作和支持。他在全中国军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在庐山、南京同周恩来等进行多次会谈，终于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同意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使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后，又谋在上海发起进攻，直指国民党统治中心，严重威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战火将在身

边燃起，蒋介石没有退缩的余地。8月12日，他在南京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得到了各地各派的军事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支持和拥护，被举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大大增强了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会议决定对日作战方针为：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部署一部在华北持久抵抗，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

面对日军的挑衅，蒋介石8月13日下令原京沪警备司令、新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第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师发起攻击，揭开淞沪抗战的序幕。蒋决心利用上海外围河港交错的有利地势及近年构筑的三道国防工事，吸引日军主力南下，在上海地区打一场持久消耗战，以挫败日本速战速决的企图。18日他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强横的兵力，我们就要以逸待劳，以拙待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②9月，他又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指挥淞沪抗战。他以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迅速调集73个师约40余万兵力（占当时全国可调动的兵力三分之一以上），在长江下游三角洲狭小地区，进行旷日持久的阵地战，顽强阻击敌人，杀伤侵略者5万余。但是，他在战略指导上没有把军力和民力结合起来，大大削弱了抗日的战斗力；在战术指挥上只是消极防御，被动应战，不能及时有力地主动出击敌人；在战局不利时，又未能组织及时有效的退却，以致造成抗日军队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一直指望英美各国出面制止日本侵略战争，期待九国公约会议加以制裁和干预，但英美等国

政府奉行“不干涉”政策，坐视日本侵华。只有苏联，于8月21日与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给予军事贷款，后来还派志愿空军来华助战。日本在淞沪会战中被困后，展开了诱降活动，表示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要求德国从中斡旋。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会晤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听取了他转述日本提出的七项和谈条件，表示愿意以这些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由于这时九国公约签字国正在开会，蒋幻想诸国会制止日本侵略，又慑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高涨，对和谈迟疑未决。

日军于侵犯上海的同时，在华北大举出兵晋、绥。蒋介石调卫立煌率第十四集团军驰援，会同第二战区阎锡山部队共约10万人扼守太原以北的忻口一线，进行忻口会战，相持20余日，给板垣第五师团等敌军以严重杀伤，打乱了日军企图迅速侵占晋冀、进而图我中原的战略部署，造成华北战场持久抗战的有利态势。

上海失陷后，日本侵略军直指南京。蒋介石不肯轻易放弃首都，以维系“国际观瞻”，乃调集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的疲惫之兵，连同教导总队和第二军团共15个师约十余万人，统交唐生智守卫这个易攻难守之城。他在亲自指挥了一段外围阵地战斗而难以抗御后，于12月7日飞离南京。日军于12月13日攻陷南京后，进行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残酷杀害我国军民30万人以上。蒋介石于12月16日在武汉发布文告宣称：“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⑧而日本方面于12月22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更为苛刻的“和谈”条件，并声称“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

派遣和平谈判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⑤这无异于要他屈膝投降。蒋介石认为：“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⑥乃中断了与日本谈判的活动。

为了制订抗战期间的国民党方针政策，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蒋介石于1938年3月底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要求国民党实现“自身的改进”以适应抗战的需要。大会决定“强化党的组织，设立总裁制度”，蒋介石被举为总裁；还决定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蒋兼团长。蒋在《对日抗战及本党前途》的演讲里，表示了持久抗战的决心，说“我们除了以坚决抗战来觉悟其（日本）迷惘以外，就没有其它方法来求取东亚的和平”，现在战争既起，就只有“下定决心，增强团结，始终一致，来贯彻我们抗战的目的”。^⑦这次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并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领袖以及无党派社会知名人士200人组成，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

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各条战线发动猛烈攻势，力图迅速结束战争，蒋介石决定全力防守。1937年12月23日日军渡过黄河，担任津浦路北段作战指挥的韩复榘竟不战而退。为稳住战局和严肃军纪，蒋介石于1938年1月将多年反对自己的韩复榘以“违反军律”、“失地误国”罪名处决。3月至4月上旬，我抗日部队在战略要地台儿庄同日军进行了一场激战。蒋介石曾亲赴徐州，督导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筹划作战。台儿庄战役击败日军两个精锐师团，歼敌万人以上。蒋介石

一时兴高采烈，想再在徐州与敌决战一场。但日军增调兵力，加紧包围，蒋被迫作出撤离的决定。嗣后日军占领徐州，趁势沿陇海线西上，直扑中原要地郑州。为阻挡日军快速西进的锐利攻势，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之术，下令于6月9日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滚滚黄河改道横流，豫东尽成泽国，泛滥的洪水将日军第十四、十六师团及机械化部队困陷其中，战局暂趋稳定；但豫东和皖北、苏北受淹地区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严重损失。

黄河决堤后，日军改变进犯武汉的路线，35万军队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西进。蒋介石重新部署武汉防务，以转入山地与湖沼地作战为主，配置了129个师及骑兵、炮兵等共约100万兵力，以及海军、空军，全力保卫武汉。他发表《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号召“一切的奋斗要以拱卫武汉为中心，以达到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⑧。他坐镇武汉，指挥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的兵力层层进行阵地战，尽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前后达4个多月，大小战斗数百次，迫使日军前后投入40万人以上，军力遭到重大消耗。10月25日武汉失守，蒋介石于30日发表《为放弃武汉告全国同胞书》，表示要坚持抗战到底，号召全国军民继续贯彻持久抗战、全面战争、争取主动之一贯方针。

此后，日本改变侵华方针，加强“政治谋略”攻势，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一批亲日分子与日本方面秘密勾结谈判“和平”的行径，以及他们后来叛逃投敌，表示了严正态度，于1939年元旦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将汪精卫

开除出党，嗣后并下令通缉。

但是蒋介石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年半的抗战中获得迅速发展，并在敌后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则忧心忡忡。他决定改变国共合作方针，而实施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1939年1月，他在重庆主持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讨论继续抗战的指导方针和防共反共问题。对于今后的作战部署，他提出了“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说“回复了（卢沟桥事变前现状）就是胜利”。^⑧他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和巩固党基》的报告，强调要整顿党务，扩大组织，强化国民党。他宣称要对共产党“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⑨全会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会后又发布多种秘密文件，如《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不断挑起国共之间的磨擦。1939年12月，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部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侵占淳化等地，并准备进攻延安。1940年秋，他提出要取消边区政府，缩编八路军、新四军现已发展的部队，并限制其防地；甚至说“至今已不患日寇敌军之侵略”，“所虑者惟中共猖獗”。^⑩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新四军军长叶挺，要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并要两军将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12月9日蒋发出手令：“凡在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⑪在他的一手策划和指令下，第三战区8万军队在1941年1月6日新四军9000余人北移途中，于皖南泾县茂林地区加以伏击，制造了震惊

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下，蒋介石不得不于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作出保证：以后“决无剿共军事”。

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领导集团自抗日战争爆发后，加紧垄断全国金融。1939年10月，蒋下令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成立“四行联合办事总处”，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成为垄断全国金融的统治机构的首脑。四行总处加强了对地方银行和私营银行的监督和控制，并进行商业的投机和“专卖”。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出现的官僚资本，对抗战后方地区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和农业扩大了经营和控制，还垄断了主要出口物资的贸易，敛集大量财富。民族资本工商业受到极大排挤和打击，濒临破产境地。广大人民的生活，由于重征田赋（后改征实物）和各种苛捐杂税，以及法币贬值、物价飞涨，降至很低的水平。

蒋介石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竭力强化独裁统治。实施《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抗战初期允诺的一点民主自由皆名存实亡，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均已荡然无存。他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强调“军令、政令应统一于中央”，竭力限制和吞并抗日人民武装。他下令在各县切实整编保甲，使每一保、甲长均能兼尽政治警察之任务，并实行“联保连坐法”，使人不敢与“异党分子”接近。他操纵“中统”、“军统”两支特务系统，肆意横行，囚禁和杀害爱国青年和民主人士。他还批准发布《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等法令，任意查

禁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刊。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先后在衡阳、南岳、长沙、西安等地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部署对日作战，宣称要“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但在作战指导上，他并未把主力部队全部配置在第一线，督饬军队进击敌人，致使日军得以继续蚕食乃至鲸吞我国大片领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同盟国在中国、泰国、越南、缅甸北部地区建立了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美英等国提供贷款和军用物资。他抽调精锐部队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协同美英军队重创日军。他派员交涉，与美国、英国先后签订了取消他们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的新约。他不仅得到了美英等国给予的贷款和租借物资，还请美国为自己训练和装备了一批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一时踌躇满志，意欲进一步加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限制和打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力量。他发表了由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攻击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妄行邪说”，诬蔑共产党“组织武力割据地方，企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6月，蒋指令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等召集作战会议，决定将一直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胡宗南3个集团军40多万军队，分兵九路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并在七八月间进行了数十次挑衅。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加紧包围华北和华中的一些抗日根据地。蒋介石这些反共行径，受到国内外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乃被迫停止了武装进攻。

1943年11月23至26日，蒋介石应邀出席中美英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他能作为“大国领袖”，和罗斯福、丘吉尔共同讨论对日作战及战后对日处置方案，兴奋异常。开罗会议加强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并决定了战后中国收复东北、台湾的基本方案。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就把打败日本的希望寄托在美英身上。在他看来，“美英若不是很快地打败日寇，便要以大力来援助中国，如此，中国便可坐享其成”。他以为抗战只要能拖，就可拖到胜利。因此，在1944年日本由豫湘桂地区发动强大攻势时，他采取避战、观战的消极态度，未加有力部署；加以国民党军队已经日趋腐败，长官贪污、走私，对士兵只是一味的采取高压手段，严厉地毒打酷骂，以此来维持部队的纪律，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以致在豫中、长衡、桂柳三次会战中，国民党军队损兵折将数十万，日军长驱直下，进入贵州，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难以计数。

但是蒋介石对于军队不容他人染指，就连美国总统代表史迪威也不容置喙。史迪威是罗斯福派来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重任的，他执行美国政府的政策竭力促使中国倾全力抗御日军，曾建议蒋调动西北地区国共双方的兵力，进击平汉线的日军，并想把积存的武器装备拨一部分给在敌后打击日军的八路军、新四军。他还要求蒋介石赋予他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蒋介石拒绝了史迪威这些建议和要求，他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1944年10月，在蒋介石要求下，罗斯福改派魏德迈接替史迪威。

这时的蒋介石自以为羽翼已丰，一心想要建立独裁专权的一统天下，强硬拒绝中共提出并得到全国人民广泛赞扬和支持的联合政府方案。美国政府派赫尔利来华“调处”国共关系，蒋介石坚持中共必须先交出军队，实现“军事统一”，并称要召开“国民大会”“行宪”。美国的“调处”原是为了“防止国民政府崩溃”，它公开宣布“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⑧这就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气焰，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蒋介石为了完备国民党专制统治，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于1945年5月在重庆主持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讲话中赤裸裸地宣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他分析发动内战的有利条件是：“我们有二三百万精锐的军队，足以消灭中共军队。我们的法币有十万万美金作准备，财政、物价都不成问题。”^⑨他号召国民党要“精诚团结”，建立与中共斗争的“体系”。大会闭幕后两天，蒋介石就调运10个师的军队向苏浙地区的新四军进攻；7月又指令胡宗南调动9个师向陕甘宁边区进犯。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一心要抢占抗战胜利果实，并为发动内战作准备，竟然下令伪军“就现驻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并任命一批汉奸为“先遣军总司令”、“绥靖司令”、“挺进司令”等，让他们配合国民党军队接收，唆使伪军拒不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而对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却是“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⑩不

准参加受降。8月15日他在重庆发表广播演说，要中国人民对日军“不要报复”，要“不念旧恶”。^⑧同时他下令“日军在军事行动停止后，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其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⑨听候国民党政府命令。

蒋介石急于占领收复区，以重建在全国的统治，在美国海、空军运输力量的帮助下，把长期散处在云、贵、川、陕等地的国民党军队，迅速运到南京、上海和华东、华北、华中各个战略要地。与此同时，他又派出大批文武官员到收复区接收敌伪资产，官僚资本这时又凭借权势接收了敌伪的各种金融机构和大型工商企业，据统计到1946年6月，官僚资本所控制的官营银行达2400余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70%；所控制的工商企业的资本，已占全国产业资本总数的80%以上。结果，大量工厂停工、商店停业，百业凋敝，物价飞涨，收复区广大人民大失所望。

四

蒋介石处心积虑发动内战消灭中共，但是他抢占战略要地和部署军事力量还需要时间；而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建设，要求国共两党继续合作的呼声又很高，国际舆论也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于是他在1945年8月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蒋介石对这次会谈的方针确定为：“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的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其对政治问题的所谓“宽容”，也是要“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

须以此为中心”。^④他委派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与周恩来、王若飞举行会谈，他自己与毛泽东直接进行谈判。对于中共代表提出的《谈判要点》11项，他认为“距离太远”，9月4日亲自拟定一个《对中共谈判要点》4条，强调政府“法统”不容紊乱，坚持“政令军令之统一”，要中共“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⑤

蒋介石对于谈判，曾经明白说过是为了“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即以‘土匪’清剿之”。^⑥所以在谈判中他提出了一些十分苛刻的条件，使谈判旷日持久，且一度中断。他在谈判期间，一再密令国民党军队抢占平汉、陇海线和东北地区的战略要地，并不断向解放区进犯。只因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中共方面又表现出极大的诚意，经过43天断断续续的谈判，蒋介石才无可奈何同意签订了《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确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1946年1月，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代表的参与下，经过22天的反复协商，会议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纲领、政府改组、增加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修改宪法草案、军队整编等5项决议，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及其奉行的内战政策。

但是蒋介石张罗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都是用来应付人民呼声和国际舆论的，他日夜盘算的是如何“消灭中共”，而

丝毫没有执行谈判协定和政协决议的诚意。还在重庆谈判《会谈纪要》签订后的第三天，他就下达“剿匪”密令，命令各战区长官遵照他在十几年前“围剿”红军时手订的《剿匪手本》，“督饬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④在他的命令下，国民党80万军队即沿津浦、平汉、同蒲、平绥铁路沿线向解放区展开进攻。

蒋介石想“消灭中共”的企图被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军事进攻虽然十分猛烈，但是受到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力抵抗。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国际舆论也反应强烈。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于1946年1月10日向所属部队下达停战令。但是他根本不打算遵守任何协定，而是加紧谋划发动大规模的内战。他密令所部趁停战命令下达前占领有利地点；随后又坚持东北地区不在停战范围之内，连续向关外增兵。以后在美国参预下，国共双方继续就东北问题、停战问题等进行谈判，但蒋介石根本不想在东北停火。5月下旬他亲自去沈阳督战，企图完全控制东北。

蒋介石认为，自己手里拥有430万军队，控制着全国大中城市、大部分交通线和丰富的资源，还有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经过将近一年的周密准备，完全可以在3至6个月内消灭中共的武装力量，乃不顾一切，悍然发动全面内战。6月23日，他命刘峙指挥12个整编师约30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12日，他又调动50万大军进攻苏北解放区。他还不顾政协会议确定的必须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训政”结束、宪草修正之后方能召开国民大会的协议，自行宣布定期

召开国民大会。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蒋介石躊躇满志，认为中共败局已定，立即发布了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在“国民大会”上，他提出一个“宪法草案修正案”，并说修改宪法就是为了打共产党。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又凭借强大兵力和炮火，在1946年7至12月的半年间占领解放区大小城镇105座，但却损失兵力70余万人。兵力不足，战线很长，蒋介石被迫放弃全面进攻的方针，改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1947年3月，他下令胡宗南部20余万人进犯陕北，19日占领延安，但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⑤在山东战场上，他命令顾祝同指挥3个兵团25万多人进犯沂蒙山区，自3月下旬至7月上旬三次进攻均被粉碎，美械装备的精锐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也被歼灭，蒋甚为沮丧。

到1947年7月，全面内战打了一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虽然侵占了解放区大批城镇，兵力的损失却达112万人。国共双方军事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战略主动权已由蒋介石手中转入解放军手中。但是蒋介石固执地要把这场内战打下去，认定“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⑥7月4日，他向国民党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提交了《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翌日又发布了一个《全国总动员令》。但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中共刘（伯承）邓（小平）部队，于6月30日突破黄河天险南下，进入鲁西南，先后歼灭国民党

军5万余人。蒋介石十分震惊，7月19日飞抵开封，调集11个整编师向鲁西南合围。与此同时，西北、华北、东北各个战场的解放军亦相继转入反攻。蒋介石感叹说：“全国战场皆陷入劣势被动之危境……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⑦11月，他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直接指挥豫皖赣湘鄂五省兵力，建立中原防御体系。12月蒋又制定“南北两线”“分区防御”的战略，重新调整了各大区军事指挥系统，分别组设东北、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国防部汉口指挥部等，在兵力上也重新作了部署。他加紧调兵遣将，四出巡视督战，力图挽回败局。

对于各阶层人民强烈反对内战，蒋介石视若悖逆，督饬国民党军、警、宪、特强化统治与镇压，国民党统治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内战军费的激增，使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947年发生了六次物价飞涨的风潮，一年间物价上涨20倍左右。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民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南北各大中学校风潮迭起，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1947年5月18日，蒋介石亲自出面发表谈话，威胁说学生的行动已越出“法律所许可之范围”，要“严整法纪”，^⑧在南京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二〇”惨案，打伤游行学生100余人，逮捕20余人；接着于6月1日在上海、南京、北平、武汉、杭州等地进行大逮捕，监禁学生和工人，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懑。

1948年3月，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召开“行宪国大”，说不

能“因戡乱而延缓宪政的实施”。^⑨在他一手操纵之下，他当选为“总统”，并获得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即在“戡乱”时期可以不顾“宪法”规定而为所欲为。在副总统的选举上，蒋介石属意孙科，亲自发号施令，坐阵指挥，力图操纵选举；但是李宗仁得到美国的支持，又有自己的桂系张罗，经过四次选举而终于获胜。这次争夺副总统选票的激烈斗争，暴露了蒋介石已无力控制国民党统治的政局。

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庞大的军费开支，使财政经济濒临崩溃，财政赤字在1947年达到总支出的90%，只能以滥发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为了摆脱困境，蒋介石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外币等；还颁布《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强令限制物价。这些高压措施，造成市场无货，黑市猖獗，不到3个月财政经济即完全破产，金圆券迅速贬值几成废纸，社会更加骚动不安。蒋介石后来也承认：“采取了金圆券改革币制的计划，以致币信每况愈下，……最后影响了全国金融的紊乱，物价的波动，乃使通货膨胀的趋势益加恶化，而无法遏制。”^⑩

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全面内战在各个战场不断失败，在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的一年间，国民党军队又被歼灭152万，总兵力已降至360万，而能用于前线的只有170余万。1948年8月，他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缩战线，实行重点防御。他扩编机动兵团和后备兵团，企图集中兵力聚歼解放军，以挽回败局。蒋介石的部署还没有定当，人民解

放军于9月12日发动了第一个战略大决战——辽沈战役。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被迫收缩在沈阳、长春、锦州几个孤立的据点，连结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地锦州陷入重围。蒋介石力图打通北宁路夺取主动权，30日飞抵北平召开军事会议，调集兵力由海路援救锦州；又于10月2日、15日、18日三次飞临沈阳，亲自指挥和部署。但是他无力挽回颓势，辽沈决战最终以被歼47万余人而告终结。他将这场战事的失败诿过于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下令将卫撤职查办。

与此同时，蒋介石以徐州为中心部署了60万重兵，打算在蚌埠附近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以固守徐州，保住南京。他坐镇南京，频频发号施令，调兵遣将，但战略战术的失误与军心的涣散，使国民党军队在淮海决战中不断受挫而被歼灭。蒋介石对嫡系精锐部队大量被歼，十分痛心。而此时他的亲信幕僚陈布雷、戴季陶又相继自杀身亡。财政经济的崩溃浪潮，更是扰动得他寝食难安。他一筹莫展，只有指望美国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派宋美龄前往美国求援。

辽沈决战结束后不久，平津决战又起。蒋介石鉴于东北已失，平津势难再保，而此时徐州战局正告危急，南京、上海兵力单薄，乃命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率部由海陆两路迅速南撤，以图多保存一些部队。但傅为保存自己的实力，想西撤察、绥，不肯南逃，蒋介石无奈，只得同意傅暂守平津。结果守军被分割包围，屡战屡败，傅作义于1949年1月21日接受离城改编的办法，古城北平和平解放。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国民党军队被歼154万多人，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维护独裁统治的有生力量

丧失殆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分析蒋介石失败的原因认为，“国（民党）军在具有决定性的 1948 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人员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观察的腐败现象，已经使国民党的抵抗力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已经证明是无力应付的。它的部队已经丧失斗志，它的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⑤美国决心换马，在中国公开策动倒蒋活动。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蒋下台，国民党军政要员中也有不少人要求蒋介石下野。蒋内外交困四面楚歌，势已难以为继，乃在 1949 年元旦发表文告说：“处此国家危机，我唯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负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愧悚慄。”他表示愿意“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是要“国体能够确保”，“法统不致中断”。^⑥他还企图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请美英法苏四国政府出面调停，但被一一拒绝；而对中共方面提出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他又不肯接受。

蒋介石陷于绝境，被迫于 1 月 21 日宣告“引退”，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但他不甘于失败，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操纵党政军。他先已把亲信安插为东南和西南各省的军政长官，加紧征集和训练新兵；派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把库存的 277 万余两黄金、1520 万枚银元以及大量珍贵文物、档案资料等运往台湾。他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渡江，声言要以海空优势保存长江以南，固守上海，暗地里作退据台湾的准备。他指责代总统李宗仁“以毛泽东之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⑦对于李宗仁、何应钦等人设想的国共“隔江分治”的和谈方案他也不首肯，顽固坚持“和谈必

须先订停战协定”，以致国共谈判破裂。4月20日解放军大举渡江，直指南京。蒋介石于4月22日在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秘密会商，决定继续作战。他24日离开溪口老家，乘军舰于26日抵吴淞口，召集顾祝同、汤恩伯等人部署上海防御。但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企望利用坚固工事挣扎的20万国民党军队毫无斗志。蒋介石见势不可挽，先由上海去澎湖马公岛，后转台北，在那里遥控从南京迁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7月他至广州，组设国民党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指挥国民党军队作最后抵抗；并出访菲律宾和南朝鲜，谋求声援。他在厦门、广州、重庆一再部署防御，企图负隅顽抗，无奈各路败兵犹如山倒，未能如愿。

蒋介石12月10日从成都败退到台湾后，沮丧至极。但他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声称要“反共复国”、“光复大陆”，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阻挠祖国的统一。他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10月1日正式成立，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称号，并于1950年3月宣布复职重任“总统”。这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凭借台湾的战略地位，重新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和庇护，1954年12月并和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他在台湾与“副总统”陈诚一道推行减租、公地放领和征收地主多余土地放领给佃农的政策，竭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财政经济，同时“改造”国民党，加强专权统治，严密控制全岛居民。他不断宣称要“反攻大陆”，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建议；也反对“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种种“两个中国”的论调，表示“中国事自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⑧坚持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立场，抵制

美日等国的侵略势力对台湾的覬觎。他很害怕失去国际的承认，在美国等国的支持下，用尽心计，使台湾当局非法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达22年之久；但终究抵挡不住新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于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被驱逐。他气恼至极，转而辱骂联合国“置公理正义于不顾，可耻的向邪恶低头，卑怯的向暴力屈膝”，“已成为罪恶的渊藪”。^①

蒋介石自1972年起多病。他于这年5月连任第五届“总统”后，即任命蒋经国为“行政院院长”，将统治台湾的实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死于台北。

蒋介石一生言论、文电甚多，散见于报刊及内部档案。国民党官方曾出版过他的言论集多种。台湾于1956年编印过《蒋总统言论汇编》24卷，1984年出版《先总统蒋公全集》3册，1985年出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40卷，都只是有选择地收录了一部分。

注：

① 据《葛竹王氏重修宗谱》和《武岭蒋氏宗谱》载：王采玉（1864—1921）乃浙江嵊县葛竹村（今划归奉化县）王有则之女，初嫁曹家田俞氏，不久俞病故，王带发入庵修行。后经堂兄、玉泰盐铺伙计王贤东作伐，1886年嫁蒋肇聪为继室。除生蒋介石外，尚生二女一子。据作者在浙江奉化的实地考察并查阅有关史料，蒋的家世是清楚的。曾有传说蒋父是河南许昌县衙师爷，蒋母先前嫁给许昌郑氏，蒋介石是出生在许昌的郑三发子云云，是不确的。

② 蒋介石：《报国与思亲》（1936年10月3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

集》(以下简称《言论总集》)第35卷第163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

- ③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以下简称《蒋介石先生》,1937年版)第1册第3编第1页记:“因受内外潮流之激荡,感痛国族之陵夷,家庭之莠弱,在校未三月即决计出洋,立志革命。”
- ④ 马叙伦:《陶成章之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第5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 ⑤ 孙中山:《致蒋纬国电》(1922年6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时蒋介石在宁波,通讯联络以蒋纬国名代。
- ⑥ 孙中山:《〈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1922年10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71页。
- ⑦ 蒋介石:《革命历史的启示和革命责任的贯彻》(1969年3月),《言论总集》第29卷第353页。
- ⑧ 《蒋介石先生》第5册第79页。
- ⑨ 蒋介石复孙中山书(1924年3月2日),《蒋介石先生》第6册第14页。
- ⑩ 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讲话(1925年4月9日),《蒋介石先生》第10册第12页。
- ⑪ 蒋介石:《忠告海内外党部同志书》(1925年12月15日),《蒋介石先生》第13册第42—50页。
- ⑫ 《上海商业联合会会员会议事录·听取虞洽卿会见蒋介石等情》(1927年3月27日),上海档案馆编:《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⑬ 《申报》1927年3月29日。
- 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1927年7月13日),《向导》第201期第2214页。
- ⑮ 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 ⑯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第483页,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版。
- ⑰ 蒋介石日记(1927年8月11日),〔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6册第175页,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1978年出版。
- ⑱ 蒋介石原有一妻一妾:1901年在家乡同毛福梅(1882—1939)结婚,1910年生蒋经国;1912年在上海纳姚怡诚(1881—1966)为妾。1921年又在上海娶陈洁如(1906—1971)。

- ⑲ 蒋介石于1930年10月23日在上海受洗入基督教。
- ⑳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公报》第99号。
- ㉑ 蒋介石：《对外关系之报告》（1935年11月19日），《言论总集》第13卷第523页。
- ㉒ 蒋介石：《救亡御侮之步骤与限度》（1936年7月15日），《言论总集》第14卷第318页。
- ㉓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㉔ 蒋介石致宋哲元手令（1937年7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㉕ 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1937年7月17日），《言论总集》第14卷第583—585页。
- ㉖ 蒋介石：《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二）》（1937年8月18日），《言论总集》第30卷第233页。
- ㉗ 蒋介石：《我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1937年12月16日），《言论总集》第30卷第250页。
- ㉘ 《德驻日大使给德外交部密电》（1937年12月23日），《德国对外政策文件集1918—1945》汇编第1卷第540号，华盛顿1949年版。
- ㉙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2日），《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103页。
- ㉚ 蒋介石：《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1938年4月1日），《言论总集》第15卷第185页。
- ㉛ 蒋介石：《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1938年7月7日），《言论总集》第30卷第269页。
- ㉜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㉝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㉞ 蒋介石1940年10月18日对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的谈话，21日蒋在致宋子文的电报中通报了上述谈话要点，见《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7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
- ㉟ 《皖南事变资料选》第7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㊱ 赫尔利在华盛顿的讲话（1945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5月8日。
- ㊲ 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军事政治经济党务之现状与改进的途径》（1945年5月1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⑳ 蒋介石致朱德、彭德怀电（1945年8月11日），《蒋总统秘录》第1册第76页。
- ㉑ 蒋介石发表的广播演说（1945年8月15日），《蒋总统秘录》第1册第25页。
- ㉒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356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
- ㉓ 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28、29日），《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18、19页。
- ㉔ 《重庆谈判纪实》第192、195页，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 ㉕ 张治中向胡宗南传达蒋介石秘示之电文，见中共谈判代表团1945年9月20日致中共中央电。
- ㉖ 《停战谈判资料》第39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㉗ 美国政府的评论，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1949年8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5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 ㉘ 蒋介石：《国军将领的耻辱与自反》（1947年6月），《言论总集》第22卷第135页。
- ㉙ 蒋介石日记（1947年11月30日），《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77页。
- ㉚ 蒋介石发表“整饬学风，维护法纪”的谈话（1947年5月18日），上海《文汇报》1947年5月19日。
- ㉛ 蒋介石：《对国民大会第一届大会开幕致词》（1948年3月29日），《言论总集》第22卷第438页。
- ㉜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7年6月），《言论总集》第9卷第195页。
- ㉝ 艾奇逊为公布白皮书给杜鲁门的信（1949年7月30日），同㉜，第39页。
- ㉞ 蒋介石：《告全国军民同胞书》（1949年1月1日），《言论总集》第32卷第207页。
- ㉟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存亡危急之秋》第154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4年版。
- ㊱ 蒋介石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的谈话（1967年9月8日），《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162页。
- ㊲ 蒋介石：《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1971年10月26日），《言论总集》第34卷第260页。

作者附记：本文初稿系作者与宗志文、郑则民共同研究、撰写而成，并经李新等同志审阅指正，付梓征求各界意见。现作者在初稿基础上又作了较大的修改订正。

杨 衢 云

袁鸿林

杨衢云，名飞鸿，字肇春，衢云为其号，福建海澄县人，1861年12月19日（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生于香港。祖父杨福康，清廪生，曾署理广东肇庆府新兴县知县，后弃官出国，居南洋槟榔屿。父杨清河，生于槟榔屿，16岁时返回本籍，后定居香港，曾先后在福建、香港当过巡理厅辅政司通事（译员）和书院的教员。

杨衢云幼从父读，14岁时入香港一家英国海军船厂学习机械，因不慎而断去右手中间三指。于是转而学习英文，考试常名列前茅。20岁毕业后，任香港圣约瑟书院教员，后改就香港招商局船务书记长，1894年转任英商新沙洋行副经理。

杨衢云少时曾习拳术而精技击，并任侠好义，尤关心时事，富爱国思想。他为人仁厚和蔼，有长者风度，见同胞受外人欺凌，则怒起而抱不平，不惜攘臂为之力争。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结局，对他刺激颇深，其思想便由爱国发展到立志反清复汉，并曾去广东寻求同志，但当时风气未开，并无应者。

1887年，杨衢云结识了香港域多利书院（后改称皇仁书院）学生、具有反清意识的谢纘泰，并引为知己，结为拜盟

兄弟。1890年，他与谢纘泰联络了在外人所办书院、洋行中求学、任职的爱国青年陈苏、周超岳、黄国瑜、罗文玉、刘燕宾等人，开始在香港酝酿成立辅仁文社——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由新型知识分子组成并含有反清革命因素的资产阶级政治团体。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正可谋划和组织一场中国大众的革新和驱逐……满族鞑虏的运动。”^①1892年2月13日，辅仁文社正式设总部机关于香港百子里一号二楼，社员共17人，杨衢云被选为会长。辅仁文社的社纲有六条：“（1）纯洁品性至最高程度；（2）禁染社会恶习；（3）为未来青年作表率；（4）经种种可能途径，增进中外文武两种学识；（5）获得西方优秀科学文化；（6）学习如何做爱国者，如何从事爱国活动和如何消除祖国所蒙受的屈辱，尽心爱国。”^②提倡西学、开通民智和爱国维新是辅仁文社的公开活动，社中曾购置多种新书报，以供讲研和传播。杨衢云和谢纘泰系社员中学习西学最优秀者。谢曾于1894年基本完成了“中国”号飞艇的设计方案（方案发表后曾得到外国著名飞艇学家的高度赞赏）；杨则对西方政治理论研究较深，成为第一个明确要在中国建立共和国的革命党人。而在暗中，以杨、谢为核心的部分社员时常密谋反清革命，还曾探访过广州清政府驻香港的特务机关，以察清方的虚实。辅仁文社的总部也曾受到香港英政府的怀疑，时有西人的警探出入其间。

1892年秋，杨衢云经尤列的介绍与孙中山相识。他们一见如故，常在一起抵掌畅谈救国大计，以至达旦不倦。杨首倡孙杨两派合作，主张孙先在广州组织团体，以与辅仁文社共策进行，孙表赞同。翌年冬，孙与尤列、陆皓东、郑士良

等八人在广州广雅书局南园抗风轩集会，孙根据杨的主张，提议宜先成立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与会者均表赞同，但不及制定会名，亦未形成具体组织。杨由于居住香港，未能到会。次日，尤列去香港，向杨报告会议情况，杨大为称赞。其时，孙、杨之间已在反清革命的宗旨上取得一致，只是对于共和国制度，尚有出入：孙主张“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戴，以倒外族满清为主体”，杨“则非造成民国不可”。^⑧尽管有此分歧，孙、杨之间的交往和有关合作的筹商，毕竟为后来孙杨两派的联合奠定了基础。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极大地震动了杨衢云、孙中山等革命者，空前的民族危机加速了他们两派联合和发动反清武装起义的步伐。恰值杨衢云和谢纘泰等人正苦于找不到新的革命同志，以发展辅仁文社之时，孙中山已于1894年冬在檀香山创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于1895年1月下旬抵达香港，杨衢云便与孙中山等人筹商两派联合，共组革命团体。2月，香港兴中会在孙杨两派联合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杨衢云率谢纘泰、周超岳等部分辅仁文社成员加入，并取消了辅仁文社。

在孙、杨的共同领导下，香港兴中会成立伊始，即着手准备夺取广州的武装起义。起义的准备大致分两头进行：孙派在广州，杨派在香港。香港的准备工作在杨衢云的亲自主持下进展很顺利，筹措军饷、外交宣传、购运枪械以及募集会党等诸方面的成绩均十分显著。在起义筹备基本就绪时，兴中会主要成员于1895年10月10日举行会议，选举兴中会会长兼起义后临时政府总统。会上，孙杨两派争相拥戴自己的

领导人出任，几乎导致两派分裂，后经孙中山退让，杨衢云遂被两派共同举为会长兼总统。起义原订于10月26日（重阳节）发难，不料起义前两日，因事泄而受到清政府的镇压，起义未及发动即遭失败。由于杨衢云在这次起义中的领导作用，清政府广东地方当局把杨与孙并列为“匪首”，各出赏格“花红银1000元”，布告缉拿。^④孙、杨等人被迫外逃避难。11月13日，杨离港前往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并经过海峡殖民地^⑤而去南非。孙早于10月30日偕陈少白、郑士良离港赴日。

杨衢云到南非后，便在当地华侨中积极宣传革命、努力发展同志。1897年，他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和彼得马里茨堡建立兴中会分会。1897年12月至1898年3月间，杨在返回香港的途中，又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等处建立兴中会分会，并与当地的反清秘密团体建立了联系。期间，孙中山也在日本、美国、英国等地开展革命活动。但是孙杨两派由于起义前的争夺会长和起义失败后的互相埋怨，彼此互不联系长达两年之久，致使香港兴中会实际上陷于瓦解。1898年3月21日，杨衢云携家眷抵达日本横滨，以教授华侨子弟英语为生。不久，杨主动找到孙中山，恳切要求两派抛弃嫌隙，重新共事，孙表接受。两派从此恢复合作直到庚子惠州起义。杨始终维护两派合作，实是两派合作的纽带。

1899年4至6月间，杨衢云在谢纘泰的促使下，曾同康梁一派有所接触，并与梁启超在横滨举行过会谈，筹商合作事宜。起初，杨与谢纘泰一样，认为康梁一派也是真正的爱国者，在其“和平革命”——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们可能会

乐意同革命派联合，共襄反清大业，因此对与康梁一派的合作颇怀期望。但后来杨却发现：“康党甚傲慢……不愿同我们平等相处；总想要控制我们，或者要我们全都服从他们。”^⑧因而与康梁一派有关合作的商谈并无结果。以后，杨对康梁保皇会明确表示谴责，断绝了同康梁一派的联系。

1899年11月，孙中山指示陈少白、毕永年、宫崎寅藏等人邀哥老会、三合会首领集于香港，成立兴汉会，会上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后，孙以不宜两会长并存为由，请杨辞去兴中会会长职。杨当即表示了赞助孙中山领导、维护两派合作的诚意，并说：“为了有利于事业，我一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我的职务了。”^⑨当时，杨闻孙正在筹划惠州起义，便自请回港筹备。1900年1月，杨从日本到达香港，经与谢纘泰商量，毅然提出辞职书，荐孙代兴中会会长，而从事革命运动则更加努力。他每日去兴中会在香港的机关《中国日报》社，凡筹备起义的事，无论大小，均奔走不倦。4月26日，杨离港去日本东京见孙中山，商量起义策略。6月17日，杨与孙同轮抵香港，经当日会议议决，杨与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在杨的积极影响下，已决意与孙中山分手的谢纘泰，也暂时中断了其独自谋划的另一次起义的准备，重与孙派共事。杨、谢两人还发展了李纪堂、史坚如为兴中会会员，李、史两人均在惠州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

10月上旬，惠州起义在三洲田打响后，起义军屡败清军。清廷南海县知县裴景福惊恐万分，乃于中旬派植槐轩、陈廷威到香港见杨衢云，提出三条“议和”条件：一、招降党人

各首领，以道府副将任用；二、准带军队 5000 人；三、给遣散费若干万。杨考虑到原定由香港和台湾给起义军输送枪械和干部人员的方案均已无法实现，起义军不久将援绝弹尽难以坚持，因此错误地以为可利用这次“议和”，使起义军潜伏下来，以便“此后有所凭借，大可为李世民之续”^⑧。杨将自己主张接受“议和”的意见电告孙中山，请示可否，遭孙拒绝，“议和”遂止。

惠州起义由于弹尽援绝而失败，杨衢云被列为要犯，清廷两广总督德寿悬赏 30000 金购杨首级，因此同志多劝杨出洋暂避。杨不忍虚糜革命经费，在香港设学校教授英文以自给，并慨然表示可为革命一死。1901 年 1 月 10 日，杨正在授课，突然遭到清政府所派凶徒的枪击，次日不治身亡。杨衢云对于辅仁文社、香港兴中会的组成和发展，对于孙杨两派在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中的合作，都有卓越的贡献。孙中山在横滨得知杨的噩耗，异常哀痛，曾出名主丧，发讣告数百份于中外各地，又于 1 月 26 日召集同志举行追悼会，并募集捐款 1200 余元恤其遗族。

注：

- ① 谢纘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英文版）。
- ② 薛君度：《孙中山、杨衢云与中国早期革命运动》，见薛君度编：《中国近代革命领导人物》（英文版）。
- ③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 年南京版）。
- ④ 大同学会编辑：《中华民国革命建国史》第一卷。
- ⑤ “海峡殖民地”为 1866 年英国合亚洲马来半岛南部之马六甲、新加坡、檳榔嶼等处组织而成之旧称。

- ⑥ 《杨衢云致谢纘泰函》(1899年6月6日),见谢纘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 ⑦ 同①。
- ⑧ 冯自由:《杨衢云事略》,见《革命逸史》初集。

范 光 启

史全生

范光启，字鸿仙，笔名孤鸿，1882年6月20日（清光绪八年五月初五）出生于安徽合肥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范彦达，早年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失败后回乡务农。范光启小时候常常听他父亲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反抗的种子。入学读书后，即立志长大为贫苦人办事，每天早起晚睡，刻苦攻读，深受邻里称道。稍长，为生活所迫，辍学随父务农，然仍手不释书，笃学不倦。

二十世纪初年，为反抗帝国主义日益加紧的侵略和清廷的腐败统治，各地革命潮流风起云涌，范光启于1909年春毅然离家去上海，与章太炎、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等人密切往还，加入了同盟会。5月，于右任创办《民呼日报》，他应邀参加，初时从事校对，不久即为主编及撰稿人。从此，范便以“孤鸿”为笔名，不断在报刊发表文章鼓吹革命，激昂高亢，“读之者无不激扬”。^①由于《民呼日报》不断在报端揭露清朝官僚的腐败黑暗，被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等人指控。8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将于右任拘捕，查封了报纸。范光启四出奔走，设法营救，并挺身入会审公廨对簿，自承文责，使于右任获赎释放。

10月3日，于右任、范光启等又在《民呼日报》的基础

上创办《民吁日报》。这时于右任不能公开出面，由范光启任《民吁日报》社社长，景耀月为总编辑。

《民吁日报》创办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与沙皇俄国勾结，阴谋共同攫取我国的景齐铁路。10月下旬，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访问俄国途中，窜到我国东北进行阴谋活动，26日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范光启等立即以此为题材，在《民吁日报》上掀起了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高潮，对伊藤博文的来华和被刺，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他在报上著文说：“汉族不幸，清政失纲，东夷乘衅，陵铄诸夏，惧将倾复国家，沦丧区宇，斯诚志士致命致节之日矣！”^②号召人们奋起革命。

《民吁日报》的揭发批判，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恼怒，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松冈以《民吁日报》“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中日邦交”^③为词，向清政府上海当局提出“强烈抗议”。上海当局于11月19日查封了《民吁日报》，拘捕了范光启，经过几次审讯，判定该报永远停止出版，所有主笔人等均免于深究完案。

范光启等获释后，又与于右任积极筹办新的报刊。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于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办了《民立报》，于任社长，范为总理。范继续著文，为革命奔走呐喊。

1911年4月27日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总结了华南沿海沿边地区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决定在长江流域筹谋起义，于7月31日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部，主持长江各省的革命运动。范光启参与了同盟会中部总部的创建工作，被举为总部候补文事部长和安徽

分部的主持人。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来，范光启立即在《民立报》发表短评，热情歌颂，把辛亥这一年称之为“诞生革命之岁”，“诚有史以来所未有”，敦促清王朝政府必须缴械投降。同时，他积极策划长江下游各省起义响应，先后参加与安徽、上海、江苏的独立光复运动。上海、苏州光复以后，张勋率领清军江防营顽敌盘踞南京，严重威胁着苏州、上海的安全。为了巩固苏、沪，光复南京，范光启积极策动驻扎在南京城郊秣陵关的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阵前起义。他对徐绍桢分析当时形势说：“满清无道，百姓分崩，今义师奋起，海内响应，此天亡之时。将军明德英才，总兹戎重，苟动枪鼓，扶义正伐，孰敢不从？以此诛钜胡虏，匡济华夏，诚千载一时之机会也。”^④并进而指出：今“张勋兵临阵前，倘不奋起杀敌，必然被他宰制。当今之时，只有召将士，众擎协力，击败江防军，才能顺人心，振士气，而为天下之倡。”^⑤徐绍桢闻言大受鼓舞，立即动员士兵进攻雨花台江防营营地，终因缺乏弹械，败退镇江。

新军第九镇秣陵关起义失败以后，范光启继续奔走于上海、镇江之间，组织江浙联军，力谋光复南京；并以大义说服联军各将领，推举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使军事复振。徐绍桢在新败之余，得范光启和众将士如此推重，十分感激，率领联军全体将士奋勇杀敌，终于击败张勋江防营顽敌，光复南京。

张勋刚退出南京，联军内部就出现一场权利之争。镇军司令林述庆首先入城，自恃功高，驻军两江总督衙门，遍贴

布告，自称苏军都督。各友军对林颇为不满，公推徐绍楨为苏军都督，与之对抗，大有水火不容之势。范光启闻讯，即与宋教仁等奔赴南京，向联军各将领会商调解，经多方协商，一致公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徐绍楨为南京卫戍司令，林述庆为北伐军总司令，使联军内部避免了一场内讧。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民党各领袖也都拥居高位，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继续进行中断了的南北谈判。范光启认为：清廷仍在，大局未定，不可轻敌，乃呈请孙中山允准，亲赴皖北招募民军。他计划招募4个整师，然后出师北伐，扫荡中原，以武力推翻清朝统治。江淮少年热情报名，纷纷应征，不多时即募集5000余人，编为2个支队，号称铁血军，范被任为铁血军总司令。队伍随即开往南京，进行整训。就在这时，南北和议告成，清帝宣布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袁世凯继为临时大总统。范竭力反对，指出：“伪孽虽去，袁贼未枭，北庭诸将，各仗强兵，跨州连郡，人自为守，而无降心。今度一时之势，以安易危，共和之政，不三稔矣。”^⑧然而势无可挽，范流涕叹息，慨然辞去铁血军总司令职，将5000余人改编为民军第三十五步兵旅，由龚振鹏任旅长。他返回上海，复主《民立报》笔政兼总理之职。袁世凯曾多次征聘范光启北上任职，范均拒绝。

袁世凯攫取临时大总统职以后，为了建立专制独裁统治，不断杀害革命党人，遣散民军队伍，并于1913年3月20日指使凶手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宋教仁。在孙中山领导下，一部分革命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范光启积极参加了这场反

袁斗争。7月上旬，范光启回安徽策动反袁，邀约管鹏、郑芳荪、张汇韬、凌毅、袁家声等在正阳关举行军事会议，商讨组织讨袁军，因彼此意见不合未成。范回家，生了一场重病，病未愈，他就约同管鹏赴芜湖发动讨袁运动，以驻芜旅长龚振鹏名义宣布讨袁。各界公推范为安徽都督，管为民政长，^⑦两人均辞而不就。范认为，皖督一职仍应由柏文蔚继任，以资号召。他一面命令龚振鹏潜师袭取颍州，北定淮上诸郡，一面发兵进攻大通，控制要隘。范发出通电，邀请被袁世凯免职而在南京闲住的原安徽都督柏文蔚返任皖督主政，敦促被新任命为皖督的孙多森和被袁收买了的师长胡万泰认清形势，顺从大义，服从柏文蔚领导，共同讨袁。

7月下旬，柏文蔚回皖就职，范光启从芜湖赶赴安庆，协同柏文蔚并力进据淮上诸郡。这时，南京方面由于北洋军阀冯国璋部和张勋部大军压境，连战失利，黄兴出走。安徽亦受到倪嗣冲部的进攻，讨袁形势急剧变化。胡万泰叛投袁世凯，围攻安庆，逼迫柏文蔚交出范光启等人。范挺身而出，从容陈词道：“吾党知杀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义，使吾得遂横草之烈，幸也。”^⑧毅然驰马赴义，幸被人拦阻。

范光启潜至上海，时“二次革命”已经失败。袁世凯四出通缉革命党人，悬赏10万元缉捕范光启。范在上海不能立足，便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孙中山在日本筹备组织中华革命党，范光启被列名为流亡日本的各省重要党人之一。

1914年2月，范光启接受孙中山指令，回上海联络革命力量发动反袁斗争。这时，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派遣爪牙四出

活动，捕杀革命党人。范在嵩山路设立机关部，组织革命志士，积极准备进攻驻设在上海制造局的镇守使署，同时运动北洋军内一些同情革命的将士作内应。为筹集经费，他把自己珍藏的数千卷珍本图书变卖一空，又典当衣服、被褥、首饰。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奔走，终于准备就绪。不幸，范光启运动北洋军将士一举，已为郑汝成侦悉，郑收买4名凶手对范跟踪行刺。1914年3月20日凌晨4时许，正当范光启在嵩山路机关部寓所起草军书时，4名凶手闯入寓所将其刺死。孙中山在日本闻讯，极为痛悼，派员至上海致祭抚恤。1933年范被追赠为陆军上将，1936年移葬于中山陵东侧马群，为中山陵“附葬”。

注：

- ① 刘文典：《范烈士鸿仙先生行状》，《学风》第5卷第10期。
- ② 《故陆军上将范烈士（光启）墓表》。
- ③ 《时报》，1909年12月30日。
- ④ 同①。
- ⑤ 毛北屏：《范鸿仙与铁血军》，《江苏文史资料》第6辑。
- ⑥ 王气钟：《范鸿仙传》，《学风》第5卷第10期。
- ⑦ 柏文蔚在《安徽二次革命始末记》中说芜湖各界公推管鹏为都督，范光启为民政长。管鹏在《安徽讨袁军始末》中记：范光启为都督，管鹏为民政长。管鹏为当事人，柏文蔚当时则闲居南京。故以管鹏之说为准。柏、管二文均见台湾《革命文献》第44辑《二次革命史料》第268、276页。
- ⑧ 同②。

沈 纘 云

汪仁泽

沈纘云名懋昭，以字行。1869年2月7日（清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江苏吴县，祖籍江苏无锡。他原姓张名祥飞，父亲张桐龄是举人，母亲郭氏也知书善画，在家乡设塾授课。太平天国进军江南，全家避居上海。父在某绅商家任家庭教师，母在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清心女书院当教师。祥飞12岁时，随母信仰基督教。他先在家自学，旋蒙培雅书院（约翰书院的前身）校长颜永京的允许，进该校为插班生，学习勤奋，品学兼优，深得师长赞许。此时，无锡富商沈金士因子早亡，遗一独生孙女，拟招赘孙婿，承继家业。经校长颜永京介绍张入赘沈家，遂改姓字为沈纘云。其后沈家专聘家庭教师教他读四书五经，他应科举考试，20岁时中举人。后来他顺从沈金士的原意，自己也有志于振兴实业，放弃致仕之途，在自办的铁工厂里学习技术，助理家业。

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值内忧外患，面临瓜分危机。沈纘云受实业救国论的影响，深感振兴实业，首重金融。此时外国银行在中国纷纷开设，沈遂于1906年与无锡实业家周舜卿等人合资，在上海创办信成商业储蓄银行。集股50万元，实收半数，推周舜卿、王一亭、顾馨一、林虎侯、徐子云等为董事，周舜卿任总经理，沈纘云任协理，主持日常行务。沈

缙云办事精干谨慎，经营得法，该行业务得以迅速发展，次年又获得钞票发行权，并代理清政府上海道署的库银，信用益著。此后陆续在南京、天津、无锡、北京等地开设分行，营业蒸蒸日上，存款高达700余万元，钞票发行额亦达110万元。

沈缙云在从商之余关心时局，阅读中外报刊杂志，并热心教育慈善事业。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中国国会”，谋组自立军，沈助饷15000元，是为沈以雄厚财力从事政治活动之始。1906年，沈与人合办上海竞化女子师范学堂，由其妻沈钦苓任校长。同年沈受马相伯聘为复旦公学校董，又与高翰卿、王一亭、李平书等创办上海孤儿院于南市雨化堂，后又在龙华觅地20余亩，建屋40余楹，收容孤儿300余人。

1906年，沈缙云组织上海南市商业体操自治会，自任会长，号召青年锻炼体魄，从事军事操练。次年该会与商学补习会等团体合并成立上海商团公会，参加操练的会员数百人，沈亦带头出操。该会后来成为全国商团联合会的基本队伍，光复上海时是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自同盟会1905年在日本成立后，国内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于右任等人1909年在上海先后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鼓吹革命，所刊文章慷慨激昂，沈缙云心向往之，亲往报社访于右任，倾谈之下结为莫逆，并慨助经费万余元。1910年，沈被上海商务总会推为赴京请愿代表，向奕劻面请速开国会，但遭拒绝。他感叹：“釜水将沸，游鱼未知，天意难回，人事宜尽，请自此辞。”^①他认定中国前途“舍革命无他

法”。^②在高涨的革命形势和革命党人的影响下，他决心投身革命，经于右任、叶兆崧的介绍，是年初冬参加同盟会，是为沪地上层资产阶级加入同盟会的第一人。在他的影响下，王一亭、叶惠钧等人也在同年底及次年初加入了同盟会。

1910年10月，于右任等人又办《民立报》，沈缦云资助经费5万元。此时报馆实际上成为同盟会在上海的联络总站，迎送来往人员，交际招待食宿等费开支浩繁，皆由沈缦云主持的信成银行负担；盟友经济困难商借旅费等，沈也有求必应。^③此时同盟会准备在长江流域一带组织武装起义，沈缦云受命筹款45000两，委托其兄德商瑞记洋行军装部买办张祥和向德国购得步枪3000支、子弹50万发，惟从欧洲运经香港时，被香港当局查获，全部没收。

1911年初，英、俄加紧对我边境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甚，同盟会决定指派沈缦云、叶惠钧等人组织反清武装力量。3月11日在2000多人参加的“保界会”成立大会上，沈即席演说，号召“准备实力”。然后沈又与宋教仁等发起组织全国义勇队，由宋编订章程，但未成立前即被清政府侦知，勒令解散。接着“乃舍义勇队之名，行义勇队之实，与沪上有识志士创办‘全国商团联合会’”，^④推举李平书为会长，沈缦云、叶惠钧为副会长，于4月8日成立，会员千余人参加军事操练，为上海的武装起义作准备。此后，同盟会于6月联合沪上各团体组成“以提倡尚武，兴办团练，实行国民应尽义务为宗旨”^⑤的反清联合军事团体——中国国民总会，由沈缦云任会长，其中骨干多为同盟会会员，成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与江浙地区的资产阶级发生了较多的联系。

10月10日武昌首义后，上海同盟会党人多次集会，商议响应武昌起义的部署，初议上海视南京举动。10月24日陈其美、宋教仁、于右任、沈缙云、叶惠钧等人在同盟会紧急会议上决定联络商团，沟通士绅，争取商团重要人物李平书等人加入起义，并指派沈缙云担任此一任务。沈与李原系知友，经试探，李表示愿意站到革命方面来，于是约定李与陈其美会见。李认为“时势至此，不能守闭关主义，当审察情势，以为进止”，^⑥并说动沈信卿、吴怀疚、莫子经等人于24日与陈相见，共同约定以保民为宗旨参加起义。从此每晚集会商讨，后又有纽永建等人参加，队伍不断扩大。11月1日因南京方面倾向革命的第九镇被调离，一时难以发动，而武汉方面清军反扑，形势危急，陈其美等人决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以解救武汉之危”，并立即进行布置。

11月3日下午，上海发动起义，闸北一路进展顺利迅即光复；而进攻江南制造局一路遇到顽抗，陈其美企图劝说敌军放下武器，结果被敌拘禁。此时清方声言：将从宁、松两路反扑，届时“无论革党、商团，擒获者一律正法”，^⑦形势紧迫。沈缙云与王一亭、李平书、叶惠钧等立即商议于商团公会会所，决定以商团为主力再攻制造局。商团集合千余人，临行前沈即席痛哭陈词，闻者动容，士气高涨，连夜围攻制造局。次日黎明胜利攻克，全市光复。是年年底孙中山回国抵沪时，曾亲书“光复沪江之主功”匾额一方赠予沈缙云，^⑧以彰其功。

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任都督，沈缙云任财政总长。由于事起仓卒，军无宿储；而清政府所设各税捐局

所，已于起事时明令裁撤，原主事者挟款逃遁，以致饷糈无出，而各地军队集沪者达数万人之众，军政各费皆需财部筹措，每晨鹄候环索者数以百计。沈缙云首当其冲，从黎明直至深夜奔走筹款，任劳任怨，而流言蜚语层出不穷，恫吓信日必数件。信成银行前后垫款达30余万两，犹不足应付。^⑨原存信成的前清上海道公款26万余两，也被各国驻沪领事团强行提取，充作赔款，不及扣留，面临财政危机。沪军都督府委派沈缙云另组中华银行，于11月21日在沪成立，发行军用钞票及公债，以应急需。12月3日沈辞去财长一职，改选朱葆三继任。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委沈缙云为驻沪理财特派员，后复委为劝业特派员。同盟会特派沈为本部理财部干事兼南洋群岛交际员。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担任全国铁路督办，研究实业建国计划，以开办金融机构为实施计划的基础，发起组织中华实业银行，自任名誉总董，指派沈缙云为筹备主任，由沈往南洋一带向华侨募集股款。次年事成回国，该行于5月15日在上海正式开业，沈任总理。不久，孙中山发起组织中日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在沪召开筹备会，孙自任筹备员长，沈缙云、张静江、王一亭、宋嘉树、朱葆三等任筹备员。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并向英、法等五国银行签订《善后借款合同》，筹措武力统一中国的战费，反动面目彻底暴露。孙中山领导国民党人在江西、江苏、安徽、广东以及上海等地举兵反袁，发动“二次革命”，不久失败。孙中山、陈其美、李平书等流亡日本，沈缙云全家亡命大连。

沈在大连继续从事反袁秘密活动，经常与当地工商、教育、新闻、宗教界人士接触。1915年陈其美、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到大连，要沈联络关外党人，筹组革命机构，开办报馆，加强反袁宣传。袁世凯侦知沈的行踪，如芒刺背，非去之不可。此时有一自称在奉天（今沈阳）办报的同盟会盟友张复生者，常来访沈晤谈，执礼甚恭，并称奉天有一报馆拟出盘，沈遂被邀往奉天一行，观看该报馆馆址。沈离奉天上火车前，张殷勤设宴饯别，沈数小时后回到大连寓所，顿觉头晕欲吐，四肢麻木，全身抖颤，急延日本医生诊治，谓系烈性食物中毒，已难挽救。沈在弥留之际，断断续续地说：“你这盟友已变成叛徒”，“孙中山先生和我都是不怕舍身的基督徒”，“你能害我的肉体，不能损我的灵魂、灭我的志愿”。^①延至1915年7月23日晨，抱恨逝世，时年48岁。孙中山获悉噩耗，潸然泪下，亲题“如见故人”挽词，以志哀思。

注：

- ① 天津《大公报》1910年6月12日。
- ② 王蕴登：《无锡沈绶云先生之墓志铭》。
- ③ 戴季陶1947年4月17日致陈果夫、陈立夫函称：“戊申（1908年）、乙酉（1909年）以后，革命同志在上海之活动，无论其事业为教育为宣传，乃至四方途经上海者，或多或少无不受绶云先生物质上、精神上之鼓励。”（原函抄本存沈氏家属处）
- ④ 《时报》1911年4月9日。
- ⑤ 《中国国民总会材料》，《时报》1911年5月8日、6月12日。
- ⑥ 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自叙》卷三，第287页。

- ⑦ 伍特公：《上海商团克复上海纪略》（1947年回忆），抄本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⑧ 沈子高：《沈绶云的一生》，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142页。
- ⑨ 沈云荪：《上海信成银行始末》，《近代史资料》总55号第112—119页。信成银行于沈绶云亡命大连后因无人经营，1913年9月临时股东大会公推查察员进行清查账目，至1914年秋将存款全部发还，发行之钞票亦如数收回。各地分行相继停业，总行亦宣告清理。
- ⑩ 同⑧，第143页。并参见戴季陶1947年4月17日致陈果夫、陈立夫函：“思昔年英士先生光复上海之时，商界中之努力相助者以绶云先生为多。即癸丑（1913年）之役，绶云先生亦为最出力之重要人。是以被忌于袁，终至客死大连。”

李 书 城

李丹阳 刘建一

李书城字晓垣，亦作筱园，湖北潜江县人，1882年6月24日（清光绪八年五月初九）生。父李凤亭系秀才，在家乡作塾师。李书城自幼随父读书，1899年中秀才，随入湖北经心书院学习，初步接触到一些新学知识。^①次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长江流域自立军起事失败，他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

1902年，李书城因学习成绩优异，被张之洞选送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与黄兴、鲁迅同学。在日本，他遍览中外书籍，汲取中国传统爱国思想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学说，并常与黄兴等人讨论救国问题。他认识到：“清廷是中国复兴的障碍，爱国志士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推倒清廷。”^②是年秋，经兴中会会员程家桢、刘成禺介绍，他在东京竹枝园与孙中山会面，亲聆其反清革命的主张，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遂与刘成禺、蓝天蔚等鄂籍留日先进青年十余人组织了“湖北学生界社”，于1903年1月创办《湖北学生界》杂志。李在该杂志发表了《学生之竞争》等文，痛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局，抨击清政府“治内专务压制，对外只知唯诺”，认为学生是“下等社会之指向针”，应肩负起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的重任。此外，他还撰印了《潜江李书城与鄂中友人书》寄到国内，号召同胞们“慨然发奋，无畏艰辛，献此身为中国用”，使“鄂学界大为振奋”。^③为了回

国开展革命活动，李书城与黄兴、蓝天蔚等人在湖北学生界社内“密结排满盟约”，^④经常在一起商讨革命方略。这时留日学界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三省，掀起拒俄运动，李参与发起拒俄大会，发表激烈演说，并报名参加了拒俄义勇队。

同年夏，李书城毕业回国，随即参加以吴禄贞为首的“武昌花园山机关”的革命活动。李负责秘密联络军队，介绍有志青年加入新军。^⑤如辛亥武昌起义的著名领导人之一刘静庵，就是由他从原籍潜江带至武昌，经吴禄贞介绍入新军的。是年冬，李与吴禄贞、耿觐文应黄兴之邀赴长沙，筹划在湖南发动起义。1904年4月，因吴奉调入京，李遂离湘回鄂。经过一段革命活动的实践，他深感“革命须靠武力”。^⑥于是再次东渡日本，顶用“丁人俊”名入振武学校学习陆军，毕业后在陆军联队实习一年，升入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

1905年夏初，李书城等人接到在欧洲的胡秉柯、贺之才等人的通知，为孙中山赴日本组织同盟会“预为筹划”。^⑦7月，孙抵日后，李出席了同盟会筹备会，并化名李唐宣誓入盟，成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不久，他遵照黄兴的指示，在留日学军事的同盟会会员中组织“丈夫团”，为以后回国进行武装斗争培养骨干力量。

李书城于1908年底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归国，在桂林筹办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次年，任该学堂监督，并一度兼任陆军小学堂监督。他“用多种方法激发学生的革命情绪”，^⑧与在校同志一道在学生中发展同盟会员，培植革命的军事力量。不久，他与在桂同志秘密策划利用陆军小学堂毕业典礼之机杀掉巡抚张鸣岐宣布起义，后因张有所察觉而未

成。为了麻痹官吏，掩护其他同志继续留在广西，李辞职离桂。

1910年初，李书城到北京，任军咨府科员。他与在京同盟会同志共谋“中央革命”，曾建议时任蒙古副都统的吴禄贞谋任一省巡抚，以建立革命基地。12月，吴禄贞任北洋第六镇统制后，呈请清政府任李为该镇标统或参谋长，未获准。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李书城随吴禄贞由京赶赴保定，企图举兵响应。后因军咨府命他南下调停战事，他乘机携眷出京赶往武昌。11月3日，被任命为民军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协助总司令黄兴在汉阳前线制订作战计划，指挥战斗。不久，湘省援军赶到，李主张“利用湘军第一协之旺气，配合鄂军精锐收复汉口”。^⑨经黄兴等人同意后，民军遂于16日晚渡汉水攻打汉口。初战得手，北洋军将领冯国璋已欲逃遁，后因清军不断增援，民军复退至汉阳，与清军相持十余日，为各省起义赢得了时间。27日，汉阳失陷，黄兴辞职去上海，李书城亦于次日离鄂赴沪。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为陆军总长，李书城出任总统府秘书处军事组长兼陆军部顾问官。南北议和告成后，任南京留守府总参谋长，在黄兴离宁时代行留守职权。这时，袁世凯为了扼杀南方的革命势力不给南京拨汇军费，引起部分军队哗变。李书城去电愤怒指责这种失信行为，并痛斥袁政府以南方需款为名，同四国银行团缔结“亡国灭种”的垫款合同。^⑩但在“兵多饷少”的情况下，李不得不襄助黄兴裁撤大批南方军队。同年秋，李偕黄兴到北京，被授予陆军中将衔，任总统府军事处

次长。次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李借故离北京往上海。随即受黄兴委派潜赴南京，策动第八师起兵讨袁，未成返沪。7月14日，李再赴南京参加讨袁之役。

“二次革命”失败后，李书城被迫流亡日本。1914年，他陪同黄兴赴美，在美国各地游历访问，并在华侨中从事反袁宣传，为护国军募款。次年，国内讨袁声势重新高涨，李受黄兴委托，先期回国参与讨袁。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死去。这时黄兴在上海病重，李为照料黄兴，逗留上海数月，代黄兴处理各种事宜。迨黄逝世后，始到北京任总统府顾问。

1917年7月，孙中山为反对段祺瑞政府毁弃《临时约法》，在南方掀起“护法”旗帜。10月，南北战争爆发，李书城由北京急赴南北军对峙的湖南前线，收集黎天才、石星川溃部，任湘西防务督办兼援鄂军总司令，率部与北军作战。南北停战后，李前往广州，任护法军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1920年，李书城回到上海。此时，他的胞弟李汉俊正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李因对民国以来“群雄扰攘，国困民敝”^①的社会现实深为不满，故认为救国之路不只一条，对其弟的活动并不反对。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上海李书城的寓所举行的。这年湖北掀起驱逐督军王占元运动，主张废督去兵的李书城成为这一运动的主持人之一。7月，他与孔庚等人去湖南请兵援鄂，并率新组建的湖北自治军在援鄂湘军帮助下，于8月将王逐出湖北。

1922年6月，黎元洪复任大总统，李书城受孙中山委派再度进京任总统府顾问和国务院参议。1924年10月，冯玉祥

发动北京政变，李书城参与政变预谋，一度担任冯的高等顾问，并在新成立的摄政内阁中任陆军总长。在此期间，他曾受李大钊之托向冯玉祥转达中国共产党迎孙中山北上的意图。11月下旬，段祺瑞上台执政，筹谋召开善后会议，李避居天津。其间他常去张家口为冯的国民军出谋划策，反对北洋军阀。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后，接踵发生“汉口惨案”。李书城以旅京同乡会代表身份回到武汉，支持市民的反帝要求，并面斥湖北督军萧耀南镇压爱国运动的行径，要萧“充分保障人权，使人民有自由运动之机会”。^⑨他在同中共武汉地区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晤商后，出面组织“汉口惨案调查团”，并亲自率团前往阳逻等地实地调查。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李书城去湖南迎接，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顾问。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李书城对蒋介石公然背叛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行径极为气愤，参加武汉政府在武昌阅马厂召开的讨蒋大会。“七一五”后，武汉实行“清党”，他拒不重新登记，自动脱离了国民党。8月，湖北省政府改组，李出任省政府常务委员兼建设厅长。他联合省政府中的左派人士，同国民党右派“三民社”分子进行斗争，亲自下令逮捕反动军官刘佐龙，主持释放了一批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11月初，南京方面的“西征军”开入武汉，大肆捕杀革命志士，迫令李书城等人交出省政大权。紧接着，其弟李汉俊被枪杀，他也以“倾共”罪名被关进卫戍司令部，经多方营救才于次年春获释。大革命的失败，加上其弟被杀，使他对蒋介石集团极

为仇恨。

此后，国民党各军事实力派之间矛盾日益激化，李书城想借机利用矛盾打倒蒋介石。他先到唐生智处说服唐与北方军队联合反蒋，于1929年6月以唐军总参议名义到华阴，请冯玉祥入晋与阎锡山商议反蒋之策。冯在太原被阎软禁后，李书城无奈，曾陪冯“坐监”。1930年5月，蒋与冯、阎爆发中原大战，李任冯、阎讨蒋军顾问。讨蒋之战失败后，李书城很感失望，他对一些亲属先后加入共产党采取默许的态度，并曾多次掩护、营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李书城回到湖北，于1932年重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次年，他因拒不批准修筑从武昌通往蒋介石行营所在地——青山的公路，被撤去建设厅长职，改任民政厅长。不久又由于反对实行保甲制被免去民政厅长职务，变成空头委员。1935年湖北发大水，李主持救灾工作，率团赴各灾区视察，救济难民。同年，省通志馆成立，李任馆长。

抗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在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致使大片国土沦陷，1938年10月，湖北省政府从武汉撤退。这时，有人因李书城是留日生，劝李不要走。李厉声说：“我宁可去摆摊字摊，也不留在武汉。”^③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省政府移至恩施后，他多次在省议会上指责蒋介石。后陈诚到恩施主持鄂政，李因不愿与陈共事，只身出走成都，拜能海法师学佛，过居士生活。但他并没有停止政治活动，经常与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联系，促其出来领导抗战。同时，他也主动接近共产党，与在重庆的董必武等人建立了联系，经常在一起讨论抗日反蒋大计。他利用故旧关系去做国

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劝一些老朋友不要为蒋介石抬轿子。

抗战胜利后，李书城回到武汉。他一度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真诚合作治理中国。但这一幻想很快就在国民党挑起的内战中破灭了。1946年初，湖北共产党地下组织通过其侄共产党员李声簧与他建立了联系。随后，武汉市地下党负责人曾惇便在他家居住。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他认识到：“中国人民要翻身，须打倒蒋介石及蒋所依靠的地主、官僚、财阀，并须长期与美帝国主义作尖锐的斗争。”^⑬

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加速了国民党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李书城等人于1948年在湖北发起反蒋“和平运动”，成立了“和平促进委员会”，敦促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与共产党谈判。白崇禧为逼蒋下台，也想利用这股和平力量，曾一度表示支持。由于和平运动得到湖北各界人士的参加和支持，声势很大。蒋介石闻讯后极为震怒，特派张群到汉处理，并传言要杀李书城。李不顾个人安危，去长沙劝说留日老同学程潜接受共产党的和谈条件，联合反蒋。不久，他又风尘仆仆地以湖北和平促进委员会代表的身份，携带白崇禧手函与共产党员李伯刚同赴河南解放区，与刘伯承、陈毅进行和平解放湖北的会谈。由于程潜的犹豫和白崇禧的变卦，李的湘、豫之行均未得结果。但是，与刘、陈的会谈和对解放区实地考察，使他对共产党和解放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李回到武汉后，在省议会接见各界代表和新闻记者，报告解放区之行所见所闻，并应邀在武汉大学、中华大学等学校和商会演讲。不久，李书城与张难先等人和中共武汉市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将和平促进委员会改组为“武

汉临时救济委员会”，在桂军撤出武汉前后，为保护武汉的各项重要设施和物资、档案，维持地方秩序，迎接解放军入城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5月16日武汉市解放，李书城被任命为武汉市军管会高级参议。不久，他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书城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农业部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第三届人大常委、第三届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第三、四届常委等。

1965年8月26日，李书城因病在北京逝世。

注：

- ① 甘鹏云：《潜江李府君墓表》；《李书城致觉明的一封信》，《革命史资料》第2辑。
- ②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181页。
- ③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3页。
- ④ 同③，第146页。
- ⑤ 《贺之才述欧洲同盟会成立始末》，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135—136页。
- ⑥ 同②，第182页。
- ⑦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3辑第228页上的注释。
- ⑧ 李书城：《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的陆军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堂》，《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第93页。

- ⑨ 方孝纯：《辛亥首义之片断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3辑第108页。
- ⑩ 李书城致熊希龄电（1912年6月），《黄兴集》第220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 ⑪ 《李书城为黄兴的一封信所作的题跋》，《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期第52页。
- ⑫ 胡楚藩：《武汉在大革命时的二三事》，《武汉文史资料》第15辑第36、37页。
- ⑬ 笔者访李书城夫人薛文淑记录（1980年2月）。
- ⑭ 李书城自写简历（1950年3月）。

叶 楚 伦

郑春燕

叶楚伦原名宗源，字卓书，1887年10月14日（清光绪十三年八月廿八日）生，^①江苏吴县人。^②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叶凤巢是晚清秀才，因不事生产，家道中落。叶楚伦11岁丧母，由姨母抚养长大。

叶楚伦自幼随父读书，童年先后寄读于吴江同里任氏、叶氏家塾，后归故里拜陶小沚为师。1902年参加县试和府试，均名列前茅，院试时落榜。翌年清廷废科举，办学堂，叶楚伦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暑假后，转入浙西南浔镇庞青臣主办的浔溪公学，为高等科学生。入学未几月，发生学潮，浔溪公学解散。叶到桐乡县的濮院镇，召集原浔溪公学的八位同学，在一个名叫沈维伯的人家中“研讨学问”。这时正值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出版，叶楚伦和他的同学秘密买到此书进行传阅。逢星期日，他们还在濮院镇公开演讲，揭露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这是叶楚伦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开始。1904年叶考入苏州高等学堂，学满三年毕业时，因考卷舞弊案，叶等痛打学校监督，被苏抚端方饬吏捕拿。叶楚伦闻风离开学堂，避居友人柳亚子家中，幸免坐牢。这时，同盟会员、叶楚伦的表兄陈去病在汕头主持《中华新报》笔政，因病辞职，推举叶楚伦代，叶遂由上海前往广东汕头。

1909年春，叶楚伦在汕头加入同盟会。他利用《中华新报》积极进行反清活动，和汕头、潮州、梅县的民党交往甚密，并建立俱乐部，组织“诗钟社”，表面是诗词花酒之会，实是联络民党人士的组织。这期间，他写了许多文章和诗词，不少诗文中表达了他反清的雄心壮志。在《梦吴江行》中写道：“君王不向鼎湖去，马革何处非疆场。朝以太庙负矢出，暮挟胡俘北门入。”“嗟我一身不足惜，朝廷何以前烈。”^⑧从一些诗词中不难看出，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中是前进的。由于《中华新报》锋芒直指清王朝，因此两广总督张鸣岐视它为眼中钉，1911年上半年下令封禁。同年秋，《中华新报》改名为《新中华报》复刊，对清政府抨击更加尖锐，销路很广，对社会影响颇大，这使潮汕的地方官吏更加感到恐惧，潮州知府曾派兵威胁叶楚伦和《新中华报》社的人员，但他们并没有屈服。

10月武昌首义后，广州、汕头、潮州相继光复。此时潮汕之间部队纷起，秩序很乱，叶楚伦奔走潮汕进行调解。不久，他离开《新中华报》社，加入以姚雨平为司令的粤军，任秘书，随军北伐。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叶随姚军进入南京拱卫。因张勋率兵进攻徐淮，姚雨平奉命渡江还击，叶也随军渡江，并兼任参谋，曾参加固镇、宿州二次战役。2月，南北议和结束，东南军事粗定，叶弃武从文，和姚雨平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日报》，姚任社长，叶任总编辑。不久，他加入了柳亚子创办的南社，并成为南社的主要骨干。1913年，叶和于右任、邵力子等在上海创办《民立报》，叶主编《民立报》副刊，笔名“小凤”。在此期间，他痛击袁世凯

的篡夺阴谋和陷害民党人士伎俩，在《祭黄花岗诸烈士》一文中，痛骂袁是“狐鼠充位，当路杀人”，告诉国人“贤俊殒丧，国基摇落”。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被迫停刊，叶改任《生活日报》编辑，笔名“湘君”。后《生活日报》因欠款案被公共租界捕房封闭，叶又转任上海城东女学、竞雄女学和开明女学等校的国文教员，兼为民鸣新剧社编写剧本；在《礼拜六》等刊物上，还写了不少言情小说和诗歌。胡朴安在《楚伦文选》前言中说他“喜欢酒，为小说家，言一尊酒，一枝笔，终日不休。人谓楚伦之小说皆酒活，楚伦笑曰：‘酒话固绝妙小说也’。”^④从当时一些诗文中也不难看出，叶的思想具有较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陈其美集资创办《民国日报》，作为民党喉舌，从事反袁宣传，叶楚伦任《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为经理。袁世凯死后，1917年孙中山到广州领导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叶楚伦以努力办好《民国日报》来配合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不但用犀利的文笔抒发正义，抨击暴政，而且当报社经费困难时，四处借贷，甚至典当妻子的首饰衣服。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了顺应新形势，柳亚子准备已在1917年停止活动的旧南社基础上组织新南社。叶支持和促成了改组南社的工作。1923年5月新南社成立，叶为新南社起草了《发起宣言》。但在创办新南社的指导思想上，他和柳亚子存在着分歧。叶在《发起宣言》中说：“新南社是蜕化文字交换，而蕲求进步到国学整理和思想介绍的。”柳亚子在

1923年10月起草的《成立宣言》最末几句则说：“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此叶是不满意的。他认为柳的《成立宣言》个人色彩太浓，代表不了团体，力主《成立宣言》改名为《成立布告》，并再三叮嘱柳亚子：这份“布告”不要发表在国民党“一大”前。叶没有随着五四后的新潮流前进，而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他的思想这时已开始向右转了，由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对派。

此时，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实行国共合作，积极改组国民党，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叶楚伦被孙指定为国民党修改党章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接着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宣传部部长和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部长及妇女部部长。但是叶辜负了孙中山和国民党革命派的信任和期望，并没有贯彻“一大”宣言所确立的三大革命政策，却是阳奉阴违，敷衍应付。当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害后，他与国民党内的右派伙同一起公开进行反共活动。9月，他在上海与林森、邹鲁、谢持等人策划分裂活动。11月，他到北京参加在西山举行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参与炮制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等八项反对三大政策的决议案。会后，他们在上海成立了所谓“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叶所控制的《民国日报》为阵地，大量刊登启事、声明、通电和反共文章，“替帝国主义军阀扬善隐恶无微不至，对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革命策略丝毫不能宣传”。^⑤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声讨了西山会议派，给叶楚伦以

警告处分，并停止他《民国日报》总编辑职务。不久，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破坏国共合作，后又利用《党务整理案》夺取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权，大量安插亲信。叶楚傖看到蒋的变化，在蒋的拉拢之下赴广州，一跃而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成为蒋的亲信，与西山会议派脱离了关系。

是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11月攻占南昌。蒋介石欲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进一步控制在自己手中，拒不执行国民党中央关于迁都武汉的决定。蒋介石这一企图遭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强烈反对。但他一意孤行，在南昌擅自召开了一个政治委员会会议，叶楚傖竭力帮腔，促成了一个国民政府迁赣的决议。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于同年12月迁都武汉。叶楚傖不去武汉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秘书长职，仍留在南昌蒋介石身边。但是他看到蒋介石并不能完全操纵国民党，为了保持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既追随蒋介石并为其效力，又左右逢源以保自身。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叶楚傖追随蒋介石不二，先到上海任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7月代理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9月，参加了宁、汉、沪三方组织的特别委员会为候补委员。1928年，蒋介石重新掌握了国民党中央领导大权，叶被任命为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29年后改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30年11月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他先后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他以国

民党元老身份兼任了大小职务 20 多个。他对蒋介石百依百顺，但极力不介入各派系之间的纷争，即便要受陈果夫和陈立夫的支配，他也甘心情愿，从不反抗，被称为“好好先生”。

抗日战争期间，叶楚伧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事务所总干事等职。1942 年，他任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所担任的职务，并没有多大实权，凭借的只是国民党元老这块招牌，在蒋介石领导集团中已不占多么重要的地位。1945 年叶继续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年 12 月任国民党中央特派苏浙皖三省京沪两市宣慰使，由重庆到上海。

1946 年 2 月 15 日，叶楚伧因病在上海去世。1947 年葬于苏州灵岩山麓。

叶楚伧一生写了许多诗词、小说和文章，一部分诗词收入《世徽楼诗稿》，一部分文章收入《叶楚伧文存》。柳亚子主编的《南社诗集》选录了叶诗一百余首；胡朴安编的《南社文选》选录了叶的《民国野史序》、《说诗》等七文。

注：

- ① 叶之生年有两说：《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记为 1887 年 10 月 14 日（清光绪十三年八月廿八日）；叶元撰《叶楚伧简历》记为 1886 年 8 月 14 日（清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五日）。本文采前说。
- ② 叶原籍吴县周庄镇，辛亥前后周庄镇曾划归吴江县，所以也有称叶为吴

江籍的。

③ 柳亚子主编：《南社诗集》第 630 页，上海中学生书局 1936 年版。

④ 胡朴安编辑：《南社文选》第 600 页，上海国学社 1936 年版。

⑤ 《政治周报》第 3 期第 4 页。

主要参考资料：

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开华书局 1940 年版。

陆丹林：《南社的创立和停顿》。

邹 鲁：《西山会议》。

《叶楚傖先生讣告》。

于右任：《叶楚傖先生墓碑》。

邓 泽 如

娄献阁

邓泽如，名文恩，字远秋，号泽如，以号行。广东新会县人，1869年3月19日（清同治八年二月初七）生。祖辈务农，父亲邓传谋经商多年。邓泽如6岁入塾，11岁随父亲至阳春习商，业余坚持自学。18岁时由堂伯邓传合带往南洋谋生，初抵英属马来半岛吡叻州，在悦生店做出纳；旋往来于金宝、芙蓉等地开采锡矿；后长住挂罗庇胜（即瓜拉比刺），以种树胶营商，逐渐积资致富。识富商陆佑，曾为陆的代理人。

邓泽如侨居国外，亲身体会到侨胞受歧视和压迫的痛苦，希望祖国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一度对康有为的保皇党有所同情。1906年7月，孙中山到南洋进行革命活动，自吉隆坡至芙蓉，邓慕名前往谒见。孙与当地华侨开谈话会，揭露清政府假立宪的骗局，并批驳了保皇党散布的“革命可遭瓜分”的谬论。邓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从此积极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运动。

1907年，邓泽如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挂罗庇胜分会会长。翌年，邓与爱国华侨李月池设立麻六甲（今马六甲）中华书报社，传播革命思想。1909年，孙中山将同盟会南洋支部由新加坡迁往庇能（即檳榔嶼），胡汉民为支部长，胡因在

香港无暇兼顾，该支部事务遂由邓泽如主持。邓对同盟会的工作认真负责，无论是在筹款方面，还是在发展会员、联络同志方面，都能尽力而为。这时同盟会在英属南洋办有《中兴日报》和《阳明日报》，邓作为一个商人，虽不大过问宣传文字，但却热心为报纸从事招股、经营等事宜。

邓泽如自加入同盟会后，即承担筹款任务，诸如钦廉、防城、镇南关、河口及广州新军起义各役军费的募集，他无不力任艰巨，接济军需，支持革命。当时在华侨中募捐起义经费困难很多，经常碰壁受阻，但他能任劳任怨，所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筹措款项，邓泽如与孙中山通信数十次，凡孙提出的要求，邓总能全力办好，因此受到孙的称赞。孙曾赞誉邓等“筹饷之功，必与身临前敌者共垂千古而不朽”。^①

孙中山于1910年秋在庇能召集黄兴、胡汉民、赵声、邓泽如等人开会，决定在广州再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惟需筹款10万元以上，商定由邓负责在英属南洋筹办5万元。会后，邓即奔走各埠进行劝募，历时40余日，虽逢长子出生，亦全然不顾，“尽力国事，急公忘家”；^②又偕黄兴同赴各处游说，结果圆满完成任务，为1911年4月广州起义提供了大量经费。同年10月武昌起义后，邓继续在南洋募集经费支援新政权。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邓泽如应召回国。到南京后，孙拟任邓为广东省都督，邓以“泽本商人，素无政治军事之学识，……自度才力不胜”^③而谢绝。后胡汉民督粤，劝邓出任实业司长及官钱局总办，他也没有应允。邓为谋国家建设，力主开办银行，振兴实业，曾

在广东调查矿藏，准备偕华侨投资经营。1913年，邓与国民党广东省支部订立了承办英德、花县灰石矿合同，但因“二次革命”失败而中止，他仍回南洋重理旧业。

孙中山于“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函邓泽如在南洋创立支部并筹款，邓得信后立即奔赴各埠开展工作。部分国民党人反对孙建立新党，邓坚决支持孙中山，受邓影响的南洋多数同志亦均站在孙中山一边。1914年底，中华革命党在南洋设立筹饷局，邓任英、荷两属各埠筹款委员长。1915年，孙中山先后派许崇智、邓铿到南洋宣传党义及办理筹饷事宜，邓泽如在许等协助下，以中华实业公司名义招股数10万元，后将此款源源汇交东京总部和广东朱执信、上海陈其美等，作讨袁活动经费，为废除袁氏帝制做出了贡献。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继续掌握中央政权。1917年，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邓泽如依孙的指示在南洋经营“军事内国公债”，收银3万余元。1920年11月底，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邓应召归国，任内政部矿务局长兼广东矿务处长。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邓泽如脱险避往香港，很快同孙中山取得联系，并筹款助孙讨逆。8月，邓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长，即以支部长名义发表讨陈宣言。10月，又与古应芬、林直勉等组织讨陈办事处，邓为第三科主任，负责“关于经济之运动及收支各业务”。^④同月，孙中山派邹鲁任驻港讨逆办事机关特派员，派邓任理财员。他们齐心协力，数月之内筹得军饷40余万元，大部用来联络滇、桂军

东下讨伐陈炯明。

此后，邓泽如进一步得到孙中山的器重，历任大元帅大本营建设部长、两广盐运使、大本营参议等职，经常列席政务会议，参与商讨大事。同时仍为国民党广东支部长，迅速恢复了被陈炯明破坏的支部工作。

孙中山得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代表的帮助，于1923年决定改组国民党，委派廖仲恺、邓泽如等9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廖、邓并为特别会议召集人，共同负责筹备改组事宜。但是，邓泽如反对国共合作，他纠集林直勉等11人联名写信给孙中山，说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改组的机会“施行阴谋”，“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⑤谓国民党将被无形消灭。他们还拟定了一个限制跨党办法。由于受到孙中山的严肃批评，他们表面上不得不有所收敛。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邓泽如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但他并未改变反共立场。同年6月，他违背“一大”决议，再次发难，与张继、谢持一起以国民党中央监委会名义，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提出弹劾书，攻击“中国共产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希即从速严重处分”。^⑥孙中山、廖仲恺等不为所动，7月，国民党中央执会决议发表宣言，表明坚持“一大”路线，“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仍望我诸同志在此时期中继续努力，……屏除疑惑”。^⑦

孙中山 1925 年 3 月逝世后，胡汉民暂时代行大元帅职权，邓泽如及国民党内一部分右翼分子聚集在胡的周围，常假座胡寓、“文华堂”、“慰庐”俱乐部进行活动。他们先是反对改组大本营、成立国民政府的决定，想要把持中央，贯彻其排斥共产党的主张，为此邓曾出面上书“弹劾政治委员会未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而发表政府改组”，被廖仲恺等人驳回；以后他们又多次策划“清党”，以排斥共产党人，并谋划对付左派人物问题。他们尤恨廖仲恺，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不惜采取暗杀手段，由胡毅生、朱卓文等收买凶手，于 8 月间将廖杀害。

廖仲恺遇害后，胡汉民、林直勉等与廖案有关或有重大嫌疑的人多出走、逃跑、被捕或被软禁，惟邓泽如得到蒋介石等人的庇护没有受到触动，且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但他心怀畏惧，很快离开广州。同年 11 月，邹鲁、谢持等人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邓虽未到会，却出钱资助。

1926 年 1 月，邓泽如再次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1927 年 4 月初，吴稚晖等人以中央监察委员名义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案，要求对共产党首要人员进行非常处置，邓也从日本赶回，表示完全赞同，并领衔通电，称国民党三中全会和武汉联席会议为共产党所操纵，否认会议所采取的坚持革命、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各项措施的合法性，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提供了依据。嗣后，邓又到南京出席国民党部分执监委员会议，支持蒋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5 月，宁方国民党中央常委及各部长会议决定组织“清党委员会”，邓泽如被推为七委员之一。9 月，宁汉沪合流成立特别

委员会，邓被任为海外部长、政府委员和总理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但因国民党内各派势力争夺激烈，他随胡汉民滞留上海未去就职，不久特委会也无形解体。

这时的政局极为动荡。张发奎、黄琪翔等于同年11月在广州兵变，拥护汪精卫，反对桂系。12月又爆发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公社起义。邓泽如按照李济深、胡汉民和桂系的需要，自上海急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指责汪精卫等对于张黄兵变“不独参预逆谋，实为发纵指示”，又说，广州公社起义“则为养奸成祸”，乃是“主谋正犯”，^⑧要求派兵去粤镇压。以后邓与古应芬奉派赴粤调查，共同炮制了一个报告书，说汪等“罪过丛积，已非朝夕”，应“通缉归案，依律从严处办”。^⑨

1928年2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仍以邓泽如为国民政府委员。但邓对蒋过去一度伪装左派不满，曾谓：“四次全会全操于个人之手，……余不愿同流合污”，因此既不到会，也不就职，并通电否认四中全会名称，认为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三中全会不合法，说蒋等已被武汉的中央指为反革命开除党籍，如果“以为有效，则蒋等既丧失党员资格，何能出席于四次全会；以为无效，则何得有四次全会之名？”^⑩

1929年，邓泽如继续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监委，但他态度消极，很少过问政事。此后数年，他除游山玩水，看书写字外，曾把从前所经历及搜集的有关国民党历史材料编成8册初稿，于1930年交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后以《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为书名出版。

1931年2月，胡汉民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被蒋所扣，邓

泽如支持胡，于同年4月联合古应芬、萧佛成、林森以四监委名义对蒋加以弹劾。随后部分国民党政客和西南军事实力派在广州开“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与蒋对立，邓为该政府委员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宁粤议和，于11月召开国民党四大，粤方“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撤消，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邓仍被推选为第四届监委、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

1934年12月27日邓泽如病故于广州。

注：

- ① 孙中山：《致邓泽如等函》（1917年10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4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 ② 黄兴：《为邓泽如子命名贺词》（1910年12月31日），《黄兴集》第2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 ③ 邓泽如：《护送总理瀛眷由南洋赴宁》，《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84页，中正书局1948年版。
- ④ 邓泽如：《驻港讨论之进行》，同③第271页。
- ⑤ 邓泽如：《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1923年11月29日），同③第312、313页。
- ⑥ 邓泽如等：《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书》（1924年6月18日），同③第315、316页。
- ⑦ 《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1924年7月7日），《中国国民党宣言汇刊》第76至77页。卿云图书公司1928年版。
- ⑧ 《邓泽如请拿办汪精卫等》（1927年12月13日致中央委员会函），《民国日报》1927年12月16日。
- ⑨ 《邓、古查办汪兆铭等之呈覆》（1927年12月31日），《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第228、235页，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部印。
- ⑩ 转引自《邓委员事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编印：《追悼邓公泽如专刊》第5、6页。

丁 贵 堂

任嘉尧

丁贵堂，字荣阶，1891年12月20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生。祖籍山东黄县，先辈闯关东，在辽宁海城丁家堡子落户。祖父丁有柏为大车夫；父亲丁希官以自做自卖豆腐为业，并租佃土地耕种。丁贵堂童年帮助父兄务农，牧牛放猪。由于家中三代文盲，其父下决心送他求学。丁10岁入塾，继在本县三育学堂、两等小学堂就读，敏而好学。他亲身感受到日本、俄国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逐渐形成爱国思想，具有正义感。1910年他在奉天高等学堂毕业后，曾在奉天东关两等小学堂教书，其时周恩来在该校求学。^①1912年春，他考入奉天法政学堂；两月后，转考入北京税务专门学校，苦读4年。毕业后于1916年7月被派到安东海关任见习，翌年8月经过考核升为最末级帮办，开始了他整整46年在海关工作的生涯。

1919年秋，丁贵堂调到北京，在总税务司署做打字工作，4年后为汉文科帮办，我国海关自鸦片战争后，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管理权、关税收支权等，均被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陆续攫夺，统管全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及各关税务司、副税务司皆由洋人担任，完全垄断了我国海关大权，在海关工作的中国人员，备受洋人的歧视和欺凌。丁贵堂到海

关工作后，不堪忍受洋人蔑视我国主权的跋扈行径，几次发生与洋人争吵的事。丁曾联合总税务司署的中国人员与洋人交涉，据理力争，获得了房租及煤贴。

1927年春，丁贵堂调上海江海关任汉文秘书。是年4月，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英美帝国主义为支持国民党统治，伪称将海关行政权逐步交还我国，总税务司署隶属财政部关务署。但是，总税务司仍由英人梅乐和“代理”，税务司、副税务司等高级职务亦仍由洋人充任。这年，江海关中国员工发起组织海关华员联合会，以“提高职权，改良待遇”相号召，开展争取中外关员平等待遇的斗争，丁为该会组织部员。在斗争中，丁主张用和平说理的办法，而不用罢工或其他暴动手段，认为既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若失败，会使洋人更加凶残。在广大员工坚持斗争下，海关当局被迫提升数名华员为“代理副税务司”以资敷衍，丁贵堂升为江海关代理副税务司，仍做汉文秘书工作。

1929年初，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在南京举行海关关制审查会议，丁贵堂和其他爱国人士为挽回海关行政管理权及提高华员地位待遇，在会上据理力争，取得了中国关员和外籍关员原则上的平等待遇和地位，并规定以后海关行政部门停止招收洋人，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削弱了洋人的垄断权势。同年，梅乐和实任总税务司，丁贵堂在总税务司署任汉文科代理税务司，次年初实为汉文科税务司。他对海关一切事务，力争必须由关务署同意后方可执行，避免洋员多头干预，以维护海关主权；同时，他对海关的报关单和其他统计报表均加列汉文，打破了单用英文的惯例。

1934年4月，丁贵堂升任总税务司署总务科税务司（即秘书长）。这项职务历来由英、美人充任，“九一八”前夕始由日籍关员岸本广吉充任。“九一八”后中日关系恶化，岸本返国，丁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中继任总务科税务司。但是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后，日本政府一再要求岸本复职。是年底，丁贵堂被迫改任不管科税务司。1935年春，丁被派为考察欧美关政特派员，出国7个月。9月返国后，仍任总税务司署汉文科税务司。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丁贵堂爱国热情高昂。他对家乡东北的沦亡十分痛心，对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战非常敬佩。他曾联合在上海的海关高级华员张勇年等人，通电号召全国海关员工向抗日军队捐献慰劳金。在他们的倡议下，全国海关的中国员工自1933年起，按月捐献薪金的百分之五，慰劳和援助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和冯玉祥、吉鸿昌、宋哲元在华北的抗日部队；阎宝航、高崇民等人主持的东北抗日救国会也得到了资助。丁同情和支持东北进步人士和流亡学生的爱国活动，常予慷慨资助，并热情接待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等人住在自己家中。丁贵堂对宋庆龄和斯诺、艾黎等创导的“工合”运动，亦予以赞助和支持。以后他还带动海关员工开展捐献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丁请阎宝航交1万元给八路军办事处；以后又拨款2万元支援新四军。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租界成为孤岛。丁贵堂筹划将总税务司署内迁重庆，但为日本侵略者所阻。总税务司署曾

把华北日本侵略军进出山海关和长城各口的情况密电报告重庆国民政府。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占租界，在天津海关发现此项密电副本，认定是间谍行为，于1942年3月逮捕丁贵堂及副税务司张勇年等人。虽经严厉审讯，辱骂殴打，丁始终表示系按政府明令办理，拒不承认是间谍行为。1个月后释出。是年底，丁佯称患病告假去东北老家养病，毅然离别妻室子女离沪，在河南商丘穿越日伪封锁线，辗转抵达重庆。

1943年3月，丁贵堂在重庆任总税务司署秘书长。6月，总税务司梅乐和辞职，丁被派为代理总税务司，是为中国关员第一次执掌海关领导权。但只2个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即派美国人李度为总税务司，任丁为副总税务司。10月，丁到新疆筹设海关，于翌年2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迪化关，丁兼该关税务司；嗣后并在中苏边境塔城、伊宁、霍城、和阗等地设立了关卡。

抗战胜利后，丁贵堂被派为上海财经接收委员，并兼江海关税务司及上海浚浦局局长，负责接收总税务司署、江海关和浚浦局。他洁身自守，与当时众多之国民党“劫收”大员截然不同。1946年冬，李度调丁回总税务司署，而另派英国人白立查为江海关税务司，以控制这个东方和中国第一大口岸。丁贵堂力主江海关税务司一职应由中国关员担任，但李度得到宋子文和国民党政府关务署长张福运的支持，独断专行，仍命丁向白立查交卸。白立查不久患肺癌死去，江海关税务司一职始由中国关员充任。

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仰仗美英帝国主义的援助，盘踞在海关的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盛气凌人，肆意凌辱和欺压我国员

工，上海区海关员工会曾先后五次发动怠工、罢工，丁贵堂始终同情，但劝说罢工工人“应当适可而止，不可弄的太大了难以收拾”。^②帝国主义分子李度曾调国民党特务、军警企图武力镇压，丁贵堂等从中斡旋、阻止，力免酿成流血事件。

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三大战役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军政人员纷纷逃往广州、台湾；海关许多人员亦内心惶惶，以丁贵堂之行动抉择去留。丁在中共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的团结、教育下，决心留守江海关，设法保护关产和档案，期望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完成自己收回关权的志愿。1949年春，丁毅然宣布决定留沪，敦促李度电令各关不得撤退，不得运走档案，不得汇走税款。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集团从广州、台北几次电令丁将当时远东最大的挖泥船“建设号”开往台湾；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又下令征调海关和浚浦局的数十艘缉私艇和挖泥船。丁贵堂在中共地下党领导和海关广大员工的支持下，托词“船只要修理”、“人员要补充”、“材料要添置”而予以拖延，尽力保护关产。汤恩伯十分恼怒，曾下令逮捕丁贵堂；由于解放大军兵临城下，汤仓促逃跑，丁免于难。

解放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均被取消，海关实现了完全的独立自主，丁贵堂无限兴奋。他积极协助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总税务司署、江海关和浚浦局。1949年9月，他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海关总署副署长、海关管理局局长，主持人民海关的建设，不遗余力。由于丁贵堂熟谙海关事务，毛泽东曾直呼他为“丁海关”。他还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1962年11月21日病逝北京，终年72岁。

注：

- ① 据辽宁大学教授、丁贵堂之同学张镜玄回忆以及与周恩来同学之卢广绩口述。丁贵堂生前曾多次对其子女说过：“周总理是位胸怀大略的政治家。想当年我只教过他短短几个月的英语，他至今还没忘记。”
- ② 丁贵堂：《自传》（1951年7月1日），手稿打字本第16页。

主要参考资料：

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

〔美〕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丁耀珍、丁耀璞、丁耀瑛、丁耀琳：《纪念父亲丁贵堂》，《光明日报》1982年12月29日。

《上海时人志·丁贵堂》，展望出版社1947年版。

伍 朝 枢

郑则民

伍朝枢，字梯云，广东新会人，1887年5月23日（清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初一）出生于天津。父亲伍廷芳，清末曾在直隶总督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多年，1896年受清政府命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即公使）；1911年武昌起义后，曾任民军方面的议和全权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北京政府代总理，广东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等职。伍朝枢1897年随父前往美国，在华盛顿等地受小学和中学教育。1905年回国，先后在广东劳工局和农工实业局任职。1908年得官费派赴英国留学，先入伦敦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继进林肯法律研究院，取得了大律师的资格。^①

伍朝枢1912年春学成归国，正当袁世凯攫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得到全国统治权之时。5月伍被派任湖北都督府外交司长，9月调入北京外交部办理条约事宜。次年列名为广东选出的首届国会议员，并为国民党籍的宪法起草员。^②这时他援引国际公法撰写论文，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为争取各国承认中国政府制造舆论。1915年被任为国务院参议兼外交部参事。1916年1月袁世凯复辟帝制，任伍朝枢为“洪宪政府”参议。他提出辞职未获准，一度托词请假在家。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

务总理。伍朝枢担任外交部参事。1917年发生了以美、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府院之争”，伍朝枢和担任外交总长的伍廷芳先是站在黎元洪一边反对段祺瑞，稍后又反对黎元洪屈服于张勋下令解散国会的不法行为。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伍朝枢随伍廷芳南下参加护法运动。孙中山任命伍廷芳为军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次长。次年5月，军政府为桂系军阀所把持，改设七总裁，孙中山被迫辞职，离广州回上海，伍氏父子暂时留任。12月12日军政府决定派王正廷、伍朝枢等与北京政府代表组成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伍朝枢虽然没有全权代表的名义，但他在巴黎和王正廷一起，对拒绝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在国内人民和旅法华侨、留法学生的斗争压力下，中国代表团终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1920年冬，粤军从福建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孙中山回广州。翌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任命伍廷芳为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次长。10月6日北京政府发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为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伍拒绝参加。

陈炯明1922年6月公开叛变孙中山，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率各舰反击叛军，伍廷芳和伍朝枢坚决站在孙中山一边。他们接受孙中山的指示，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希望外国代表严守中立，勿助叛军。正在此时，伍廷芳突然病逝，伍朝枢为父办理丧事之后，转赴上海。

1923年2月，孙中山因滇桂联军已驱逐陈炯明出穗，乃返广州。3月1日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派伍朝枢为外交

部长。伍协助孙中山起草对外宣言的英文原稿，6月29日以《大元帅对外宣言》发表。宣言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得到帝国主义列强“以精神上、物质上之援助”，维持了黑暗腐败的统治，使“人民受害，水深火热，情况之惨，殆难言罄”，希望各国“不干（中国）内政，严守条约，同谋列强之利”。^③此后，孙中山为收回关税主权，并解决军饷问题，坚决向美英等帝国主义交涉，要求提取被无理剥夺的部分粤海关关税余款。对此，北京外交团致电广州政府，叫嚣要采取强硬手段；同时调集在黄埔的军舰，进行威胁。伍朝枢奉孙中山之命以外交部名义复照北京外交团，驳斥其谬论，指出：“中国海关始终为中国国家机关，本政府辖境内各海关，自应遵守本政府命令。且关税之汇交北京，不啻资助其战费，以肆其侵略政策。”因此，截留关余“乃完全中国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④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伍朝枢和胡汉民、吴铁城等人表面随和，而实际抱阳奉阴违态度。早在大会召开之前，他们就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为据点，背着孙中山进行一些活动反对共产党，并对工农运动的兴起表示畏惧。“他们本来也是不赞成改组国民党，不赞成三大政策的，但是他们在当时革命形势节节向前推进的情况下，只有暗中反对，消极怠工，却不敢公开说反对的话。”^⑤2月20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定任伍朝枢为商民部长。

初夏间，伍朝枢奉命赴天津、沈阳会见段祺瑞和张作霖，商讨有关联合反对直系统治的问题。^⑥7月国民党中央设立政

治委员会，孙中山任主席，伍为委员兼秘书长。8月下旬，以陈廉伯为首的商团策划运输大批枪械入口，阴谋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命令将枪械全部扣留在黄埔军校。伍朝枢主张商团事件“和平解决”，表现了迁就妥协的态度。

1925年6月，发生了英帝国主义者枪杀中国示威群众的广州“沙基惨案”，激起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伍朝枢以大本营外交部长名义向北京公使团提出严重抗议。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伍朝枢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司法委员会主席兼广州市政厅委员长。这期间，伍朝枢同胡汉民、孙科、吴铁城等保持密切关系，参加他们的一些集会，对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表示不满。11月伍被任命为司法调查委员会主席，着手调查广东的司法状况。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期间，伍朝枢在广东省、广州市两级政府宴请“二大”代表时发表演说，叙述广州市推行三民主义的一些成绩。大会选举时，伍朝枢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后，担任司法行政委员会委员，一度代行主席。2月兼任黄埔开港计划委员会委员。

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以后，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中山舰事件处置办法，伍朝枢也出席了会议，不久还和蒋介石等人一起发表通电谴责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于这时蒋介石和汪精卫、胡汉民矛盾激化，伍朝枢和汪、胡原来关系密切，因此同蒋介石的关系比较冷淡。5月30日蒋介石在广州逮捕新改编的第十七师师长

吴铁城，伍朝枢和孙科等为吴向蒋缓颊无效，便告假离粤，经香港回上海寓居。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7月汪精卫相继“分共”清党，国民党内几派势力一度取得了妥协，9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伍朝枢被委为外交部长。伍先是发表外交声明，表示对帝国主义国家“不采暴动手段”，维护“友好关系”。此后采取了一些收回主权的外交举措，如宣布收回部分关税自主权，发布进口关税暂行条例、出口税条例等。接着于11月23日发表了“对外请求废约宣言”，宣称：“凡从前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现今无存在之理由。”^⑦还表示：“对于重要悬案，国民政府准备适当时期，以公平及互谅之精神，设法解决。”^⑧但各帝国主义国家置之不理。12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撤销承认”苏俄的领事，伍朝枢命令全国各省对苏俄商业机关、银行、商店、轮船公司勒令停业。

1928年初，南京国民政府改组，黄郛继伍朝枢为外交部长。伍与胡汉民、孙科均下野，同往印度、埃及、土耳其及欧美游历。5月蒋介石国民党军北伐奉系途中，日本军队炮轰济南，造成“五三”惨案。南京国民政府委派伍朝枢赴美国，游说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支持和援助中国。7月伍任国民政府全权代表，与美国谈判修改条约的问题。1929年1月任驻美国公使，同美国方面多次谈判，为双方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之条约”奠定基础。在新的条约中，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利益均沾”的对华政策，继续保留着和他国“应无区别”的“最惠国待遇”。伍代表国民政府多次要求美国政府放

弃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均遭拒绝。同年9月伍奉命赴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第十届大会。翌年在参加国联第十一届大会时，被选为国际联盟行政院理事。

1931年4月，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为导火线，国民党内汪精卫、孙科等反蒋势力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分裂的局面。伍朝枢闻讯于6月15日离驻美公使职位，回到广州，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琼崖特别区长官。“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于10月底在上海举行会谈。伍朝枢被推为粤方代表之一。双方从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伍朝枢住宅举行了七次会议，在中央政制、党务、外交等问题上达成一些协议，结束宁粤对立局面。^①伍朝枢被任为司法院院长、国民政府委员。但他在国内并无实力基础，没有就职，连广东省政府主席也一并辞去。他曾打算就任西南政委会常委兼琼崖特别区长官，设想进行某些开发工作。消息传出后，立即受到地方实力派的抵制。伍朝枢不得不辞职，移住香港，一度到北平、绥远等地旅行。1934年1月3日在香港病逝。

注：

- ① 陶履谦：《伍梯云先生行状》，见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列传》。
- ② 《中国近代史丛刊·辛亥革命》（八）第596页。
- ③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第100—101页。
- ④ 《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5—27日。
- ⑤ 何香凝：《我的回忆》，《回忆辛亥革命》第42—43页。
- ⑥ 何国柱：《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北洋军阀史料》下册第111—112页。

⑦⑧ 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第1集第235、241—242页。

⑨ 《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第70—76页。

王 乐 平

刘培卿 刘镇

王乐平，名耆塾，1884年12月8日（清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山东诸城县王家楼子（今属五莲县）。其父王季龙是举人，教书为业。王乐平自幼随父上学，18岁中秀才。尔后在家务农。

1906年夏，王乐平到济南考入山东高等学堂，翌年加入同盟会，开始了革命活动。1907年至1908年，王乐平和山东优等师范学堂于洪起、陈干等同盟会员组织“保矿会”，反对清政府以山东矿产为抵押向德帝国主义借款。因此，被学校当局以“革命嫌疑”为由开除学籍。1908年底王回诸城，在相州中学任教数月。1909年夏返济，考入山东法政专门学堂，继续学习并开展革命活动。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王乐平和丁惟汾等组织山东各界联合会，逼迫山东巡抚孙宝琦于11月13日宣布独立，成立了山东临时议会和临时政府，王被推为议员，倡办学生军保卫新政权。11月24日，袁世凯胁迫孙宝琦取消独立，以其亲信张广建署藩司、吴炳湘署巡警道，在济南大肆捕杀革命党人。王乐平弃学避居青岛。1912年1月，他受山东革命党人委托，去南京谒见孙中山，受孙派遣，赴烟台参加以胡瑛为都督的山东军政府工作。当时山东革命党人正在登州、黄县、

青州、诸城等地组织起义，王被委为革命军司令，曾指挥胶东之役，与清军展开激烈的争夺。不久南北议和，2月王乐平作为山东军政府的代表之一，与张广建的代表举行谈判。4月，山东军政府从烟台迁济南，重选议会。山东独立时创刊、旋被张广建取缔的革命党人的机关报《齐鲁公报》恢复，改名《齐鲁日报》，王乐平担任该报主编。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齐鲁日报》被迫停办，王在山东高等学堂执教。翌年春，孙中山从东京派人携密书赴山东联络革命党人武装倒袁，使者中途被捕，联络名单被搜出，山东都督靳云鹏按名单捕人。王乐平遭通缉，避难甘肃，先担任甘肃教育厅课长，后到陕西略阳县任厘金局长。

1916年初，王乐平返回山东，往来于中华革命东北军驻潍县居正部及驻周村吴大洲部之间，策划讨袁。6月袁世凯死后，王被举为参议院议员，到北京就职。1917年7月张勋复辟，国会被解散，王乐平回山东。他利用在甘肃、陕西所得之款，在博山殷家沟兴办了一处年产2万吨的煤矿。不久，因受日本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排挤，难以维持，乃重返政界。1918年8月，王当选为山东第二届省议会议员，并任省议会秘书长。

1919年王乐平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5月3日，他曾代表山东省议会去上海，多次发动山东旅沪人士参加运动。6月18日，他率领山东各界86人组成的请愿团晋京请愿，在怀仁堂向总统徐世昌面陈山东人民的爱国要求，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同年夏，他在济南创办了“齐鲁通讯社”（不久改为“齐鲁书社”），推销进步书刊，联络革命同志。12月，在省议

会讨论财政预算的会议上，他根据调查所得的确凿资料，提案弹劾山东督军张树元侵吞军费，获得与会者的拥护。1920年冬，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建共产主义小组，但王乐平没有行动。1921年底，他应陈独秀的邀请，在王荇美动员下，拒绝了北洋政府安排他去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的派遣，作为山东革命团体的代表，和王荇美、邓恩铭等共产党人一起，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召集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实地考察了苏联的社会制度。1922年5月回国后，他向孙中山汇报时，建议采用“俄国之组织方法”，孙深以为然，遂派他回山东主持国民党党务，注意同共产党合作。

王乐平同共产党山东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建立了“平民学会”，创办了《十日》杂志。王乐平利用这个半公开的学术团体，作为复兴国民党山东党务的机关；王荇美则利用它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6月，民初国会恢复，王乐平重新出任参议院议员。他往来于北京、上海、济南、青岛等地，从事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活动，和丁惟汾等在北京组织了国民党北方分部，着手党务改组。1923年7月，因反对曹锟贿选，王离京赴沪，与丁惟汾合办《北方周刊》，鼓吹反对军阀的北方革命。年底又与丁去青岛创办了胶澳中学，作为国民党在青岛的立足点。

1924年1月，王乐平作为孙中山指派的山东代表，和王荇美、丁惟汾等一起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王被派回山东，负责建立有王荇美等参加的国民党山东临时党部，并派人到济南、青岛、烟台、淄博、惠

民等市、县建立了临时党部。同年8月，他与共产党人一起，召集山东31个团体开会，成立了“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开展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中心内容的反帝运动。12月，他和王荃美、王哲、阎容德在天津受到孙中山接见，被委为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回省开展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1月7日，他主持成立了济南国民会议促成会，随后又成立了山东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2月初去北京，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出席3月1日至4月5日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孙中山逝世，王乐平担任孙中山治丧委员会委员、招待股第五组组长。会后，他回山东，于4月27至29日在济南公园主持召开了山东各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发起组织了“孙文主义研究会”。7月11日至13日，国民党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王乐平当选为主任委员。同年冬，反动军阀张宗昌通缉王乐平并派人包围他的住宅，他逃往北京。1926年1月，王乐平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回北京，和李大钊等一起，参加领导了反帝爱国斗争。3月18日在天安门召开群众大会时，他是主席团成员之一；群众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示威请愿时，他举旗走在队前，并被群众公推为5位代表之一，进府同段祺瑞交涉；反动军警镇压时，王被棍棒打伤。

北伐战争开始后，王乐平赴广州，随军北上。9月，他潜入武昌，对吴佩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策动吴的暂编第三师团长贺对庭（山东临沂人）部反正，以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昌。

不久，王又赴九江、南昌等地主持对北洋军队的收编工作。邓演达在武汉成立湖北政务委员会，王应邀到武汉，担任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武汉电信局局长，旋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员，赞同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1927年3月，王乐平在武汉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赞同全会关于维护国民党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并撤销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的决议。

王乐平自认为是国民党的元老，一向看不起蒋介石。他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在北伐战争中，总是找邓演达联系、汇报工作，从不找蒋介石。王乐平也反对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期间，丁惟汾、顾孟余、范予燧等曾商讨国共分家问题，并叫范予燧到武汉转告王乐平。王乐平听后虽未表态，实际上是赞同丁惟汾等人的意见的。1927年初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改组，共产党员丁君羊担任主任委员，王乐平对此大为不满。

“四一二”政变后，丁惟汾劝说王乐平去南京拥蒋，王拒绝。但王在武汉遭到山东左派青年的反对，难以为继。7月，经顾孟余介绍去开封，在冯玉祥举办的党政训练班担任主任，培训国民党党务工作人员。这时，王乐平对国民党分崩离析、政客角逐的局面十分不满，产生了改组国民党的想法。他撰写《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与训练》一书，提出“恢复十三年精神，改组国民党”的政治主张。该书1928年初出版，成为改组派的基本纲领之一。

1927年9月，王乐平追随汪精卫先后去上海、广州。11

月1日，汪精卫在广州召集部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开会，王参加会议，赞同在广东另立国民党中央，以与南京相对抗。17日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发动事变后，汪精卫派掌握了广东的大权，王乐平积极支持广东省代理主席陈公博。1928年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以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为诱饵拉拢王乐平，为王所拒，因而受到蒋介石的排斥。王不甘心，便在上海竖起改组国民党的旗子。5月，陈公博办《革命评论》，宣扬改组国民党的理论。6月，王乐平与顾孟余合办《前进》杂志，攻击蒋介石，支持陈公博的政治主张。还创办了大陆大学，培养国民党改组派的人材。同年冬，王乐平和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白云梯、朱霁青、潘云超、郭春涛等在上海开会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下设宣传、组织、总务三部，陈公博总负责，王乐平和朱霁青分管组织工作，兼管军事。王派人到各地联系，成立了改组派的各省市党部和海外分部。1929年1月，改组派在上海召开中央及地方组织负责人会议，亦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陈公博出国，王乐平实际上成了改组派总部负责人，兼大陆大学代理校长。总部的一切组织、宣传、军事联络等筹措工作，都由他最后决断。他主持总部工作，指挥各地改组派的活动，利用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反蒋情绪，借济南惨案、选举国民党“三大”代表等机会，在政治上广造倒蒋舆论。他还利用一些军事实力派反对蒋介石的情绪，组织“护党救国军”，策动李宗仁、张发奎、石友三等部军事倒蒋。

改组派的活动给蒋介石以很大威胁。蒋介石对王乐平恨

之入骨，密谋铲除。1928年秋，王乐平护送其父棣枢从上海回诸城安葬时，蒋介石一面假意送花圈，一面密令山东逮捕王乐平。王乐平乘帆船逃回上海。1929年11月19日蒋密令国民党军政机关查禁改组派总部。接着，派其亲信陈希曾到上海，嘱令特务头子杨虎于1930年2月18日将王乐平刺杀。

主要参考资料：

《王乐平先生墓碑》碑文。

九皋：《访辛亥革命老人郭叔蕃》，《团结报》1981年11月7日。

丁惟汾：《山东革命党史稿后编》卷1第2章。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

向汉文：《改组派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易 培 基

马复华

易培基，字寅村，号鹿山，湖南长沙人，生于1880年2月28日（清光绪六年正月十九日）。其父为逊清武官，曾在湘西因事牵连入狱，年仅16岁的易培基上书为父申冤，以文词婉曲感动办案上司，使其父得到赦免，易因此而享文名。

其时清廷腐败，丧权辱国，易培基愤于外侮日亟，欲从事外交报效国家，遂离家赴武昌，考入湖北方言学堂，与赵恒惕同学。毕业后，易培基又去日本进修，返国后回到长沙，于1913年任湖南高等师范学堂国文教员，讲授文字学等课程。他在文字学的研究上接近章太炎，在经学上则赞成康有为。一年后，改任长沙师范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员。他授课生动，喜标新立异，很能迎合青年学生的心理。当时毛泽东、田汉等人都在第一师范读书，曾受易授教。

1918年，张敬尧任湖南督军，残酷镇压人民，摧残教育，易培基和一些教师参加了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翌年，易被推为绅商界总代表，前往新任湖南督军谭延闿处洽商事务，自此结识了谭延闿，并深得谭的赏识。1920年6月，“驱张”运动胜利后，为使被张敬尧摧残的各级学校迅速恢复，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接受教育界人士杨树达等人的建议，决定成立教育委员会，易培基被任命为委员兼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校长。易上任伊始，即将学校人员彻底改组，先后聘匡互生、周谷城、彭静宜等人担任教务主任，教员有杨怀中、徐特立、夏丏尊、刘大白等人，师资阵容十分强大。毛泽东也曾于同年7月受聘在第一师范担任过一段国文教员。为使学生获取新知识。易还敦请中外名人如杜威、罗素、章太炎、蔡元培等到校做学术讲演。又创开女禁，丁玲（蒋冰之）等女生闻讯转学来到第一师范就读。学生组织如“崇新学社”等也相继成立。当时，第一师范人才鼎盛，新潮澎湃，成为三湘新文化的先锋。

1921年，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奉孙中山命令组织北伐，讨伐赵恒惕部，任命易培基为总司令部秘书长，易遂离开第一师范。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谭延闿奉命回师靖难，易培基随行至广州。是时他曾写下一首题为《赴粤途中》的言志诗：“万仞当关险，穷庐百雉城；秋风一何劲，瘦马欲纵横。”^①至广州后，孙中山任命易为大元帅府顾问，不久又被孙中山派为驻浙江全权代表。易培基居杭州西湖俞（平伯）楼，与胡汉民、汪精卫等经常往来，时有诗作唱和。易生平唯一著作《三国志补注》，也是在俞楼完成的。

1924年初，易培基奉孙中山命赴北京，作为全权代表与苏联代表加拉罕谈判庚子赔款问题，并暗中主持学生运动。在北京，易结识了国民党人李煜瀛（石曾），往来甚密，并与李结为儿女亲家。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曹锟，废颜惠庆内阁，逐清废帝溥仪出故宫。11月7日，易培基在李煜瀛推荐下，署理黄郛摄政内阁教育总长。时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李煜瀛任委员长，易为委员。12月23日，段祺瑞

就任临时执政，黄郛摄政内阁总辞职，任教育总长仅两周的易培基也跟着辞职。于是，他便专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从事接收故宫、查点文物的工作。翌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他被推为理事之一。

1925年3月，易培基与冯自由在北京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活动。同年8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仰承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旨意，镇压学生运动，引起了学生的反抗，章士钊竟下令解散女师大。易培基与李煜瀛等人对学生运动大力支持。迨至11月，章士钊等因时局关系向段祺瑞提出辞职，段于12月对政府进行改组，以易培基为教育总长。此前，段祺瑞决定继续开办女子师范大学，并任命易为校长。1926年1月，女师大举行大会欢迎易到校就职，鲁迅和许广平分别代表校务维持会、学生自治会致欢迎词。

1926年春，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兵关内，与冯玉祥国民军展开激战。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派军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3月18日北京人民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主权，会后到执政府门前请愿，段祺瑞公然命令卫队向请愿群众开枪，打死打伤200余人，是为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翌日，段以“假借共产学说，煽聚群众”，“闯袭国务院”^②的罪名通缉易培基及徐谦、李大钊、李煜瀛、顾孟余等人。易遂逃匿于东交民巷使馆区，不久返回湖南长沙。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易培基由长沙转往上海。同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采纳张人杰、李

煜瀛等人的建议，决定在上海创办劳动大学，任命易培基为校长。易曾邀鲁迅到该校讲演并授课，与鲁迅有不少接触和书信往来。嗣后，国民党政府大学院成立，易为大学委员会委员，经常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

1928年1月，易培基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后又加推为外交委员会委员。同年6月，北伐军战胜奉系，占领北京，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改北京为北平，同时通过北平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理事会条例，任命李煜瀛、易培基等27人为理事，并派易培基前往北平接收故宫博物院。易卧病上海，不能前往，电告故宫博物院古物、图书两馆副馆长马衡（叔平）、沈兼士及秘书吴瀛（景洲）等代行接收，并接收清史馆和颐和园。不料，国民党政府委员经亨颐提议废除故宫博物院，易培基多方据理力争，才使故宫博物院得以保留。随即在南京举行了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全体会议，推举李煜瀛为理事长，易培基为院长。

同年10月，易培基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农矿部长，仍兼上海国立劳动大学校长及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易任农矿部长期间，除调整内部组织外，还制定了训政时期农矿部施政纲领。他计划整顿直辖各矿局公司，筹建国营矿业，筹办矿品展览会，召开全国矿业会议等，但由于经费不足等原因，上述计划均未能实现。1930年11月，农矿、工商两部合并为实业部，由孔祥熙任部长，易培基的农矿部长职务亦被相应免去，易遂北上专理故宫博物院事务。

易培基到北平后，决心以故宫博物院的管理为终身事业，自任院长兼古物馆馆长，由张继（溥泉）任文献馆馆长，江

瀚（叔海）任图书馆馆长，以其女婿李宗侗（玄伯）为秘书长，使院务逐步走向正轨。他每天到院办公，对有关重要事项，都要亲自过问，全院工作渐臻改进，一度呈现蓬勃向上的气象。当时，故宫除按日分三路开放外，还增加陈列古代名画、玉器、钟表、仪仗等，以供游人购票参观。易又将太庙及景山也辟作公园，供人游览。他还主持对故宫殿堂进行了必要的整修，着手古物的鉴别、审查、整理工作，领导编辑出版《故宫周刊》、《故宫书画集》、《文献丛编》、《故宫所藏殿本书目》等刊物、书籍，以及各种拓片、印谱，使不少珍贵的史料、书画、文物得以流传于世。为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经理事会通过，并报行政院核准，1931年将故宫所藏金砂、银锭、绸缎、皮货、药材、茶叶等非文化用品公开降价销售，收入达70余万元，对博物院的维持和发展不无补益。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不仅侵占了我东北大片土地，还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地区，危及平津。面对险恶的形势，易培基于1932年春拟订了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计划，经理事会通过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施行。他不顾某些人的反对，毅然于1933年2月6日将第一批文物启运南下，至5月15日止，全部13491箱文物珍品分5批安全运往南京、上海。易为保存故宫文物尽心尽力，功不可没。

同年5月1日，正值最后一批文物准备装箱南运的时候，突有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到故宫调查处理物品问题，并于10月3日由最高法院检察署长郑烈向司法行政部提起公诉，指控易培基、李宗侗凭借特殊权力有低价购买故宫皮货、绸缎的违法犯罪行为。据说这是由于当时任司法院副院

长兼故宫文献馆馆长的张继没有当上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怀疑是易培基从中作梗；加上张妻崔振华得悉故宫博物院将公开处理部分物品后，曾要求先行选购，被李宗侗阻止，因此崔串通张继的门生郑烈，对易、李进行诬告。易培基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院、司法部提出反诉，要求行政院、司法部依法罢去郑烈的职务，但如石沉海，而诬陷之词有增无减。他逐渐意识到此案含有浓厚的政治派系和个人恩怨色彩，不是单纯司法问题，所以不愿出庭自辩，且于1933年10月15日提出辞去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务，随即避匿天津日租界。旋因华北局势日紧，而潜往上海匿居，一些报刊则谓其已畏罪潜逃去国外。

此后，郑烈多次派检察官到故宫和南迁古物存放地侦查，并通令缉拿易培基，还增加易在农矿部任内“吞没公款”部分，将该案由北平地检厅移归江宁地方法院办理。1934年10月，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更指称易培基、李宗侗在故宫博物院任内，盗取珍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珠换真珠9606粒，以假宝石换真宝石3251颗。于是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盗宝案”震动全国。同年1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由外交部协助司法部严令逮捕易培基、李宗侗，南京和地方法院据此扩大了侦查范围。隔了2年多的1937年9月，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再次提起公诉，指称易培基、李宗侗及原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3人陆续侵占所保管之故宫文物，计有书画594号、古铜器218号、铜佛101尊、玉佛1尊、秘书处装箱南迁古物12号、图章3号；珠宝除前案业已起诉者，尚有2号。并谓：“其侵占方法多以假易真，任意调换，

间亦有将全号物品或其中一部分径行吞没，致无从查考者。对于书画，则掉换之外，尚有割裂、挖补、改裱重装等情事。”^③易的有些同事、朋友对这些指控愤愤不平，劝易再行反诉，易愤懑地对他们说：“我因不愿巴结权贵而被挤下政治舞台，张继却握有法曹权力与我为难。张、郑不倒，我的冤情无反诉胜利之可能。”^④

易培基长期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症，故宫案嫌久久不能解脱，更使病情加重，因忧伤至甚，终于在1937年9月含恨死去，年仅58岁。死前留有遗呈一束，呈送国民政府，内称：“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仰恳特赐查明昭雪。”^⑤

易培基死后，一些友人曾为其申冤。蒋介石也说：“易是读书人，亦是老同志，不至如此，应查明白。”^⑥但长时间未予结案。直至1948年1月9日，《南京人报》突然登载一则消息称：“李宗侗、吴瀛免诉；易培基部分不受理。”^⑦这桩悬案遂告不了了之。但吴瀛（景洲）一直不服，于1983年写成《故宫盗宝案真相》一书，叙述前后经过甚详。惟此案甚为复杂，当时未能查清结案，事后更是众说不一。

注：

- ① 傅清石：《易培基的生平及晚年遭遇》（上），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1期第69页。
- ② 《政府公报》第3570号，1926年3月20日。
- ③ 《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书》1937年诉字第395号。
- ④ 周益：《故宫盗宝冤案始末》，《文史通讯》1983年第2期第33页。

⑤ 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第20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⑥ 同①。

⑦ 同⑤第218页。

徐 堪

马宣伟

徐堪原名代堪，字可亭，1888年1月1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生，四川三台县人。父徐奋卿系秀才，在家乡教书为业。徐堪自幼随父读书。1904年应岁考，得取秀才。

1906年春，成都通省师范学堂招生，规定报考者应为举人、贡生、秀才、监生。徐堪应考，取第八名。入学后，常与同学议论国家大事，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十分不满；同时经常阅读《新民丛报》、《民报》、《浙江潮》及《革命军》等书刊，思想逐渐倾向革命。1907年，黄复生、夏之时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回川，在成都成立同盟会四川支部。徐堪经同学卢师绶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9月，成都的同盟会支部拟在农历十月初十全城文武官员集万寿宫庆贺慈禧寿辰时，组织武装起义，占领省城。徐堪参与密谋，并领到手枪一支，准备参加起义。不幸计划泄漏，清政府四门戒严捉拿革命党人。徐堪和三同学逃往陕西，拟投奔凤翔府知府尹昌龄。步行入陕后，他又辗转到武汉待命，先入武昌工艺厂当学徒作掩护。1908年冬，徐堪接同盟会总部指示：以武汉起事尚待多时，着先各自散归。他长途跋涉返川，1910年初考入四川高等警官学堂。

1911年夏，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同盟会党人藉保路推进革命活动。徐堪率警官学堂及陆军学校学生10余人，赴川北一带策动民军起义。途中得知蜀军政府已于11月22日在重庆成立，急忙率队赶到重庆，被委为蜀军第四标标统。1912年3月，调任夔州关监督。清代夔关监督由夔州知府兼任，每年交征解银16万两，超额归监督私有；连同其它收入，每年所得不下10万两，是个肥缺。徐堪任监督后，大力整顿夔关制度，做到点滴归公，当年征解银达40万两。

1913年8月5日，熊克武、杨庶堪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号召，在重庆通电讨袁。讨袁失败后，四川督军胡景翼下令通缉革命党人，谓徐堪“并与逆党勾结最密，卷劫公款甚巨”。^①徐即逃亡上海；乃将原名徐代堪改为徐堪。

徐堪在上海继续积极参加护国战争及护法斗争，时时回川活动。1918年任川滇黔靖国军援鄂第一路总司令部军需处长兼江北县长。1919年被四川补选为国会议员。1921年4月，他在广州参加非常国会，参与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国会在北京复会，徐堪来到北京，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勾结直系军阀，宣布补选议员不得出席，徐堪便跟随胡汉民、谢持、邹鲁留在北方组织国民党党部。1924年北京政变后，他任北京政府农工部商品陈列所所长。1925年11月，邹鲁、谢持等人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徐堪追随谢持、邹鲁等人，将商品陈列所作为西山会议成员的活动场所。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徐堪离北京南下，初任上海交易所监理官，后改任金融管理局副局长，负

责管理上海金融，从此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效忠。1928年初，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3月改金融管理局为钱币司，徐堪初任副司长，12月任司长。他秉承宋子文的意旨办事，取得宋的信任。1933年孔祥熙继任财政部长，徐堪又兼任公债司司长；1935年5月他升任财政部政务次长兼钱币司长，1939年又兼任四联总处秘书长。徐堪在财政部十余年中，竭尽全力执行蒋介石和宋子文、孔祥熙的财政措施，为维护国民党统治集团利益出谋献策，事必躬躬，因此深得宋、孔信赖。

徐堪在财政部任职期间，为国民党政府做了四件事：一、确立中央银行的金融统治地位。中央银行成立后，名义上“为国家之最高金融机关，负有协助政府统一币制调节金融之重责”，^②然而商办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先利用金融力量阻挠中央银行开业，“继则提出中央银行发行之兑换券，全国不得超过4000万元；银行同业每日收到之中央兑换券须当日轧现，以及中央银行理监事名额与监事会主席人名等种种限制与要求非财政部完全应允与实行，中央银行不得开业”。^③在中、交两行多方扼制下，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被迫辞职。孔祥熙继任财政部长后，徐堪献策对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增资：中央银行由2000万元增扩为1亿元，确立其金融统治地位；对中国、交通两行则增加官股，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二、变中国、交通两行商办为官办。徐堪提出改组中国、交通两行的方案，使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三位一体，在同一战线上为国家奋斗”。^④1935年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通过上述方案时，遭到汪精卫等人的反对。徐堪多方搜集资料，写成会议辩论稿送交孔祥熙，再次开会时，由

孔对汪等的反对意见一一予以驳斥，又经蒋介石出面，改组方案乃得通过。从此，中国、交通两行改归“国营”，纳入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系统。三、改革、统一币制。清末和民国以来币制混乱，除中央政府铸造银元外，各省也造了一部分成色不一的银元、铜元，并发行纸币。徐堪针对币制混乱情况，起草全国统一币制方案，于1935年11月4日由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法币政策，为国民党政府稳定和统一全国财政金融起了很大作用。四、发行公债。1936年国民党政府采纳徐堪的建议，先后发行“统一公债”14.6亿元、“复兴公债”3.4亿元，为国民党政府筹集到大批款项。

徐堪为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方面立了大功，1935年1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又兼任中央政治会议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5月徐堪任行政院粮食部部长。他提出征实、征购、征借的“三征”政策，从广大农民手中强行征取粮食。1946年11月他调离粮食部，任国民党政府主计长。他在南京搞了一个“四川建设协会”，企图在西南建立起经济势力。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金、银、外币。9月6日，徐堪奉派考察四川、云南、湖南、湖北等省“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执行情形”。^⑥由于金圆券迅速贬值形同废纸，他向蒋介石献策：发行“银圆券”，以挽救金圆券全面崩溃的命运。11月蒋介石任命徐堪接替王云五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不久徐又兼中央银行总裁。1949年7月，他在广州主持发行银圆券为国民党政府作垂死挣扎，结果仍然是很快地变成废纸。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徐堪逃到香港，不久去美国。由于他多年积聚的财产皆被子女瓜分，遂于1959年孤独一人到台湾定居，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大会”宪政研讨会常务委员。1969年7月29日，徐堪病死台湾。

注：

- ①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记要》第92页，（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
- ② 徐堪：《中交两行增资改组案经过》，《徐可亭文存》第1页。
- ③ 同②，第2页。
- ④ 徐堪：《财政上的四大建树》，《徐可亭文存》第4页。
- ⑤ 同①，第395页。

黄展云

李锡贵

黄展云，字鲁貽，1876年1月4日（清光绪元年十二月初八）出生于福州，祖籍福建永泰。父黄育韩，卒于广西融县县尹任上，家道中落。黄展云3岁丧母，由祖母抚养长大。

1892年，黄展云入乡学。^①越两年，清政府对日战争失败，丧权辱国。黄忧于时局，发愤求进，自修新学，寻找挽救祖国危亡的道路。1896年，他考中廪生，向往政治维新。戊戌变法失败，他深感清廷腐败，民智不开，认为必须普及教育，培养青年的爱国思想，推翻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否则无以救亡，因而毅然抛弃科举仕途，研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以救国为己任。1899年，他与堂兄黄翼云、表兄林万里创办福州蒙学堂，并且联络会党进行反清革命活动。黄展云在蒙学堂除常设小学班外，还开特别班，设图书馆，辟运动场，置军体课，组织“励志社”、“阅报社”，举办讲演会，努力在青少年中启迪民族意识，灌输爱国反清的革命思想，引导学生关心时事形势，学文尚武。

1902年，福州蒙学堂改为侯官两等小学堂，规模扩大。黄展云极力充实进步的图书报刊，并亲自掌管《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太平天国笔记》等书册，专供加入励志社的进步学生及革命同志阅读。是年暑期，他借远足的机会，向学生讲述清政府的政治腐败，痛陈遭受外国侵略奴役之苦，称

颂史可法、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他的教育和启发下，程祖樵、黄光弼、高贻书、蒲开泰、陈与桑、严骥、张兆蓉、蔡世俊、陈更新、倪履新 10 名参加“励志社”的学生，商定都用“汉”字做自己别号的第一字，以铭推翻清朝还我汉族河山的决心。侯官小学堂成了当时福州联络青年、宣传革命的一个中心。^②

翌年，拒俄运动掀起之际，黄展云集合同志，假侯官小学堂开会，成立“海滨公会”，以“研究学问，讨论国闻”为名，拟出刊杂志，编练义勇队，参与拒俄运动，后因遭到当局的阻止和破坏，未能成事。此时，邹燕庭、林斯琛在哥老会内创设“共和山堂”，黄率一批进步师生和所联络的革命同志加入这个反清的秘密组织。1904 年春，他策动学生黄光弼等成立学生联合会。次年春，他与郑权、郑祖荫、林斯琛等组织“汉族独立会”，作为秘密反清革命活动的总机关。^③

黄展云在开展革命活动中逐渐意识到，要推翻清政府，须用武力。是年夏，当侯官小学堂高等班第一期结业之时，他遴派优秀毕业生陈更新去日本，进东京九段体育会，学习马术和兵操，预备投考陆军学校；派蒲开泰去上海科学仪器馆附设专科学校专攻理化，学习制造炸药；派严骥入闽口要塞炮科学堂肄习操炮。是年底，黄与表哥林万里共同编写《高等小学修身课本》8 册。

1906 年秋，黄展云与堂兄黄翼云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系深造，并加入中国同盟会。黄展云因与会党素有联络，当 1907 年 8 月“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他应邀参加，被推举为福建支部的负责人之一。1908 年秋，黄卒業

返回福州，主持“益闻阅报社”，即当时中国同盟会福建分会的机关工作，并在法政学堂任“修身”课教师，秘密进行反清革命活动。是年9月，福建咨议局成立，黄为避免清政府注目，并便利革命活动，入该局充当记录员。次年，他又在省城参加考核，得中优贡。

1911年3月，同盟会谋在广州举义，黄展云激励学生陈与桑、陈更新、陈可钧、黄光弼等前往。4月27日，广州起义事败，陈等壮烈牺牲，葬于黄花岗。黄义愤填膺，坚信“黄花赍志策未毁，主义随风更披靡”。

武昌首义后，同盟会福建分会谋划响应。黄展云在分会总机关主持文书部工作，^④加紧备制起义旗帜，拟就都督府宣言和章程。在11月8日晚至10日起义过程中，他参与部署军政，不遗余力。12月初，黄出任福建政务院教育部长。次年2月，改称教育司长。在此前后，黄展云拥护出师北伐，支持学生组织北伐队；主持学制改革，编写教科书，创办《福建民报》。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黄展云与许崇智等筹划响应，胁迫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独立。“二次革命”失败后，黄被捕，后经林万里等人斡旋，得释。12月，袁世凯派刘冠雄率李厚基督闽，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黄辗转上海，再次亡命日本。

1914年6月，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黄展云端诚拥护，宣誓参加该党，为孙中山所赏识，任秘书。他联络同志，宣传改组国民党、建立中华革命党的重要性，积极从事反袁活动。1915年2月15日孙中山委任黄为中华革命党

福建支部去；6月黄奉派与许崇智等人前往菲律宾、新加坡、马六甲、霹雳等地视察党务，劝募“革命公债”筹措讨袁军资。^⑤

1916年底，黄展云由东京返国至上海，在中华革命党总事务所工作。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黄奉命留在上海筹办汇源公司，为护法斗争筹集经费和联络革命同志。9月，黄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再去菲律宾筹饷。

1919年10月，黄展云被孙中山委为国民党福建支部长。黄回福州创办《福建新报》，抨击北洋军阀统治，支持学生爱国反帝运动，策动驱逐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李厚基以“造谣惑众，扰乱军心”的罪名将黄拘捕，《福建新报》也被迫停刊。1921年夏，黄获释后，即前往上海晋谒孙中山，孙令黄仍然主持福建党务。其间，黄在沪与方声涛、许卓然、秦望山等人组织“福建自治促进会”，并派秦望山先回闽收编民军，组织自治军。1922年，黄回闽，被各路自治军推举为总指挥。他戮力配合北伐军许崇智等部和北军王永泉部，于10月将李厚基赶走。嗣后，他抵制徐树铮将“建国军改制置府”移置福州的图谋，并积极在青年学生中发展党员，博得孙中山的赞扬和鼓励。

是年11月，黄展云兼任福建盐运使，为东路讨贼军筹饷，深得孙中山的赞扬。1923年初直系孙传芳、周荫人部入闽，黄命自治军第六路司令黄炳武在闽清截击，惟众寡悬殊，难于抵挡。黄展云遂避居上海。

1925年春，黄展云返回福州，筹办海滨中学，拟为宣传革命的据点。4月12日，黄出席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散发

驱逐军阀周荫人的传单，被捕下狱，在狱中备受折磨。迨翌年12月，北伐军入闽之时，黄光荣出狱，声望俱增。黄即着手筹组国民党福州市党部。他赞赏共产党员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品德，市党部的组织、工人、农民、青年等部，均交由共产党员负责，使市党部成为国共合作较好的一个机关。

12月25日，福建省政务委员会成立，越九日，又成立福建省临时政治会议，黄展云均任常委，兼政务委员会教育科（厅）长。此时，黄创办独青小学，自任校长，旨在培养为祖国独立富强而奋斗的青年。他还在城内组织“三五社”，以研究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为名，抨击政弊，支持人民反抗土豪劣绅，指出为了“正政本”、“清乱源”，必须组织特别法庭，以管理人民对于土豪劣绅之控诉。

在大革命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日益猖獗。1927年3月，福建的国民党右派召开“各界拥护党权大会”，4月3日又举行“拥蒋护党大会”。由于黄展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想利用国民党内地方青年派的力量来清除土匪流氓、官僚政客、贪官污吏等“伪革命党”，所以他颀预地赞成“拥蒋护党”处理“跨党分子”，以强化国民党。他在蒋介石嫡系与海军、地方青年派之间剧烈竞争的漩涡间，4月7日被抬上福建省党部代主任的职位。是时，福建的党、政、警、财和“清党”大权皆操蒋介石嫡系——东路军代总指挥、新编第一军军长谭曙卿及其参谋长赵启霖、政治部主任李大超等“十人团”和“黄埔同学会”之手。黄展云依然致力于教育事务，忙于组设省教育改造委员会，改校长制为委员会制，支持学

生向教会收回教育利权的斗争，划分学区，推广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幼儿教育，恢复农事试验场，建立通俗教育馆等等。

“四一二”政变后，福建于4月20日成立“处理共产分子特别委员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黄展云不同意国民党右派狂捕滥杀的罪恶行径，曾救出了中共福州特委组织部长陈应中等人。7月，福建开始第二期“清党”，黄展云任清党委员会副主任。他登报声明谢绝私人酬酢，以昭清白。

8月，黄展云任福建省政府农工厅厅长。他对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而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夭折的原因，归之于“有伟大的理想，没有接受的民众”，因而决定遵循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制”的建设方针，“向乡村去直接和民众接近”，去试验推行扶植农工的各项政策，企图走出一条改良政治，巩固民国的道路来。^⑧黄以长乐县营前为试验，拟订了《营前模范村暂行草案》，亲自兼营前模范村村长职务，并提请省政府设营前分县为模范县，划拨兵工营址扩建为劳工医院，发行水电公债，建造水力电厂。1928年3月初，黄展云率领一批人员进驻营前，设立农工银行，创办学校，清查田亩，整理警政，组建警卫队和民团编练处，捉拿土匪，打击土豪劣绅，紧缩费用，竭力想把村政府建成模范的廉洁政府。

黄展云改良政治的试验，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不过半年，即被制造借口而通缉，被迫离闽去沪匿居了一年。他面对“民国仅存名义，民命等于草芥”的政治局面痛心疾首，决心继续试验他的改良政治方案，于1929年9月又回到福建。

专任营前模范村村长。他成立了营前乡自治筹备委员会，清丈土地，测绘地图，实行“清葬”，改善村路，修建自新工艺所，美化环境，提倡男女平权。他认为革命之根本在于教育，三民主义之得以实现亦视国民教育之程度，所以特别重视教育。1930年5月，黄撰著《营前模范农村概况》一书出版发行。他期望通过这本小册子的宣传，得到国民党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使有志于国民革命的同志赶快改弦更辙，也像他那样深入农村，接近民众，致力于“村治”。但是，他所走的改良政治的道路本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又与蒋介石独裁统治相悖，因而惨淡经营的模范村终于搞不下去了。

1932年10月以后，黄展云踟躅沪宁之间，国民党政府对他十分冷淡。第二年，经友人奔波，才挂上一个全国侨务委员会委员的虚名，寄居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黄流亡武汉。他曾想回福建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后因患重病，于1938年7月16日在汉口去世。

注：

- ① 蔡人奇：《藤山志》，福建出版社1948年版。
- ②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民智书局1929年初版。
- ③ 郑祖荫：《福建辛亥光复史料》，1940年10月铅印本。
- ④ 郑权：《福建光复史略》，《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台湾版）。
- ⑤ 黄誓顽：《南洋霹雳华侨革命事迹》，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2年版。
- ⑥ 黄展云：《营前模范农村概况》。

诺那呼图克图

周锡银

诺那呼图克图^①本名赤乃降措，藏族，西藏恩达（今昌都县）人，1864年6月18日（清同治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自幼被恩达所辖之黑教寺庙诺那寺（一译为嘎拉寺）选为活佛。^②7岁被迎入庙，法号诺那。他长期在寺中苦读经书，并习吞刀吐火之术，后来又曾就学于西藏类乌齐县某红教寺院，不仅熟悉藏族的宗教、历史、文学，而且对于天文历算、工技医方等也有造诣。他的弟子说他“博学多闻，精梵藏文学，工技医方诸明，皆善巧”。^③

1904年英帝国主义武装进犯拉萨，达赖十三世在诱逼之下投靠英帝，于1909年下令停止了对清政府驻藏大臣柴草、粮食和人役的供应，并征调藏军阻击清政府派遣入藏的川军。1910年3月，川藏两军激战于西藏工布江达一带。这时诺那正受聘于工布江达的土酋白马策翁家，为其出谋献策。“当藏军来攻时，（白马策翁）谋与结仲（诺那）喇嘛，结仲知国际大势，力主抗拒（藏军），如战胜藏军即可自立为国，将来朝廷容纳再为内附，否则投英以为保护。”^④白马不从。后来，诺那曾多次规劝其率部归附受清政府派遣入藏的川军，以抗击亲英的藏军，白马仍不从。诺那遂联合左右，斩白马策翁全家首级献于清政府总督行营，工布江达全境得以平定，清川

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此曾奏请朝廷封诺那活佛为西康大总管。^⑤

1914年“西姆拉会议”破产，英帝分裂西藏的阴谋落空后，便唆使达赖集团发动对川康边境的武装进犯，妄图用挑起汉藏流血冲突来实现其分裂西藏的目的。1917年9月，驻类乌齐县的川军和藏军发生武装冲突，达赖乘机向昌都以东扩张，攻占了昌都、察雅、德格、邓柯、白玉和石渠等县以及金沙江以西的大片地区。其时，诺那正活动于川藏毗邻地带，在僧俗民众中颇有声望。藏军东侵时，诺那助川军抵御藏军。当川军节节败退至昌都时，统领彭日升受藏军利诱，尽缴械弹以降。诺那率领下的军民死伤殆尽，仅存卫兵10余人。诺那命左右离去，说：“藏中待俘虏，刑至酷。每割截耳目手足，非汝等所堪。余为大喇嘛，除极刑，唯问监禁。”^⑥1918年7月15日诺那被藏军俘虏。

十三世达赖集团的藏军在攻占藏边广大地区之后，英帝驻川边副领事台克满（Elic Teichman）貌似公允，从中斡旋，川军和藏军于1918年8月在昌都签署了“停战协定”。诺那被藏军押解至拉萨，英人出面调解，谓如降，即可委为川边藏区僧俗民众的统治者，诺那严词拒绝。审讯者责问他“喇嘛打仗，犯重戒，汝可知乎？”诺那据理雄辩，审讯者无以对。终被判处永远监禁，移囚于拉萨西南7日路程之孤山地牢中，派一连藏军严密看管。诺那在牢6载，日惟念佛。1924年10月，看守者报告达赖喇嘛说，诺那已“不食、绝息、如死状”。达赖派人往验属实，于是就地掘土坑草草以三件羊皮裹埋之，并在侧近垒了一个土塔，名曰降伏塔。数日内，诺那

凿洞钻出，以二羊皮为衣，潜离孤山，昼伏夜行，辗转逃出西藏至尼泊尔境，乞食为活，遇疾辄医。道经札希孔，恰逢王子之女患病已久，治之立愈，被尊为上宾。后来转赴印度孟买、波罗克等地，再经海路回国至上海，历时9个月。1925年10月5日到达北京，谒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不纳；谒临时执政段祺瑞，门卫不报。诺那悲愤填膺，拟碎首殉难，卫兵阻救，受段祺瑞召见，赠送千金，留居京师。

1926年冬，诺那被川康军务督办刘湘邀至重庆，设坛授经传教，从者甚众。1928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安抚川边，举荐诺那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特准成立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后诺那又被选为立法委员，为国民党政府治边治康出谋献策。西康建省委员会设立，他任委员。1935年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第五届候补执委。嗣后兼任中国佛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菩提学会副会长，先后在上海、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主持“护国息灾法会”。

1935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长征，6月与第一方面军会师于懋功（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国民党政府和川康地方军阀十分恐慌。为了抵销红军在川康藏区的革命影响，阻击红军，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夏委任诺那为西康宣慰使，命他从内地迅即返回西康藏区，进行所谓“宣慰”和纠集农奴主武装“御匪”。8月，诺那抵西康省首府康定，随即召开了有康定土司头人、活佛喇嘛以及官僚士绅参加的第一次宣慰大会。他在竭力宣扬国民党政府戡乱剿共“德政”和“三民主义功效”的同时，还诽谤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因而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同年末，

红四方面军进入康北高原之前，诺那竟“不辞跋涉之劳，以七十衰病之身”，率西康宣慰使署随员离康定赴关外的乾宁、道孚、炉霍（今炉霍）一带荒寒之地，进行反共活动。

当时的康北藏汉人民，正处于帝国主义、地方军阀和藏族僧俗农奴主的严酷统治之下，殷切盼望红军早日到来。《康藏前锋》记载，当时“康民历年苦驻军苛虐，仇怨日深，闻红军之将至，于是群起抗难，扣留县长，撤除繁敛”，积极行动起来迎接解放。诺那在康北沿途所经之地，耳闻目睹了群众的疾苦和愤怒的情绪，不得不以西康宣慰使的名义采取一些缓和民情的措施，撤换了道孚、炉霍、甘孜等县县长，直接指导保甲，训练地方武装。这些行动立即引起四川军阀的疑惧。他们攻击诺那赴康造成了混乱，说康北4县皆无县长，成为无政府状态，以致红军乘虚而入等等。诺那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互相攻讦，引起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安。经过多次调停，诺那始得四川当局“谅解”。此后，他勾结康北藏族大土司头人德格土司泽旺、上瞻总保多吉朗加，联络大活佛甘孜香根等，组织农奴主武装，阻击红军西进。他在给国民党政府的报告中说：已“可调康地民兵八千名布防御匪”。^⑦同时，他到处奔走“安抚”藏民，造谣诬蔑所谓“共匪之罪恶”，“详示中央所以防剿之策……力行坚壁清野”等等。

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越夹金山过宝兴、天全，经康定、乾宁和道孚，于3月5日占领炉霍县城。诺那调集康北数县农奴主武装，屡向红军骚扰，曾亲率炉霍县寿宁寺喇嘛军夜袭红军驻地，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红军攻克康北重镇甘孜县后，组建了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政权——中华苏维埃博

巴自治政府，^⑧诺那及其宣慰使署官员仓惶出逃瞻化（今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由于红军和博巴政府坚持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诺那的随行官兵发生了严重分化。一些人不愿再与红军和博巴政府对抗，有的群众也不再接受诺那的“宣慰”。4月6日，其随员藏族头人巴登多吉将诺那捆绑至瞻化，驻县红军立即把诺那转送甘孜县的红四方面军总部。

由于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毒害甚深，诺那初到甘孜时，对红军的态度非常傲慢。他说：“我为发号施令之人，全署员兵（指西康宣慰使署官兵）奉令行事。蒋委员长待我厚，防御共匪系我天职，速杀我，宽免员兵。”红军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他进行团结教育，先让其亲信弟子、宣慰使署秘书长韩大载陪伴护理，随即红四方面军总部有关方面负责人亲往诺那住宅向其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解除疑惧。在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诺那仇视红军的态度有了显著转变，不仅不再污蔑、诋毁红军，相反还自愿教红军指战员学习藏语藏文和藏族歌谣。在他的住地，“哼呀不止，并制藏歌，歌之，声彻云霄，说康藏故事，听者多感动，尝自煮茶熬酥油……”，^⑨与初时判若两人。

5月6日，诺那染疾发烧。红军在医药给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尽力治疗。5月12日晨，诺那病情加重，周身发热疼痛难忍，要求医生注射吗啡止痛。因诺那心脏较弱，不能用吗啡，改用樟脑。诺那感慨地说：“我为将死之人，用去这些珍贵针药，太可惜。”^⑩5月12日晚，诺那病情突然转重，抢救无效去世。

注:

- ① 呼图克图是清朝中央政府授予藏族和蒙古族地区喇嘛教大活佛的封号。凡属这一级的活佛,均载于理藩院册籍,每代转世必经中央政府承认和加封。国民政府沿用了这一制度。
- ② 黑教系藏族“本教”的俗称,藏语称“本波”,为藏族地区固有之宗教,崇奉鬼神和自然物,尚巫术。佛教传入西藏后,黑教势力渐衰,随后因受喇嘛教影响,成为类似喇嘛教的一个教派,藏族称之为白本教;但在偏僻地区,仍保持着许多原有特点,藏族称之为黑本教。
- ③④⑨⑩ 《诺那呼图克图行状》,《康藏前锋》第4卷1、2期合刊。
- ④⑤ 刘赞廷:《西康建省记要》卷8。
- ⑦ 《西康各县匪灾调查概况》,《康藏前锋》第4卷第7期。
- ⑧ “博巴”是藏语“藏族人民”之意,博巴政府即“中华苏维埃藏族人民自治政府”简称。

孙 道 仁

黄国盛

孙道仁，字退庵，号静山，湖南慈利人，1867年2月1日（清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其父孙开华，系入闽湘军将领。孙道仁幼年随父在闽，好驰马试剑。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孙开华以署福建陆路提督职，由泉州渡台办理台北海防，镇守沪尾。法军封锁台湾的时候，孙道仁密雇帆船，把弹药藏在舱底，渡海接济驻台守军，因而被台湾巡抚刘铭传委任前敌营务处，后保加四品衔。这是孙道仁从军之始。

中法战争结束，孙道仁赴北京以荫生参加考试，任京府通判，分发顺天补官。孙道仁赴京时，为了讨好满清贵族，携有巨金和其父孙开华在战争时抢来之古玩珍宝以通关节，孙开华又巴结攀附庆亲王奕劻，因此他得以于1890年被安置在颐和园海军水操内学堂任办事官。这一差使向来多由满贵族担任。

1891年，热河发生金丹道农民起义，清政府调集直、热、奉军队进行血腥镇压，孙道仁奉命担任后路运饷事务，往返于朝阳、赤峰、热河等处，后得赏三品衔以知府分发福建补用。不久又升为道员仍留福建补官。1893年其父孙开华死，回籍守制。

甲午中日战争时，孙道仁被湖南提督娄云庆调用，总管

庆字全军营务处兼统庆新五营，驻岳州听候调遣，议和后解职。1895年，孙道仁受闽浙总督边宝泉委任，会同督办善后局。1897年在闽统带福胜中前两营。次年受闽浙总督许应骙委任，总办全闽营务处仍统领福胜步炮等营，驻扎省城；旋又兼统福强水陆全军。

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闽省官僚和洋人惊惶不安，各国驻闽领事指名要孙道仁“出任保护之责”，孙贸然应许。孙道仁并劝请闽督加入“东南互保”，“与各国订约保其商民教士”。^①为了防范福建人民起来斗争，孙道仁照会各领事，请闽省各国商人及传教士移居省城，由他派得力军队两营严加防卫。孙道仁还密布侦探，亲自带兵严密梭巡，竭力压制民众的反抗，被时人讥为媚外。同年浦城县刘加福聚众数千人，起来反抗当地官吏的苛暴统治，孙道仁得到情报报后立即传令部下，授以机宜，“擒刘加福于江山界”。^②孙道仁深得清廷赏识，获二品顶戴。

“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以倡办“新政”为名设练兵处，编北洋新军为中央军，并下令各省编制地方新军，借以维护垂危统治。1901年秋，闽浙总督许应骙奏派孙道仁赴日本参观军事演习，兼考察陆军教育。孙道仁回国后，即开办福建武备学堂，任武备学堂总办，聘日本士官和教习，教学管理等均仿日本士官学校办理。学堂毕业生赴北京考试多名列前茅，各省争相延揽，充任统带、管带者不乏其人。后来闽军不少军官都曾受训毕业于该学堂。孙道仁同时着手建造陆军营房，购买新式枪炮，为建立闽省新军煞费苦心。

1902年，闽省暂编常备军左右两镇，以孙道仁本部及福

强军步队数营编为常备军左镇。1903年闽浙总督许应骙被清廷免职，孙道仁也为藩司所中伤，解去左镇职，降补通判，但仍充任武备学堂总办兼充督练营务处。不久官复原职。湘人李兴锐1904年督闽，孙道仁被委任为常备军右镇兼统长门炮台。不久李离闽，将军崇善兼署闽浙总督，孙道仁被解去右镇及长门炮台统领职，改任职军政局，仍总办武备学堂。

1905年初，孙道仁代理福宁镇总兵。他奉命筹办改编常备军事宜，为使闽省武力练成一镇，变卖其父遗产不少。是年河间府秋操，孙道仁前往参观，并去上海、湖北参观兵工厂。11月，清廷正式提升孙道仁为福宁镇总兵。孙到京谢恩，朝廷赏其福字，并询问湖北张之洞枪炮厂和袁世凯秋操情形，孙受宠若惊，竭力表示效忠清廷。不久孙道仁又世袭骑都尉之衔。1906年升任暂编陆军第十镇统制，成为闽军头面人物。1909年解去练兵处及武备学堂总办职务，因办学堂有功，清廷赏加提督衔。翌年奉命率兵前往厦门“照料保护”美国来华“游历”舰队人员。事后又往安徽参观第八、九镇会操。入京复被召见，得赏陆军副都统衔。1911年，清廷正式任命孙为福建提督。

武昌首义告捷，各省革命迅速开展。福建革命党人积极运动新军。曾任福建佐杂官职的彭寿松，设立“军警同盟会”，在第十镇发展革命力量甚众。第二十协协统许崇智是同盟会骨干会员，第三十八标标统杜持和革命党人赵声曾有联系，此时皆跃跃欲试。^⑤孙道仁本来与革命无缘，面对是顺从还是抵制的抉择，初甚犹豫。这时福州将军朴寿制造恐怖，于福州各城门遍埋炸药，还企图把闽省新军将领诱入署中聚而

坑之。孙道仁闻悉后颇为震惊，以大势所趋，遂于11月5日在马江一船中，由彭寿松做介绍人，加入了同盟会，立誓并盖手印。孙道仁与革命党人林斯琛等会商部署起义日期和计划后，于8日发出部署密令：许崇智担任前敌总指挥；与“旗界”交接各街道地带，分布进攻和堵截部队，以于山为总攻阵地，前敌总指挥部设在于山观音阁；各革命与进步社团组织，于当晚配合军队，紧密巡防，等等。^④9日拂晓，福建新军在省城正式宣告起义，孙道仁至于山督战。经过激烈战斗，杀死了朴寿，旗兵投降。但孙道仁对闽浙总督松寿在城内吞金自杀，颇为伤感，为松寿开会追悼，“以尽寅谊”。后来他回顾辛亥经历时仍感慨地说：“余虽赞助汉族之光复，且回念先壮武公（即孙开华）谆谆训诫之辞，尤究不能免清史之讥，殊自惭也。”^⑤

11月11日，福建成立临时政府。同盟会福建支会会长郑祖荫等执旗捧印往都督府，推举孙道仁为军政府闽省都督。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后，孙道仁被任命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福建都督。

光复后的福建情况和全国相似，革命党人涣散自满，新政权内部各派力量争权夺利，局势混乱。任参事会会长的彭寿松居功骄傲，认为福建光复系他一手造成，不把都督和其他人放在眼里。第十镇官兵虽然参加了彭组织的军警同盟会，然皆系孙道仁部属。彭寿松无法制孙，乃自设亲兵两营，由哥老会重要分子张煊、刘辅廷分任管带，使其子彭厚庵统之。彭与孙表面上虽然没有公开冲突，但内心仇结愈深。1912年初商讨正式建立“福建临时议会”时，以彭寿松为首的湘籍

“旅闽人”，力主议会需特别规定“旅闽人议员专额”。同盟会会员、都督府民政科科长蒋子尊和福州《民心报》经理黄家成，因坚决反对议员专额，先后惨遭彭寿松手下帮凶的暗杀，引起舆论公愤。孙道仁无能为力，通电袁世凯、黎元洪等，要求派员来闽调解，自己愿意立刻解职，“以谢两面，而息争竞”。^⑥不久岑春煊受袁世凯指使，乘舰船带军进入马江。这时革命党人刘伯仁、黄光弼、郑兰荪等人对彭进行了诚恳的劝说，彭寿松不得不退职，孙道仁得以暂安。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李烈钧湖口通电讨袁，安徽、湖南、广东等省先后宣布独立。这时福建省内各方群情愤激，福州警界派代表向都督府请愿，要求宣布独立。孙道仁看到袁世凯握有绝对优势之兵力，甚为胆怯；但又看到李烈钧、黄兴决心讨袁，群情难违，感到左右为难，便拖延观望，等待时机。时任民国陆军第十四师师长的许崇智约同刘通、黄光弼等人去见孙道仁，要孙作出“最后决定”。孙不得已，于7月19日和许崇智联名通电各省，宣布福建独立。但电文中只说：“袁氏派兵迫赣，赣省既已率先，吾闽岂容后义，特合各界会议，即日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不敢明确谴责袁世凯，也不说及出兵北伐。当时人们就看出，这是孙道仁害怕得罪袁世凯，替自己留有“余地”的表现。^⑦孙道仁对许崇智要求出兵北伐之事只在口头上敷衍，不予行动上的支持，因此名义上虽宣布独立，但实际上并没有行动。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道仁于8月9日宣布取消独立，电袁世凯请罪，并把责任推诿于许崇智。袁世凯一面复电予以安慰，一面裁编闽军，调刘冠雄率李厚基的北洋军第十七

旅入闽，并将闽省湘籍军队尽数遣散；随后又下令裁撤福建都督，并以李厚基为福建护军使。从此福建陷入北洋军阀的统治。闽军遣散后，孙道仁失去活动地盘，事实上等于退出了军界。孙被迫辞去都督职之后，入京受袁世凯审查。期间，孙得知原福建盐场知事饶汉祥担任参政院参政，遂托饶在袁面前为自己“辩白”。袁世凯从饶口中闻知“孙本不学无术，不过是纨绔子弟而已”；^④又经陆军部查证，说孙道仁宣布讨袁“有不得已之苦衷”，于是袁发布策令，对孙“特予免议，以示宽大”。^⑤不久孙道仁获准回籍。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孙道仁于翌年被聘任总统府高等顾问。但不久黎元洪下台，孙也去职。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特任孙道仁为永威将军。孙奉命前往甘肃、新疆两省查勘烟禁，乘机捞了一笔贿赂之财。1923年事毕销差回京，遇上黎元洪再次被迫退位，孙失去黎氏依靠，告老回籍，增购田产。晚年应女儿女婿所请，居住厦门养老，于1932年8月去世，葬于长沙。^⑥

注：

①②⑤ 孙道仁：《退庵纪事》，见《闽省革命战史》。

③ 杜伟：《闽军北伐支援胶东光复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册。

④ 刘通：《辛亥福建光复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⑥ 《福建辛亥光复史料》第226页。

⑦ 郑坦：《许崇智响应“二次革命”点滴》，《福建文史资料》第1辑。

⑧ 闵子南：《我对孙道仁片断之所知》，政协泉州市委员会秘书处藏稿。

⑨ 见《奋兴报》1914年10月16日。

⑩ 湖南慈利县党校罗祥祯调查。

卫立煌

严如平

卫立煌，字俊如，安徽合肥人，1897年2月16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生。父卫正球，为本县石塘桥乡册书，登记管理当地田赋，1905年歿于瘟疫。此后全家赖其大哥卫立炯在县任职维持生计。卫立煌少时入邻村私塾就读。辛亥革命后，卫立炯任和县军事训练班主任，卫立煌亦去和县，受到大哥及其友人革命思想的熏陶。“二次革命”起，和县宣布独立，袁世凯派倪嗣冲出兵镇压，卫立煌随大哥加入群众武装队伍抵抗，失败后潜回家乡。

1914年初，卫立煌去汉口投亲谋职未成，报考学兵营被录取。一年多的军事训练，使卫受到严格锻炼。结业后，卫不愿去北京入北洋军，到上海寻找革命党人。后南去广州，入朱庆澜的省军，旋任班长。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卫立煌被选派参加孙中山之卫队，不久升任警卫团排长。

南北对立后，北洋政府段祺瑞奉行武力统一政策，于1918年4月任命福建督军李厚基、浙军师长童保暄为“援粤军”正副总司令，进兵广东。孙中山命陈炯明、许崇智率援闽粤军讨伐李厚基。卫立煌奉派编入粤军第二支队，向闽西南进发。在一次夜战中，队伍被冲散，卫挺身而出，集合百

余人袭击敌军指挥部反败为胜，被晋升为连长。不久又因战功升任营长。

此后，卫立煌在粤军许崇智部转战广西、江西、福建，以后又参加镇压商团叛乱和东征平定陈炯明叛军，战斗中英勇果敢，身先士卒，先升任团长，后又任补充旅长。1925年9月，粤军首领许崇智被蒋介石逐离广州，所部粤军被蒋改编，卫立煌旅被缩编为第九团，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卫改任团长。

1926年7月，北伐军兴，卫立煌第九团先编入总预备队留粤，10月在何应钦指挥下入闽作战。在永定、松口两战中，卫立煌英勇沉毅，兼富谋略，为击溃周荫人部立下战功，先升任第十四师副师长兼前敌总指挥，不久又任师长。平定福建后，卫部北上入浙，战孙传芳军。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于南京另建国民政府，第十四师驻南京，后移镇江。8月下旬，孙传芳军反扑，分三路强渡长江南下，抢占龙潭车站。卫率第十四师自镇江进占龙潭车站北侧之高地，日夜鏖战，全力拼杀。经6昼夜激战，第一、七军等终于击溃孙传芳军，第十四师等部乘胜渡江追击，直至蚌埠。10月，第一军扩为第一、第九两军，卫升任第九军副军长，后又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副司令。旋即北上入陆军大学将官特别班第一期进修。

1930年初，卫立煌奉命在蚌埠组建第四十五师，任师长。在5月爆发的中原大战中，第四十五师奉命保持津浦线南段的畅通，保卫南京。蒋介石中原大战取胜后，即调集大量军队，接连发动对工农红军的“围剿”。1932年5月他调集25

个师又7个旅，分兵三路进犯鄂豫皖苏区。卫被派为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率李默庵第十师和蒋伏生第八十三师，于6月先在平汉线南段花园车站附近活动，8月占河口后向黄安（今红安）前进，与红四军、红九军等红军主力遭遇，第十师在冯寿二地区受到伏击，消耗兵力甚多。第二纵队等部在黄安、新集、七里坪等地与红军激战受重创后，均停滞不前。蒋介石下令各纵队向鄂豫皖苏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进击，重申将来设县时以先占者名字命为县名。9月，卫率第六纵队自新集北进策应第二纵队，于18日走山间小路袭占银山畈，越过大别山北部之蒙家山，与红军交战后进抵汤家汇。红军为保存力量转移东去，卫部第十师主力遂于20日乘虚进占金家寨。事后，蒋介石划霍山、商城、六安等县的边境地区设县，命名为立煌县（今金寨县），并任卫为“豫鄂皖边区剿匪总指挥”。在1933年10月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卫又被任命为北路军第二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

是年11月，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等人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调兵镇压。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第十四军附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冷欣第四师、汤恩伯第八十九师，同张治中第四路军、蒋鼎文第二路军一同开赴福建。卫率主力隐蔽于顺昌以南及沙县附近，以宋希濂第三十六师袭占延平（今南平），被福建当局误认为主力，卫乃率主力沿闽江急趋仙游和惠安东北之涂岭设伏，袭击十九路军南撤队伍。次年2月，退集到泉州的十九路军余部被围，卫立煌迫使他们接受改编。福建事变终被蒋介石镇压。蒋对卫听从调遣，虽非亲信嫡系而肯为自己效力作战，深为满意。

以后，卫先后被任命为驻闽预备军总指挥兼驻闽第十绥靖区司令官、豫鄂皖三省边区“清剿”总指挥兼三省边区督办、闽赣浙皖边区“剿匪”总指挥。在1935年11月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6月，他兼徐海绥靖分区司令官。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首犯平、津，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卫立煌率第十四集团军请缨北上，第十四军3个师迅速北调。部队开到保定，北平已失陷，乃绕满城至易县，进入太行山脉东侧，旋北进至北平西郊门头沟附近之千军台，与日军接战。10月初，卫率部自石家庄入晋，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在忻口一线集结重兵，除李默庵第十四军、郝梦龄第九军外，还有刘茂恩第十五军、陈长捷第六十一军等，共约10万人，正面防御自晋北南犯之日本板垣第五师团等部共5万余人。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于9月25日在平型关伏击板垣师团一部奏捷后，此时在忻口以北展开了英勇的游击战，不断袭击日军，破坏日军的运输补给线，给卫部以很大鼓舞和支持。卫指挥各军奋勇作战，在忻口地区展开了正面战场的大规模防御战。广大士兵满怀民族义愤同仇敌忾，坚守阵地，大量杀伤日军，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等在战斗中阵亡。在八路军游击战的有力支援和配合下，忻口战局支持了将近一个月，寸土不让，歼灭日军2万余人，力挫日本侵略军锐势，挡住了它的正面进攻，鼓舞和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直至日军占石家庄后沿正太线突破娘子关直奔太原，忻口阵地侧背均受到威胁，卫才指挥守军撤至太原城北。11月8日太原陷落，卫指挥各军撤向汾河以西太

原以南地区，集结在汾阳平遥一线，继续抗御日军南下。卫作风谦和，对杂牌军不存门户之见，能够一视同仁，因此各军多能协同对敌。1938年1月，卫升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1939年1月，卫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洛阳，9月兼任河南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翌年又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卫周密布防，在中条山背水为阵，保卫黄河，与日军对峙4年不懈。

国共合作抗日之初，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统率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广泛开展游击战，不断给日本侵略军以袭击和威胁。卫立煌钦佩八路军英勇抗日，在作战部署及战术配合等方面相互密切合作。1938年春节，卫亲去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向朱德贺年，并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经验，建立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3月，卫率一部东去中条山，在大宁遭日军袭击，朱德接卫电后即派八路军驰援；此时驻石楼的日军又扑来，八路军一部赶至白儿岭奋勇阻击，掩护卫等脱险，卫深为感动。4月，卫偕参谋长郭寄嶠、文朝籍等随从人员，自永和渡黄河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接待和宴请，毛泽东称赞卫面对强敌不屈不挠，屡败屡战，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使卫更增强了合作抗日的信念。他督促所属按时向八路军供给足够的饷械，遏制所部与八路军闹磨擦。对于八路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扩大游击战，卫都认为是抗日的实际需要。他说，二战区的军队，凡是打日本的，都应当一视同仁，曾一次拨给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以后在一战区，他对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亦有较好的合作关系。他

还请朱德向所部官佐讲世界形势、抗战前途和游击战术。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自1938年冬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提出许多“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唆使部属制造反共磨擦。卫立煌认为这不符合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方针，予以敷衍和抵制。1939年10月，国民党特务伙同当地反动势力，袭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杀害伤残病员和家属200多人。卫震怒之余，将南阳专员朱玖莹撤职，并惩处宛属十三县联防主任别廷芳等有关人员。翌年2、3月间，蒋介石指令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部，由磁县、武安一带三路向太行区八路军驻地进犯，遭到八路军自卫还击。朱怀冰急电向卫求援，卫拒下驰援令，结果朱部主力及反共游杂武装共万余人被歼。卫还不顾蒋介石、何应钦之电令，照常给八路军发放饷械。是年秋，蒋命卫北上太行山，遏制八路军向南发展。卫会晤朱德，协商议定了双方活动和抗日防卫的地区，划漳河为界避免磨擦。由于卫没有坚决执行反共方针，蒋介石心生疑忌，指责他偏袒八路军。1942年1月，蒋下令卫调离第一战区，解除本兼各职，改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剥夺了他的军权，并暗行监视。

1942年3月，我国组建中国远征军，入缅与英军并肩作战，以确保滇缅公路国际运输线畅通。卫立煌被任命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但还未到任，被指为偏袒八路军有据，蒋介石即于4月改派罗卓英任之。远征军援缅作战失利，大部退回云南。1943年蒋介石重组远征军，10月命卫立煌接替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职，任务是消灭滇西怒江以西的日本侵略军，打通中印公路。卫到任后，建立前进指挥部在保山县

马王屯亲自坐镇。他除了与云南省主席龙云建立良好关系，保证远征军有足够的粮秣外，还与美国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建立友好联系。美方建立一支代号为“Y 部队”的联络部队，负责向远征军供应弹药和武器装备，以及组织空军配合作战。卫立煌经过周密计划，部署霍揆彰第二十集团军担负攻击集团军任务，强渡怒江，向腾冲进击；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集团军；另以何绍周第八军及第五军高吉人第二百师为直属预备军在昆明待命。

5月11日拂晓，卫立煌指挥远征军发起攻势。第二十集团军先后由栗柴坝、攀枝花渡过怒江发动攻击，第十一集团军的四个加强团亦分别由惠仁桥、蚌董渡等地渡过怒江，第五十三、五十四军经过激战收复唐习山、大塘子，向腾冲攻击前进。第五十三军由高黎贡山东坡强攻，在罕无人迹的悬崖峡谷攀行3昼夜，到达山顶后乘势猛攻，日军惊惶失措，放弃阵地，退入据点固守。第二十集团军强渡怒江奏效后，卫立煌改变部署，指挥第十一集团军也全部渡江，参加攻击。8月，卫指挥所部围攻松山，猛击腾冲。日军凭借坚固工事拚死顽抗，但我抗日部队在滇西人民的支援下英勇战斗，终于在9月7日攻克松山，14日收复腾冲，击溃日守军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及滇西日军指挥部；11月3日光复龙陵，20日进占芒市。卫指挥远征军乘胜追歼日军，12月1日克复遮放，1945年1月20日攻克畹町和猛卯，继续追击至南坎以西。经过远征军9个多月的艰苦战斗，盘踞在滇西和中缅边境两年之久的日本侵略军，共被歼灭1.7万余名。在远征军节节推进的同时，郑洞国、孙立人率驻印军在缅北艰苦作战，次第攻占

了加迈、密支那、八莫、南坎等重要据点。1月27日，远征军和驻印军在畹町附近的芒友胜利会师，中印公路遂即通车，被封闭近3年的对外交通运输线得到恢复，国际援助的抗战物资源源输入。卫立煌指挥远征军抗战获胜声震中外，3月被任命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但卫与总司令何应钦的思想作风不合，难以合作共事，故不常到部问事。

卫立煌自1939年10月妻子朱韵珩病故后，独身生活数年。有人曾欲说媒孔祥熙之长女孔令仪，卫拒绝，而与旅美执教的韩权华于1945年初在昆明结婚。韩权华是一个爱国心很强，音乐造诣和文化素养甚高的女子，她倾慕卫坚决抗日、具有民主思想而感情真挚，婚后卫的心情颇为欢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阴谋发动内战，蒋介石以及陈诚等人声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卫立煌主张国共之间的争执及八路军改编都应以政治谈判来解决，与内战叫嚣格格不入。翌年春，卫由重庆回南京。不久，内战烽火四起，卫态度消极，深居简出，筹谋出国。11月，卫偕韩权华启程赴美，考察军事，历时半年；又继续在欧洲英、法、西德、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参观考察。他深为国内战事日剧而焦虑，在欧洲曾让亲友通过法国共产党人与延安联系，表示愿为早日结束内战实现和平进行合作。回国途中，他还参观中东各国，直至1947年秋返抵上海。

此时，蒋介石发动的大规模内战，已经由“全面进攻”经“重点进攻”、“分区防御”而改为“重点防御”，两年中被歼灭264万人，败局已定。尤其是东北战场，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打击下，40余万国民党军队被迫龟缩在长春、沈阳、锦

州3个孤立地区。1948年1月，人民解放军又发动猛烈的冬季攻势，蒋介石为挽救岌岌可危的局势，并解脱其亲信陈诚的困境，下令卫立煌继陈诚为东北“行辕”代主任兼“剿匪”总司令。卫推辞未成，北上就职。他力谋掌握一些听命自己的实力，并部署各军屯守沈阳、长春和锦州，只是整训部队，修筑工事，竭力避免出兵与解放军交战，争取东北战局能够和平解决。但是蒋介石要东北军队出击，打通北宁路（今京沈线）沈锦段，将主力撤到锦州，以备转入关内。卫以兵力不足、地势不利等理由加以拒绝，相反要求蒋从关内增援3个军的兵力登陆葫芦岛来打通沈锦段，使蒋十分恼火。卫、蒋之间争执迭起。嗣后，蒋遂自向范汉杰、杜聿明、廖耀湘等人发出指令，自行其事。卫坚持按兵不动，只想多拉一些部队摆脱蒋介石的控制，以待时局的变化，最后投到人民一边。

9月，人民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先打锦州。蒋介石不顾卫立煌的反对，以廖耀湘第九兵团等共11个师又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新民出彰武和新立屯，妄图切断解放军的补给线后南下；又以锦西、葫芦岛的守军及从华北海运来的援兵共9个师组成“东进兵团”，沿铁路线北上增援锦州。蒋责备卫不肯出兵辽西是不想打仗，一再到沈阳及葫芦岛、锦西发令指挥。东北人民解放军集中主力攻打锦州，将“西进兵团”阻击于新立屯以北地区，并将“东进兵团”挡在塔山阵地以南，于10月14日向锦州发起总攻，激战31个小时，全歼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解放锦州。18日，蒋介石又抵沈阳，以卫立煌指挥不力，命杜聿明任东北“剿

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指挥廖耀湘兵团开赴黑山、大虎山，企图夺回锦州。卫立煌要廖退守沈阳的主张，被蒋严词拒绝。卫完全放弃指挥。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下，经两日一夜激战，廖耀湘兵团5个军10万余人，在辽河以西、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至28日全部歼灭，廖耀湘亦被俘。长春已先于19日解放，沈阳此时在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下，一片混乱。蒋为诿卸败责，此时又命令卫为东北“最高指挥官”，叫卫在葫芦岛继续指挥。11月2日沈阳守军被歼，东北全境解放。卫退抵北平。

东北战局是蒋介石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的，但他逃避朝野谴责，11月30日以“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的罪名，下令将卫立煌撤职。卫携眷属离北平经上海至广州，但被拦阻而返回南京受软禁。卫在苦闷之中恍悟自己误随蒋介石20多年，决心与其断绝关系。1949年1月蒋下野，卫于春节潜离南京，到香港寓居，闭门阅读各种书刊。蒋介石曾两次派人来游说卫去台湾，卫均峻拒。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卫立煌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表示热烈祝贺。1955年3月，卫立煌为祖国各方面突飞猛进的成就所鼓舞，决然离港返回北京，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受到祖国和人民的欢迎。卫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常委、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1960年1月17日卫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电报，《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53—502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1981年北京版。

卫立煌：《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新华月报》1955年第4号。

卫道然：《卫立煌将军传略》（手稿本）。

温广汉对卫立煌的回忆（手稿，1979—1981年）。

韩权华对笔者的两次谈话（记录稿）。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台北1967年版。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1983年版。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张 之 江

宗志文

张之江字紫岷，别号姜子，河北盐山县人，生于1882年（清光绪八年），父为村正。他从小习文，18岁应童子试，补诸生。1903年清政府募兵，无人应募，其父不得已令其入伍当兵。他因通晓文墨，升迁较快，1907年在新军第一混成协骑兵营中任排长，驻新民府。在军中接触到反清志士，阅读《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书籍，逐渐萌发了反清革命的思想。1910年他入新军第二十镇，常常听到王金铭、冯玉祥等人议论反清斗争，进一步激发了推翻清廷统治的思想，乃加入他们发起的“武学研究会”，以读书为名联络同志，秘密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辛亥武昌首义后，12月，张之江随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合力发动滦州起义，不幸失败，王金铭被杀害，冯玉祥被押送回保定，张之江逃离第二十镇。

民国成立后，原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任山西督军。张之江投奔张绍曾，任晋北东路司令部二等参谋。1914年11月，冯玉祥在陕西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张之江前往投效，任该旅第二团团长。1915年5月冯旅被派入川，张之江随往。年底护国战争爆发。次年初，冯旅奉北洋政府令在叙府、泸州一带同护国军刘云峰部作战。冯玉祥反对袁世凯称帝，派人同护国军暗中联络，张之江奉冯命与蒋鸿遇一起秘密前往会

晤刘云峰，接洽局部停战；又单独往见蔡锷，磋商促成四川独立的办法，并持蔡锷致冯玉祥的信回来见冯，信中嘱其加紧促成四川将军陈宦宣布独立。张颇有办事能力，深得冯玉祥器重。护国战争结束后，冯玉祥所部第十六混成旅奉命移驻河北廊坊，张任该旅骑兵营营长。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时，第十六混成旅官兵呼吁继冯玉祥任旅长的杨桂堂起义，杨不但不听，反而入京晋谒张勋。张之江与该旅参谋长邱斌和营长李鸣钟、鹿钟麟等密商，议决反对复辟，迎冯玉祥回旅主持大计。张之江到天津与冯面谈，商定声讨反对复辟办法后，立即返回廊坊，与邱斌等积极备战。张率骑兵营在廊坊一带击败张勋所部辫子军。

护法战争开始后，1918年6月冯玉祥兼湘西镇守使，第十六混成旅进驻常德。张之江任该旅步兵第二团团长。所部负责维持常德城治安，把守城门。当时日本驻沅江军舰上的士兵经常上岸，态度异常骄横。一次，几个日本士兵横冲直闯要进城门，拒绝我国士兵的检查，并动手殴打要检查他们的士兵，双方搏斗起来，张之江坚决支持其部下的行动，下令将逞凶的日本士兵抓起来，大长了中国军人的军威，维护了国家的尊严。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后，第十六混成旅先后进驻汉口、信阳，受北洋政府歧视，粮饷无着。半年中士兵每日以盐水和杂粮勉强度日，生活十分艰苦。张之江任劳任怨，与士兵同甘共苦，受到冯玉祥的表扬。

1921年5月，第十六混成旅随陕西督军阎相文入陕。7月，改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张之江任该师步兵第二十二旅旅长。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张之江奉命率所部

赴郑州，与河南督军赵倜的军队作战。5月5日赵部由开封出发，偷袭郑州。张之江部军力单薄，众寡悬殊，仍然一面奋力应战，一面急电求援。血战五日，在增援部队支援下，击溃赵部。不久冯玉祥任河南督军，扩充队伍，将3个团改编为3个混成旅，张之江任第七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为提高军官的军事知识，开设中高级军官学习班，还设高级战术研究会，张之江任讲堂监察官，讲授战术知识。

同年10月，冯玉祥受吴佩孚排斥，调任陆军检阅使。11月率所部抵北京，在南苑设立训练机构，积极训练队伍。张之江第七混成旅驻通州，奉冯玉祥命在那里对士兵和初级、中级军官进行训练。士兵除学习军人教科书外，还要学军纪、军歌；初级军官加读《曾胡治兵语录》和《左传》摘要；中级军官加学兵器学、欧洲战史等。术科则包括刺枪、劈刀、器械体操、山地行军练习等项。通州还办有培德学校一所，教育官佐眷属，并附有小学和幼稚园，教育他们的孩子。李德全在该校任教员，张之江介绍她和冯玉祥认识，以后两人结婚。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北洋政府任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张之江任第三军第一路司令，9月下旬出兵古北口、滦平等地，向奉军进攻。10月中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张之江旅已抵承德，19日奉冯命返京，布防廊坊附近，旋击败吴佩孚残部。24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筹组摄政内阁等，张之江曾列席会议。国民军成立后，冯玉祥部扩编为国民军第一军，张之江任该军骑兵第一旅旅长。

早在1923年5月，冯玉祥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冯坚持未就。1924年12月，张家口发生兵变，北京执政府段祺瑞免去察哈尔、绥远两都统职，任命冯玉祥的主要部将张之江、李鸣钟分任上述两地都统。张旋将察哈尔驻军编入国民军。1925年3月，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实施其开发西北的计划，察哈尔、绥远皆在其总体规划之内。

张之江代察哈尔都统后，积极进行该地区的经济建设。他首先整顿财政税收，清除积弊，随后修筑马路，开通张家口至库伦、多伦等地的公路，同时修建长途电话及电报线，并提倡畜牧，移民垦荒等，开始改变察哈尔的落后面貌。

五卅惨案后，国民军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撮合各派军阀，以“讨赤”为辞，向国民军进攻。11月，直隶督军李景林受日本收买，由天津向北京进攻国民军。张之江奉命出兵，击败李部，进驻天津。1926年1月冯玉祥通电下野后，张之江继任西北边防督办。不久，张作霖、吴佩孚等北洋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此时，国民军约20万，一致推张之江为全军总司令，鹿钟麟任东路军总司令，宋哲元任西路军总司令，石敬亭为后防总司令，进行防卫。“讨赤”联盟各军分五路向国民军进攻，国民军处于四面受围之势，4月15日开始退出北京，撤到南口。

南口位于昌平居庸关之间，重峦叠嶂，地势十分险要。国民军早已在此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张作霖、吴佩孚等以50余万之众围攻南口。5月中旬，吴部向南口淤泥坑附近进攻，直鲁联军向国民军正面猛扑，激战十余日，未能前进。张、吴见南口屡攻不下，一方面布置力量进攻陕、甘，以断绝国民

军后路；一方面以饷械资助晋军阎锡山，促其直逼绥远。国民军虽英勇善战，由于兵力众寡悬殊，加以给养困难，饷械补充无以为继，作战十分艰苦，坚持至7月中旬，有生力量伤亡过半。张之江乃于8月15日下令总退却，向西撤往绥远、宁夏一带。这时，国民军高级将领之间，出现各有主张、不相协调的现象，韩复榘、石友三向阎锡山投降，蒋鸿遇则拒绝西撤，张之江感到困难重重，难以指挥。

南口大战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有名的战役。国民军在以张之江为首的领导之下，克服种种困难，力御强敌，牵制了吴佩孚的兵力，使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得以胜利进军。南口战线长达2000里，山峦重叠，交通不便，命令难以传达，张之江奔走前线，备极辛劳。9月15日冯玉祥五原誓师，重组国民军联军，任总司令，张之江仍任西北边防督办。

1927年6月，张之江任豫陕甘考核院院长、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2月，他代表冯玉祥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任国民政府委员，定居南京。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产生矛盾后，他经常在蒋冯之间进行斡旋，并先后担任国术研究馆理事、禁烟委员会委员长等闲职。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张之江任江苏绥靖督办，不介入蒋冯之争。以后他专任中央国术馆馆长，热心体育事业，一度赴国外考察体育。

卢沟桥事变后，张之江积极主张抗日。这时，他已获陆军上将衔，曾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学习，但始终未直接带兵作战，只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事参议院参议等职。1945年5月，他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11月任国民党政府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参加大会。

解放后，1954年张之江任第二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1956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1966年5月12日，张之江因病在北京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李秦葵：《国民军史稿》，1930年版。

高兴亚：《国民军革命史》，1930年版。

高兴亚：《冯玉祥将军》，1982年版。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1930年版。

宋哲元口述、兆庚记录：《西北军志略》。

李 鼎 新

陈孝华

李鼎新，字承梅，福建侯官县（今福州市）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生。

1881年（清光绪七年），李鼎新毕业于福州马尾船政局后学堂第四届驾驶班。同年，他作为船政第二批出洋学生，被派往英国留学，在格林威契海军学校专习驾驶，曾随英舰游历北海及西印度群岛。5年后学成归国，先是任北洋海军右翼中营游击，1889年升署“定远”舰副管驾。3年期满后，经李鸿章奏请，照章补授实缺。^①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在9月间的黄海海战中，李鼎新所在的“定远”舰重创日本舰艇多艘。当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在该舰指挥北洋舰队作战，不幸中弹受伤后，李鼎新和管驾刘步蟾曾代司督战。次年2月，在威海海战中，“定远”舰被日舰鱼雷击中，驶至刘公岛搁浅，只得作水上炮台使用。

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全国震惊，李鼎新于翌年3月呈文清廷，陈述了北洋海军八个方面的弊端，诸如：“船不快”，“炮不快”；“军械多系旧式，军火储备不全，且多有不能自制者，以致临敌无以接济”；“南北洋各守一方，水陆各具一见，致军心不能画一”；“海军提督无统辖之权，船坞局厂皆调动不灵，且多方牵制，号令所以难行”等等，致

使北洋海军惨败。在呈文中李还对整顿海军提出了 20 多条建议，其中包括：“必须仿照西法，方为妥善”；“英国水师，欧西为最，中国要立海军，必用西人。须雇英国资深能干之大员”等。^②但清廷在 4 月处分一批海军将官时，李鼎新亦被“暂行革职”“听候查办”。^③

1901 年 11 月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在大力扩充北洋陆军的同时，也着力整顿恢复甲午战争后一蹶不振的北洋海军。他以“水师人才最为难”为由，奏请重新起用部分被革职的海军将领，李鼎新因此“开复原官”^④，历任“海圻”舰管带、山海关舰队副司令。1911 年春，清政府成立海军部，李鼎新被简授海军正参领，署理军法司司长，掌管军事司法惩罚等事宜。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于 1912 年 4 月继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把中央政府设置在北京，李鼎新在北京政府海军部任职，先任部参事，旋升海军参谋长。8 月被派往沿海各省检阅军舰，10 月授海军少将。同年 12 月，海军总司令黄钟英病逝，经由海军总长刘冠雄荐举，李鼎新接任海军总司令，授海军中将，驻节上海高昌庙。

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后，加紧摧残革命势力，于 1913 年 3 月暗杀了年轻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袁还先发制人，派兵南下进攻国民党人控制的江西等省。与此同时，袁世凯令李鼎新协同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共谋在上海镇压革命党人。李鼎新秉承袁的旨意，增调“楚泰”号炮舰、“海筹”号巡洋舰等到上海，加强驻沪海军力量。7 月 12 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兴兵讨袁，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李鼎新闻讯后，立

即传令驻泊在高昌庙的“肇和”、“应瑞”、“镜清”等舰及鱼雷艇加强警戒。7月18日，革命党人陈其美在上海宣布独立，并于23日率领讨袁军向江南制造局发动进攻。李鼎新将海军总司令部移到“海筹”舰上，指挥舰队开炮还击，致使讨袁军遭到惨重损失，被迫撤退。李鼎新为袁世凯镇压上海地区革命势力，效力甚著，8月获海军上将衔。

正当袁世凯加紧称帝活动时，1915年12月5日，陈其美等革命党人策动驻泊在上海高昌庙的“肇和”舰海军官兵起义。是日为星期天例假，李鼎新及驻沪海军将领当晚正在宴请到沪视察的萨镇冰。李得悉“肇和”起义的消息后，午夜即与萨镇冰等赶到江南制造局商议对策。他奉袁世凯“将该舰击毁”的命令，以10万元赔款促使邻近的“应瑞”、“通济”两舰攻击“肇和”舰。翌日，“肇和”舰官兵反袁起义迅即失败。事后，驻沪海军司令部裁撤，李鼎新则因“疏忽失职”受革职留用处分。因此在袁世凯称帝时，海军各舰队司令均受封晋爵，惟李鼎新向隅。

李鼎新受处分与被冷落之后，深受刺激。这时，在上海护国讨袁人士张继等人的积极联络下，驻沪海军决定加入反袁行列，而且公举李鼎新为总司令。李既有怨于袁世凯，又见海军将士大多倾向反袁，便接受拥戴，并策划海军独立。他下令驻福州等地海军舰艇开赴上海吴淞口待命。不久北京传来袁世凯病死的消息，李鼎新当即取消前令，以静待大局和平解决。可是，继袁之后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毁弃《临时约法》，不肯重开国会，从而引起一场新旧约法和国会的争论。在此形势下，海军重新酝酿独立。李鼎新商承唐绍

仪等人后，再次向各舰发出了集中吴淞口的命令。1916年6月24日，第一舰队的4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冲破福建督军李厚基的重重阻拦，由福州驶抵上海吴淞口外。25日，李鼎新亲率“海圻”、“通济”两巡洋舰和“飞鹰”、“永丰”两水雷舰自黄浦江开到吴淞口，与第一舰队会合。当天下午，李鼎新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联合发表宣言：“今率海军将士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并表示：“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接受。”^⑧随后立即成立了海军驻沪临时总司令部，李鼎新为总司令。李声称：“暂以临时总司令名义驻沪，维持海军现状。”^⑨26日，李鼎新电告西南各省联合设在广东肇庆的军务院，表示海军“此后一本军务院宗旨进行，相与终始。”^⑩军务院立即回电表示支持海军的行动，并宣布任命李鼎新为军务院抚军。而与此同时，李鼎新又致函淞沪护军使署，表示海军“对于陆军，则各不侵犯”，“决不为军务院之傀儡，使大局糜烂”。^⑪

海军的独立，严重威胁着北洋军阀在东南沿海各省的势力，直接给北京政府造成压力。6月29日，段祺瑞被迫接受南方要求，声明遵行“临时约法”，召开国会。于是，军务院于7月14日宣布撤销。李鼎新经与萨镇冰接洽达成协议，于15日宣布取消海军独立，驻沪海军临时总司令部也即日撤销，所有舰队仍交各司令管理，直接听候中央调遣。

此后李鼎新常作为北京政府大总统的代表，被派往各地处理有关海军的事务。1918年秋，他前往武汉、岳州、上海、厦门等地慰劳各舰队。1919年10月，李赴日本参观阅兵典

礼。这期间，林葆懌率第一舰队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海军发生分化。李鼎新曾奉命两次赴厦门、汕头等地，为促成第一舰队北归、南北海军统一而奔走出力。

1921年5月，李鼎新出任北京政府靳云鹏内阁海军总长。在这以后，北京政府虽历经颜惠庆、梁士诒、张绍曾、孙宝琦等15届内阁的交替，但李鼎新的海军总长职位一直未动。这固然是由于李在海军中的名望及能适应各方面的关系，更主要是他完全依附于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因此在当时的各派军阀混争中，海军也成了直系军阀能够利用的力量。1922年秋福建政局剧变，闽北镇守使王永泉在段祺瑞亲信徐树铮策动下，联合粤军许崇智部进兵福州，驱逐叛皖投直的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驻福州马尾的海军亦起配合，将李厚基残部缴械，并扣留了李厚基。此事震动了北京政府，深恐海军要塞马尾港落入粤军之手，威胁直系在福建的地盘。总统黎元洪于10月15日和18日两次传见李鼎新，商讨福建事态的处置，并要求李随时入府对福建军务条陈一切意见。李鼎新急忙采取对策，派出以海军部司长林葆纶为首的调查组，前往福州马尾调查处理李厚基被扣一事；同时命令其亲信杨敬修在马尾设立海军警备司令部，统一指挥驻在马江的舰队和陆战队。李还急调第一舰队“海容”等舰由上海驶往闽江口，增援马尾海军基地；派海军陆战队统带杨砥中率部南下，协同第一舰队和驻马尾的陆战队，守卫马江和长门地区。李惟直系政权马首是瞻，可见一斑。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致使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遭到惨败，直系军阀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局面亦

随之告终，李鼎新顿即失去海军总长职务。从此，他再没有在政军界担任职务，息影在家。

1930年，李鼎新在上海病逝。

注：

- ① 《清末海军史料》下册第571页，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
- ②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中日甲午战争》（下）第410—4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③④ 同①，第582、585页。
- ⑤ 《中华民国海军举义记》，《中华新报》1916年6月26日。
- ⑥⑦ 《申报》1916年6月26日。
- ⑧ 转引自《1916年驻沪海军宣布独立》，《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

吕 超

马宣伟

吕超，字汉群，号平林，祖籍湖南，先世入川后在宜宾定居。父亲是塾师。吕超生于1890年3月9日（清光绪十六年二月十九日），自幼在宜宾读私塾，后到成都入四川陆军小学堂第一期，1909年毕业，为优等生，继赴南京入陆军第四中学深造。他在南京结识革命志士，旋加入同盟会。从此，与同班同学陈铭枢、何克非、夏醉雄及军官万定雄等人，经常聚会讨论革命大事和联络校内外革命同志。

1910年春，吕超分配到保定军校入伍生队学习。革命党人、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吴禄贞派同盟会员到保定与吕超等人联络起义事。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发动，清政府下令大搜捕，吕超与同学数人先后离保定赴各地参加革命工作。吕到上海后，通过同盟会中部总会介绍，见到陈其美，议定回到北方进行革命活动。吕领得数千元后即赴天津，与彭家珍、黄复生、夏斗寅、赵铁桥等人进行策划。后赴北京晤李石曾、汪精卫等，成立了同盟会京津分会。吕先在军事部任事，后继蓝天蔚为军事部长。当时，清廷亲贵良弼等人极力反对清帝退位。1912年1月26日在军事部任事的彭家珍因暗杀良弼以身殉国，吕超深受感动，更加努力工作。他分工担任运动毅军及曹錕第三师官兵，迅速在排、连长中发展同盟会员 40

余人，士兵中发展千余人。吕晚间常在僻静处分班召集官兵，晓以革命大义，听者深受教育，表示愿为革命效力，请早发动。2月29日，袁世凯唆使北洋军第三镇在北京“兵变”，作为拒绝南下的借口，并假借镇压兵变，派兵捉拿革命党人。一天，吕超路经天安门，见袁军鸣枪抓人，躲入一胡同内逃脱。他立即通知军中的革命同志赶快隐蔽，并以军事部长名义签发证书，介绍他们入革命队伍。不久，吕将京津同盟会的工作结束，离京南下。

同年5月吕超返回四川，在宜昌与同盟会员冯中兴相遇。冯系奉黎元洪之命率兵护送步枪数千枝入川，以偿付盐款。四川督军胡景伊和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均想获得这批武器。熊先派人找吕商议，愿以这批武器在夔府成立第五师第二团，委冯中兴为第二团团团长，吕超为副团长。吕与冯商议后取得协议，成立了第五师第二团，移驻万县后又改编万县巡防军一营以充实实力，吕超任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1913年初任第二团团团长，移驻重庆。

“二次革命”爆发后，8月4日熊克武、杨庶堪通电讨袁，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吕超被派赴成都，联络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和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后又去乐山、宜宾、泸州联络各地驻军。吕回重庆后，被派到永川龙光旅担任第一支队队长，主攻隆昌、泸州、合江等地。不久黔军攻占重庆，熊克武、杨庶堪被迫出走。吕只身潜入重庆，劝黔军司令黄毓成重树反袁革命旗帜。黄也是同盟会员，当即表示同意。但入川陕军已达夔府，吕超冒险通过火线与陕军司令张钫会见，双方达成协议：川陕两军以万州桥至大江溪流为界，互不侵

犯。吕决定再赴重庆联络黔军，但黔军已在川军进攻下败退离渝。胡景伊下令拘捕参与“二次革命”的“肇乱人犯”，吕超乃只身东下。

吕超逃亡上海后，得悉熊克武、杨庶堪、谢持等已出国东渡，即赶到日本，受孙中山委派，到为逃亡日本的同志而设的“浩然庐”讲学。

这时，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吕超与杨庶堪、谢持、卢师绶、石青阳等人唯孙中山之命是从，一起加入。1914年秋，孙中山决定再次发动反袁斗争，委吕为中华革命军川南区司令。12月，吕奉命回国，由湘西至宜宾秘密布置任务，又到上海购置炸药、手枪乘船入川。船至涪陵码头，得同盟会员密告，重庆当局已探知自己的行踪，乃派其弟吕一峰运送枪弹，自己绕道回宜宾，秘密发展中华革命党党员，为成立讨袁起义军打下基础。

1915年12月，蔡锷等在云南护国起义，率护国第一军入川，吕超以中华革命军川南司令名义举兵起义。他率部出发，沿途招募民团，夺得江防军步枪近百余支，将部队进行整编。年底，吕超率部协同护国军攻宜宾。这时，熊克武、但懋辛、向传义等由滇抵宜宾，熊克武为护国军四川招讨使。1916年1月吕部编为两个支队，吕为第二支队长。2月，川军攻宜宾，吕率部激战于牛喜场西北高地，获得全胜，军威大振。3月又率部攻克筠连，歼灭巡防军，枪杀附袁的县知事，川南6县附袁部队望风前来归顺。他乘胜前进，率部兵不血刃而占自贡。6月袁世凯毙命。新任四川督军周骏继续与护国军对抗。熊克武采纳吕超攻打隆昌的建议，下令分三路围攻隆昌，又

获大胜。护国战争胜利结束后，吕超任第五师十八团团长，驻忠州。

1918年初，川滇黔军组成三省靖国联军，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起兵讨伐依附北洋军阀的四川督军刘存厚。2月，吕超率部先攻进成都，赶走刘存厚。捷报传到广东，孙中山电委吕超为成都卫戍总司令兼暂行代理四川督军。吕复电力辞，推熊克武担任，并率部追逐刘存厚部直至陕西宁羌（今宁强）。

川局既定，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杨庶堪任四川省长，吕超任第五师师长驻防绵阳。吕办军官教育团训练官佐，培植拥护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干部，部队扩充为3个旅1个独立团。7月刘存厚在汉中设四川督军署，吕超进兵汉中，于12月5日将汉中城包围，至21日城将攻破时，刘部赖心辉率援兵赶至，吕超部在粮弹两缺的情况下率部败退回川。

1919年，陈炯明、赵恒惕、熊克武主张联省自治之声甚嚣尘上，他们各据一省，政由己出，甚至国民党内亦有人借联省自治诋毁孙中山，嘲弄吕超等为“孙大炮之信徒”。这时四川国民党内发生矛盾。唐继尧企图乘机控制四川，于1920年4月联合国民党人石青阳、颜德基、卢师绅、黄复生等，组成“倒熊联军”，自任川滇黔联军总司令，吕超站在倒熊一边，出任副总司令。混战开始后，7月18日吕超率部攻入成都，就任川军总司令。熊克武率部败退后，又拉拢刘湘、邓锡侯及困居陕南的刘存厚一同攻打吕超和石、颜、卢、黄。吕部等被打垮，吕超出走上海。

1921年秋，吕超奉孙中山命赴粤，随孙中山至桂林组织

大本营，准备北伐。1922年冬，吕奉派赴湖南，在赵恒惕部队内发展国民党员。不久又到郑州联络胡景翼、岳维峻、樊钟秀，并赴大名联系孙岳等，吸收他们加入国民党，与之密商策动北方革命的计划。接着，吕超赴北京联络冯玉祥，又取道上海与浙江督军卢永祥取得联系，直至1923年5月，始返回广州，受到孙中山嘉许，委为大元帅府参军长。

这年2月，四川一、二军之战又起。吴佩孚图川，帮助杨森、刘湘等率各路反熊军向一军进攻。6月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派吕超回川任讨贼军第一军总司令。1924年3月，熊克武部战败退出四川，师长杨春芳投刘湘，将吕超扣在泸州，软禁了一个时期。1925年2月，四川督理杨森企图武力统一全川，刘湘、袁祖铭组织川黔联军攻打杨森。袁祖铭任总司令，邀吕超任总指挥。联军讨伐杨森取得胜利，吕超拥有1万人的队伍，分得宜宾、高县、珙县、长宁、兴文、筠连等县为防地。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吕超召集旅、团长开会，主张出川。其它将领不愿出川，吕超只身来到广州。11月，吕被任命为四川宣慰使，回川策动各军易帜参加北伐。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独裁统治后，吕超欲凭借李宗仁的力量图谋四川未果，乃参与反对蒋介石的派系斗争，一度遭到蒋的通缉，避居上海租界。1930年吕超参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冯玉祥、阎锡山的联合反蒋活动。中原大战前夕，李、白拨兵一团及军械一部分交吕超在汉口招集旧部，成立后援军司令部。结果冯、阎大败，吕部也被收编。1931年12月吕超经陈铭枢推荐，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军长。

抗日战争开始后，吕超坚持抗日立场。1939年10月，吕在重庆成立“中国抗建垦殖社”，得到陈铭枢、邓锡侯、孙震、潘文华等人的支持。该社出钱、出人对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地进行开发，吕超悉心从事。1945年9月吕超被调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官。1948年1月，吕超被选为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在成都成立监察使署。1949年四川解放前夕，吕超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思想有所转变，曾参与策动四川国民党军队起义。

1950年吕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1年7月20日吕超在重庆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沈铸东：《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学生赴武汉参加革命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70页。

《民国川事纪要》，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版。

《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版。

吕超儿媳刘蕊兰回忆资料。

邓 锡 侯

林松柏

邓锡侯，字晋康，生于1889年5月24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四川营山县人。其父经营土陶为业。邓10岁左右双亲俱丧，赖舅母抚养成人。少年时拜本县廪生李铁樵为蒙师，颇受器重。稍长受维新思想影响，弃学从军。

1906年邓锡侯赴成都考入陆军小学堂第一期，1909年升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堂。1910年四川保路运动事起，邓辍学返川，先在营山县城关负责训练团丁，旋即投入川军第四师师长刘存厚部下，初任副官，后迁任连长、营长、团长。1916年护国之役中，邓参加反袁战争，作战勇猛，屡建战功，深受蔡锷赏识。

护国之役后，罗佩金、戴戡各率滇黔军入川，分任督军、省长。不久，滇黔客军与以川军第一军军长刘存厚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发生矛盾。1917年4月和7月，先后在成都发生“刘罗”、“刘戴”之战。邓锡侯在战争中累立战功，被新任四川督军刘存厚晋升为旅长。

不久，川军师长熊克武在唐继尧支持下，会同滇黔军向刘存厚进攻。1918年2月，刘存厚败退陕南。邓锡侯等因不满刘依附北洋政府，转而推举熊克武为川军总司令，被任为第二师旅长。

1920年春，唐继尧因见熊克武不能成为他控制四川的工具，乃联合川军第五师师长吕超倒熊。第二师师长向传义持骑墙态度，以邓锡侯旅拥熊，另一部拥吕。熊克武以驱逐客军相号召，联合川军击败滇黔军，推刘湘主持四川军民两政。邓锡侯升任第一军第三师师长。

刘湘主持川政后，实力不断扩大。1922年7月，终于爆发了熊克武、但懋辛的第一军和刘湘、杨森的第三军之战。邓锡侯站在熊克武一方，任四川省军副总指挥，率部进攻二军。不久二军全线败退，刘湘下野，刘成勋取而代之。8月9日，邓锡侯的第三师随同其他川军开入重庆。11月，刘成勋宣布改编部队，取消军级编制。邓锡侯因不能晋升军长，与陈国栋、田頌尧、刘斌等起而反对熊克武、但懋辛、刘成勋。刘下令解除邓的第三师师长职务。1923年2月中旬，邓部挥师西进，在江津、永川、隆昌、内江一带，与第一、三军展开拉锯战，19日开始围攻成都。21日赖心辉部攻占简阳，解了成都之围，邓部退守新都、广汉一带。

这时，吴佩孚乘川军内讧之机，援助杨森与邓锡侯等联合进攻第一、三军。4月5日邓部占领成都，6日杨森率部占领重庆。邓等随即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组织省联军，邓被推为联军总司令，发出讨伐熊克武、但懋辛的通电，并分兵左右两翼，以田頌尧为左翼总指挥，陈国栋为右翼总指挥，在成都附近与第一军展开激战。5月中旬，熊、但攻入成都。10月，熊军攻占重庆。12月，杨森与刘湘联合分5路反攻熊军，邓锡侯任第一路总指挥。邓军与杨军于13日会师江北，合攻重庆。熊军退出重庆。1924年5月，北洋政府“论功行赏”，

任命杨森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并加驍威将军头衔。邓因杨森的军署设在成都，怕引起矛盾，将省长行署设在重庆。杨森野心勃勃，梦想统一四川，大搞扩军备战。邓锡侯力图自保，对省政无所建树。

1924年11月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后，因赖心辉曾通电拥护北洋政府，于1925年2月任赖为四川省长，邓锡侯专任陆军第三十师师长，驻重庆。邓创办军事教育团，自兼团长。教育团按军官、士兵分设三个班，每期训练四个月，作为发展部队的基本力量。4月，杨森发动“统一之战”。刘湘一面联络黔军袁祖铭部，一面拉拢邓锡侯、刘文辉，组成川黔联军，与杨森对抗。7月，邓部和袁部集中铜梁、大足、璧山地区，在大足城郊激战，击溃杨军，杨森向嘉定撤退，邓锡侯率部尾追，于9月初占领嘉定。杨森兵败离川，刘湘任四川督办，邓锡侯任四川清乡督办。

邓锡侯在这次战争中夺得大量防地，踌躇满志，扬言要赶走四川省长赖心辉，对刘湘大量收编杨森残部也颇为不满。此时吴佩孚已打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的旗帜，委杨森为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三路总司令。邓乃与杨森、袁祖铭互通声气，无形中结成反刘湘的三角同盟。在此情形下，刘湘不得不也谋求与杨森合作。杨森身价陡增，于1926年3月回师万县，以“兵多地狭”为由，电请邓锡侯让出广安、邻水，邓不允。5月刘湘与杨森联合驱袁（祖铭），邓乃依附刘、杨，出兵驱袁。

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取得节节胜利，四川军阀纷纷表示愿意参加北伐。邓锡侯派代表到南昌活动后，被

蒋介石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政变，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邓通电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

川军易帜后，四川形成四巨头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頌尧分割的局面。二刘所部各约10余万人，田部约4万余人，邓部约6万人，都有自己的防区。省会成都则为邓锡侯、田頌尧、刘文辉所共管，为了协调关系，同年12月成立三军联合办事处，刘文辉任处长，邓锡侯、田頌尧为副处长。1928年夏，四巨头集会，推刘湘为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邓、田为省府委员，邓兼财政厅长，田兼民政厅长，并联名电请南京国民政府予以任命。南京方面没有据此发表任命，邓、田极为不满。邓拉拢和策动杨森、赖心辉等，组织反对刘湘的同盟军，发出讨刘湘的通电，但被刘湘击败。

此后的战局纷争，多在拥有重兵的刘文辉和刘湘叔侄之间展开，邓锡侯难以跻身匹敌，只能唯刘湘马首是瞻。1932年10月刘文辉、田頌尧之间爆发成都巷战，邓锡侯口头上宣布中立，实际上暗中助田。11月刘文辉、刘湘在荣县、威远之间展开大战，正当胜负难分之际，邓锡侯、田頌尧向刘文辉发起进攻，刘文辉被迫与刘湘讲和。1933年初刘文辉回驻成都，与邓锡侯形同水火，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5月初邓赴新都防地，下令集中兵力，从灌县起沿岷河构筑防御工事。5月中旬刘文辉部向岷河邓部出击，因岷河水流湍急无法强渡，双方隔岸对峙两月之久。8月刘湘与刘文辉又展开岷江之战。刘文辉全线瓦解，刘湘大胜。邓锡侯虽然也在获胜者一方，实

际上成了刘湘的附庸。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锡侯率师出川，先后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驻山西洪洞县。驻地与八路军驻地相距10余里，朱德曾到邓部向军官讲解游击战术，八路军文工团也常来演出，从而对邓部官兵起了积极的教育作用。1937年底邓部被调往徐州作战，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防守津浦铁路。国民政府迁重庆后，蒋介石想控制四川，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遭到地方实力派的反对。邓锡侯与张关系较深，1938年10月被任命为川康绥靖主任，以便从中斡旋。1946年张群到美国治病，推荐邓代理四川省长，1947年正式担任。

1948年初蒋介石为了反人民内战的需要，电令邓锡侯预征壮丁，并征购军粮10万石，置于水陆交通要道。这时，邓见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蒋军士气低落，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信心，对征兵征粮任务迟迟未办。3月下旬，蒋电令邓到南京面谈。邓向蒋陈述四川困难，要求暂缓征丁征粮，并上书呈辞，蒋立即批准，并发表王陵基继任四川省主席。

不久，邓锡侯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与在上海的民盟主席张澜接触频繁。张劝邓回四川团结地方上的力量迎接解放。6月底邓返回四川，与刘文辉、潘文华联系反蒋，准备应变。9月，蒋介石任命邓为川陕边区绥靖主任，驻节汉中，协同胡宗南防守西南。邓借故拖延未去就职。1949年4月张群任西南军政长官，建议蒋改任邓为副长官。不久，邓到重庆就任新职。他与刘文辉、潘文华利用四川省参议会及地方势力，在成都组成“川康渝国大代表、立委、监委、省市参议员联谊

会”，矛头对着为蒋介石效命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求撤换王。王则声言联谊会为非法组织，要予以取缔。于是，邓等又成立“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要求保境安民，反对蒋介石在四川打仗，因而不久又被蒋下令取缔。

同年八九月间，解放战争重心已开始转移到西南，蒋介石到重庆坐镇指挥。邓锡侯对于究竟是跑台湾，还是投向人民立功赎罪，在思想上还踌躇未决。这时，共产党和解放军派出秘密工作人员到成都向他转述了中共的方针政策，周恩来曾通过刘文辉设置的雅安电台，指示他们要团结力量，待时机成熟，及时发动。邓坚定了起义的决心，与刘文辉、潘文华相约，待解放军进入川西时，采取配合行动。此时，胡宗南部已溃窜川西平原。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皇飞到成都，逼令邓锡侯、刘文辉和胡宗南合作“固守川西”。邓虚与委蛇，应付到12月7日，与刘文辉相约，当日分别潜出成都北门，相偕出走。9日他们到达彭县，10联名发表起义通电。

四川解放后，邓锡侯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及水利部部长、四川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还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四川省副主任委员。

1964年3月30日，邓锡侯因病在成都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邓锡侯：《我在川西起义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版。《四川军阀史料》。

赖 心 辉

马宣伟

赖心辉，字德祥，1884年8月（清光绪十年）生于四川三台县。父亲是小商人。赖心辉少时在家乡读私塾，后经他的岳父引荐，在曾伯和门下学习。曾伯和见赖心辉大可培养，1907年夏出任云南省老鸦滩百货厘金局局长时，带他随同前往。到云南后，赖更加勤奋读书，1909年由曾伯和保送入云南讲武堂学习。1911年春，赖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第十九镇见习。赖在第十九镇结识了任管带的四川同乡刘存厚，并参与第十九镇下级军官的秘密革命活动，加入了同盟会。武昌首义后，10月30日，以蔡锷、李根源为正副司令的云南革命军在昆明发动起义，赖在唐继尧、刘存厚的指挥下，参加攻打云南总督署。

11月1日云南军政府成立，蔡锷派韩建铎、刘存厚率滇军两个梯团援助四川起义军，赖心辉随军回到四川。1912年春，刘存厚在成都招募新兵成立四川陆军第四镇，赖在第四镇任炮兵标统。^①4月，四川陆军奉命改镇为师，刘存厚任第二师师长，赖心辉在第二师炮兵第二团任营长。1916年1月，赖随川军第二师在纳溪起义，参加反袁世凯的护国战争。^②立有战功，升任第二师炮兵第二团团长。

护国战争结束后，入川护国军滇军总司令罗佩金、黔军

总司令戴戡，于同年7月分任四川督军和省长，因而与以刘存厚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势力发生利害冲突。加之驻川滇、黔军军纪败坏，四川军民均十分痛恨。1917年4月，刘存厚通电反对罗佩金，赖心辉等数十名旅团长亦通电控告罗佩金九大罪状，^③遂发展为刘罗成都巷战。不久罗败走。7月，又发生刘戴（戡）成都巷战。黔军退入皇城督军署内，刘存厚率部屡攻不下，赖建议刘先炮轰皇城内的军装库（即弹械等军用物资库）。刘同意，并命赖率部前往。赖率炮二团布阵于南门城墙上，亲自上炮，精心测量，第一炮即打中皇城的大门，接着命中军装库，顿时弹药爆炸，声响十里之外，守城黔军大为慌乱。戴戡弹尽粮绝，撤离成都。赖心辉从此得名“赖大炮”。

赖心辉在这场混战中立了大功，刘存厚补充赖部一批汉阳枪和大炮。11月12日，北洋政府授予赖三等文虎章。1918年1月又授予少将军衔，委为川北边防军总司令。赖借机扩大了部队，占绵阳、梓潼、北川、罗江等县为防地。

滇黔军战败后，云南督军唐继尧利用护法靖国之名，大力支持川军师长熊克武就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率部进攻依附北洋军阀的四川督军刘存厚，迫使刘于2月20日退出成都，撤向陕南。赖心辉于4月28日率部退守绵阳。5月3日，熊军第五师师长吕超欲彻底打垮刘部，率部向绵阳一线的赖部进攻。赖见寡不敌众，退到陕西与刘存厚会合，驻防汉中。7月5日北洋政府委刘存厚为中央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赖心辉为第四十二旅旅长。12月上旬，吕超率部将汉中城四面包围。刘存厚部困守城内，不久弹尽粮绝，刘打算弃城逃命。

此时，赖心辉从陕西督军陈树藩处借来大批枪械、粮饷，率部赶到，打退吕超，解了刘存厚之危。

1920年初，唐继尧见熊克武不能成为他控制四川的工具，遂令驻川滇黔军向熊进攻。熊败退川北。不久，熊以驱逐客军相号召，联合刘湘、邓锡侯等及败退陕南的刘存厚等川军，分路进攻成渝两地的滇黔军，10月将滇黔军全部驱逐出川。刘存厚部以赖心辉旅为前锋首先攻占成都。熊克武划什邡、金堂、广汉、德阳四县为赖部防地。什邡县有著名土匪头子张廷升，赖先派人去招抚，张不从，赖率部围剿，消灭了张匪乌合之众。

1922年7月，四川爆发了以熊克武、但懋辛为一方的第一军和以刘湘、杨森为一方的第二军之战。赖心辉站在熊克武一边；任省军副总指挥。率部向第二军进攻。8月上旬第二军溃败。这时，赖对四川的军民两政颇思染指，因资望较浅，自知无望，很想推一个软弱者上台，以便操纵。乃向熊克武建议以第三军军长刘成勋领四川军民两政，得熊同意。刘成勋继任川军总司令后，为酬谢赖心辉，委赖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驻防富饶的泸州一带。刘、赖两人还结为儿女亲家。

一、二军之战后，一军内部由于分赃不均，又爆发了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等同熊克武、刘成勋、赖心辉之间的战争。1923年2月13日，刘成勋命赖心辉统率各军讨伐邓、陈，又电请川东边防督办但懋辛出师援助。两军混战到20日，邓、陈两师已前进到川西地界，开始围攻成都。刘成勋困守城内，正在恐慌之际，21日赖心辉率部攻占了简阳，24日前哨部队抵达成都，从侧背攻击邓、陈两师，遂解成都之围。赖

心辉善战之名传扬一时，刘成勋对他更加倚重。

同年3月，吴佩孚见川军内讧，援助杨森回川。杨森于3月14日攻占万县，4月5日攻占重庆。与此同时，驻宜宾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进占成都，并自任成都卫戍司令。刘成勋在3月30日通电辞去川军总司令职，赖心辉率部退往内江、资中、隆昌一带。

5月，熊克武率原第一军及赖心辉的四川边防军、刘成勋部，合力反攻杨森、刘湘等部。赖先攻入成都，熊、刘率部相继入城。6月4日，孙中山以军政府大元帅名义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赖心辉为四川讨贼军前敌总指挥，讨伐北洋军。赖心辉的四川边防军这时已辖有6个旅和1个炮兵团及特务营、机炮营、骑兵营等部队，实力达万余人。赖令其部分别由乐山、宜宾、泸州攻重庆的侧背；并亲自攻资中、内江一线。赖攻占内江后，6月14日乘胜下令总攻，双方激战一日，赖部伤亡惨重，连预备队也用尽。他当即召开军事会议，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赖指出，敌我双方同样伤亡惨重，敌军可能也在今晚撤退，应采用两全之计。遂抽选精锐一营，于当晚夜袭隆昌；再派一加强连向隆昌侧面搜索，以牵制敌人，然后缓缓撤退。

当夜初时，赖部前沿部队陆续撤下。时值6月中旬，大路两旁都是稻田，秧苗已有半人高，撤退下来的士兵互相争路吵骂。赖心辉坐在六人抬的大轿内听见士兵们骂：“打了败仗还摆阔气，坐大轿子把路都挡完了。”他连忙招呼下轿，叫弁兵在路边坟地上铺好被褥，摆起鸦片烟盘子，躺下抽起烟来。退下来的士兵们见总指挥的轿子还放在路边，总指挥本

人安闲地躺着烧烟，便回头向后面乱挤的官兵大声吼道：“你们慌什么？往后传：总指挥还正在这里烧烟咧！”这一喊，果然军心大定，部队缓缓地撤退，秩序井然。待到拂晓，赖军侦击营传来捷报：“杨森部与袁祖铭两部已向荣昌、永川方向遁去，经我先遣侦击连虚张声势地跟踪追击，已溃不成军，沿途丢弃物资不少，请总指挥派大军火速前进，以期一鼓歼灭敌人！”赖心辉烟枪一撂，哈哈大笑，下令大军掉头向永川、璧山方向火速前进。10月16日，赖军终于攻占重庆，杨森、袁祖铭向万县逃走。

联军攻下重庆后，熊克武等人发生意见分歧，赖心辉对战事意存观望。结果杨森部得喘息机会，反而乘势反攻熊军，12月13日占领重庆，继率部直插潼川熊军总部，并于1924年2月9日攻下成都。赖心辉见风使舵，于10日通电拥护北洋政府，4月28日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兼四川边防军总指挥；9月10日被授予正威将军。1925年2月7日又被任命为四川省省长。是年初，杨森发动“统一之战”，赖心辉率边防军驻资中、内江一带防御。7月赖率部至永川、荣昌，击溃杨军东路王兆奎部。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连战皆捷，四川各军阀准备改换旗帜。赖心辉也向国民政府接洽，11月27日被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军长。但是他并未参加北伐，仍在四川境内与其他军阀互争雄长。1927年冬，他遭到刘湘与刘文辉的夹击，所属防地全被刘文辉吃掉。赖耿耿于怀，1928年10月参加李家钰、罗泽洲和杨森等组成的同盟军，分路攻打刘湘、刘文辉两军。赖心辉率部独挡永川、重庆一线，击

溃刘湘军的进攻，战事节节胜利。刘湘改变计划，集中兵力于江北、巴县，先打退罗泽洲师及杨森部，又用重金收买了郭汝栋，然后联合刘文辉军向赖心辉进攻。赖部孤军作战，寡不敌众，弃江津、内江等县防地，退到合江、赤水之间。1929年1月，赖心辉因早年曾援助过当时的贵州省长周西成，乃与周商定：赖部退入贵州遵义，由周西成援助再打回四川。5月，周西成在滇黔之战中阵亡，黔军毛光翔乘机出兵堵截赖部，赖只得退入四川秀山县城。为重新组建队伍，他招纳酉阳、秀山、彭水各县的土匪，号称6师之众，盘踞在酉阳、秀山一带。

不久，刘湘令第三师师长王陵基以剿办土匪为名，出兵酉阳、秀山一线向赖部发动进攻。赖部粮弹两缺，士气不振，而招来的土匪又是乌合之众，一触即溃。赖心辉被迫率部再退贵州边境，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求救。蒋介石于1930年6月19日委赖心辉为新十一师师长。赖率部集中黔江，拟取道鄂西恩施、巴东一带，转到汉口待命。但王陵基又出兵截击，赖部被迫折回贵州，经龙里、贵定、八面大山等地进入湖南安乡、澧县，后进驻江西永丰。新十一师后来被陈诚改编，将老弱官兵遣散回四川，赖心辉部彻底瓦解。

同年秋，赖心辉奉蒋介石电令取道宜昌赴汉口，洽商改编事宜。甫抵宜昌，被刘湘密令独立旅长郭勋祺将其扣留软禁。半月后，郭勋祺私自将赖放走。赖乘飞机逃到南京见蒋介石。后经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保荐，赖任国民政府上将参军，每月拿干薪800元。不久，赖移住上海法租界，抽鸦片烟打发日子，入不敷出，久而久之借贷无门，当卖俱尽。1933

年冬落魄还乡，在成都度其贫困生活。

1942年4月18日赖心辉病逝。死后他皮夹中仅余法币1元，尚有纸条一张，上书自挽一联：百战徒劳，愧对乡国；一事无成，负罪人民。

注：

- ① 《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21页。
- ② 同①71页。
- ③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上册第175页。

田 颂 尧

马宣伟

田颂尧，又名光祥，1888年6月19日（清光绪十四年五月十日）出生于四川简阳县一个商人家庭。父田元章，开设德全堂中药铺。田颂尧自幼读私塾，后进新学堂。1908年，田颂尧考入四川陆军小学第一期。^①次年毕业，升南京第四陆军中学。^②田在这里结识一批革命志士，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于1910年加入同盟会。以后，他离校在南京、上海一带参加革命活动。辛亥武昌首义后，陆军第四中学的学生们受到鼓舞，成立学生军支援武汉，^③田颂尧任学生军教育长。不久返回四川，任四川陆军第四镇参谋。1912年4月镇改为师，田在第四师任营长。1916年4月陈宦入川任会办督理四川军务，以大清乡为名捕杀革命党人，田颂尧被派任清乡独立支队长，驻在下川南。

田颂尧深感川军受入川北洋军的歧视和排挤，1916年1月随刘存厚在纳溪起义，参加反袁护国，被委为二路三支队长。^④刘军集中纳溪，决定先攻江安、南溪两县，再进取泸州城。田颂尧支队受命攻打江安、南溪两城。正当此时，田部前卫连队截获向泸州城递送文书的北军传达兵，得悉北军即将退出泸州，田遂将队伍分布于江安下游沿江一带，派重兵把守距江安城30里的马腿津，还配备大炮两门。待北军兵船

顺流而下，到达有效射程时，田部枪炮齐发，北军多数船只中弹沉没，落水者全被掳获，只有部分弃舟登岸向富顺县方向逃走。田部据守马腿津，连续截击3日，先后俘获军官20余名，士兵260余人。田颂尧随即派谢松营先抵南溪城下，奋勇环攻，2月2日攻克，获枪炮、子弹和粮食甚多。^⑤田以这一战役为荣耀，升任师长后，定此为“二二护国纪念日”，每年举行庆祝大会，以资宣扬。

同年2月10日，田颂尧率部配合入川护国第一军在月亮湾作战，后与舒英衢、邓锡侯两支队在棉花坡、马鞍山、头背梁一线与北军激战。马鞍山、头背梁是泸州、纳溪之要冲，北军白天黑夜不停地进攻，均被邓、田支队击退。后两支队又在纳溪与北军奋战月余，直到陈宦宣布独立，袁世凯退位，战事始告结束。6月，蔡锷任四川督军，升田颂尧为第二师骑兵团团长。1917年7月因争夺四川政权，先后发生川军第一军军长刘存厚与督军罗佩金、省长戴戡之间的战争。田颂尧在两次巷战中为刘存厚立下战功，升任第三混成旅旅长。11月北京政府授刘存厚崇威将军，会办四川军务，授田颂尧为炮兵中校，加陆军炮兵上校衔。

1918年1月，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出兵讨伐投靠北洋政府的刘存厚。熊部攻下成都，田颂尧随刘存厚败退陕南。同年7月，刘存厚入汉中设四川督军行署，田颂尧被北京政府任命为第二十一师步兵第四十一旅旅长；8月被授陆军少将军衔，还授三等嘉禾章。

1918年熊克武继任四川督军。次年四川国民党内部发生矛盾，唐继尧秘密发动“同盟倒熊”。1920年4月，四川倒熊

之战打响，7月10日熊败退出成都。8月熊联合刘湘拉拢刘存厚返回四川，共同驱逐滇黔军和以吕超为首的倒熊军。刘存厚率田頌尧等部由汉中返回四川，田率部攻占绵阳，距成都仅200余里，一时使川中大震。^⑥最后，倒熊军败退出川。11月田頌尧任中央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所部驻防阆中。1923年2月，继一、二军之战后熊克武、刘成勋与邓锡侯、陈国栋、田頌尧之间又展开一场争夺权利的战争。3月，吴佩孚乘川军内讧之机，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全力进逼重庆。田頌尧乘机反攻，占德阳、广汉，与邓锡侯、陈国栋驻新都部队联成一片。

此时，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竭力笼络一些川军将领，以反对得到广州军政府支持的熊克武。9月5日，田頌尧被北京政府授为陆军中将。但在与熊克武军作战中，附北川军节节败退，10月丢失重庆。北京政府为鼓励他们继续顽抗，12月10日又授予田頌尧为章威将军、邓锡侯为驃威将军。1924年2月熊部转胜为败，退入遵义。5月21日，经吴佩孚保荐，田頌尧被北京政府授陆军上将衔，27日又被任命为帮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

田頌尧虽然与杨森等人合力打败了熊克武，但四川内部仍然是群雄割据，各自称霸。已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的杨森于1925年初发动了一场“统一四川”之战。田頌尧与云集川东的川军各师组成反杨联军，指挥廿一、廿二两师侧击杨森驻遂宁部，取得胜利。田頌尧乘势占据以三台为中心的大片防地，收编了第十二师段荣琮等部。他于1926年5月26日受吴佩孚委任四川军务帮办兼川西北屯垦使后，还打出刘

存厚任川督时委他的川西北屯殖总司令的旗号，加紧扩充实力，扩大防地，所辖部队有：中央陆军二十一师（师长孙震），中央陆军第二十二师（自兼），川军第五师、第八师、第十一师和独立师及混成旅、独立旅等，防地达 20 余县。

1926 年夏、秋，北伐军在湘鄂赣闽节节胜利，田颂尧派代表联络易帜。12 月 12 日，蒋介石委田颂尧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就军长职后，军部设三台，成都设行营，总兵力达 6 万人。

同四川其他军阀一样，田颂尧也在自己的防区内形成省中之国，自行委派官吏，颁布各种政策法令，征收田赋等各种税收。初期，田军每年对防区百姓征一次田赋税，即可维持；后来为了扩军、参加混战争夺防地，竟每年向百姓征五六次田赋税。当地流传两句民谣：“为了他‘田家’，害了我田家（指农民）。”田颂尧借建设为名，提取各县的官、公、庙、会产业 100 多万银币，但仅以二三十万元修了绵阳城内的公园和潼（川）、绵（阳）及潼、阆（中）的公路。田在川西北银行发行纸币越来越多，又不能兑现，到 1933 年变成废纸。田颂尧统治川西北 10 余年，搜刮了大量钱财，购置良田数千亩，街房、公馆 200 余座，银行、字号林立，国外还有产业。其财产总额在四川军阀中名列前茅。

1932 年 11 月，田颂尧为了争夺防区，与刘文辉爆发了成都巷战，使成都人民饱受苦难。正当这时，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陕南突进川北佛子关。田颂尧得报，立即命令万迭青旅赶到瓦石铺抵御。万旅抵挡不住，田急调大部队增援，又遭失败。红军于 12 月 25 日占通江后，又于次年 1 月 23 日解

放南江和巴中。通、南、巴三县是川北富庶地区，交通险阻，易守难攻。蒋介石得报后，立即委田頌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迅速结束与刘文辉的决战，于1月28日就任新职，赶到阆中设督办署，以孙震为总指挥，曾宪栋为右纵队司令，指挥第一、二师和第二路；罗乃琼为中央纵队司令，指挥第三师和第一路；王铭章为左纵队司令，指挥第四、五师和第三路。2月18日，田頌尧指挥全线向红军进攻。经过激烈的争夺战，通、南、巴几次易手。田部于6月初战败，田頌尧率部退守广元、旺苍、阆中、南部一带，督办署移南部县城，并向全川各军请求增派援兵协“剿”红军。

1934年7月，以刘湘为首，6路川军围攻红军，田頌尧部编为第二路。但在红军反击下，他率部再退，将督办署设在盐亭，扬言誓死扼守嘉陵江，企图凭天险防御红军，以待增援。可是，田頌尧的饥疲之兵已失掉防御能力，屡被红军击溃。9月中旬，工农红军收复仪陇、阆中，田军被歼2000余人，残部溃散。22日红军又占领苍溪以南的木门等地。田頌尧的二十九军被打得溃不成军。蒋介石气急败坏，将田頌尧撤职查办，并将二十九军改为第四十一军，以孙震为军长。田頌尧经营几十年的军阀队伍就此瓦解。

田頌尧解除军职后，寓居成都。抗战时期，蒋介石退到四川，为笼络四川各界人士，才给田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的闲职。田不甘寂寞，想东山再起，重登政治舞台。1945年，他见国民党要实行所谓宪政，便想搞一个组织来为他将来竞选“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服务。在刘存厚、邓锡侯支持下，田以其旧部为基础，成立“二二护国同

志会”，邀请四川军政界及地方士绅 700 余人参加，自任理事长，邓锡侯、刘存厚为名誉理事长。1946 年 3 月，田颂尧在简阳县选区竞选立法委员，四川省主席张群来电称：立法委员未经国民党党部提名者无效。田愤懑不已，从此心灰意冷，“二二护国同志会”也就此瓦解。他对办学较热心，先后担任成都树德中学、荫堂中学、龙泉驿中学的董事长。

1949 年 12 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田颂尧随刘文辉、邓锡侯起义。解放后，田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后为四川省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 年 10 月 15 日在成都病逝。

注：

- ① 刘石渠：《清末民初川军沿革》，《四川军阀史料》第 1 辑第 8—9 页。
- ② 《军机处录副档》。
- ③ 沈铸东：《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学生赴武汉参加革命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 69 页。
- ④ 邓锡侯、田颂尧：《四川护国战役始末》，《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 36 页。
- ⑤ 同④，38 页。
- ⑥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上册第 254 页。

范 绍 增

陈章文

范绍增原名舜典，号海廷，四川大竹县人。1894年3月7日（清光绪二十年二月初一）出生在一个富裕农民家庭。自幼不爱读书，常到茶馆听说书，对江湖豪侠劫富济贫心向往之，整日在外游荡。1911年春四川保路同志军兴，大竹、渠县一带袍哥首领、同盟会员张作霖聚众而起，范随他们摇旗呐喊，受到张赏识，收为袍哥小兄弟，并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1913年胡景伊任四川都督后，借口整编军队，勒令解散同盟会领导的民军，诛杀甚众，张作霖被迫率部为匪。范这时已任张的总管事。

1916年护国之役中，范绍增在张作霖率领下参加反袁战争。张在邻水一带活动时，不幸被亲袁的川军袭杀。张牺牲后，范被公推为袍哥首领，率部继续进行反袁战争。1918年4月受滇川黔靖国联军援陕第二路总司令颜德基收编，任模范营营长，不久升为团长。

1920年10月，颜德基参加唐继尧发动的倒熊（克武）之战失败，范绍增改编在熊系第一军第六师余际唐部任团长，驻扎云阳。不久因受排挤不愿再干，听说驻夔府的第三军唐式遵部兵少械多，乘风雨之夜前往袭击，夺得一部分枪械，集结2000多人，活动于酉阳、黔江一带。

1923年3月，吴佩孚乘川军内讧之机，援助杨森窜回四川。范绍增受杨收编，任第四师第八旅旅长。1924年2月杨任四川省长后，又委范为第九混成旅旅长。次年10月，杨企图以武力统一四川，失败后下野离川，临行时将一部分人交范照看。1925年3月，杨森又受吴佩孚委“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再由湖北回到万县，范率部来归。9月北伐军进军武汉时，杨见风使舵，表示愿意参加北伐，被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范绍增任该军第七师师长。10月杨森以援鄂为名，派范与北洋军合谋武汉，受到武汉国民革命军的痛击，范受伤回川。

范绍增出身袍哥，颇重江湖义气。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曾收留与他共过事的共产党员王维舟在军中避难。是年底，杨森因范发展袍哥势力，不为己用，欲借口杀之，范得讯后于夜间潜乘汽艇逃命。旋在长寿约集杨部师长郭汝栋等，利用杨森因庇护吴佩孚受到蒋介石撤职处分的机会，通电讨杨。蒋乃任命郭汝栋为二十军军长，范绍增为川鄂边防军司令。不久范等讨杨失败，范部防地尽失，范转而依附刘湘，编属刘部第四师师长。

1931年2月刘文辉任四川省主席后，与刘湘争夺四川霸权。范绍增与刘文辉素有交往，刘文辉想收买他，一次就送了他50万元。刘湘对他们的关系心存疑虑，范就对刘湘直言不讳地承认刘文辉送给他巨款的事，问刘湘如何处理。刘湘叫他把钱拿到上海去玩，范将钱在重庆修建一所华丽的范庄，并挟巨款到上海冶游。范在上海受到青帮头子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的盛大欢迎，被破格收为弟子。从此四川袍哥与上海

青帮互相勾结，在长江走私运毒，贩卖军火，无所不为。杜月笙送给范一营人的英国装备，以加强范的势力。

1937 年何应钦去四川整军，刘湘借机改编范绍增的军队，免去范的师长职务，名义上升为第二十一军副军长，实际上不准到职。因此范对刘湘十分痛恨。抗日战争爆发后，范只身赶到上海前线指挥作战。上海沦陷后随军撤退到汉口。这时刘湘正在汉口万国医院治病，范受戴笠之托，负责监视刘湘与韩复榘的函电及代表联系情况，一一向戴报告。

1938 年 2 月 5 日，范绍增任第八十八军军长，自募兵员抗日。他很快在四川合川编成 4 个团，以 3 个团编成新二十一师，1 个团属军补充团。武器破旧不堪，范找到老部下、某武器修理厂厂长李文彬修理，修理费半数以上是范自己拿出来的。他对官兵说：“过去打内战，都是害老百姓，这回抵抗日本侵略，我就是倾家荡产，拼命也要同你们一起，把日本赶走！”

1940 年夏，范绍增部参加浙西一带作战，冬天又调太湖地区张渚一带担任防守。日军第二十二师团长土桥一次指挥敌伪 2 万多人进犯，在宜兴一带展开激烈的拉锯战，范亲临第一线督战，终于击败日军。1941 年春节时，老百姓带上慰问品沿百余华里的防线慰劳范部。范在张渚各界劳军会上讲话说：“这回打日本人，我们虽然伤亡官兵 1000 多，不是老百姓帮忙，还是打不赢的。二回我们不把仗打好，老百姓要吐我们的口水！”

范绍增部打败日军后，顾祝同接见范，表示要扩编他的部队，后来扩编的命令迟迟未发表，只于 1942 年 3 月将范调

任空头的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范一气之下，回到重庆。

范绍增回到四川后，交游甚广，与张澜、熊克武、陈铭枢来往密切，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日益不满，思想上逐渐倾向反蒋。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找顾祝同把他原来的部队调去搞屯垦，顾示意还要准备与共产党打仗。范不愿打内战，旋去上海。他凭帮会及川军旧部关系，借口为四川人办事，在上海成立“益社”，自任理事长。该社利用经商与中共地下党员联系，运销解放区的棉花，又将药物、纸张运往苏北解放区，打破了蒋介石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范还参加了一些掩护共产党人的活动，并在经济上资助过民盟。

1948年3月国民党召开国大，范绍增当选为国大代表。选举副总统前，蒋介石召见范绍增等人，要他们联系一部分代表，支持孙科任副总统。范直说他们已经答应支持李宗仁，不好失信于朋友。蒋对范当面抗命非常恼火，不久又得知范和杨啸天等人进行不利于国民党的活动，立即手令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将范等逮捕。范得讯后逃脱。

1949年春范绍增回到重庆，看到国民党政权崩溃在即，一面派人回大竹、渠县组织力量迎接解放，一面在重庆联络民革成员准备应变。8、9月间战争重心开始转移到西南后，蒋介石坐镇重庆指挥。他委任范为挺进军总司令，派特务杨良任副总司令，对范进行监视。范早有准备，躲开杨良，在大竹、渠县成立了8个纵队。12月，范在渠县通电起义。

解放后，范绍增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调任河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1978年3月5日，范绍增因病在郑州去世，终年84岁。

主要参考资料：

范绍增：《关于刘湘、韩复榘之死的一点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

高兴亚：《冯玉祥与刘湘的秘密往来》，《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王 陵 基

刘识非

王陵基号方舟，四川乐山县人，生于1883年9月10日（清光绪九年八月初十）。其父继承祖业，在乐山、成都经营绸缎庄。王陵基少时在家馆中就读。1903年7月考入四川武备学堂速成班学习一年。时值四川增设新军，缺乏初级干部，王陵基被派往各县招募弁目学生。学生招回后，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徐孝刚任管带，王陵基任队官，从事弁目生的训练。不久，王随徐孝刚到日本购运武器，自请留在日本学习，乃入东斌学校一年，又在成城学校学了几个月的日文。1906年回国后，在川军协统钟颖部任参谋。不久，钟颖部调驻拉萨，王随往。

1908年秋，四川开办陆军军官速成学校，原弁目队学生刘湘、杨森、王缙绪、潘文华等多数考入军官学校。该校步、骑、炮、工、辎各科长，最初都是聘日本军官充任，缺乏翻译，当局把王陵基由拉萨调回成都，担任该校翻译。辛亥革命前，不少军官速成学校学生和弁目生是同盟会员，参加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的革命活动。王陵基则拒不参加同盟会，还说军人是保卫国家的，军队只能受国家的指挥，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用不着参加什么党。

辛亥革命后，四川增编新军3个镇（师），王陵基在四川

副都督胡景伊的保荐下，任第二镇的标统（团长）。1913年“二次革命”起，在上海的川籍同盟会员熊克武，组织了2000多武装力量回川，受孙中山委任为蜀军总司令。熊率部到达重庆后，兼重庆镇守使，通电讨袁。袁世凯即令川督胡景伊、滇黔联军总司令唐继尧出兵重庆围攻熊克武。王陵基向胡景伊请缨率部讨熊，被胡逾格编为川军第二师先遣支队长兼川东宣抚使，率部由南充向重庆进攻。王部到达重庆附近时，滇黔联军黄毓成部已逼近重庆，熊部因各方围攻众寡悬殊，弃渝出走。黄部先入重庆，王陵基将其部队主力驻在江北，自率有力部队进入山城，与黄火拼争夺重庆。在巷战中，民房被烧毁甚多，居民伤亡多人，重庆士商呼吁停战，王、黄各执一词互相攻讦不止。北洋政府遂将黄、王二人“解职查办”，黄毓成率部回黔，王陵基调任督署参议。不久，北洋政府又恢复王陵基少将军衔并发还勋奖章。

1915年2月，袁世凯派其亲信陈宦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巡按使，掌管四川军政大权。王陵基经胡景伊引见受到陈宦赏识，常被询问川事。不久袁世凯恢复帝制，王陵基认为袁是改朝换代的英雄，愿作“从龙之士”。12月护国战争爆发后，陈宦派王陵基任第一师第四团团长，不久，王陵基又升调为第三师第五旅旅长。1916年5月，陈宦见反袁声势日盛，被迫通电反袁，宣布独立。第一师师长周骏对袁则表忠诚，通电讨陈。袁世凯将陈宦撤职，任周骏督理四川军务，赐周以存武将军勋位。周骏电荐王陵基为陆军第十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并在荐电中陈述王的忠袁言行。王赢得袁之欢心，被授为尚威将军。王陵基并奉周骏命令，率部向成都进攻，申

讨陈宦。6月，袁世凯毙命，周骏、王陵基声名狼藉，被迫舍去成都，撤向南充，不久赴北京。经多方疏通，王谋得烟台镇守使兼烟台知事职。1918年初王又到北京另谋出路未成，悻悻回川。

1921年2月，王陵基投奔驻重庆的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任该军参谋长。不久被派到第六混成旅帮助整理部队，旋任该旅旅长。1922年初，川军各派互争地盘，爆发内战，但懋辛第一军与刘成勋第三军等组成“省联军”，与杨森第二军对抗。杨森惨败，得王陵基旅掩护，率残部逃往宜昌，王陵基自请留在四川。1923年7月，刘湘任四川军务善后督办，王投刘麾下，1924年初受委任为陆军第二十八混成旅旅长。次年升任川军第三师师长兼江（北）巴（县）卫戍司令。

1926年北伐军节节推进，刘湘于12月将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王陵基任该军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这时，重庆组成以杨闇公为首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王陵基认为侵犯了他的权限，对省党部的活动大为不满。1927年3月24日英美帝国主义制造“南京事件”，死伤我军民2000余人，四川人民极为愤慨，省党部组织群众于4月3日在重庆举行示威大会。王陵基事先未能禁止，遂指使军警向群众开枪镇压，打死400余人，打伤1000余人；他还指使暴徒捣毁了省党部、四川日报社及中山、中法等学校，杀害了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漆树芬及冉钧、杨闇公等。惨案发生后，受到各方舆论严厉谴责，刘湘默不吭声，王陵基则反诬共产党破坏重庆治安，并派特务四处捉拿共产党人。

王陵基为了发展他的势力，取得刘湘的支持，在卫戍区

保安团开办一个团务学校，学生由各县选送，毕业后派回各县为保安团骨干，校长请刘湘兼，王自任副校长负实际责任。不久，王又开办重庆军官学校，招考中学毕业生训练一二年，以培养一批有文化的军官作为自己的亲信，校长仍由刘湘兼，王自任副校长。两校开办后，王经常到校讲课。毕业学生后来大多是王部的高、中级干部，分发在地方任保安团干部的亦多倾向于王。

1931年，红二方面军贺龙所部，在鄂中洪湖地区发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委刘湘为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刘湘不愿离开四川，即委王陵基为代总指挥，率6个旅、2个加强团及特种部队“围剿”洪湖地区红军。王陵基欣然承诺，对其亲信夸耀说：“剿匪”既可发挥自己的才能，又可增长声望，还可借机谒见蒋介石，增加将来发展机会。王以一部驻在宜昌，亲率主力前往沙市，除以有力部队固守沙市外围据点外，派第四师师长范绍增和前敌指挥官郭勋祺分左右两路向洪湖革命根据地进攻。嗣后并请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派出三四个师在潜江、沙洋及襄阳以南地区阻截红军。王陵基亲到前线督战，十分卖力。当他得悉红军主力向荆门方面移动后，认为红军将包围其左翼，亦以主力向左移动，要在荆门地区同红军决战，妄图在荆门、郢城地区消灭红军。红军打了几个歼灭战后，向老河口方面作战略转移。王陵基伤亡甚大，阴谋未能得逞，不敢深入洪湖地区，退而固守当阳、曾家集一线。

此时，王陵基得悉河南有三股土匪，各有人枪一两千，当即派人前往联络，招抚为第三师第一、二、三路警卫部队，名

义上为增大“剿匪”力量，实际扩充了他个人的武装。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川陕边区，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1933年7月，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统率四川各路军阀围攻红军。刘委邓锡侯、孙震、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邦俊分任6路总指挥，向红军进攻。王陵基为第五路，指挥8个旅共24个团和特种部队，并代刘邦俊指挥第六路的4个旅，于12月中旬向革命根据地疯狂进犯。红军为集中力量，主动放弃达县、宣汉，王陵基立即向上表功，并企图借机吞并第六路的队伍，因而惹起各路“剿匪”军不满，刘湘遂将其撤职。王被撤职后，百无聊赖，跑到上海当了两年寓公，花天酒地。1936年春，刘湘又电邀其返川，任省保安司令部保警处长并代行保安司令职。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初，王陵基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于夏初出川抗战。8月参加南浔战役，防守瑞昌武宁一线。嗣后，王部新十三师在万家岭一役奏捷获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陆续参加了长沙会战、南昌会战等，1939年6月，王升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率七十二军驻修水。此后王忠实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他常向其部属讲：打日本人没有什么，将来打共产党才要真正流血。我把我的意见多次向委座（指蒋介石）提出，委座也赞赏我的见解。他多次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如建议在湘鄂赣边区组织“剿共”部队等，深得蒋介石信任。他指令参谋长宋相成搜集八路军、新四军“妨碍”、“破坏”抗战材料报到重庆去。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他竭力奉行蒋介石的指示，

指令第一线部队及时消灭新四军和共产党组织。王还责成所属把消灭共产党及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视为最重要任务，规定各级主管长官要层层具结，并推行连坐法，三人连环保。他在总部成立肃“奸”委员会，自兼主任；各军、师成立肃“奸”小组，军、师长任组长。他对共产党员或有嫌疑的人，都凶残地加以杀害，被逮捕的新四军和共产党员押到总部，极少有生还的。他说：委座曾指示过，对共产党宁可误杀三千，不可走漏一人，这句话很有道理。

1941年冬，日军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由于王陵基平时散布消极抗日保存实力言论，其部属对日军也就不积极作战。会战开始，王率主力赴平江、长江地区参战，令七十二军三十四师陈良基担任武宁、修水方面守备。三十四师抵抗不力，节节败退，使少数敌、伪部队窜到修水地境，总部仓库和全军眷属几遭失陷，王陵基不得不在前方抽调两个团星夜兼程回援。会战结束后，王陵基回到修水，将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撤职，三十四师师长陈良基撤职查办，还枪毙一个团长泄愤。

王陵基一向把“剿共”看得比抗日重要。1945年春初，第三十四师参加湘粤赣边区会战，收复了江西省政府所在地太和，继续追击南窜之敌。王陵基却下令三十四师立即舍去追击日军之部署，回援湘鄂赣边区，去进攻渡江南下之八路军王震部。他还设宴招待团以上军官，唆使他们拼命“剿共”，不要怕伤亡，将来一定优先补充。

王陵基忠实执行反共政策，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嘉许，1943年春晋级陆军上将衔，1945年春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

中央执行委员；抗战胜利后，又擢升为第七绥靖区司令官，辖2个集团军。王陵基深恐反共落于人后，自请将七十二军派到长江北岸去承担“剿共”任务，得到蒋介石赞许。

不久，王陵基调任江西省主席。他要七十二军调到江西担负“绥靖”任务，与武汉行营发生了矛盾。后来蒋介石电令将七十二军仍留鄂东北“剿共”，将驻江西的青年军2个师拨王指挥。王在江西大力征粮征兵，以补充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的需要。

1948年春，王陵基调回四川任省主席。他对蒋介石的任命心领神会，表示要作好“反共后方基地”的建设。他一到四川，就大刀阔斧地更换专员、县长，任派原刘湘部特别是第三十集团军军官充任各级文武官员。他下令各地彻底肃清中共地下组织。对反对他的民间机构、人民团体等，则进行威胁利诱、分化瓦解。他极力扩大反共地方武装，同时联系胡宗南、宋希濂、孙震、杨森等，想利用他们的力量阻止解放军入川。

1949年夏秋，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入西南后，蒋介石委任王陵基为四川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王立即委任各区专员为该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又令各总指挥委县长为师长，大肆发展反共武装。12月，四川大部地区陆续解放，王陵基还妄图作困兽之斗，要退守雅安。但人民解放军已撒下天罗地网，所属之10个保安团亦先后起义，王走投无路，于12月下旬只身化装逃跑，在途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获。

1964年12月28日王陵基获得特赦释放出狱。他晚年患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获赦后曾入医院治疗。1967年3月17

日病故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四川军阀史料》。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四川文献研究社 1974 年台北版。

《文史资料选辑》、《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黄百韬

王家鼎

黄百韬，原名新，字焕然，1900年9月9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生于天津。祖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其父黄宗骏早年从军，曾为李鸿章淮军之统领，后流落天津。黄5岁时丧父，因家贫曾一度随母靠捡煤核度日，嗣后其母至当地苏姓殷实富户作女仆，黄偕往充当少东书僮。以少年聪慧深得主人喜爱，遂得资助入学堂就读。1913年小学毕业后，入直隶省立工业专门学校中学部，3年后毕业。他凭藉苏家与江西督军李纯的世交关系，被荐往李纯处，得入陆军第九混成旅学兵营当学兵。

1917年8月，李纯转任江苏督军，黄百韬随至南京，任督军署李纯身边的传达兵。李对黄甚为赏识，以心爱的婢女金恕勤赐黄为妻，并保送他入军官教育团第5期步科受训。1922年结业后，黄被派往江苏省防军任排长、连长等职。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已投奔奉系的张宗昌，乘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之机，进入关内，收编直军4个旅，继又协助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南下，率兵攻打江苏督军齐燮元，江苏省防军一触即溃，黄百韬被俘。张宗昌念黄在金陵军官教育团之师生情谊，予以接纳，后派黄至徐源泉部，先后任团附、营长、参谋等职。1926年8月，褚玉璞任直隶军务督办，徐

源泉为帮办，任黄百韬为督办公署参谋。

1928年4月国民党军队继续北伐，6月初进占北京、天津，张宗昌、褚玉璞率直鲁军残部退守滦河东岸。10日，直隶军务帮办徐源泉在天津易帜，黄百韬随徐投蒋，接受改编。徐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六军团，黄百韬被任命为第十二军（军长张冠五）第八师参谋长。同年冬，国民党军编遣缩编，徐源泉第六军团缩编为陆军第四十八师，驻防于昌平、南口一线，黄百韬调任该师第一四三旅二八八团团附。1929年3月，第四十八师奉命南下，在南京受阅后溯江移驻汉口。时值蒋桂战争爆发，第四十八师划归“讨逆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第九军（军长何成浚）序列，参加讨桂战役。旋黄又调任第一四二旅二八四团团附。同年10月徐源泉第四十八师参加讨伐冯玉祥。12月第四十八师改编为第十军，黄百韬以原部团长兼第一四二旅副旅长。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第九、十军等非蒋嫡系部队属何成浚指挥的第三军团，第十军编为第十六路军为左翼军，黄百韬所在的第一四二旅参预在平汉线与冯阎军的拉锯战。8月，蒋军反攻，第十军被编为平汉路第一纵队，第一四二旅参预攻打洛阳之役。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转而发动“围剿”工农红军，黄百韬在鄂中地区转战不停，甚为卖力。1931年2月，黄百韬所在的第一四二旅从沙市进驻公安，担负“分区联防清剿”的任务。3、4月，黄率二八四团进攻藕池红二军段德昌部，先后侵占石首、调弦口、塔市驿等地并沿江东犯。5月，黄升任第四十一师第一二三旅旅长。1932年1月，鄂西红军攻取皂

角市、陈家河等地，进逼武汉。黄百韬所在的第四十一师与第四十八师自东部攻入鄂西根据地。4月，黄百韬调任第四十八师一四四旅旅长，嗣后指挥该旅及一四二旅、新三旅等8个团，在皂市附近九真庙地区与贺龙、段德昌部工农红军激战中受重创。7月下旬，黄百韬旅率先攻占洪湖根据地腹地新堤蕉子洲，受到蒋介石的嘉奖。1933年初在与红三军贺龙、关向应部交战于湘鄂边鹤峰、桑植地区时，黄百韬旅猛攻鄖阳关得手。1935年4月在进犯湘西大庸、永顺、桑植，建立三县边境封锁线的战役中，黄旅为先遣纵队，从黔江东移来凤县中堡、李家河一线，协击塔卧地区，并修筑四川境内具壩至濯河壩间的碉堡。此时红军移师包围宣恩，黄旅遂转白塔增援宣恩。是役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被俘，黄百韬乃被任命为第四十一师代理师长，率部驻来凤、咸丰间，“追剿”和堵击长征西进的红军。9月，任第三区司令官，修筑碉线网防守来凤至江岩堡一线。

黄百韬虽然作战甚为卖力，而从团附升任师长历经7年之久，盖因既非黄埔系、保定系，又没有什么靠山。但他升任师长后，却居功自傲，日益骄纵，为第十军军长徐源泉所不容。12月，徐以“群情不洽”为由，免去黄的师长职。黄表示韬晦之意，从此改名为“百韬”。旋被任为鄂湘川黔边区“剿匪”总部总参议。同年底，黄被保送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进修，结识了鹿钟麟等人。1938年9月毕业后，正值冀察战区成立，鹿钟麟为总司令，黄任战区参谋长。1940年春，黄百韬调充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高级参谋，其间曾以撰写年终军事论文获奖，受到参谋总长何应钦赏识。

1941年夏，黄百韬受何应钦保荐，出任第三战区参谋长职，欲对战区机关颇多整顿，但因出身杂牌军，为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及其部属所鄙薄。黄遂竭力与顾的亲信结好，逐渐取得顾的支持和任用。1944年2月，被顾派往第二十五军任军长，隶属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序列，曾参加赣州战役对日作战；1945年5月又参与进犯浙西新四军苏浙军区抗日根据地的反共军事行动。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百韬率第二十五军跟随顾祝同进驻淞沪地区。1946年初划归汤恩伯第一绥靖区统辖。6月，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爆发，第一绥靖区12万人进犯苏北解放区。驻扬州的黄百韬整编第二十五师，分兵进犯宜陵、樊川、邵伯、高邮等地，蹂躏解放区。8月，黄部在邵伯被解放军第十纵队歼击，退回扬州。11月，黄部一个旅会同整编第八十三师、整编第六十五师四路进犯盐城，黄率部在下仓地区与解放军激战兼旬。1947年初，蒋介石调集23个师发动“鲁南会战”，企图一举歼灭华东人民解放军，黄百韬师为“主要突击集团”的右路，北犯临沂。解放军为集中优势兵力歼敌有生力量，于2月10日放弃临沂北上莱芜，于是月下旬歼灭李仙洲集团等共5万余人，黄百韬等欲北援已无及。5月，蒋介石调集汤恩伯、欧震、王敬久3个兵团共13个整编师“重点进攻”沂蒙山区，黄百韬部属临沂汤恩伯第一兵团序列，与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同为这次进攻的主攻部队。5月12日，七十四师抵达桃圩、蒙阴时，改归黄百韬指挥。黄原计划合整编第八十三、七十四、二十五、六十五师互相联结，固守天马岭、虾蟆岭，但张灵甫自恃嫡系精锐部队，^①执意孤军

深入，放弃天马岭，独自占领蒙阴东南 60 里的险地孟良崮。人民解放军迅即以优势兵力割断其与黄百韬等部的联系，切断其后路，封闭合围圈。黄百韬在蒋介石严令之下率部去救七十四师，但在解放军阻击下一直未能与七十四师合拢。5 月 16 日七十四师被全歼，骄狂的张灵甫被击毙。事后，蒋介石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将战败责任归咎于黄百韬指挥失误、援救不力，欲治其罪；由于得到顾祝同等人迴护，黄得以在会上详述作战经过，仅受“撤职留任”处分。

此后，黄百韬更加卖力地从事反共内战，甘当进攻解放军的主力。7 月国民党军队分 3 路进犯鲁中，黄百韬为右路指挥官，侵占东里店、南麻等地，并率部救援临朐第八军李弥部。8 月至 10 月，国民党军进犯胶东地区，黄率部卖命死战，先后占潍县、昌邑、高密、平度、栖霞、福山、烟台等地。旋奉调移驻安徽。

1948 年 6 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了豫东广大地区的基础上围攻开封，歼敌 39 万余人。蒋介石震惊不已，赶赴前线指挥，但调集驰援之区寿年兵团被围于睢县、杞县地区，邱清泉兵团亦受到阻击而无法前进。于是，蒋介石急调黄百韬率师车运豫东，并指挥第三快速纵队、交警军二总队，成立黄兵团。黄百韬率部西进，赶到帝丘店地区时，被人民解放军 5 个纵队合围，遭到猛烈攻击。黄率部顽抗死战 8 昼夜，死伤无数，士气颓丧，黄亦负伤。直至胡璉十八军和邱清泉兵团来援，黄才得以突围而出。为此，蒋介石在南京军事会议上授予青天白日勋章，黄感激涕零，表示今后当为蒋介石“万死不辞”。

豫东战役结束后，8月，蒋介石正式组建第七兵团，以黄百韬为司令官，辖二十五、六十三、六十四军。9月中旬，按蒋介石的重点防御布局，黄率部移驻陇海线东段新安镇，担任海州至运河间防务。其时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后，于10月中旬挥师南下。11月初，蒋介石慌忙部署徐海防务，收缩兵力集结于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地区守备。黄百韬意识到第七兵团地处前沿，是解放军打击的首要目标，遂向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建言：仿效拿破仑团式集中法，集结各主力兵团于徐州四围，以图各个击破人民解放军。11月3日，他再向刘峙建议，速取各兵团相互衔接深沟高垒战术。当天深夜，蒋介石在南京批准退守徐州的方案，决定弃守海州、新安镇，命黄百韬率第七兵团由新安镇退守徐州以东地区。黄百韬对幕僚慨叹这一决策为时已晚，“恐怕撤退不及了”。^②5日，黄又受命率部掩护海州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西撤。此时，第一百军和四十四军亦归黄百韬指挥，第七兵团扩至5个军，共约12万人。

11月6日夜，华东人民解放军7个纵队从鲁南兼程南下，矛头直指黄百韬兵团，揭开淮海战役序幕。7日，双方发生局部战斗。当夜，黄得报李延年部业已转移，遂于8日凌晨率部沿陇海线仓皇西撤。5个军的官兵、辎重均须通过运河铁桥这个唯一通道，拥挤阻塞，行动迟滞。第六十三军从窑湾镇渡河，遭解放军苏北兵团的截击，随后被全歼。9日黄率部移抵碾庄地区，但碾庄至曹八集间的西撤通路迅即被人民解放军切断，黄奉命就地抵抗。4个军7个师被解放军11个纵队全面包围于纵横不及10华里的碾庄地区。黄踞守地堡工

事，呼救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请求早派援军和补给粮草弹械。12日起，解放军展开猛烈攻击，重点突袭碾庄南部正面第四十四军阵地，至14日晨全部摧毁。黄百韬急调第二十五军第四十师一部增防碾庄车站，激战不止。参谋总长顾祝同于15日飞临碾庄上空，又空投蒋介石亲笔信，为黄百韬顽抗死守撑腰打气。^③16日自晨至暮，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碾庄西部第一百军阵地全部瓦解。至此，南、西两面阵地俱失，北、东两侧阵地亦多残破。徐州“剿总”先曾于11日午后命徐州以西邱清泉第二兵团东调，会同李弥第十三兵团以钳形攻势解黄百韬之围，但李部进到八义集、大许家时，受到解放军增援部队的阻击，经7天多的逐村逐庄争夺苦战，仍无法前进。黄百韬但闻大许家炮声隆隆，终不见李弥兵团的援兵到来，只好唉声叹气地表示失望。17日起人民解放军日夜赶修迫近工事，于19日通过网状壕沟坑道逼近黄部阵地。黄百韬仍至死不悟，藉空军掩护，集中营长以上官长训话，声称要“以死报国”。对于已经失去的阵地，他仍命炮兵轰击毁尽；对碾庄民众则任其饿死也不放出。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第四十四军和第一百军被全部歼灭，包围圈越缩越小。第二十五军和六十四军残部弹尽粮绝，士气沮丧。黄百韬于20日凌晨逃至大院上据点，午后又转往吴庄据点，准备向西北方向突围。但各据点均为解放军网状壕沟分割包围。黄见大势已去，绝望地对同僚表示：“天地虽大，吾将难以自容。”^④至22日黄昏，被围之国民党军残部被全部歼灭，黄百韬突围逃命未遂，举枪自戕而死。

注：

- ① 当时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和整编第七十四师，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
- ② 陈士章：《黄百韬的起家 and 败亡》，《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 ③ 蒋介石给黄百韬的亲笔信原件照片，见《新徐日报》1949年1月3日，第2版。
- ④ 《碾庄之战》，刊于台北《中外杂志》第39卷第1、2期。

主要参考资料：

《毛泽东军事文选》关于淮海战役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1981年版。

李以助：《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杨廷宴口述，黄福初笔记：《黄百韬司令官殉难经过》，台北《革命人物志》第5集第324—329页。

李世镜：《黄百韬上将逝世九周年纪念感言》，台北《中央日报》1957年11月22日。

《鄂湘川边剿匪总司令部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193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杨群奋：《民族英雄及革命先烈传记·黄百韬》，下册第327—340页，台北正中书局1966年版。

上官云相

王家鼎

上官云相，字纪青，一作霁青，山东商河县人。1895年2月26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二）生。祖辈世代务农，父上官维兼营泥瓦匠，间或从事古瓷买卖。上官云相幼时从邻村塾师受业，于1910年7月至济南考入山东陆军小学。1914年6月升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7年1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预备生队，半年后转入第六期步兵科。

1919年3月，上官云相在保定军校毕业后，以见习生派往湖北陆军第二师第二十一混成旅（孙传芳部）任卫队排长、连附。1923年，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第二师长孙传芳率部入闽，任福建军务督理，上官随任督理公署少校参谋。1925年，孙改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时，上官任督理公署中校宪兵营长。同年，升任暂编陆军第七混成旅（杨震东部）第一团团长，驻杭州笕桥。

1925年10月，孙传芳发动浙奉战争，上官团属联军第二路军谢鸿勋部，沿沪宁线北进。11月3日，上官团在固镇以南与奉方张宗昌部激战，俘其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卓有战功。翌年初，孙传芳将赣军第三师（冯绍闵部）编为陆军第七师，升上官云相为该师第十三旅旅长，驻苏北宿迁运河一线。

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挥师入赣。孙传芳派主力抵抗，上官云相旅于10月上旬开抵九江，与第二师卢香亭部驻守南浔线涂家埠、乐化地区，曾一度挫败蒋介石嫡系王柏龄师，解南昌之围。11月，孙传芳兵败退出江西，上官旅撤往吴江、苏州。1927年5月，复退往江北，上官调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8月，升任第四师师长。此时，孙利用蒋介石下野、宁汉矛盾之势，集六师三旅兵力大举渡江，在龙潭大战，威胁南京。上官师为孙军劲旅，随东路军渡江。兵败后，上官率第四师残部撤往德州后方补充整训。12月27日，因与奉军安锡珪部发生冲突，上官被逐，遂去职。

1928年夏，孙传芳余部在张家口被蒋介石改编为陆军第四十七师，以孙旧部王金钰为副师长（旋升师长），上官受王邀任该师第一四一旅旅长。

1929年，第四十七师先后移防徐州、漯河。10月，奉蒋命讨伐冯玉祥，11月一四一旅参预攻偃师、占洛阳，迫西北军退守陕州，上官受蒋介石传令嘉奖。1930年3月，上官升任四十七师师长。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上官师属蒋军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浚），先在平汉线作战，继又东移陇海线作战。7月12日，上官云相升任第九军军长，辖四十七、五十四两师。时冯军孙殿英部占据亳州，威胁蒋军后方，上官指挥五十四师攻克亳州，移防柘城。8月6日，冯集全力发动总攻，上官率部在宁陵、柘城地区与冯军主力作战，冒暴雨胶着坚持，使陷于空虚的蒋军阵地重归稳定。21日，上官率部重返平汉线作战。冯、阎由于矛盾，坐失战机，战局急转直下。9月初，平汉线蒋军分兵五路反攻，上官云相为第

三纵队指挥官，率部沿平汉路西侧北上，切断郑、洛交通，于10月6日首入郑州。上官在中原大战中积极为蒋效力，从此得到蒋介石信任。11月，调任军事参议院参议，旋改任国民政府参军。1931年1月，接任第二师师长。

1931年5月，第九军军长王金钰因参加对江西中央苏区第二次“围剿”遭到溃败而“引咎辞职”。上官云相闻讯赶到南昌，获准回任第九军长兼四十七师师长，旋奉命兼代第五路总指挥。7月下旬，参加第三次“围剿”，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第三路进击军总指挥，率五十四、四十七两师从永丰向南村急进。8月4日进占良村、莲塘。此时，在兴国以北的红军主力第一、三军团，断然摆脱西路蒋军主力陈诚、罗卓英部，又甩掉东路蒋军毛炳文、赵观涛、蒋鼎文等师，中间突破，全力攻击敌薄弱环节上官部。6日，红军包围四十七师一个旅于莲塘附近山谷，7日全歼该旅，击毙其旅长。同日，红军又包围良村，歼其两个团。上官全军溃散，重武器丧失殆尽。他慌忙收容徒手官兵，重编第四十七师，开赴蚌埠整训。

1932年3月，当十九路军发动的淞沪抗战临近尾声时，上官云相奉命率四十七师开抵常熟，拨归第五军张治中指挥，负责警戒二线沿江据点，但未经对日作战，淞沪抗战即告结束。6月9日，第四十七师奉命由镇江乘轮开汉口，旋移防武穴，投入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围剿”，上官任鄂豫皖三省“围剿”军中路军第五纵队指挥官。9月初移驻蕲水，侵占英山后推进霍山，参预会攻根据地首府金家寨。1933年夏，上官云相率部继续在鄂东罗田一带，进出松子关，追击红军游

击部队。1935年1月，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上官被急调追击红军，任湘鄂川边区“剿匪”总部（总司令徐源泉）第一路军总指挥，率部由豫鄂入川，开赴绥阳、綦江、松坎防堵中央红军，并驰援桐梓王家烈部。5月，蒋介石令上官率四十七、五十四师修筑黔北公路扎佐至松坎段，沿途修筑碉堡，借以封锁、阻截红军。8月，上官任驻黔第一绥靖区指挥官。

1936年1月，上官云相因贪污军工筑路款项败露而去职，遂赴欧洲游历并考察军事，于1937年1月返国。同年5月15日就任豫鄂陕边区主任，驻湖北襄阳。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9月，上官云相调任第十一军团长，隶属淞沪战场左翼军（总指挥陈诚）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序列，驻苏州。11月10日，左翼军自淞沪退守吴（县）、福（山）线，薛岳升任左翼军总司令，上官代理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率部撤退至皖南泾县三溪。1938年3月，上官改任第三战区长官部（司令长官顾祝同）总参议，7月调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翌年4月，奉命率六个师自广德开江西临川，担任鄱阳湖东、南两岸和赣江东岸对日防御守备，曾一度进击南昌，攻占机场，损兵折将，无功而退。

1940年10月，蒋介石、顾祝同为袭击坚持皖南敌后抗日的新四军，^①置赣东对日作战于不顾，将上官云相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迁至皖南宁国，与原在皖南的蒋军第二十三集团军连接。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迫令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变更作战地境，限于一月内撤往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以“佳电”，表示愿顾全大局，将皖南新四军撤往长江以北。

正当新四军积极准备从苏南渡江时，蒋、顾、上官等加紧秘密策划，企图一举歼灭新四军于皖南。12月中旬，上官从宁国总部匆忙赶到上饶，顾破例地留他夜宿私寓，面授机宜；接着顾召开徽州秘密军事会议，指定上官为作战指挥官，确定动用蒋军七个师又一个旅兵力的作战编组。^②会后，上官交代幕僚“要绝对保守机密”，要继续为新四军“催请经费粮秣”，但“弹药器材决不代他请领”，“万勿暴露企图，以免给予新四军口实”。^③

1941年1月5日，新四军军部暨直属部队9000余人到达泾县西南茂林地区。当晚，上官云相召开军事会议，诬称新四军“南窜”黄山、天目山，发展根据地，立即下令参与包围的蒋军各部推进、堵击，予以歼灭。他宣称：“我们和共产党誓不两立。”^④6日拂晓，上官总部直辖的第四十师在三溪镇东北山口隘路投入堵击战斗，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由此发生。

事变开始后，上官云相负责整个战役的全权指挥，随时通过战区一名联络参谋向顾祝同报告战况。新四军英勇抵抗，7至10日战况激烈。上官在宁国万福村集团军总部，夜以继日地躺在鸦片灯旁精心策划、指挥这场血腥屠杀。

7日，上官得报新四军已全部渡过舒溪，乃下令蒋军各师集中主力搜索、包围，形成互相衔接的封锁圈，特令直辖四十师迅速夺占榔桥河山口隘路，迫使新四军无法展开、通过。新四军被围在山谷，天寒阴雨，道路泥泞，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英勇顽强地作战。当晚，上官严令各师长：“如果新四军从哪个师的阵地上突围逃跑了，就唯那个师长是问。”^⑤上

上官还特别命令所有蒋军前线部队：在攻击位置变动后，原封锁线不得撤除，以防止新四军小股或零星潜出。他自诩这是他“多年剿共作战的经验”，“书本上找不到的”。^⑥9日，上官得知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等带领少量部队从茂林西北蒋军第一四四师防地突围而出时，大为震怒，立刻撤换、扣押该师师长唐明昭，以第七十九师师长段茂霖兼任该师师长。当天，上官督饬蒋军发动全线进攻，包围圈日益缩小，新四军军部被迫退守东流山、石井坑一带。11日拂晓，蒋军强攻东流山等地，新四军顽强抵抗，激战至12日晚东流山失守，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分散突围。^⑦上官指挥所部继续追击，叶挺亲自组织、率领手枪队与蒋军拚杀，叶挺致书上官，斥责其背信弃义，指出应以抗战为重，不再自相残杀，表示愿与上官面谈。13日叶至上官总部，即被扣押。

“皖南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谴责。22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要求严惩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但上官云相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不仅没有受到惩办，还得到第三战区长官部的特别嘉奖，国民党政府特发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奖金5万元。上官在欢宴“胜利”时炫耀说：“仅半个月完成一个会战任务，也是一个理想的作战指挥。”^⑧1942年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三十二集团军总部有人建议将“皖南事变”战例列入报告。上官供认“这是内战，自相残杀，在抗日战争民族大义上是理屈的”，^⑨不能上报。由于上官云相反共有功，1943年1月被升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

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1945年春，抗日战争行将进入反攻阶段，继赫尔利援蒋声明发表后，蒋军在苏南、浙西地区大举发动反共军事行动。5月，上官云相指挥第三战区所辖第五十二、第七十九师以及部分美国训练特务部队共十个师，分三路向新四军苏浙军区猛烈进攻。6月上旬，新四军主动退出新登、临安和天目山地区。上官率部跟踪紧逼，侵入浙西解放区达百里。^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官云相调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参与接收平、津地区。终因非蒋军嫡系将领，实则有职无权。1946年，他不甘寂寞，自请设唐山指挥所，自兼主任。旋移住天津“张园”，奉命指挥冀东的蒋军进行内战。1947年2月27日，他出席平、津、冀、热“绥靖会议”后，兼任天津城防构筑委员会主任，致力监督天津外围防御工事构筑和款项支付事宜。上官为谋取军事实权，曾托人请求蒋介石准其兼任天津警备司令，^⑪蒋未应允。

1947年7月，第十一战区撤消，改设保定绥靖公署，上官云相任副主任。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上官对华北战局表示消极、悲观。1948年1月，上官在改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后，曾指使亲信赴解放区走私贩运棉花，藉此牟利。同年秋，平津战役前夕，上官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声威，以养病为由，去职赴沪寓居。1949年4月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旋飞香港，转逃台湾。

上官云相赴台后，于1950年4月去职，即去高雄市隐居，晚年益加消沉、悲观。1968年萌生出世之念，自印名片称“古穆和尚”^⑫。1969年8月8日，因病在台北死去。

注：

- ① 即国民党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当时隶属第三战区第三十二集团军战斗序列。
- ② “皖南事变”中参加围歼新四军的蒋军部队有：第二游击区第四十师，第二十五军的五十二师和一〇八师，第五十军的一四四师、一四五师，新七师的第二旅，第七十九师，第六十二师，近5万人。
- ③ 武之葵：《上官云相袭击新四军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
- ④ 同③。
- ⑤ 陈士章：《蒋军第四十师袭击新四军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
- ⑥ 同③。
- ⑦ 这次突围的新四军仅新三团、老三团部分取得成功，在繁昌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县。
- ⑧ 同③。
- ⑨ 同③。
- ⑩ 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7月25日。
- ⑪ 杜建时致笔者的信。
- ⑫ 《山东文献》第一卷第三期。

李 延 年

王家鼎

李延年，字吉甫，山东广饶人。1904年3月11日（清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李之权是个熟读孔、孟经书的乡绅。李延年10岁入本村初等小学，继入邻村刘集振华高等小学堂就读，1920年9月考入济南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附设甲种商业讲习科读书。此时，国民党人王乐平在济南创办“齐鲁书社”，宣传进步文化思想，李延年常与这个书社接近。

1924年春，王乐平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后，回济南为黄埔军校秘密招生。李延年闻讯，弃学潜赴上海应试，被录取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11月结业，任教导团排长。1925年2月，李延年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充任教导团第八连连长；10月又参加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城，旋班师广州，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第三营营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8月中旬，李延年所在的第二师紧随第八军唐生智部从长沙循粤汉线北上，李延年营参加了汀泗桥战斗和武昌之役。9月下旬，北伐军三路攻入江西，李延年营属东路军左翼军序列。11月攻占南昌后，李升任第二师第四团中校团附。1927年1月，李部随东路军第三纵队进入浙江，李升任第五团团长。3月底，北伐军抵达宁、沪，第二师布防宁、沪线上，李团驻守丹阳。

8月，孙传芳部强渡长江占据龙潭，威胁南京。驻守在苏

南地区的何应钦第一军、李宗仁第七军倾力投入是役，李延年团奉调驰援，奋力堵击，全团兵员伤亡过半，坚持不退。11月，该团与直鲁联军鏖战于临淮关，受敌三面包围，死守三昼夜，终于击破重围，守住阵地。李因战功晋升为少将团长。1928年4月底，蒋介石率第一集团军30余万人到达济南。日军出兵干涉，制造了“五三”惨案。蒋介石作出屈辱忍让的决策，令李延年团和邓殷藩团“留守”济南，掩护大军撤出，绕道北上。李延年部扼守济南旧城，与攻城日军福田彦助第六师团激战逾三昼夜，伤亡几达三分之二，守住旧城。5月11日，奉令突围而出，掩护后撤的一个排全部殉难。李延年此举，备受蒋介石赏识，战后晋升第二师副师长。

蒋介石占据平津后，实施国民党军队“整编”，李延年任蒋鼎文第九师第二十六旅旅长，移驻江苏新安镇。翌年，他率部随蒋鼎文开赴武汉参加讨伐桂系，后又参加讨伐石友三战争。1930年5月爆发“中原大战”，李部随第九师属平汉线何成浚第三军团，进抵杞县，攻取兰封，直至西北军失败。1931年初，李延年调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攻城旅旅长。同年6月国民党政府成立警卫军，李调任警卫军第二师副师长。1932年初，警卫军第二师改编为八十八师，李任副师长，驻防沪杭线上。

是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李延年列名于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领衔发表的“团结御侮，请命杀敌”通电赴沪参战，于2月18日接替江湾、庙行一带的十九路军防务。20日拂晓，与来犯日军激战，达二昼夜，大挫敌锋；22日，李部在友军支援下再次包围、击退倾巢来犯之敌，为沪战中的

最佳战绩。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李延年由蒋鼎文保荐，接任第九师师长，驻浙江嘉善。嗣后李率第九师移防徐州，7月李就任徐州警备司令。

1933年2月，李延年第九师开赴江西“剿共”，参加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编为陈诚指挥的中路军序列，与陈诚嫡系第十一师交相掩护，南犯广昌。3月21日，红军在草苔冈地区一举围歼了第十一师，李延年在东陂企图增援，遭到红军阻击，被歼一个团，遂仓惶北逃。同年秋，李又参加第五次“围剿”，衔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之命，率第九师第二十六旅前往大雄关地区，与红军激战，于11月20日进占党口。

这时，十九路军在福建揭橥抗日反蒋旗帜，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急调嫡系部队十个师入闽“讨伐”。李延年第九师奉命由赣东开进闽北建阳、建瓯集结，旋会同第三师（李玉堂部）沿闽江北岸东进。李延年探知水口守军内部空虚，遂以一个团一举攻占水口。1934年2月初，李延年第九师和第三师占领福州。

蒋介石镇压“闽变”后，又命蒋军转入对苏区的继续“围剿”。3月，李延年任东路军第二路军第四纵队指挥官，辖第三、九、八十三、三十六各师从漳州，龙岩向上杭、新泉、连城一带推进，半年间修筑大量碉堡、公路，准备进攻闽西苏区。9月1日，李延年令第三师第八旅自朋口进犯白衣洋岭山麓温坊地区，突被红军重重包围，全旅覆没。3日，李延年率第九师再举进犯，又被歼一个团，因而受到蒋介石申斥。27日，李挥军三十六师攻占白衣洋岭主阵地，10月上旬进占长

汀。此时红军主力已撤离中央苏区北上，开始长征。

1935年春，“剿匪”东路军总司令部更名“驻闽绥靖主任公署”，李延年任驻闽绥靖第四区司令官兼第九师师长，驻泉州。他大量收编泉、漳两属闽军地方武装，竭力推行“清乡”，镇压在闽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旋兼任驻闽绥靖第四区司令官，驻福州。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李延年率第九师开赴上海，参加左翼军刘行、罗店一线对日作战，隶属第十九集团军序列。11月10日，左翼军退守吴（县）福（山）防线。此时李延年已晋升为第二军长兼第九师长，率部撤往芜湖，旋开汉口整补。1938年5月，李延年第二军在台儿庄以东地区对日作战，中旬奉命突围，经亳州撤往漯河整训。6月初，担负郾城至漯河一带守备，5日开封失守后转赴湖北花园、孝感集结。8月，李延年升任第十一军团长兼第二军长。9月，率甘丽初军及第九、五十七、六十一各师在田家镇要塞与日军激战。11月，兵团、军团制撤消，李率第二军调衡阳，是年底开四川秀山整训并绥靖地方。

1939年11月，日军为切断越桂间国际交通线，自广西钦州、龙门港登陆，占领南宁后以3万重兵守卫南宁北昆仑关要隘。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遂组织27个师的兵力，发动昆仑关战役。第二军奉命抵达迁江，在宾阳以东布防。12月18日，第五军（杜聿明部）发起总攻，经旬日激战，其荣誉师（郑洞国部）伤亡殆尽。1940年1月7日，李延年率第九师奉命接替荣誉师投入一线战斗，李又指挥第二军猛攻侧翼九塘，击毙敌旅团长中村，在苏联空军18架轰炸机配合下一举攻占

昆仑关。^①下旬，日军大举增援，昆仑关得而复失。2月2日宾阳失守，李延年率第二军移驻湖北宜昌。

同年5月，李延年任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二军长，指挥所属第二、九十四、十八各军攻占宜昌，6月14日西撤鄂西建始整训。9月下旬，为策应长沙会战，再次攻击宜昌，10月8日一部突入宜昌，因敌投放烈性毒气，遂退出。入冬后李部转移重庆附近永川，翌年春移防泸州。

1942年夏，李延年调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胡宗南），在大荔设陕东河防指挥部，布防大荔、朝邑、郃阳一带。1943年秋，李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中原战役，迅占郑州、浉池，前锋到达陕州。李延年率部东出潼关对日作战，战地扩展到灵宝、卢氏、临汝一带。

嗣后，蒋介石为夺取山东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反共内战，任命李延年为山东挺进军总司令，辖山东境内国民党各挺进纵队，不断袭击八路军抗日武装。1945年2月李兼任山东省政府军事厅长，驻皖北阜阳。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抗战胜利后，李延年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总司令，负责济南、青岛、德州等地受降、接收事宜。济南等地日军奉命“守备原防”。^②李一面接收、受降，整编地方游杂部队，一面与日伪合流，向解放区进攻。他诬蔑说“鲁南‘奸匪’猖獗”，鼓动所部“早灭匪氛”。^③10月25日他指令新编第五路军吴化文部“集中兵力与日军协同予共匪有力之打击”。^④11月3日，吴部自界河北犯。

国民党政府蓄意破坏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准备发动内战，于1946年2月任李延年为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淮海指挥部指挥官。6月内战全面爆发后，李延年8月会同鲁南冯治安部、豫东王敬久部三路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9月，李指挥七十四师等三个整编师经宿迁沿运河南犯两淮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在全歼其五个团之后，主动撤退。19日李延年进占淮阴，他沾沾自喜地吹嘘说：“有十个七十四师，就可以统一全中国。”^⑤12月中旬，李延年率部自两淮进犯涟水。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因全面进攻遭到挫败，转入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蒋介石调汤恩伯等三个兵团开进山东。李延年任汤恩伯第一兵团副司令官，驻临沂指挥七个整编师与人民解放军作战。5月11日，蒋军分三路北犯鲁中。李延年力主慎重，建议勿使精锐主力第七十四师先头深入沂蒙山区，汤恩伯未纳此议，七十四师遂深入蒙阴以东孟良崮地区，于16日被全部被歼。同年秋，李延年接任王敬久第二兵团司令官，兼任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副司令。

1948年春，国民党军被迫转入重点防御，李延年率部由豫东移驻徐州，旋改编为第九绥靖区，守备海州、连云港地区。6月，徐州“剿总”成立，李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九绥靖区司令官。

9月人民解放军攻占济南后，蒋介石以徐州易攻难守，决定退守淮河，命李延年固守海州战略据点。11月2日令第一百军增防海州。4日，蒋忽而改变决策，决定在徐州决战，第一百军中途折回。李延年对此抱怨说：“举棋不定，亡国之征。”^⑥6日奉命放弃海州，西撤徐州，于10日就任徐州“剿

总”蚌埠指挥所主任，指挥四个军和刘汝明第八兵团守备淮河。28日徐州“剿总”刘峙抵蚌后，李延年专任第六兵团司令官，奉命率部进出淮河，占领固镇以北地区，企图解救被围于宿县双堆集地区的黄维兵团，但遭受解放军阻击，迁延半月，迄无进展。12月15日黄维兵团全部被歼，次日李延年兵团退守淮河南岸。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率领的3个兵团在永城东北陈官庄地区全军覆没，淮海战役结束，李延年兵团于16日炸毁淮河铁路桥梁，南撤滁县、浦口一带。

蒋介石为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加强长江防线，在下野前成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命李延年充任副总司令。李积极协助总司令汤恩伯布署湖口至上海间的长江防务，率第六兵团驻浦镇、浦口，守卫南京。李视察上海至南京一线江防，在江阴要塞督令构筑沿江营据点和申港团据点。他到处鼓吹打气说：“等二线兵团建成，即可反攻”，要部下“放心固守”。^⑦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直捣南京。23日，李延年逃离南京，率部南撤杭州，就任金华指挥所主任，统一指挥第十七兵团（侯镜如部）、第七绥靖区（张世希部）、第八兵团（刘汝明部）、第九编练司令部（张雪中部）等，企图沿浙赣线继续顽抗。但此时国民党军各部只顾仓惶南逃，早已溃不成军，李延年无法控制部队。李率残部在浙南丽水碧湖附近遭到解放军游击队阻击，丢弃全部輜重行李，舍车步行，于5月中旬到达福州，旋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六兵团司令官。

李延年在福州面对国民党战败残局，意气消沉，以吸鸦片、打麻将消磨时日。曾对人言：国民党“战也亡，不战也

亡，这是中华民国国运问题”。^⑥6月21日，蒋介石企图顽守福建以固台湾外围，召开福州军事会议，令李延年死守福州并迅速攻占闽北重镇古田。李受命后，表示“死不足惜”。7月李令所部向古田进攻，被解放军阻击。8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分3路进军福州，17日全歼福州绥靖公署和第六兵团直属部队7万余人，解放福州。李延年只身乘飞机逃离，率残部防守平潭岛。9月16日解放军攻占平潭岛，李率残部逃往台湾。

李延年逃到台湾后，以擅自撤退的罪名，被诉诸军法审判，判刑10年。出狱后隐居于台北市郊新店，生活贫苦，常以告贷度日。^⑨1974年11月17日，李因病在台北死去。

注：

- ① 陆学藩：《昆仑关战役亲历记》，《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 ②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军字第31号），1945年9月26日。
- ③ 《李延年给王洪九的信》，转引自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1月3日。
- ④ 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1月12日。
- ⑤ 《孟良崮战役资料选》第2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版。
- ⑥ 李以勋：《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4页。
- ⑦ 李子亮、邹彬等：《京沪地区蒋军的江防守备及崩溃实况》，《文史资料选辑》第65辑第75页。
- ⑧ 李以勋：《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45页。
- ⑨ 台湾《传记文学》第26卷第6期；香港《大公报》1975年7月22日。

邱 清 泉

颜 平

邱清泉，原名青钱，字雨庵，1902年3月6日（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生于浙江永嘉县。其父邱箴衡，曾业裁缝，兼营负贩，后开恒泰鱼行。邱清泉8岁入塾，10岁入基圣小学堂，14岁入永嘉县立高等小学，1917年秋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五四”运动波及浙江，邱曾与同学下乡宣传抵制日货。他读书兴趣亦由古籍转向西方学说，如达尔文物竞天择说、尼采的“超人哲学”等。1921年在第十中学毕业后，回乡执教1年，即赴上海求学，入上海大学社会系。

1924年夏，邱清泉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工兵科。邱曾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第一次东征和击溃刘（震寰）杨（希闵）叛军的实地作战，获得筑桥、攻城和安置炸药等工兵方面的实际知识和经验。1925年9月自军校毕业后，即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为少尉排长；第二次东征惠州之役后，升任中尉排长兼连党代表。1926年5月，调任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工兵营第三连连长。北伐军兴，工兵营随军入湘，配属第四军，曾参加武昌攻城战和南昌之役。1927年初，邱清泉等率学生至武昌返回军校继续完成学业，时任工兵大队第一队队长。

是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宁汉分裂。邱清泉

虽在武昌，却与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结伙，公然反对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师生，曾被拘囚半月。邱逃逸至南京投奔蒋介石，入总司令部训练处为科员，后调任侍从室副官。1928年1月，任第九军第三师补充团第三营营长，次年又转第二师任营长，在开封、郑州一带参加蒋冯混战。1931年升任第十师第五十九团团长。

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工农红军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1932年5月组设“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邱清泉入该司令部为政训处科长，追随原“孙文主义学会”头目、政训处长贺衷寒之后，并常为《扫荡月刊》（后改为《扫荡报》）撰写文章。1933年邱升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处长。

1934年7月，邱清泉被派赴德国留学，先入工兵专科学校，翌年10月入柏林陆军大学。他主要研习战术战略，除学巴尔克、斯蒂芬、克劳塞维茨等人的军事著作外，还学鲁登道夫的法西斯“总体战”理论，颇受普鲁士精神的影响。1937年5月毕业回国，在南京任教导总队参谋长。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大批军队奔赴抗日前线，邱清泉所在的教导总队亦调赴上海。淞沪会战经过3个月的鏖战，在日本侵略军登陆金山卫、占领松江后，邱随教导总队西撤，移驻南京，守卫紫金山、孝卫陵一线。12月12日南京陷落，邱撤退不及，乔装匿居乡间两旬，后经句容至江阴渡江，由徐州到武汉。1938年3月，邱清泉被任命为由装甲兵团扩编成的第二百师副师长。嗣后，邱兼突击第一纵队司令，率战车营、工兵营、战车防御炮营、装甲汽车队、高射炮队、

摩托搜索队及步兵一营，由湘潭北上至兰封，编入第一战区战斗序列，参加了兰封战役。6月，邱部奉派驻守郑州。9月信阳之役，邱曾率装甲兵深入敌后，日军畏慑。10月，第二百师扩编为第五军，邱任该军第二十二师师长，率部至湖南东安进行训练。

1939年11月15日，日本侵略军在钦州湾登陆北上，进犯广西，于24日攻陷南宁，继于12月初占领南宁东北50公里之昆仑关。第五军奉派增援桂南，归北路军徐庭瑶指挥。邱清泉师仿效宋将狄青征侬智高“微服过关”，由思陇翻山越岭，迂回至五塘、六塘断敌后路，与第二百师、荣誉第一师形成前后夹击之势，自20日晨起不断发起攻击，次第占领三角山等阵地，击毙日军少将、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等官兵多人。28日，第五军协同第六十六军、九十九军等部及空军发起全面反攻，邱清泉部参加正面作战。经过四天激战，于31日夺回昆仑关。邱清泉因战功获四等宝鼎勋章，并于次年5月升任第五军副军长。

1940年9月，邱清泉调至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参议；半年后又调任军训部第十六补充兵训练处处长兼重庆第三警备区司令。他训练新兵，除督促传授战斗技能外，要受训的壮丁以连为单位，利用驻区空地种菜、喂猪、养羊。胡宗南对邱之才干颇为赏识，邀邱去西安任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副主任。第七分校学员人数超过总校，所辖8个总队分设于西安四郊，邱在校本部设军官教育队训练教官，然后让他们分赴各总队施教。

1943年1月，第五军扩编为第五集团军，军长杜聿明升

任集团军总司令，邱清泉任第五军军长，辖3个师、6个特种兵团共约4.5万人，是支兵员充足装备精良的主力部队。先是，中国和英国1941年12月成立军事同盟，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编组远征军入缅与英军协同抗击日军，第五军隶属第一路参加作战。1942年4月29日腊戍失守后，第五军跋涉回国，病员众多，斗志懈怠。邱清泉上任后，注重给养和整训，以恢复战斗力。其时远征军撤往印度之一部，集结在加尔各答西北之兰姆珈，组成中国驻印军，蒋介石拟派邱清泉为驻印军军长。何应钦认为驻印军的总指挥是美国将军史迪威，邱的性情粗暴，可能与美国人闹翻而影响美援，乃向蒋建议改派了郑洞国。邱仍率第五军整训。

由于日本侵占缅甸全境和滇缅边境一部，中印公路于1942年被切断，国际援助的物资无法运入我国。为此，我国远征军、驻印军联合美、英力量，于1944年5月对滇缅边境的日本侵略军发起反攻。邱清泉奉命调第二百师由昆明前往滇西参加作战，于9月迂回攻击日军龙陵、芒市间之联络线，至11月3日会同七十一军等部克复龙陵，12月次第克复畹町北之象鼻山、腰子山、冷山等。远征军和驻印军经过艰苦战斗，于1945年1月27日在芒友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为抗战末期国际援助作战物资的运输打开了孔道。此役邱清泉获得三级宝鼎勋章和美方赠给的铜质自由奖章。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要把云南牢牢控制在手，以解除后顾之忧，密电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解除龙云所部武装，强行“改组”云南省政府，谓“西南大局之成败在此一举”，并亲自坐镇西昌指挥。驻在昆明北郊及罗次、呈贡的第五军，在

邱清泉的指挥下，于10月3日凌晨包围了昆明全城和云南省政府。龙云被蒋强迫除去云南省主席等本兼各职，调离昆明。邱清泉在此事件中为蒋效忠出力，获“二等云麾勋章”和“忠勤勋章”。12月，邱的第五军又参与镇压昆明“一二一”运动，迫害爱国学生。此后，邱率第五军调赴江苏，驻南京北岸之浦口，拱卫首都。

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战略部署下，邱清泉率第五军奉命出击，不遗余力。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集结22个旅的兵力，分由郑州、徐州进攻鲁西南解放区，发动所谓“钳形攻势”，妄图消灭冀鲁豫解放军主力于菏泽、定陶地区。隶属“徐州绥靖区”的第五军，伙同整编十一师等，自砀山、虞城之线长驱北进，但被人民解放军冀鲁豫军区独立旅阻于城武地区。直至整编第三师等4个旅1.7万余人被歼灭，解放军主力已转移，邱部才于9月12日侵占定陶，20日占菏泽。11月，邱部奉命绕道东明渡过黄河北犯，12月先后侵占濮阳、清丰、观城，翌年1月2日又占范县。但在解放军发起巨（野）金（乡）鱼（台）战役之际，邱部撤出范县退缩观城。他企图依仗美械装备和猛烈的炮火，去解救被围的国民党军队。

在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失败后转为“重点进攻”时，邱清泉的第五军改称整编第五师，继续在豫皖一带南奔北窜。1947年11月，人民解放军攻克砀山、黄口，向徐州外围进迫。邱部与整编第三师等奉调自商丘、宿县驰援；12月又南趋太和、界首企图追击；但解放军转而北上，会合鲁西地区解放军向开封、郑州方面进击，邱部又尾随于后赶去解救。1948

年春，骄矜自恃的邱清泉在河南杞县黄泛区，被人民解放军刘伯承、杨勇部围击，顽抗3月。由整编第五师扩编为整编第五军的邱部，在解放军的围击下，几乎全军覆没，更无力东援被围之七十五师沈澄年部。南京当局以邱不援友军之罪，予以申戒处分。邱垂头丧气，于8月告假回乡。

在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的战略决战面前，蒋介石幻想固守徐州，保全南京朝廷，于1948年9月匆匆设立“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整编第五军扩编为第二兵团，任命邱清泉为副司令官，一月后又升邱为司令官。邱兴冲冲上任后，立即率部自虞城、砀山北进，欲去救援济南被围之“第二绥靖区”王耀武部。但遭到人民解放军强有力之阻击，刚进抵曹县，济南已告解放，只得返回商丘。嗣后，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强大攻势下，菏泽、郑州、开封、商丘等城于10月下旬至11月初次第解放，邱清泉兵团只得往东溃退。蒋介石慌了手脚，为确保南京，部署40万兵力固守徐州。邱清泉兵团辖第五、十二、七十、七十四等军，于11月初集结于徐州以西黄口、砀山一带。人民解放军在徐州以东之碾庄地区围歼黄百韬第七兵团，蒋介石指令邱清泉和李弥去救。邱率7个师东援，被“围点打援”的解放军强大兵力阻击，11天只走出30里；至黄百韬兵团已被全歼之时，邱还在碾庄以外40余里。此时，碾庄以东陇海路两侧和津浦路徐蚌段两侧先后解放，宿县也已于16日升起红旗，徐州、蚌埠已成孤点，刚被蒋介石调来增援的黄维第十二兵团又被围于双堆集。蒋介石固守徐州之计划已成泡影，急急下令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南逃。邱率第二兵团逃至永城东北陈官庄，在人民解

放军堵击下，被分割包围在纵横不到 20 里的狭窄地区。但他还幻想构筑工事固守阵地，等待蒋介石空投粮弹，伺机突围南逃。时已进入寒冬，连日雨雪交加，所部身无棉衣，赖挖地洞避寒；粮草亦渐尽绝，官兵纷纷宰杀马匹充饥，继食树皮草根，以至抢吃人肉。士兵纷纷投奔解放军，但邱清泉残暴枪杀意欲投降的士兵，负隅顽抗。12 月 17 日中原人民解放军和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广播了毛泽东起草的敦促杜聿明、邱清泉等人投降书，但邱仍扬言“抱定不成功便成仁之决心”，顽抗到底。1949 年 1 月 6 日，人民解放军向陈官庄、青龙集地区发起总攻，邱清泉兵团随同杜聿明集团被全部歼灭。邱清泉在 1 月 10 日凌晨逃往张庙堂的途中被击毙。

主要参考资料：

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电报》，《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517—577 页，战士出版社 1981 年版。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文史资料选辑》第 8 辑第 1—42 页。

邱维达：《邱清泉第二兵团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 21 辑第 168—182 页。

周振强：《蒋介石的铁卫队——教导总队》，《文史资料选辑》第 12 辑第 43—53 页。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3 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郑洞国、覃异之：《中国驻印军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 8 辑。

刘 茂 恩

郭熙生 宋岑

刘茂恩字书霖，河南巩县人，生于1898年6月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父刘惟永为小商人，长兄刘镇华系民初军阀，曾任陕西督军、省长。刘茂恩幼读私塾，后入小学，1913年入洛阳河南省立第八中学。1915年10月被刘镇华保送到北京袁世凯办的混成模范团第二期辎重科受训，1917年7月毕业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19年3月毕业，到陕西刘镇华军中，先在军官教育团执教，后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

1925年4月胡憨战争中，刘镇华支援憨玉琨，被胡景翼击败。刘茂恩参加了这次战争，后随刘镇华逃到山西，投靠阎锡山。1926年春刘镇华企图重返陕西，决定攻打西安。4月，刘茂恩参与刘镇华率领的镇嵩军，围攻西安8个月之久。11月被国民联军抄袭，败退河南陕州。1927年4月刘镇华加入冯玉祥的国民联军，被编为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辖5个军，刘茂恩任第四军军长。1928年5月刘茂恩参与北伐，先后在山东、河北打败直鲁联军和奉军。6月，第八方面军改编为第十一路军，名义上直属中央，实际上归阎锡山节制，驻防豫西。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后，刘镇华出国游历，

刘茂恩代理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兼第十五军军长，受阎锡山令，到豫东参战。第六路军总指挥万选才率部东进抵开封后，被阎锡山任为河南省主席。刘茂恩与万选才有宿怨。8月，冯、阎军在陇海路失利后，万选才部向后退却经过刘的防地时，刘派人将万扣押，送交蒋介石，并率部投蒋，使冯阎军受到沉重打击。刘投蒋后，先后任陇海路左翼军第四守备区司令、平汉路左翼军第四纵队指挥官。蒋介石战胜冯、阎后，对刘茂恩甚为嘉赏。刘从此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1933年5月，刘镇华任安徽省主席，不久兼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刘茂恩任安徽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他所率领的第十五军成为刘镇华部参加“围剿”红军的主力。1934年10月，方志敏率领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皖南北上时，刘茂恩部进驻屯溪阻截，于1935年1月24日将方志敏俘获。以后，刘又率部入川追击工农红军。1936年刘兼任豫鄂皖边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茂恩任第十三军团军团长，奉命率部由六安开往石家庄。9月入山西增援大同。师至怀仁，大同失陷，乃奉命掩护友军及兵站物资的转移，苦战5昼夜完成任务。旋在忻口战役中率部血战逾旬，重创日军板垣师团。10月受命守备汾河，掩护石家庄、太原以北地区友军的转移，刘率部力战，使友军得以安全转移。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派遣郭晓棠、杨章武等人参加刘茂恩部，晓以民族大义，增强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1938年3月临汾失守以后，刘部进抵晋西北。在这期间，他与八路军一一五师代理师长陈光常常见面，还资

助一一五师一部分被服弹药。同年夏刘部进入中条山绛县以南地区，与日军对峙。八路军人员通过刘部防区时，皆顺利过境。

1939年10月，刘茂恩晋升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率部与日军鏖战于安泽、浮山、晋城、阳城一带，击退敌军多次进犯。1941年春夏，日军调集重兵猛攻中条山，刘部苦战近月，一时军饷供给困难，军中马匹都杀以代食，终被迫退渡黄河，守备豫西河防。

1944年春，刘茂恩率第十五军防守洛阳，兼任豫西警备司令。日军进犯中原时，刘部死守洛阳46天，孤军无援，突围至卢氏、淅川一带休整。7月，刘茂恩由陈诚保荐任河南省主席，兼省警备总司令。1945年3月，日军再次西犯，刘率部进驻伏牛山区，阻敌入陕。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1946年3月，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在郑州召开绥靖会议，颁发“绥靖手册”，筹划编组地方反动武装，清查保甲户口，构筑工事，训练反动军警等，并计划使用优势兵力击溃晋冀鲁豫和豫鄂区解放军主力，分区隔离，逐步实行清乡。刘茂恩带领省辖保安团及地方武装积极配合。刘还成立了泛东“剿匪”指挥部和豫北办事处，就近指挥专员、县长构筑防御工事，严密保甲组织，建立还乡工作队。他的床头装有电话，日夜听取各地报告，进行指挥。

1948年3月，国民党军第二〇六师被人民解放军围歼，洛阳解放。与此同时，刘茂恩的第十五军也在鲁山被击溃，军

长武庭麟被俘。河南省政府所在地开封处于解放军包围中。6月17日，人民解放军开始进攻开封，20日下午解放军攻入河南省政府大院，刘茂恩在卫兵护拥下由后侧门潜出，化装逃出开封城。26日解放军主动撤离开封后，刘随整编第五军进城，一面办理善后，一面电请辞职。7月27日河南省政府改组，由张轸接任省主席。9月2日刘茂恩乘飞机离开封到南京，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1月又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常委。

南京解放前夕，刘茂恩携眷逃往台湾，曾任蒋介石的“总统府”国策顾问。1981年4月24日，病死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文公直：《最近卅年中国军事史》。

贾逸君：《中华民国政治史》。

米哲沉：《刘续华的一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姜 桂 题

钟碧容

姜桂题字翰卿，安徽亳县人。生于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父早丧。姜自小体格魁梧，乡里儿童望之生畏。他的家乡是太平军、捻军起义活动的地区，姜桂题少年时自投清军将领僧格林沁军营请“杀贼自效”，^①充当僧格林沁的卫队官。1863年因镇压捻军立功，提升管带。

1865年，清毅军将领宋庆听说姜桂题很勇敢，招致麾下。姜“自此入毅军由偏裨而登统帅”。^②他先从毅军追击捻军张宗禹部，转战皖、豫、直、鲁，屠杀起义军。1867年平息捻军后，又跟随宋庆西征秦陇，因功得总兵衔，加“长勇巴图鲁勇”号。不久，随毅军从左宗棠奔甘肃镇压回民起义，攻肃州时，身受重伤。是役得授总兵，换清字“巴图鲁勇”号。

1875年姜桂题回皖省亲，在家料理母亲的丧事。不久，被河南巡抚李鹤年请去南阳练兵。1883年，姜仍回毅军，随宋庆驻防旅顺。清廷为防备帝国主义进犯，派姜守卫旅顺持续10余年。

中日甲午之战时，姜桂题、卫汝成、徐邦道等6军驻守旅顺，由龚照珩统率，但各军互不协调，各行其是。日军进攻旅顺时，守军不战而退，姜桂题弃甲而逃，被清政府革职。

1895年袁世凯受命编练新军。为了控制这支军队，发展

个人势力，袁多方笼络军界头目，以便网罗利用。1896年姜桂题应袁世凯之召入新建陆军，任右翼翼长。1898年新建陆军改武卫右军，隶属于荣禄，为北洋五大军之一。1899年12月，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姜桂题屯军山东泰安、青州（今益都）、潍县等地。

1900年春，山东义和团主力转移，与直隶义和团汇合，迅速向北京、天津推进。6月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授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准备乞和。李立即召姜桂题入京“拱卫京师”。姜秉承李的旨意，勾结帝国主义屠杀义和团。把汹涌澎湃的反帝爱国运动镇压下去后，又迎护慈禧、光绪回京，因而颇受信赖，因“功”加太子少保銜，授紫禁城及西苑门骑马，赏穿黄马褂。1902年宋庆死后，原毅军即归姜桂题统率。1905年姜办理长江防务，驻浦口编练江防军。1908年，继马玉昆任武卫左军总统官，1910年任直隶提督兼统武卫左军。

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期间，袁世凯借用革命声势威吓清廷，指使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46人通电清廷，要求“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迫使清帝退位。姜桂题参与通电。

民国成立后，姜桂题在军界尚有相当大的势力，所部毅军号称10万。1912年7月，袁世凯提名陆征祥组织内阁，陆所提阁员名单被临时参议院否决后，袁世凯怒不可遏，指使其党徒散发传单和信件，对议员大肆恐吓，威胁将以炸弹从事。姜桂题为袁世凯奔走效劳，大宴参议员和各党派领袖，进行疏通，迫其就范。8月，黎元洪假手袁世凯杀害辛亥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张振武时，张受骗到北京后，姜桂题受袁命配合行动，出面召集军界袍泽大会，假意对张表示热烈欢迎，

诱张堕入彀中。

1913年8月1日，袁世凯任命姜桂题署热河都统。次年6月，姜正式受任为热河都统。1915年袁世凯进行帝制的活动公开后，姜领衔上劝进表。9月，他又伙同段芝贵、倪嗣冲等人以安徽“公民”的名义呈具请愿书，谓：“今日之政体，非君主立宪，不足以定国是，安人心。”^③劝袁世凯早正帝位。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8月1日国会在北京开会，张勋竭力排斥国民党议员，提出将“二次革命”中反袁党人概予罢免，姜桂题随声附和。9月，姜桂题参与张勋、倪嗣冲等联名通电，要挟解散国会，公然声称“不称武人干政之嫌”。21日，张勋、倪嗣冲召开第二次督军团徐州会议，正式组织所谓“十三省区联合会”，制定章程，以张勋为盟主。姜列名参加该会。该会的目的是巩固北洋团体，反对南方国民党势力。10月，姜桂题和张勋、倪嗣冲等十三省区督军、省长致电黎元洪，请定孔教为国教，谓：“提议于国会，照旧定孔教为国教”，“编入宪法，永不得再议”。^④

1917年3月间，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在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爆发。5月22日，张勋召开第四次徐州会议，提出解散国会的要求。姜桂题附合张勋，6月4日致电黎元洪要求解散国会，并宣称要赴京进行调停。12日黎元洪在张勋胁迫下下令解散国会。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不久组织护法军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12月31日，姜与督军团曹錕、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等16人发表通电，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并请大总统冯国璋敦促参议院，迅将政府

提出的组织法与选举法立即施行，以作为新国会的张本。姜还积极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讨伐南方。他致电北京政府，催促曹锟迅赴前方，“以期早收统一之效，勿令坐失时机。”^⑤

1918年8月，大总统冯国璋因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尖锐，通电辞职，9月段祺瑞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姜桂题立即随声附和，请大总统徐世昌“早日就职”，倒向安福系。

1920年直皖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姜桂题“接近皖派，而亦爱戴东海。直皖揭作，声言派兵入京，保护总统”。^⑥他奉徐世昌之命与张怀芝调停直皖之争，前往天津、保定，向曹锟、吴佩孚疏通。但曹、吴拒绝调和。姜、张奔走数次，毫无结果。后决定找曹锟的弟弟曹锐接洽，曹锐拒而不见，姜、张扫兴而归。徐世昌又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专门研究调停直皖之争的问题。姜桂题列席会议，他向徐世昌声明：“嗣后决不再作调人”。^⑦

1920年7月29日，徐世昌派姜桂题兼管将军府事务，此系闲职，徒具空名，没有实权。他“意态消极，不近任何党派，盖亦军界中之超然派”。^⑧1921年，姜桂题以年老多病，迭次呈请辞职未获准。9月，徐世昌特派姜为陆军检阅使，令即来京供职。1922年1月16日，姜桂题病死北京。

注：

① 《昭武上将军勋一位姜公墓志铭》，见《姜桂题荣哀录》。

- ② 同①。
- ③ 全国请愿联合会事务所编：《君宪纪实》第1册第37页，1915年版。
- ④ 见《孔教十年大事记》第8卷第104页。
- ⑤ 《公言报》1918年7月12日。
- ⑥ 张一麀：《直皖秘史》第17页，上海世界书局1920年版。
- ⑦ 信史编辑社：《段祺瑞秘史》第52页，神州书局1921年版。
- ⑧ 《新社会日报》1922年1月18日。

赵 倜

邢汉三

赵倜，原名金生，1871年（清同治十年）生于河南汝南县。父赵子宣，不务正业，好赌博。家中仅有坟地一亩余，靠其母佃种地主土地度日，生活困难异常。赵倜8岁时，经人介绍到上蔡县城一家药铺当学徒，东家请有塾师，见赵聪敏，令他给儿子伴读，改名倜，字周人。赵在私塾读书4年，能写通顺文章，被派到药铺帮助记账。赵认为日与算盘为伍，没有前程，坚决求去，于1883年重返汝南。

赵倜返回汝南后，找不到出路，迫于生活，受佣于同村武状元赵云鹏家。赵云鹏在外居官多年，有钱有势。赵倜小心服侍，奉命唯谨。赵云鹏见他年富力强，办事可靠，又有文化，1887年派他代管收租事务。赵倜不辞劳苦，办事井井有条，更得主人信任。1890年赵倜向主人表露“投笔从戎”的意愿，主人为其转荐予清政府将军马玉昆。时马部驻防济南，派赵在所部作文书工作。赵为人随和，又会书写，马部军官都乐于与他交往。赵于暇时学骑马打枪，勤学苦练，学得一身好本领，受到马玉昆赞赏，1894年被提拔为骑兵管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马玉昆率毅军赴朝作战，赵随往，曾在平壤南门外与日军血战。1898年毅军改武卫左军，赵倜随马玉昆入该军，驻山海关内外。

1900年4月，八国联军攻天津，赵倜随马玉昆统率的武卫左军参加守大沽口和京津线的战役，作战失利，赵仅率残部数骑逃入北京。8月14日侵略联军打到北京城，光绪及慈禧逃离北京。赵倜随马玉昆护驾，因奉上的谕赴保定冒险提取军饷有功，深得慈禧的赞赏。帝后到达西安后，对护驾官员论功行赏，赵被越级提升为统领。

1902年马玉昆任武卫左军总统官，赵倜随侍左右，十分卖力。1908年马玉昆死后，姜桂题继任武卫左军总统官。赵协助姜治理军务，颇著劳绩，升任武卫左军全军翼长。辛亥革命时，赵倜奉袁世凯命率部进驻陕、晋、豫边区潼关一带，镇压阎锡山、张凤翔的反清起义，当地驻军数万皆归赵指挥，为他以后攫取河南军政大权打下基础。1912年秋，白朗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在豫西崛起。1914年1月赵倜受任“豫南剿匪督办”，督率在豫各军围剿白朗起义军。因未能在限期内“肃清狼（朗）匪”，曾受革职留任处分。赵所部主力，多为骑兵，乃改围剿为追剿，4月尾追白朗起义军至陕西、甘肃西部，再折回河南。由于这趟辛苦，袁世凯撤销了赵的处分。8月，赵倜所部在宝丰与白朗军作战。白朗不幸中弹牺牲，所部随之溃散，赵倜以剿灭白朗有功，被袁世凯特任为宏威将军。9月又改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1916年7月任河南督军。

河南地处中原，向为兵家必争之地，赵倜督豫8年，是其一生最显赫的时期。他统治河南，除依靠其军队作为资本外，主要赖其纵横捭阖的本领。赵对袁世凯力表忠顺，取得袁的信赖。袁妄图称帝时，段芝贵于1915年9月联合14省将军密呈袁“速正大位”，赵列名于中，表示拥戴，12月受袁

封为一等侯。袁世凯败亡后，段祺瑞接掌北洋政府大权。赵倜乘河南省长田文烈 1917 年 12 月调为农商总长之机，谋得兼任河南省长职，从此全省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他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提出“豫人治豫”口号。在这个幌子下，他一面笼络省议会议员，广植党羽；一面放手编练“巡缉营”3 万余人，以厚实力。他在开封成立了修械所，兼制子弹。“巡缉营”危害地方，河南人民饱受其苦。

1919 年初，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斗争日益尖锐。段祺瑞想以亲信曲同丰督豫控制河南。赵倜闻讯后，立即派人赴湘与吴佩孚联系，愿互为声援，得吴赞同。段乃将易督之举搁置。同年冬，段决意去赵，总统徐世昌不敢过于违背直系，只同意将赵兼省长职免去，赵得以仍任督军。

1920 年 7 月，直皖战争爆发后，赵倜与直系联合，结为反段同盟，直系主力部队顺利通过河南。奉系从东线助直攻皖，不过 4 天，皖军一败涂地，吴佩孚坐镇洛阳。但赵倜不愿将河南地盘拱手让直，吴、赵之间斗争激烈。吴采取借刀杀人的手法，于 1921 年春唆使驻在信阳的冯玉祥以索饷为名，公开反赵，又指使原河南第一师师长成慎通电讨赵，商定南北两路夹攻，夺郑州、取开封，驱赵下台。赵见情势危急，分电姜桂题、张作霖等求援。吴恐事态扩大对己不利，把责任推到成慎身上，率兵击杀成慎。经过这次事件，吴、赵间的矛盾表面上虽似缓和，实际更加深了。赵早已与张作霖派来的人秘密联系，至此决心联奉反直。

1922 年 4 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赵倜与奉密约，应允战争打响后即出兵郑州，断吴后路，南北合击打败直军。吴

佩孚早料及此，作了相应布置，策划败奉驱赵，一战成功。吴率部北上时，留冯玉祥坐镇洛阳，对付赵倜。双方在河南调兵遣将，引满待发。5月5日，主战场奉军已被击败。赵倜误得情报为奉军大捷，认为时机已至，当天发出宣言，名为武装中立，实则以武力驱逐在豫直军。双方激战于郑州附近。最初势均力敌，互有进退；嗣因奉军败报传出，赵倜所部军心涣散，渐形不支。赵的三弟赵杰任前敌总指挥，见大势已去，下令全线后撤。赵倜为保全性命，带亲信数人，化装逃往上海。5月10日，总统徐世昌下令“免去赵倜河南督军职务，听候查办”。至此，赵倜结束了他在河南的统治。

赵倜在河南任职8年，罪恶累累，搜刮所得，大部归入私囊。除在北京、天津广置宅第外，在汝南老家购置农田数十顷，重租盘剥农民。此外，存入天津英商银行数十万元。

赵倜由河南逃到上海时，张作霖亦败退关外。不久，赵潜至沈阳见张，受张聘为高等顾问，徐图进展。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河南入国民军之手，赵倜返豫之谋未能实现。1927年2月，张作霖以援助吴佩孚为名，派兵入河南，进驻郑州、开封等地，赵倜随奉军回到开封。他原想东山再起，不意事与愿违，到开封不久，北伐军已逼近。奉军土崩瓦解，赵倜随之狼狈而逃。到北京后，受张作霖委为督战专使。1928年6月赵随奉军退出关外。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赵随张学良进北平，过其寓公生活。1930年中原大战时，赵倜认为有机可乘，欲动员张学良率兵参战，自己借以死灰复燃。迨张表态拥蒋时，奉军对河南无从染指，赵回豫企图又成空想。

赵侗 1933 年患癌症死于北平。

老 洋 人

李国强

老洋人，原名张庆，又名张廷献、张国信，河南临汝县人，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张扬高，依靠耕种两亩岭地，勉强维持全家人的生活。1896年，他的父母先后病故，他开始四处流浪，乞讨度日，农忙时帮长兄张林干些农活。艰苦的生活环境，被压迫的社会地位，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胆大、坚强、爱打抱不平的性格。^①

1911年夏季，豫西一带遭受严重的旱灾和雹灾，庄稼几乎颗粒无收。但清政府的苛捐杂税反而有增无已，逼得贫苦的农民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这年秋季，老洋人跟着张林一起投奔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先后转战豫、陕。1914年6月，张林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不久白朗起义军失败，老洋人回到家乡。为避免官府捉拿，他将原名张庆改为张廷献，参加了河南督军赵倜之弟赵杰新建的“宏威军”，历任马兵、排长、连长，驻扎灵宝。他注意军纪，禁止部下抢掠百姓。因其身躯高大，黄头发、黄眼睛、深眼窝、高鼻子，貌似外国人，绰号“老洋人”。^②

1922年5月，河南督军赵倜由于和当时驻在洛阳的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有矛盾，趁直奉战争之机，联奉反吴，命

赵杰率宏威军进攻驻扎在郑州的直军，但被冯玉祥部打败，撤军至中牟，又逃往山东。老洋人“实恨军阀跋扈，思有以重创之”，^③没有跟着赵杰逃跑，率宏威军散兵共300多人，于6月20日打下扶沟县城，经许昌、襄城，回到宝丰县木中营、杨旗营一带进行休整，准备西进陕西，并提出口号：所到之地，不要银钱，不拉票。

7月12日，老洋人率众经鲁山、下汤、栾川、卢氏，直扑陕州（今陕县）。守备陕州的丁保成率部缴械投降。丁保成曾充任灵宝县巡缉队副领官，老洋人与他相识，便留他充任参谋长。老洋人继续率众西进，围攻灵宝，逼近潼关。陕西督军刘镇华即令驻守潼关的憨玉琨部东进救援灵宝。为了避免憨部，老洋人放弃了西进的计划，于月底折向西南，过卢氏攻陷南原，复下商雒，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他联络张得胜（德盛）、李明胜（鸣盛）、任应岐、崔二旦（邦杰）、李老莫、常建福、韦风岐等大小30余股，共约七八千人，被众人称为“老架子”（意为“总架杆”，即首领），声势日炽。

直系军阀吴佩孚为要剿灭老洋人部众，与河南督军冯玉祥制定了一个三路合剿的计划，由冯玉祥任总指挥。在冯军围剿下，老洋人率众于10月23日由豫西突围撤往豫东南，号称“建国军”，越鲁山、方城、叶县、舞阳、郾城，27日粉碎了靳云鹗陆军第十四师在京汉线的堵截，28日攻陷上蔡县城。老洋人进上蔡后，部众在四街高喊：“老百姓不要慌，俺们是打富济贫，替天行道！”^④并打开仓房，叫群众取粮拿物，不让空手出城。上蔡的三个大劣绅：百尺镇团总葛培茂、县商会会长姜金鹏和陈海鹏，被斩首示众。29日，老洋人率众

离开上蔡，连陷项城、沈邱、新蔡等县城，直驱皖北重镇阜阳。

阜阳是原安徽督军兼省长倪嗣冲的老家，倪搜括百姓，家财万贯。老洋人早已谋划袭取这个人们心目中的“金窟”。在攻打阜阳前，他预遣一部分人伪装成商贩，身藏武器，混入城内，俾作内应。11月2日晚，老洋人大队人马突至阜阳西门城下。守城士兵稍事抵抗即弃械奔逃，县长陈祖荫被活捉。老洋人破阜阳后，获得了倪家所存子弹200余万发，步枪3000支，机枪13挺，大炮数尊，以及很多金银细软；还劫走阜阳教堂神父意大利人马福波。安徽督理马联甲当令皖北镇守使殷恭先率军二十五营刻日进剿。老洋人见殷兵甚众，放火焚烧阜阳后，于5日拂晓弃城撤回豫境，又连陷息县、正阳、遂平、郾城，拆毁了京汉铁路从明港至信阳之间的铁轨，并架走在息县的美国传教士巴牧林牧师及其子诺尔和正阳伦敦会牧师贺尔门等。每当官兵进剿时，老洋人就将这些外国人置于前线，使得官兵不敢冒然开枪追击。

老洋人焚烧外国教堂，劫架外国人，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惶恐与干涉。他们威胁北洋政府立即进剿老洋人，营救被掳外人。直鲁豫巡阅使曹錕乃令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为“豫省剿匪总司令”，指挥豫省各军进剿。

老洋人攻陷遂平、郾城后，11月14日在汝南与靳云鹗所部激战六小时之久，势渐不支，遂由上蔡一带向西退却。河南督军张福来派其第二十四师一部，由开封向西华前进，企图与靳云鹗部夹攻老洋人；吴佩孚也加派一团兵力，在豫鄂边境设防堵截；湖北督军萧耀南令湖北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潘守蒸自武胜关率两营进驻长台（属信阳），进行协剿。靳云鹗并发出布告，悬赏缉捕老洋人，谓凡能生擒者，赏洋1万元，击毙者赏洋7000元；如能救出外国人，从优给赏，加官晋级。

针对北洋军的四面围击，老洋人计划退入桐柏山中，再由南阳等处退回豫西。为此，老洋人将所部分为三路：一路由老洋人率领，进至方城、泌阳交界的母猪峡；一路由张得胜率领进入桐柏；一路由李鸣胜率领，退到光山、固始。各路互为犄角，忽东忽西，打乱了军阀们的围剿部署。正当军阀们调兵遣将，重新布署，高叫三个月内“一律肃清”的时候，老洋人已于11月底率众会聚于鲁山、宝丰、郟县一带。

12月初，因洛阳一带已有北洋军重兵扼守，老洋人率众3000余人由鲁山、郟县交界的郭店进入襄城，拟赴黄河北岸河南、直隶交界地区，再图大举。但由于连日来东突西闯，枪械子弹已严重匮乏，只得又退回鲁山东北耿集、朱家店等地进行整编，自称“河南自治军”，老洋人为总司令。并制订了军歌：“枪声镗镗，鼓声汪汪，老天不下雨，百姓去逃荒。枪声隆隆，鼓声通通，督军立大功，百姓血流红。枪声熊熊，鼓声同同，督军三天成富翁，全省百姓个个穷。”^⑤

12月下旬，吴佩孚、靳云鹗、胡景翼、张福来为了迅速将老洋人消灭在豫西，决定采用“总攻、分击、外围、内捣”之策。靳云鹗率其第十四师，配备飞机、大炮、骑兵、工兵，直捣鲁山、宝丰、郟县老洋人所据之地。到郟县后，由于老洋人扣押着7个外国人，靳云鹗怕攻之过急会伤害了外国人，就一面对老洋人进行恫吓，一面进行诱降。老洋人为

了保存实力，派人向靳表示愿意投诚。双方经过几天磋商后议定：“（一）老洋人一股投诚，愿受改编；（二）改编之始，老洋人先将所掳外人释放，以示诚意；（三）双方约定各不相侵，不得无故放枪，以免误会；（四）由靳氏改编老洋人部众为十二营，一律先发一月粮米及全副军装，以示诚意；（五）改编后暂由老洋人、张得胜两人统带；（六）由靳氏酌给枪械，以便戴罪图功；（七）由靳氏代向曹、吴两使、张督理请求准所部改过自新，编为正式军队。”^[1]随后，老洋人释放了外国人，靳云鹗将老洋人所部改编为河南游击第一、二支队，由老洋人任第一支队长，张得胜任第二支队长，仍驻宝丰、郾县一带。靳云鹗还将两个支队中营长以上人员全部易名，以“国”字排列，老洋人改名张国信，张得胜改名张国威。

老洋人接受改编后，靳云鹗长期不给发饷。老洋人以“就地筹饷”为辞，积极扩充武装力量，收缴附近各县团防枪械，向地主官绅筹粮派饷，再度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恐慌。吴佩孚在当地官绅“恳求移防”的呼吁下，以“赴豫东就餐”为借口，令老洋人部离开鲁、宝、郾地区。

1923年4、5月间，老洋人部由豫西移防豫东鹿邑、柘城、宁陵、永城、夏邑等县。老洋人率部到豫东后，释囚犯，筹军械，并联络苏、鲁、豫、皖边农民武装和绿林组织，“约期大举”。这不仅使当地豪绅惶惶不可终日；纷纷逃避，就是苏、皖等省的达官贵人，也感到极大的威胁，因而多次联电吴佩孚、张福来，请其“亟商良策，弥患无形”。^[2]

10月，吴佩孚想用调虎离山的手段，令老洋人南下援川，使其在军阀混战中被消灭。老洋人藉口饷械缺乏，部下蛮横

难驯，抗不听命。吴佩孚恐老洋人被奉系或皖系军阀所运动，成为肘腋之患，便秘密计划调集苏、鲁、豫、皖、陕五省军力4万人将其包围解决。但因事机不密，被老洋人预先侦知，乃率其部于10月17、18、19日由永城、夏邑、宁陵、柘城、鹿邑分两支越京汉路突围回到豫西，活跃在宝丰、鲁山、南阳一带山中，声势复炽。

老洋人再起，使北洋政府和军阀大为不安。贿选总统曹锟电令河南督军张福来速将老洋人“限期捕获，以绝根除”。吴佩孚、靳云鹗、张福来等也深感“不先行剿灭”，“难免燎原”，遂决定集中全力镇压。11月1日，张福来出驻许昌，亲自指挥各军进剿。老洋人派其部下姜明玉率2000余人向西北突围，借以牵制敌人兵力；自己率4000余人，谋向豫南进入鄂边。从11月4日起，经叶县、方城、南阳、泌阳，于11月14日进入豫鄂交界的湖阳镇。因受鄂军阻击，经桐柏入泌阳的母猪峡，联合当地民军，其势骤张。接着，西出唐河，经新野、邓县、内乡，于11月23日夜攻陷淅川县的李官桥，直驱荆紫关。因鄂军布防严密，又改向郧阳（郧县），拟由此进入四川，投靠四川反直派的熊炳琦、但懋辛。28日，老洋人所部被鄂军截回。陕军张治公、贾济川、吴新田也派大军在商雒山设防。老洋人部被围困在陕边龙驹寨一带山中，周旋多日，未能摆脱北洋军围击，于是树起“河南救国军”的大旗，决定第二次回击鄂边，以图扰乱直系的援川军后路而冲入川省。

12月26日夜，老洋人率众攻陷湖北重镇枣阳，焚烧县署，释放囚徒，并枪伤美国传教士贺福夫妇，架走女传教士

吉伦，再次引起帝国主义的震惊。

老洋人虽然攻下了枣阳，但因鄂、陕、豫各路北军前堵后剿，苦战连日，人倦马乏，已成了强弩之末，遂决计重回豫西恃险图存。豫南镇守使马志敏率军跟踪追击，豫西镇守使丁香玲严密设防，老洋人连战多败，部下逃跑甚众。1924年1月初，老洋人率残部200余人退到郟县西北的老爷岭。北军层层包围，猛烈攻击。9日，老洋人在激战中饮弹身亡^⑧。

注：

- ① 临汝县文化馆：《关于老洋人的史料》（未刊稿），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藏。
- ② 关于老洋人的绰号，还有一种说法：有一次他听到别人说洋人厉害，就气愤地说：“我比洋人更厉害，我是洋人的老子！”人们遂称其为“老洋人”。
- ③ 《民国日报》1922年2月10日。
- ④ 上蔡县政协：《关于老洋人攻占上蔡史料》（未刊稿），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藏。
- ⑤ 《晨报》1923年2月4日。
- ⑥ 《大公报》（长沙）1922年12月29日。
- ⑦ 《晨报》1923年5月25日。
- ⑧ 《大公报》（长沙）1924年1月20日。关于老洋人的死，当时有的说系被其部下丁保成所杀，又有的说老洋人见大势已去，自缢而死。此据追剿老洋人的南阳镇守使马志敏真（11日）电。

主要参考资料：

刘恺慈、施景伯、王慕韶、宝丰文化馆、枣阳文化馆：《老洋人拉杆片断》（未刊稿），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藏。

褚民谊

黄美真 张 云

褚民谊，原名明遗，字重行，浙江吴兴人。1884年（清光绪十年）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父亲褚吉田是当地名医，教子甚严，令其幼年时读四书五经，受儒家思想熏陶。1898年，又让他到苏州天赐庄传习医院向美国人柏乐文学习英语。1900年，褚回乡入浔经公学，开始阅读中西文学书籍，并接触数理化等科学知识通俗读物。

1903年，褚民谊东渡日本求学。先入高中，后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开阔了视野。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是热血青年，他们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表示强烈不满，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怀着极大的义愤。褚民谊受排满思潮影响，也参加过留学生中间的某些政治活动。

1906年，褚民谊随同乡张静江去法国，途经新加坡时，由同盟会会员尤列、陈楚楠介绍，参加了同盟会。抵法国巴黎后，即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一起创办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世界画报》等刊物，出版各种小册子，“鼓吹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主张民族解放、教育平等、思想自由”，^①宣传反满思想。

武昌起义爆发后，11月初上海亦告光复，褚民谊回国到上海。经黄兴介绍，他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后由汪、陈

两人作媒，与陈璧君母亲的养女陈舜贞结婚。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褚民谊赴南京任职。仅3个月，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落入袁世凯之手。已经十分松散的同盟会亟谋健全和扩大组织，以与一时纷起的党团争逐，于1912年4月24日在上海成立总机关部，5月4日改名“同盟会本部驻沪机关部”，^②举姚勇忱、吕天民为正副部长，褚民谊为总务长。但是同盟会的组织继续涣散，8月又与4个小政党合并改组而为国民党。许多革命党人表示消沉，褚民谊也不例外。同年9月，他再次赴欧，求读于比京自由大学，重过学校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褚民谊离开欧洲，经地中海抵达槟榔屿，“橐笔报界，致力于实际革命工作”。^③这时，国内政局更加动荡，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日益暴露，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懑。1915年春，褚民谊随张静江回国，在上海参予“倒袁”活动。9月褚三度赴欧，在法国与蔡元培、汪精卫等组织“华法教育会”，办理华侨及留法学生诸公益事。期间褚信仰无政府主义，宣传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学说。1920年，与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任该校副校长。同年，进斯特拉斯堡大学学医，专攻组织学。1924年，以“兔阴期变论”毕业论文，得医学博士学位。

其时，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蓬勃发展。1924年底褚民谊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并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

1926年1月，褚民谊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嗣后递升为执行委员。同年7月，国

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褚民谊于10月辞去广东大学及广东医学院所兼各职，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军医处处长，留广州负责后方医务。11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在粤的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北迁，先后取道湘、赣前往武汉。褚民谊随第二批出发，与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国民党中央常会代理主席张静江等人于12月底到达南昌。这时蒋介石欲以南昌为都，将他们截留在南昌。不久，褚民谊乘蒋介石派他前往北京苏俄大使馆交涉“驱逐鲍罗廷”的机会跑到上海，但他没有北上，直接前往武汉，参与“迎汪复职”活动。

1927年4月初，汪精卫回国，经上海去武汉。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另立政府，宁汉公开分裂。褚民谊追随汪精卫，参加武汉政府的反蒋活动。同年8月蒋介石下野，促成宁汉合流。9月，褚民谊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并被推为特别委员会候补委员。汪精卫因未能掌握到主要权力，出走九江，策动唐生智另组武汉政治分会；又南下赴粤联合张发奎与李济深、黄绍竑争夺广东地盘。汪精卫的这些活动遭到国民党内各方责难，处境孤立，不得不于年底出国赴欧。追随汪精卫的褚民谊则跑到上海，任上海中法工业专门学校校长。

褚民谊为了保持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此后很少与汪精卫公开联系。1928年2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党部，褚民谊仍列名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被派往欧洲考察卫生事宜，先后访问了瑞士、德、法、比等国，在各大大学讲演国民党历史及国民党政府之政策。归国

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卫生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教育部大学委员会委员。1929年3月，褚民谊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后任中比庚款委员会中国委员长、上海医师公会执行监察委员等职。在国民党内争的年代里，褚民谊表面上不偏不倚，声称“本党同志对于反共之主张已渐趋于一致”，因此“在理宜互相团结，无复异议”，“虽政见各有不同，意志容有参差，要当顾全党德，遵守党纪，不宜各逞意志，互走极端，致失友谊，而分党力”。^④但实际上，他与汪精卫同坐一条板凳，与汪精卫、陈公博等人反对蒋介石“专制统治”和“军阀主义”的主张相呼应，提出“政策统一、权限分明、分工合作、实事求是”，要求“武装同志本佳兵不祥之遗训，而止戈为武，实行化兵为工政策”，^⑤为汪精卫重新上台制造舆论。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各派势力在“共赴国难”的幌子下，实行暂时的“和平统一”，形成所谓“蒋汪合作”的政治局面。1932年1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联袂入京”，汪任行政院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褚民谊应汪精卫之邀，担任行政院秘书长，1934年又兼任国民党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后，他曾以较多的精力从事所谓“国术”的研究，改组“中华国术协会”，创办《大众健康杂志》，主张“国术”科学化、民众化，提倡踢毽子、放风筝，并改传统的太极拳为太极操。他指斥那些轻视踢毽子、放风筝，而注重于足球、游泳等活动的人实为“炎黄之胄，甘为臣仆，而不知耻”，是“大背礼教”的。^⑥1934年国民党政府正式定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的官方纪念日，褚民谊对此有极浓的兴趣，亲

赴山东曲阜主持纪念活动，竭力宣扬孔孟之道。

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受伤，辞行政院长职，出国治疗。褚民谊也同时辞职，后来在上海任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法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主要从事于文化教育。

1937年11月10日上海沦陷前夕，褚民谊由南京返上海，因中法国立工学院事，未随国民政府西撤。次年7、8月间，曾两次赴汉、渝，对汪精卫通过高宗武与日本接洽“和平”事未曾与闻。12月汪精卫逃出重庆，于29日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褚民谊为了表明“清白”，于1939年春，召集中法国立工学院师生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并于上海各大报刊登启事“声明一切，盖犹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表示对汪的“和平运动”，“绝无参加之意向”。^①

1939年5月上旬，汪精卫潜赴上海，即秘密召见褚民谊。经汪的“启发”、“诱导”，褚决定参加“和平运动”，甘心情愿去当汉奸。由于褚民谊在国民党内原来就享有较高的地位，同时又与汪精卫有亲戚关系，因而落水后，就成了汪伪汉奸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同年8月底，汪精卫一伙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褚任大会主席团副主席，并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党部秘书长。褚于9月6日发表对重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劝降电，对蒋介石改变十年内战期间所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表示“痛苦”，鼓吹抗战不能持久，“长此相持，国不成国，民无噍类”，因此“当和则和”。他美化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无领土野心，不割地、不赔款，不妨害吾之独立自由，是吾人抗战之目的已达”。要重

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毅然决然，打开僵局，从速结束战事。依据近卫之所声明，以为直接谈判之基础”。“推派代表来沪，共商国事。”^⑧一派汉奸论调，不以为耻。

此后，褚民谊卖力效忠汪精卫，积极筹组傀儡政府。1940年1月下旬，汪精卫在上海组织还都筹备委员会，褚民谊任委员长，负“筹备还都”之责，到南京“着手修葺府院会各部、各衙门”。^⑨3月30日，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褚民谊副之，并兼任伪外交部部长。

褚民谊走马上任后所办的第一件事，即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对日广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表示“感谢”，要中日两国“扫除过去之误解与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各出赤诚，共成其事”，^⑩建设东亚新秩序。

同年7月，汪日“调整国交”谈判在南京举行，褚民谊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谈判。11月30日，汪日双方签订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及《中日满共同宣言》，汪政权获得日本的公开承认，日本则从汪政权那里获得了在沦陷区内所想获得的一切。为了掩盖卖国罪行，12月10日，汪伪召开“庆祝大会”，褚民谊代表汪精卫发表演说，声称日汪条约的签订，“扫除过去纷扰之原因，确立将来亲善之关系”。^⑪接着，褚民谊被派为驻日大使，其行政院副院长职位由周佛海兼任，外交部长则由徐良代替。褚赴日后不仅为实施《基本关系条约》，谋取汪日间的“根本协调”，还四出奔走联络，先后与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签订条约，取得这些国家对伪政权的承认。

1941年10月，褚民谊回国复任外交部长，继续秉承汪精

卫意旨，为日本侵略战争政策效劳。12月8日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挑起太平洋战争，伪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宣布对于与日交战的各国外交官、领事官今后概不承认其职务之执行。翌年5月下旬褚任访日特使，将汪伪“与日本同甘共苦”、“争取最后胜利之决心，传达于日本皇室”。^②1943年初，汪伪政府发表对英美《宣战布告》，褚民谊声明“我们和友邦日本处于同生共死的同一命运之中，我们决定齐奋步伐，携手迈进，争取我们共同的胜利”。^③同年10月，褚民谊又参与《中日同盟条约》的签订。期间，褚民谊还兼任伪中日文化协会理事长、中德文化协会名誉理事长等职，为日本和德国法西斯扩大侵略战争摇旗呐喊。褚的所作所为，深获日本军国主义欢心，日本天皇特赠褚民谊一等旭日大绶章一枚。

褚民谊为汪伪政权中所谓“公馆派”老人，一切听命于汪精卫夫妇指挥。1944年11月汪死后，陈公博任代主席，褚民谊认为凡事不使之预闻，让他跑龙套，毫无意义，要求辞职。后经周佛海等人从中斡旋，才同意暂留南京。1945年7月，褚民谊秉承陈璧君意旨，辞去外交部长职，去广州任伪广东省省长兼保安司令和广州绥靖主任，企图加强对广东的控制，作垂死挣扎。

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褚民谊梦想逃脱对他的惩处，立即向蒋介石大献殷勤，表示“负责治安”，并积极组织“警备司令部”，亲兼司令，“严令各师长、各县长，各守本位”，等待蒋介石“派员接收”^④。10月14日，褚民谊在广州被国民党军统局诱捕。次年4月经国民党江苏最高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行，判处褚民谊死刑，

同年8月23日在苏州狮子口监狱刑场处决。

注：

- ① 萧瑜：《褚民谊博士传略》（1929年7月20日）。
- ② 《民立报》1912年5月5日、6日第10页。
- ③ 同①。
- ④ 褚民谊：《北伐以来之回顾与希望》（1928年11月）。
- ⑤ 同④。
- ⑥ 吴稚晖：《国术源流考》序文（1936年5月）。
- ⑦ 《褚民谊自述》（1945年11月11日）。
- ⑧ 褚民谊：《致重庆中央执监委员电》（1939年9月5日）。
- ⑨ 褚民谊：《对于苏高院检察官起诉书之答辩》。
- ⑩ 褚民谊：《对日广播》（1940年5月4日）。
- ⑪ 《中华日报》1940年12月11日。
- ⑫ 《中华日报》1942年5月30日。
- ⑬ 《中华日报》1943年1月12日。
- ⑭ 同⑦。

孙 殿 英

熊尚厚 邢汉三

孙殿英，字魁元，河南永城人，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生。其父孙玉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后因口角而杀人，被囚死狱中。孙殿英7岁入塾，后因与同学斗殴受到老师责罚，竟放火烧了塾馆，被开除出塾，随母亲在乡里乞讨度日。

孙殿英自幼游手好闲，顽劣成性，成年后和地痞流氓厮混，出入赌窟，逐渐成为当地著名的赌棍。他精习赌博的骗人伎俩，诡计多端，每赌必赢。其后他以赌博所得，从事鸦片贩卖，北去河南商邱，南走安徽亳县，远至洛阳、西安，大发横财；同时浪荡江湖，广结军警胥吏。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孙在豫西投土匪队伍张治公部下，又在洛阳加入了“庙会道”，不久成了庙会道的头目。^①他领着会道门分子，勾结土匪，过着打家劫舍的强盗生涯，同时继续在洛阳一带大肆贩毒。1922年，直系首领吴佩孚在洛阳缉拿毒犯，孙无法立足，乃逃往陕县，投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下任副官。他继续制造海洛因、红丸贩卖于晋南、豫西一带，还买了几十支枪，招兵买马，拉起一支队伍，被丁香玲委为机枪连连长，次年升为补充营营长。

1924年秋，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败退，孙殿英率

部在陕县哗变，重操抢劫旧业，并收编散兵游勇和零星杆匪，扩充至三四千人。他借口筹集军饷，攻城掠寨，抢劫商民，数月之中，临汝、鲁山、郟县、宝丰诸县皆被掳掠。不久，孙受镇嵩军憨玉琨招抚，初任代理团长，不久即升为第五混成旅旅长，驻防密县。

1925年3月，憨玉琨部在豫西被国民二军胡景翼部击败，孙殿英改投国民三军叶荃部，任旅长；不久升任第二师师长。同年秋，国民三军西调入陕，孙即脱离国民军，率部在伏牛山一带流窜，并收编朱锡川等土匪队伍，壮大声势。这时，孙谋投吴佩孚被拒，乃率部越过京汉路东窜，在亳县大事抢掠后，投奔山东张宗昌，在褚玉璞部任第五师师长。是年底，孙师在津浦线桑园一带袭击国民三军徐永昌部，翌年夏又参加南口战役，攻打国民军。孙上阵督战，敢冒危险，受到张宗昌、褚玉璞的嘉奖，成为直鲁联军中的一名悍将。孙部编为直鲁联军第二十五师。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湘、鄂、赣、闽次第光复，继向豫、皖、浙、苏推进。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援助孙传芳，孙殿英部被调至安徽阜阳、太和地区。翌年春，孙被任命为直鲁联军第十四军军长兼大名镇守使，驻防大名，抵抗国民革命军北上。5月，奉调南下曹县扼守。7月，孙传芳、张宗昌利用宁汉对峙之机反攻徐州，调孙殿英部去豫北。孙率部于10月中旬攻占汤阴、临漳，11月又占卫辉、彰德、淇县。1928年初被冯玉祥部第三路军孙连仲击败，退往河北。5月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力图死守津浦线，调孙殿英到交河至河间一带。但奉军和直鲁联军阻挡不住蒋介石联合冯玉

祥、阎锡山等军的北进，全线败退。孙殿英率部先退至天津南仓，继退集蓟县、遵化马兰峪一带。6月奉军撤回关外后，张宗昌、孙传芳等部先后逃离天津。孙殿英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孙仍任军长。

孙殿英率部驻马兰峪一带，临近清东陵。7月上旬，他以“军事演习”作掩护，自带少数亲信，悍然炸开慈禧太后和乾隆帝的陵墓，盗走大量珍宝文物。孙盗墓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各地报刊纷纷揭载，要求惩办。^②但孙拿出一部分珍宝赠送权要，得到了平津王成总司令阎锡山等人的庇护，国民党最高当局亦不予深究，最后仅以“警戒失职”之名，调动防地移往延庆了事。

同年11月，第六军团缩编为师，第十二军编为步兵独立第二旅，孙殿英任旅长。旋奉调南下，行至山东齐河时，宣称“自行其是”。1929年初他在章邱收编土匪张明九部，掳掠大批财物。其时，张宗昌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妄图东山再起，纠合鲁军余孽在烟台登陆。3月孙殿英率部至黄县、蓬莱，自封为鲁东民军总司令，加入了张宗昌军，参予胶东混战。不久张宗昌败逃去日本，孙于是年冬又向蒋介石输诚，被改编为新编第十八师，移驻河南商邱。^③

孙殿英率部到河南不久，又接受阎锡山允为军长的笼络。1930年春，他赶去太原面谢阎锡山，并与阎部各军长结为盟兄弟。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孙站在冯阎一边，被委任第四方面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孙部开赴豫东、皖北布防，他自率一部进驻亳县。蒋军王均、叶开鑫等部围攻亳县不克，曾派人以20万元收买孙；孙收了一笔巨款，但

未允降蒋。7月，中原战局逆转，孙部在孙连仲部救援下突围，经杞县、朱仙镇退据山西晋城。他在晋城设修械局制造武器，设制造局制造和贩卖海洛因等毒品，设印刷局伪造钞票，竭力扩充实力。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率东北军入关，阎锡山、冯玉祥败北下野。孙殿英立即改换门庭投张。经多次要求，孙部被张学良收编为暂编陆军第二师；1931年7月又改称第四十师，在平汉线与反蒋之石友三军交战。11月，孙升任第四十一军军长。

此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孙殿英表示要抗日，于11月22日通电要求“团结御侮”，“速定出师计划”，“恢复山河”；说“公理公法均不足恃，势非诉诸武力，断难雪此奇耻”，“静待明令宣战，当执戈前驱”^④。由于他的这一表现，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军事力量，派出韩符麟、宣侠父等人前往该军工作，广泛进行抗日爱国宣传，使该军官兵的民族觉悟有了提高。

1933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山海关，热河告急，平津震动。2月下旬孙殿英奉调率部驰援热河，在赤峰以北地区布防，与万福麟、汤玉麟等部共同御敌。孙部由山西晋城北上，经河北转入热西围场、隆化时，万福麟部在朝阳、陵南被击溃，日军直逼赤峰。孙部急行军赶至赤峰，部署未定，即遭日军、伪满蒙军猛烈攻击。在爱国官兵的支持下，孙率部阻击，士兵浴血奋战，与敌相持7昼夜，歼敌四五百人；但因敌众我寡，乃从赤峰转移到猴头沟门新阵地，继续与敌作战10余日。后奉命撤退，绕道北山、大庙返回围场，又转至沽源，退驻察东赤城独石口。孙沿途收编了不少东北军，弥

补了他在热河抗战中损失的实力。他的赤峰一战，获得了全国舆论的好评。^⑤

是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冲破蒋介石的阻挠和破坏，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举起抗日旗帜。蒋介石担心孙殿英加入同盟军，乃委孙以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之职，诱其移军西开。孙踌躇满志，派人去天津大批购买军火，在冀察热等地广招兵马，所部拥有骑兵三师二旅、步兵三师，号称五万之众。7月中旬，孙率部抵包头后，向晋绥各地征收粮秣；并将驻晋城之余部悉数调出与大队汇集。9月，孙率部开发。

孙殿英率部西进，震惊了甘、青、宁诸省的统治者。西北地区久属马家天下，马麟主青海，马鸿逵主宁夏。而蒋介石诱孙西进，本意是借马之刀杀孙，先已密令马鸿逵中途截击孙部；更派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兼靖绥主任，节制三省军务。此时，马鸿逵、马麟、朱绍良先后通电反对孙军西来，并调兵三旅布防磴口，严阵以待。孙率部至五原、临河、陕坝（今杭锦后旗），暂停前进，一面休整、练兵，补充给养，并收编绥西骑匪杨猴小部；一面四出求援，派人分头同汪精卫改组派、陈济棠广东派、福建人民政府、陕西杨虎城以至伪满拉关系。阎锡山担心孙军滞留绥西，危及晋境，许以军械、粮饷，促其早日西去赴任。

1934年1月初，孙殿英率部进入宁夏，与马鸿逵部接火交战。初战甚为得手，一星期内接连攻占石嘴子、五响堡和馒头桥，包围平罗，兵临宁夏县（即今银川市）城下；接着又占领了宁夏城外的两道堤岸。马鸿逵向南京蒋介石、北平

何应钦及甘肃朱绍良告急，朱迅即调兵增援马军，何、蒋先后下令双方停战，孙不肯甘休。此时，孙军好几个将领被马鸿逵收买，1月下旬两次攻城均未能奏效。孙仍将大部兵力集结宁夏城垣附近，但先后四次攻城均不能下，师老兵惫，军心涣散。3月中旬，阎锡山突然出兵晋绥，截击孙的后路；何应钦更是指挥五省兵力进剿。孙殿英败退绥西，饷糈不继，内外交困，一筹莫展，于3月23日通电离军，被迫交出所部3万余人由胡宗南、阎锡山等“整编”，自己被阎锡山软禁在太原晋祠。5月，何应钦给他一个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高等顾问的虚衔。两年后，孙到平、津向各方活动，后经宋哲元提携，于1936年6月被委为察北保安司令。

“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在北平设立抗日民军总司令部，任孙殿英为冀北民军司令。7月28日宋哲元撤往保定，北平失陷，孙殿英在房山收容散兵及平津流亡学生，迅即集合人枪3000余，加以编练。他赶去南京见蒋介石，被委为冀察游击司令。嗣后日本侵略军沿平汉线南下，孙率队南撤，继续收编散兵游勇，发展实力。他利用地形伏击尾追之日军，将所获之战利品及生俘之5名日军解送给蒋介石邀功领赏。1938年孙部退驻河南林县一带活动，继与日本侵略军有数次作战。孙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隶属庞炳勋第二十四集团军。此后三四年间，他纵横捭阖，竭力保存实力，表面上孙仍为抗日部队，甚至派人与八路军取得联系，暗地里却与日伪势力密切勾结。

1943年春，日本侵略军对太行山发动“大扫荡”，进犯林县、陵川，孙殿英部在林县被围。孙被俘，投降了日军，并

派人带领日军至莲花山洞引庞炳勋降日。孙降日后，被日伪编为伪新五军，任军长；后又被扩编为第四方面军，所部各师均扩编成军。孙并兼伪豫北保安司令。他利用职权，重操贩卖毒品勾当，并倒卖金银，武装走私，获取暴利。抗战胜利前夕，孙又与蒋介石派出的熊斌等人挂上了钩，奉命进行所谓“曲线救国”活动。^①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蒋介石为了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于11日广播任命10名汉奸分任各路军总指挥，孙殿英被任命为新编第四路军总指挥。孙立即派人买通一记者编发新闻，诈称孙将星夜北上维持平津治安；随即去电并派人联络伪华北财务总署督办兼伪联合银行总裁汪时璟。汪答应提供饷给，先后交出伪联币一亿元。孙派人拿了这笔钱在北平抢购黄金珠宝，转手倒卖，大发横财，并以此贿赂国民党军政要员。

蒋介石于1946年7月发动全面内战后，孙殿英被任命为第三纵队司令官，隶属胡宗南部，屡向解放区进犯，兵员被歼甚多。1947年4月，人民解放军进攻汤阴，孙率部顽固据守。解放军炮火轰开县城东北，孙在缺口处仍负隅顽抗，以猛烈炮火反扑。后夺路逃出，在石庄被围，5月2日被俘。同年冬，孙在狱中病死。

注：

① 张和宜。苏勋丞口述，张知人整理：《我所知道的孙殿英》，《河南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

②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盗陵案内幕复杂》，《国闻周报》第5卷32

期。

- ③ 张述孔：《流氓军阀孙殿英》，《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49页。
- ④ 陈觉：《国难痛史》第3卷第4节。
- ⑤ 温仲良辑：《东北战区视察记汇编》第51—61页。
- ⑥ 王健民：《熊斌宣抚华北概略》，台湾《传记文学》第13卷第3期。

郝 鹏 举

三家鼎

郝鹏举，幼名勉，字腾霄，河南阌乡县城郝家巷（今属灵宝县）人。1903年1月29日（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一）出生于县公署衙门一个衙役家庭。其父郝福嗜吸鸦片，家境穷蹙。郝鹏举8岁母丧后即流浪、乞讨，作过学塾杂役，继投华山学道。后得同乡帮助，进阌乡高等小学卒業。又到洛阳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至毕业。

1922年5月冯玉祥任河南督军，大批扩军，郝鹏举投入冯部，在学兵团第二营炮兵连当学兵。是年秋，冯调任陆军检阅使，由河南移驻北京南苑练兵。学兵团因成员都有文化，备受冯的重视。冯见郝鹏举身材短小干练、聪明机警、刻苦操练，甚为赏识，乃选拔其充传令员，随侍左右。1925年1月，冯任西北边防督办，为培养初级军官，创办西北军干部学校于张家口，郝被入选该校受训，任学员第一大队长。同年夏，苏联政府派遣军事顾问援助冯部西北军，冯选派基层军官24名赴苏学习军事，郝列名其中。11月，郝被分配入基辅红军各兵种混成干部学校第一期炮科。郝学习成绩优异，但心存升官发财欲望，政治上抵制学校的革命教育，嫉视同学接受马列主义。1927年夏毕业归国后，仍回西北军，被任命为第二集团军独立炮兵团团长，驻开封，暂归第二十五师（师

长张自忠)指挥。1928年春,国民党军继续北伐,郝部转战河南,北上进抵北京。5月,升任第二集团军第二军参谋长。郝居功自傲,目空一切,为西北军同僚所侧目。

1929年春,蒋介石讨伐冯玉祥,西北军主力西撤,韩复榘叛冯投蒋。郝鹏举见形势动荡,难断鹿死谁手,遂脱离部队,赋闲郑州。他经营澡堂,兼营旅馆业,甚至不惜道德沦丧,去豫西灾区骗买良家少女卖淫。此时郝吃喝嫖赌无恶不作。1930春,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发动反蒋,中原大战爆发,郝见反蒋联军声势浩大,曾欲再投旧部,但自感无颜见冯,暂守未动。及至10月,冯、阎联军失败,梁冠英部投降蒋介石,被编为第二十五路军,驻守苏北淮阴“剿共”。郝鹏举凭借昔日部属关系,乘时钻进梁部,任独立第一旅旅长,旋调任第二十五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他与黄埔同学会头目、留苏同学贺衷寒勾搭,加入复兴社,为蒋介石搜集、提供军内情报。他有恃无恐,常擅违军纪,不听梁的劝阻,竟至无理殴打一个老中医,因拒不认错,被梁革职。后由贺衷寒荐介,去湖北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参议。1933年8月15日,蒋介石任郝鹏举为三十军参谋长。1934年3月兼任该军第三十师副师长、代理师长。1936年春,郝受何应钦、贺衷寒派遣,携款秘密赴合肥第二十五路军总部,暗中诱惑梁冠英部旅、团长迫梁下台或要求脱离梁部。梁察觉后,5月赴南京向蒋告发郝鹏举,并呈请“辞职”。蒋佯示要严办郝,又批梁“辞职照准”,将第二十五路军缩编为第三十二师。^①郝曾极力活动任该师师长,未成,仍回原任。郝目中无人,为所欲为,三十军军长孙连仲感到难为约束,遂保送郝进陆大第十四期受训。

抗战开始后，胡宗南在西安设立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训练政工人员。1938年4月，郝鹏举由贺衷寒引荐，任战干第四团总队长。1939年6月，调任第二十七军参谋长，隶属胡宗南第三十四集团军序列。后因郝散布不满胡的言论，且在私生活上行为不端，被胡扣押。郝买通监押人员潜逃，跑到绥远西部投奔傅作义部，任暂编第五军副军长兼民众动员总指挥，封锁陕甘宁边区，不断进行反共摩擦。其间，郝于1940年3月赴南京与周佛海密商，^②准备伺机投敌。

1941年，郝鹏举公开到南京投靠汪伪政权。他通过留苏同学林柏生，得到陈璧君垂青。7月29日，汪伪行政院任命郝为第一集团军（李长江为总司令）参谋长，驻苏北泰州。9月15日，汪伪军事委员会在泰县设苏北行营，以郝为行营参谋长兼第一集团军参谋长。1942年6月，他积极参与、策划在南通、海门地区的“清乡”运动，摧残这个地区的抗日游击部队。8月11日，调任南京汪伪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教育长，致力训练汉奸军事骨干，叫嚷“坚定一个信仰，结成一条生命，紧跟着团长（指汪精卫）来完成复兴中国保卫东亚的伟大使命”。^③10月，汪伪政权调整战时机构，郝鹏举调任伪军事委员会参赞武官公署武官长。稍后复任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1943年9月2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调派郝鹏举取代郝鹏任苏淮特别区行政长官兼保安司令。当地人民讽之曰：“去郝鹏，来郝鹏（举），何必多此一‘举’”，表达对汪伪黑暗统治的厌恶和不满。11月25日，汪伪军事委员会设驻徐州绥靖主任公署，以郝为主任。

郝鹏举就苏淮行政长官后，于同年冬连续召开行政、治

安、教育等会议，全力确立所谓战时体制，强化行政机构和军警实力，推行“新国民运动”奴化教育，贯彻日、伪卖国协约，实践所谓“大东亚共存共荣”方针不遗余力。

1944年1月，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划分省区案，首设淮海省，任郝鹏举为省长兼驻徐绥靖公署主任。^④他一上台就“整饬吏治”，^⑤继续强化统治机构。又创办《大陆新报》、《淮海月刊》，成立淮海学院、中央青年干部分校等，灌输亲日奴化教育。为建立反共经济基础，他又主持成立淮海省银行，组织开发协会，吸引投资，妄图以此“示范各省，全面对共”。^⑥郝尤着力扩大军事实力，编练伪军，当时拥有第十五、第二十八两师和第七十一和第十二两旅正规部队，同时收容杂牌部队，编为省、县保安队。是年春、夏，郝部不断进扰泗阳、淮阴、睢宁等地新四军，与第三师（黄克诚部）、第四师（彭雪枫部）作战。进扰受挫后，郝诬称抗日根据地“民匪不分”，承认“专赖讨伐”“殊不足取”，提出要用“抚缉流亡”怀柔策略。^⑦郝为巩固其权位，还积极投靠汪伪实力派林柏生，伙同伪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黄自强，在南京秘密组织宣传、情报机构“政治工作局”，搜集、提供苏北地区共产党活动情报，编印反共宣传品，鼓动其部属的反共斗志。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汪伪统治覆灭，郝鹏举转而投靠国民党蒋介石。郝先经黄百韬拉拢，投第三战区顾祝同部。10月，率所部汪伪第七方面军接受第十战区改编为第六路军，仍驻防苏北徐海地区。旋奉蒋介石指令为反共前锋，率部进攻鲁南解放区。12月，郝会同冯治安、陈大庆等部占领

贾庄、韩庄，分三路北犯鲁南。^⑧1946年1月，郝部划归第三绥靖区（设贾区）司令官冯治安指挥，奉令从左翼进出运河，掩护冯部北进。郝深恐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为保存实力而消极避战。时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克侠藉视察郝部之机，劝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郝为形势所迫，1月5日夜访新四军军长陈毅于峄县。9日，郝发表“退出内战、拥护民主”通电，并率所部4个师、1个特务团共2万余人在台儿庄、枣庄地区举行战地起义，更名为“中国民主联盟军”。^⑨郝此举受到中共中央、延安边区政府的欢迎，新四军暨山东军区给予其礼遇和优厚粮饷，旋调郝部移防后方莒县整训。新四军暨山东军区派朱克靖为郝部政治委员，陈毅亲赴莒县慰问、检阅郝部官兵，并向郝提出根据民主自愿原则逐步改造成为人民军队的方针。

郝鹏举起义后，继续视军队为私产和政治投机工具，拒不接受逐步改造的方针。是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后，徐州绥靖公署加紧了对郝的诱降活动。8月，先后派李克昌、李笠雨到郝部策反。郝取两面派态度。他对中共表面应付，连续发表通电、诗文，^⑩佯示不为蒋介石利诱阴谋所动；暗中却勾结蒋方，待机叛变。先是，陈毅已洞察其奸，于6月亲赴莒县晤郝，晓以大义，陈以利害，规劝其坚定民主和进步立场；继而又调遣郝部移防东海赣榆县境，不变其优厚待遇，任其抉择出路。12月，华东解放军司令部以及陈毅多次函电并派员向郝重申“来则欢迎，去则欢送”的民主自愿原则；同时郑重希望其脱离内战战场，勿向解放区进攻以加重人民痛苦。

1947年1月9日，郝鹏举藉起义一周年紀念活动，一面

致电延安毛泽东、朱德，伪善地表示“万分地感激与兴奋”，^①一面加紧其叛变投蒋步伐。他集中军队，准备军需辎重，接走莒县中楼村的眷属等等。他还“邀请”陈毅出席纪念会，企图加以诱捕，陈未赴会，阴谋未逞。1月23日，郝暗中接受国民党鲁南绥靖区司令官兼第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职。26日晚，郝一举诱捕朱克靖及中共联络人员康宁等4人，当夜率部撤往海州城下蒋管区，27日晨发表反共通电，宣称“还军于国”，公开叛变投蒋。29日，郝飞徐州面见陈诚、薛岳，接受“进剿”解放区反共使命，并竭力诬蔑、诽谤解放区党政军民。2月6日，郝鹏举率部向陇海路东段白塔埠、大新集、蒜庄湖地区解放区进攻。华东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第二纵队四、九两旅发起自卫反击，经6日夜和7日全天激战，攻占白塔埠郝的司令部据点，全歼郝部主力，郝鹏举被生俘。13日，郝被押解至临沂河湾村，要求面见陈毅。陈见他后，严词斥责其背信弃义的罪行，说：不料“人之无良心到了这种地步”。^②

1947年4月，蒋介石在发动全面进攻受到挫败后，转而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鲁东南解放区党政机关陆续向渤海区后方转移，郝鹏举被押解随行。夏初某日，撤至小清河某地正欲渡河，遇蒋军飞机轰炸，郝乘机逃遁，被押送警卫人员击毙。

注

① 梁冠英：《二十五路军受蒋介石收编和被消灭的经过》，《文史资料选

辑》第52辑。

- ② 《周佛海日记》。
- ③ 汪伪《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毕业同学录》，1943年。
- ④ 当时淮海省辖徐州市和铜山、东海、邳县、砀山、肖县、睢宁、宿县、淮安、涟水等二十一县。
- ⑤ 汪伪《民国日报》1944年2月22日。
- ⑥ 《淮海省施政概况》，汪伪《民国日报》1944年7月4日。
- ⑦ 《郝鹏举在南京对中外记者的谈话》，汪伪《民国日报》1944年7月25日。
- ⑧ 冯治安，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当时北犯鲁南解放区的除郝部外，尚有冯部五十九军三十八师、陈大庆部一一七师、骑八师、翁文庆纵队等十个师。
- ⑨ 《中国民主联盟军退出内战、拥护民主宣言》，《大众日报》1946年1月14日。同年9月1日，再更名为“华中民主联军”。
- ⑩ 1946年9月5日，郝鹏举发表通电，对中央社关于郝已“率部反正，与共军激战”的广播和传单，表示斥责，并发誓“头可断，血可流。此心如冰洁，此志如玉坚”，决不为高官厚禄而背叛人民。其诗文，见同年9月16日、20日、21日《大众日报》。
- ⑪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郝鹏举事件的教训》，见《大众日报》1947年2月22日。
- ⑫ 张剑：《陈毅将军和郝逆鹏举的谈话》，香港《正报周刊》第27期，1947年2月28日出版。

卢 作 孚

周凝华

卢作孚又名卢思，四川合川县人，1893年4月14日（清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贩卖麻布的小贩家庭。少时就读本县瑞山书院，后因家境困难辍学。15岁时，徒步赴成都入文化初习学校，进修数学、语文和英语，一年后自学。他阅读了一些欧美的社会学说著作和孙中山的著作，结交有进步思想的同学，立志奋斗和爱国恤民的思想初露端倪。

1916年春至1919年5月间，卢作孚经乃兄卢志林举荐，先后就职成都《群报》、《川报》记者兼编辑（两报同属民间报纸）。1919年夏在川报社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是年冬，卢据来往拉萨的商人秦君安口述有关西藏情况，撰写述评《西藏往事的谈话》，在《川报》头版连载，引起人们注目。同时，卢以记者身分参加省议会旁听，在《川报》辟“省议会旁听录”专栏，评议省议会动态，在四川舆论界崭露头角。1920年，川军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尹杨森邀卢任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卢1921年初到泸州应职，并聘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德熙、恽代英及肖楚女等到川南师范学校任教。卢与他们过从甚密，齐心推行五四新文化运动。1922年，川省军阀混战，杨森败退，卢亦去职返重庆。1924年5月，杨森任四川军务督理，聘卢任省教育厅长，卢婉辞不就，改任成都通俗教育

馆馆长。一年后，卢辞退回桑梓合川。

卢作孚见我国经济落后，回合川后，决心弃教经商，开办航运业。与朋辈询谈，颇得支持。他对重庆所有轮船公司现状作了一番调查，于1925年10月11日发起开办航运的筹备会，同窗好友、地方商贾及知名人士共23人到会。卢提出“避实就虚”的方针，说：“办航运应作新的试探和新的试验，不应在原有轮船过剩的航线中去与正在失败的同业竞争，而应经营嘉陵江重庆至合川间新开的航线。”^①卢的主张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商定集股2万元（银元），每股500元，造一适于航行嘉陵江的小轮，经营合川重庆间52里航运。月余，得股资8000元。卢偕黄云龙自筹300元路费携款往上海购船。卢、黄与各船厂研讨两月后，向上海合兴机器厂订购一艘长75尺、宽14尺、深5尺、载重量70吨，吃水浅、专营客运的小轮，造价2万余元。这时，合川电告卢、黄，言募股维艰，勿订造船合同。卢考虑再三，商得厂方同意分期付款后，毅然签署合同。

1926年6月10日，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合川正式成立，公推卢作孚为总经理。8月初，小轮造成，由上海驶回合川，取名“民生”，航行合川重庆间，间日开航。航行3个月，盈利颇丰，股东见有利可图，纷纷认股，不久集足5万元。

一年后，民生公司盈利4万元，股本增至73000元。1928年初再购轮船一艘，取名“民用”。次年10月，与重庆顺庆轮船公司合并，改“顺庆”轮为“民望”轮。卢作孚把3艘轮船的航线作如下调整：“民用”航行渝合（合川）线，“民

生”航行渝涪（涪陵）线，“民望”航行渝叙（宜宾）线。一年后，盈利9万余元，股本增至25万元。

1929年底，卢作孚应刘湘之聘，出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一年，从而巩固了民生公司在川江航线上的地位。

卢作孚为谋求民生公司的发展，针对外商轮航公司船多势强、压迫我国商轮航运的现状，向川江上的我国轮船公司提出“集中财力人力以维持华商航业之生存”的“化零为整”要求，^②并言明“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增加资本，接受必须售卖的轮船，或合并可以并于民生的公司”。^③其方式可以是购买，亦可折价入股，职员量才录用。自1930年10月合并福川轮船公司起始，至1934年7月先后有23家华商轮船公司并入民生公司，接收和收买轮船25艘。至此，民生公司基本统并了川江上的华商轮船公司，拥有轮船31艘，总吨位超过万吨，职工增加到2000人，股本增加到117万元。

民生公司随着船只的逐年增多，航线亦由短航向长航发展。1931年春开航渝宜（宜昌）线，1932年6月开航渝汉（汉口）线，不久开航渝宁（南京）、渝申（上海）线；又相继成立万县、宜昌分公司及汉口、上海、沙市等办事处，各埠口之趸船、仓库、货栈亦同期建成。

民生公司的崛起，引起在华外国轮船公司的惊恐，外商视民生为其牟取暴利的威胁，企图以雄厚资本加以压垮。1934年，航行川江的外商轮船公司较大者有17家，实力最强者有日本日清、英商太古、怡和、美商捷江、法商聚福等公司。民生公司由于在内部废除了封建买办式的经营管理方式，建立了一套适合自身特点的“民生制度”；能依恃本土社会环境，

适应航运市场的需求；地方及中央政权某种程度的支持，以及卢作孚经营有方；更由于民生公司顺应了全国人民要求收回长江航运主权的历史潮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因而民生公司非但未被实力强大的外轮公司挤垮，反而有所发展。1936年，民生公司轮船增加到48艘，职工增加到3800余人，股本增至160万元，资产扩充到1000万元。竞争最激烈的1934年盈利40万元，1935年盈利44万元。相反，各外商轮船公司却受到不同程度打击，意商光耀公司竞争失败，其“光华”轮被民生公司收买；美商捷江公司1935年倒闭，其轮船亦被民生公司收买。英商太古、怡和等公司，也先后被迫退出川江。至抗战爆发前夕，民生公司已成川江航运主力，卢作孚维护川江航权的理想初步实现。

卢作孚在致力发展航业的同时，还创办了与航业发展配套的民生机器厂、三峡织布厂，投资合营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重庆公共汽车公司，捐资开发重庆北碚乡村建设实验区，兴办中国西部科学院、北碚地方医院、北碚图书馆、北碚温泉公园、兼善中学等诸多文化教育事业。由于卢创办实业的魄力和才干，1935年秋被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任命为省建设厅长。卢任职两年后，坚辞而去。

卢作孚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就主张武装反抗日军入侵，并把他1930年考察东北三省的见闻写成《东北游记》一书，公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1933年重庆各界召开纪念“九一八”血耻日两周年大会，卢在会上义正辞严地痛斥日本侵华罪行，并提出“中国船不装外国货，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中国甲级船员不任

用外国人，均由中国人担任”的主张，且率先在民生公司实行。^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卢作孚积极动员民生公司职工参加抗战。他说：“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②8月，民生公司调配大小船只30余艘，两周内运送4个师2个旅川军赴抗战前线。9月，卢就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同年底，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后，卢出任政府资源、工矿、贸易三委员会联合运输办事处主任，负责调配长江一切公私船只，转运长江中下游入川物资和人员。卢带领民生公司职工，不分昼夜，全力抢运。1938年10月武汉失守，20余万吨待运进川的物资和10余万人员滞留宜昌，急待中转四川。卢坐镇宜昌亲自调度指挥，并在川江采用“三段航行”和夜航来增加运力，40余日内将主要物资和人员基本运完。为此，卢受国民政府嘉奖。

1940年夏，卢作孚兼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其主要精力仍倾注民生公司之航业。他采用多种手段扩展民生公司实业，扼制官僚资本控制。这时，民生公司航线虽囿于川江及其支流，但运输量却有增无减，1945年年客运量由1938年之80万人增为500万人（不含兵运），年货运量由14万吨增为17万吨。民生公司的轮船由战前的48艘增到116艘，投资业由战前的18家扩展到56家，经营项目有矿产、冶金、机电、机械、建材、纺织、金融、贸易、保险、木材及新闻出版，资本由战前的355万元扩充到1944年的8000万元（银元）。

抗战后期，卢作孚为在长江航运获得优势并发展东南亚

海运，想从外资找出路，频繁地与欧美国家外交和实业界人士接触。1944年11月，卢作为民营交通界代表应邀出席纽约国际通商会议。会后，卢接踵拜访美国政府及实业、金融界上层人士，寻求贷款。次年春卢访问加拿大，在原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仑将军推荐和安排下，会见了加拿大议会两院领袖及政府总理、财政部长等，加财政部、商业部同意安排三家银行向民生公司贷款在加造船，但要双方政府出面担保。卢向国民党政府申请“担保”，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拖搁一年有余。卢急切之中两次面见蒋介石陈述理由，才取得同意。1946年10月，卢再度赴加拿大签订贷款造船合同，由该国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自治领银行共同贷款1275万加拿大元，分别由该国戴维造船公司、圣劳顿斯机械造船公司建造5000马力新型客货轮3艘和2400马力新型客货轮6艘。由于加方以材料涨价为由一再提出加价，迫使民生公司加付现钞150万美元。后来，由于加方延宕交船期限和我国国内战局变化，这些船舶皆未投入航运。

卢作孚为加速开办海运，1946年成立民生公司上海总经理办公处，亲自坐镇上海，运筹指挥。是年8月，修葺一新的“民众”轮首航上海至台湾成功，为民生公司发展史之新起点。同年底及次年春，由卢任董事长的太平洋轮船公司（民生公司、金城银行各出资50万元兴办）三艘“海”字号海轮亦先后开航上海至天津、青岛及上海至广州、香港。1948年4月，民生公司“南海”轮自香港首航日本成功。1949年初，该公司从美国购买轮船5艘，经改装为货轮后，开航东南亚诸国，成为远东航业界一支崭露头角的新军。至此，卢

早期设想的民生公司“由川江向长江、由长江向沿海、由沿海向东南亚和日本发展”的航业规划终于实现。^②此时，民生公司拥有江、海客货轮 117 艘，职工万人，创我国近代民族航业之魁。

1949 年 10 月广州解放后，卢作孚寓居香港。这时，台湾当局曾派俞鸿钧、叶公超等人游说卢去台，均遭卢婉言相拒。人民政府先后派许涤新、张铁生等人与卢联系。卢在港经过千方百计的努力，终于使民生公司 20 余艘轮船没有被台湾当局破坏或劫持，他积极做好率船回来的准备。1950 年 1 月，周恩来电邀卢回北京共商国家建设大计。卢于 1 月中旬顺利回到北京，出席了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民生公司滞留在港的 20 余艘江海轮和物资以及价值 2000 万美元的财产，全部返回大陆。民生公司所欠加拿大贷款，均由人民政府还结一清。

卢作孚在新中国除继续担任民生公司总经理外，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2 年 2 月 8 日，卢作孚因病于重庆去世。

卢一生写有不少文章，编集成册的有《东北游记》、《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国的建设与人的训练》。

注：

①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第 7 页，民生公司 1946 年版。

② 王余杞：《民生实业公司》，《交通杂志》1934 年 2 卷 6 期。

③ 同①，第 17 页。

④ 《关于九一八纪念大会函件记录和决议案》，《新世界》杂志 1933 年第 31

期。

- ⑤ 卢作孚：《民生实业公司如何为抗战服务》，《新世界》杂志 1944 年 5 月号。
- ⑥ 王世均：《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造船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 33 辑第 291 页。

李 烛 尘

熊尚厚

李烛尘原名华搢，湖南永顺县人，1882年9月16日（清光绪八年八月初五）生。其父在县城开旅店，乡间略有田产。李烛尘生长在农村，从小受乡村私塾的教育，12岁曾到县城，得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非常感叹。15岁去县城参加童子试时，购得《盛世危言》一书，读后产生了“出乡窥见世情”^①的念头，想去大城市见见世面。但父母不愿他远离家乡，只好仍在家乡读四书五经，20岁考中了秀才。

1902年，李烛尘在岳父及妻子的支持下，放弃旧学，去县城读书。翌年春，考入常德湘西优级师范学校理化科，在校加入湘江学会，与林祖涵（即林伯渠）等结识，受到一些新思想的影响。1909年，他在湘西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出游北京，继而转往天津，乘轮去上海。沿途所见所闻，深感帝国主义野蛮侵略是国家衰败之最大祸根，心里无限感伤，曾写下《在渤海湾中》一诗，抒发忧思。辛亥革命爆发，李烛尘非常高兴。1912年初，他留学日本。在东京补习功课，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称工业大学）预科，一年后升入本科电化专业。

1918年，李烛尘毕业回国，经大连至北京，寄住湖南地方会馆谋求职业。他怀着“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理

想，将其在日本考察盐碱工业的所获，写成旅游日记向北京《盐政杂志》投稿。该刊主办人景本白对李甚为赏识，遂向天津久大盐业公司主持人范旭东推荐。

1918年8月，李烛尘入久大盐业公司任技师，他安装了第一部发电机，使久大开始用电力生产。当时，范旭东正着手经营永利碱厂，派他去四川考察井盐，寻找生产氯化钾的原料。1919年春，他在自流井、五通桥、南充等地作了历时大半年的实地考察，受到范旭东的赞赏，1920年即被任命为永利碱厂经营部部长，之后又任厂长。1921年他又前往内蒙伊克昭盟等地探查天然的苍海碱资源，回厂后向范旭东建议创办一个专门的化工研究机构，开展对盐碱的研究。范采纳了他的建议，遂设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李烛尘长于管理，知人善任，深得范旭东的信赖，自1924年起，永利、久大两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人事任用等内部事务，都由他主管。当时永利碱厂仍在试验制碱阶段，资金、设备、技术等各方面困难重重。李烛尘肩负重任，兢兢业业，从不懈怠。他竭力改善职工生活福利，改进食堂，兴建宿舍，设置医院，以及兴办补习学校和子弟小学等，鼓励职工各守其职，共同支持对苏尔维法的试验。为了培养技术人才，他和永利化学技师陈调甫去各地职业学校和高中招收人才，开设艺徒班培养技工。当时一些盐滩的恶势力依仗军阀、官僚的支持，经常制造事端向永利、久大取闹，李从容应付，机智周旋，消除了不少纷争，维护了企业的权益。

1931年4月，李烛尘与津沽化工界人士沈舜卿等一行6人前往日本，参观东京第三次化工博览会，同时在一些化工

厂进行考察，学习其经营管理经验，回国后曾在天津《大公报》连续发表考察报告，以推动我国化工事业的发展。1934年3月，永利、久大、黄海等单位合组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范旭东赠股5000元给他，使他当选为公司董事，11月升任公司副经理，对永利公司的全面经营管理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其后，范旭东和侯德榜为了兴建永利硫酸铔厂，主要精力用于南京，津沽地区则由李烛尘负责。李不顾日本侵略势力加紧侵略华北的恶劣环境，应付各种困难。1937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将向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局势日益显露，李奉范旭东之命入川考察，在四川选定自流井、五通桥建厂，以备日后内迁。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平、津迅速沦陷。永利公司决定津沽地区各厂首先内迁，绝不日为生产化工原料。李烛尘任永利公司内迁总负责人，他除调度一切可运物资、设备迅速内迁外，并将公司300余名技术人员撤往武汉，自己则仍留天津处理善后。是年底，日本侵略者提出“合作”，他不畏日人的恫吓，坚决拒绝，毅然于1938年初离津去川。3月，他在重庆设立了永利、久大公司华西办事处，妥善安排两公司来川人员及家属，随后在自贡市张家坝建立久大制盐厂。由于卤水原料不足，他组织开凿卤井，在自流井为久大建立起华西新的基地。接着，还推动黄海化工研究社对“枝条架晒卤法”进行科学研究，扩大受晒面积；又设计一种“塔炉”，充分发挥燃料的热力。他积极推进这些川盐生产设备的改革，对于久大的发展，对于有千百年历史的川盐复兴，都作出了贡献。

1942年10月，李烛尘参加西北工业考察团由重庆去兰州，经青海湖、河西走廊前往新疆等地考察。嗣后著有《西北历程》一书，叙述考察经过。

李烛尘性格刚直，敢于直言。他对重庆政府将盐实行垄断式的专卖深为不满，谓“军阀政府能免盐税20余年，但战时政府却改行专卖，这可谓盐政史上的倒行逆施”，^②对国民党统治腐败无能，不顾民间疾苦的行径甚为愤慨。由于他热心公益，仗义直言，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成立时，即被推举为理事长；并任中国工业协进会总会常务理事、迁川工厂联合会监事；此外还是许涤新、沙千里等创办的中国经济事业促进会对外出面的负责人。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他更多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积极团结工商界爱国人士。抗战胜利前夕，他提倡“国农民工论”，主张战后由政府推进农业的发展，将工业交给民营，替广大的工商界人士讲话。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酝酿重庆谈判，李烛尘在《大公报》撰文欢迎毛泽东亲临重庆。9月，毛泽东在重庆桂园举行招待会，对范旭东和李烛尘等创办永利公司在化学工业方面的贡献予以赞扬，使他受到鼓舞，更加激发了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的热忱。当时，国民党接收大员四处抢夺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李烛尘十分气愤，要求当局将中纺公司全部转卖给民营，“分别标售，听任民主选择”。^③12月，他参与民主建国会发起活动，任该会常务理事。

1946年1月，李烛尘以工商界代表在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参加施政纲领组。他向会议正式提出了“国农民工论”主张，要求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组织“最高经济指导

委员会”，推动全国经济事业的发展，作到工业由民间经营，农业由政府帮助发展，实行二五减租，使得耕者有其田，人民安居乐业。他指出：现在收复区的工厂都被政府当局拿去了，而把一些破烂厂子标卖给民营，这是大事放着不做，专与人民争小利，^③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以及对国民党统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不满。政协代表在沧白堂举行讲演会，他再次阐述了这些主张。政协会议讨论修政“宪法草案”时，他说：“中国较多的企业是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真正的民族资本很微弱，对她应是扶植而不是节制。”^④希望尊重并扶持民族资本，不必将“节制资本”一语笼统订入宪法。在闭幕会议上，他还提出了请求政府撤销硝石和硫磺管制的要求，指出硝磺管制“实不啻将重要原料全部封禁”，“致使一般化工无从发展，其关系实在太”。^⑤此案被载入会议议案的附件中，使他曾一时产生过错觉，感到满意。他在重庆文化艺术团体招待政协代表的谈话会上，听到洪深、曹靖华等人悲愤地控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独裁专政的暴行时，深受感动，难过得流出了眼泪，当即表示工商界与文化界一样，也要争取基本人权。^⑥对于国民党特务公开制造“沧白堂事件”等恐怖行动，更是气愤。当冯玉祥、沈钧儒等人发起人民自由保障会时，他积极参加，出任发起人会议主席。^⑦2月下旬，李烛尘离开重庆返回天津，任中国工业协会平津分会理事长。

李烛尘回到天津后，一如既往，悉心经营永利、久大。自永利公司总经理范旭东于1945年10月去世后，他任公司副总经理，全力支持和协助总经理侯德榜。他不仅急谋久大、永利生产的恢复，更致力于继承范旭东生前提出的“建设十大

化工厂”的计划，争取实现范旭东与美国进出口银行所订1600万美元的贷款合同，以谋发展永利公司的事业。

1946年夏，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国内和平遭到破坏。6月下旬，李烛尘在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计划委员会的会上呼吁说：“目前当务之急，首在全国人民齐心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停止内战，才是解除目前经济危机的唯一出路。”并指出“国内经济面临总崩溃，物价狂涨，生产缩减，外货涌入，政府不但熟视无睹，且在欢迎、奖励，实在是大错特错。”^⑨面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李烛尘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代表人物，为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同年8月，他组织天津工业界前往南京请愿，向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要求组织外货统销机关、保障工厂主权完整、改订关税、由国家银行给民营工业贷款、发起大规模提倡国货运动等，竭力为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争取一些有利条件。翌年6月，他与杨天受、朱继圣等组织天津经济调查所，任该所评议会主席。他又组织天津工商金融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当时，美国收购粗盐输往日本扶植日本碱业，对我国化学工业构成极大威胁，为此他主张中国的盐除本国自用外，所余者宁肯倒在大海也不能卖给美国输往日本，并要求将日本的部分碱厂作为战争赔偿拨给中国。1948年1月，他以平津工业协会理事长名义致电蒋介石，要求恢复工矿贷款和押汇以救济工商业；还组成华北工商请愿团往南京，要求奖励出口、增加棉粮生产、开放粮食运输、增加南粮北运和开放工贷等，以救济北方工业。他反对征收法人财产税，7月向立法院表示：这是袒护家门，摧残实业的行径；并在上海发表《为反对征收法人财产税敬

告立法院同人书》，指出：国民党政府对工矿事业法人征收种种税金即为取卵，现又征收法人财产税，实不啻剥此生卵之鸡的肉，鸡萎卵竭，其势必至。8月，他强烈反对蒋介石“偏枯北方”工业的反动政策，要求规定禁止输出物资的品种，放宽管制，简化机构，主张城乡物资交流，由地方拟定具体办法，促进工商交流。为此，他联合北方部分立法委员举行记者招待会，又组织经济座谈会，奔走呼吁数十次，对平津工商界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⑩

由于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所局限，李烛尘还不能抵制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重压力，识破他们的各种花招。在1946年8月蒋介石于庐山发表“八一三”文告，声称将擅自召开国民大会时，他始初坚持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原则表示反对，但在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下，后来也不敢抗持到底，被迫接受任国大代表，只是借故不出席会议。1948年夏，他出任立法委员。在全国反美扶日运动中，他虽然内心对蒋不满，但处于彷徨苦闷之下，也感到无可如何。由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陷入全面崩溃之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摧残日益加紧，全国民主爱国运动不断高涨，他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能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满怀信心迎接解放。曾在《海王》旬刊赋诗道：“水面常被风生浪，天朗时为云覆晴。众口铄金金不毁，是非终局必分明。”^⑪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李烛尘协同侯德榜大力整顿永利公司，努力恢复生产。4月，刘少奇去天津对工商界发表重要讲话，并和他作了三次长谈，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

舞。9月，他任天津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代表工商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先后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食品工业部部长、第一轻工业部部长；同时任民主建国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9月久大公司公私合营，他任总经理。1955年1月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他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常委，第四届副主席。

1968年10月7日，李烛尘病逝于北京。

注：

- ① 《海王》旬刊第8期（1934年11月）第161页。
- ② 徐盈：《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李烛尘传》，中华书局1948年版。
- ③ 社会问题研究会编：《民主建国会》第25—26页，1949年版。
- ④ 《划时代的会议——政治协商会议》，桂林时代出版社1946年版。
- ⑤ 同④。
- ⑥ 同②。
- ⑦ 上海《大公报》1946年1月14日。
- ⑧ 上海《中央日报》1946年2月10日。
- ⑨ 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7月8日。
- ⑩ 张帆：《李烛尘生平简记》，《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
- ⑪ 《海王》旬刊1948年（第二十年）第35期第560页。

杨 寿 枬

朱复康

杨寿枬初名寿棫^①，字味云，晚号苓泉居士，江苏无锡县人，1868年10月6日（清同治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生于一个“累代书香”的家庭。祖父杨延俊是道光年间进士，曾任山东肥城等县知县。父杨宗济，诸生，任溧阳县训导。伯父杨宗濂、杨以回、杨宗瀚先后在李鸿章幕府，随军征伐太平军和捻军。杨宗濂历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杨宗瀚曾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总办等职。

杨寿枬6岁起读经书、通鉴，12岁随父读于溧阳学署，14岁学制义和试帖诗^②。但他性好诗古文词。17岁返里应试，以第一名入泮。1890年被伯父杨宗濂召往直隶通州道署，教其子杨寿楣读书。1891年杨寿枬应顺天乡试，中举人，三应会试未中式，遂灰心科举，专治史学，尤致力于财政一门，曾取《九通》内的钱币、赋税、盐法、漕运各门，提要钩玄，分类纂录，积成数巨册。

1897年，杨宗濂署山西臬台，杨寿枬在其幕府任文案。不久，杨宗濂擢任藩司。当时山西巡抚胡蘄生颇注意新政，在省设武备学堂、商务局，办纺织厂等，皆与杨宗濂商定委办。杨寿枬主稿所有奏摺、函牍，为胡蘄生激赏，遂延入抚署，主内文案。

1899年杨寿枬南归葬亲。他以资捐内阁中书职，因翌年逢义和团事件，中止北上。其二伯父杨宗瀚在无锡筹办业勤纱厂，乃参与佐理厂务，遂得悉纺织厂经营管理的门径。1901年辛丑条约订立，八国联军退出，杨寿枬入京就内阁中书职。次年为大学士孙家鼐邀入幕府，主章奏。1903年清政府设商部，杨寿枬应商部考试被录取，分补保惠司主事，1905年调补平均司。是年7月清政府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大臣出洋，^⑨考察各国宪政，载泽派杨寿枬为二等参赞随行，于11月初出发，翌年6月返抵上海，7月回京复命。杨奉命督率译员在法华寺翻译有关东西洋各国政治制度的论著，杨任总纂，编纂专书共60余种，咨送宪政编查馆，择其精要者分撰提要，进呈内廷。9月清廷命载泽会同各部院尚书及南北洋大臣厘订立宪官制，由载泽主其事，杨协同编纂。

1907年杨寿枬改补农工商部工务司主事，兼商律馆纂修。是年10月随该部侍郎杨士琦赴南洋各地抚慰华侨，乘海圻、海容两舰历小吕宋、暹罗、爪哇、新加坡诸地，翌年春初回京复命，上“考察南洋各岛华侨商务摺”。旋补工务司员外郎兼公司注册局总办、商标局会办。这时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实行“奖励工艺”的措施，以图振兴全国工商业，颁订了“奖励公司章程”、“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等。这些章程、办法的草拟，大多出自杨寿枬之手。他在农工商部，深为本部堂官^⑩所倚重。

1909年，清廷以载泽为度支部尚书，设财政清理处，杨寿枬为该部丞参兼财政清理处总办，专任清理财政。杨请派

监理官分驻各省监督财政，并令各省造送财政报告，为编制全国岁入、岁出预决算之依据，并拟订6年内清理全国财政办法草案及分年办理程序。清政府财政收支尚无预决算制度，杨寿枬采取欧美各国新法，参以中国旧章，创制全国收支预决算，其有关条例和程式皆手自订定，颇费一番心力。他以为这样就可事权统一，控制全国财政，如网在纲。

1910年杨寿枬被派充崇陵^⑤监修官兼盐政院参事，旋补度支部左参议。他对部务颇有整饬风规、力除积弊之志。如过去户部书吏权甚重，往往上下其手，中饱私肥。杨总办财政清理处时，即对核算、办稿诸事均调部员办理，雇用书吏仅事缮写。杨严明考核，风气为之稍变。

清政府预备立宪，关于改革官制问题，杨寿枬主张仿效日本，设地方议事会，建立立法机构。他曾代度支部提出说帖，后来内阁会议制定官制，即以此为蓝本。他对清政府采取君主立宪的责任内阁制度极为热心，认为“历经欧美各国考察，封建专制已不能适合世界潮流，唯君主立宪犹可系维人心”^⑥。所以奔走甚力，向各方鼓吹呼吁。他与劳乃宣、吴士鉴等数十人组织“宪政实进会”，推陈宝琛为会长，以期促进立宪早日实现。

宣统年间，载沣为摄政王监国，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颀顽无能的亲贵各树党派，纷争甚烈。载泽历赴海外考察，于各国政体略有所知，深为“庆党”^⑦所嫉。杨寿枬为载泽所识拔，故对“庆党”深感不满，常肆抨击。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官吏纷纷请辞出京，而杨仍守本职，每日到部视事，至“逊位”诏下始移居天津。

1912年7月，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以周学熙任财政总长，杨寿枬由杨士琦的荐举任盐政处总办。时张謇上盐务改革条陈，主张废除运商引票制度，撤销定岸引界。当时舆论纷争激烈。袁世凯偏向保守，而对张的建议又觉难于驳斥，乃与杨寿枬商量。杨认为张文言之成理，未宜明予驳斥，不如由财部另拟一个盐务改革计划，以清除盐场积弊为主旨，降低盐价，减轻盐税，与张案一并提交参议院讨论。结果财部所拟被通过，张案乃取消。

9月，杨寿枬被任命为长芦盐运使。他改革盐税征实银法为一条鞭法，改两为元，商民称便。杨整理盐场产业，税率未加，而税收年增200余万元。对财部某些不正当的提款，他敢于顶回去，为部主管所不喜。但因袁世凯认为他筹饷有功，调他为粤海关监督。不数月，又改派为总统府顾问兼财政委员，专任整理旧税事宜。1914年8月改任为山东省财政厅长。该省将军靳云鹏、巡按使蔡儒楷很尊重他，遇有财务问题，都和他商定而行。杨曾电财部请缓办杂税，谓“民间不苦税则之重，而苦税目之繁。请择税收丰富科目简单者踏实举办”。^⑧于是在山东专办验契、田赋、公债三项，结果全省税收较前增加1000多万元，居全国第一。^⑨

1917年2月段祺瑞组阁，任杨寿枬为财政部次长，时总长李经羲因病未到任，由杨代总部务。当时，许多省各自为政，税收往往不解国库。杨寿枬力主量入为出，制订临时预算，提出开源节流之议，核定每月支出经费700万元，以期收支适合。

7月1日张勋复辟，任命杨寿枬为度支部左侍郎，旋命署

理尚书。杨虽有“心怀旧君”之思，但因患病在家，未直接参与复辟丑剧。可是他在事后所写的笔记和杂文，仍认为“张勋此举磊磊落落，功虽未成，亦足为历史上有名人物”，¹⁹不难窥见他的心事。

1919年，杨寿枬被选为参议院议员，并推为财政理事，审核全国预算。又继周学熙之后，任全国棉业督办，订购美棉种籽，分发各省种植，改良棉种；并举办棉业传习所培养纺织人才。1922年秋，江苏省辟无锡为商埠，杨寿枬奉派为无锡商埠局督办。是年冬，内阁改组，任刘思源为财政部总长，杨寿枬复任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署长。1923年4月总税务司英人安格联上整理中国内债说帖，欲以“华府会议”议定的值百抽五所增新关税年约1000余万两，改充“金融”等6项公债基金，实则此项新关税已批准为“九六公债”基金，而安格联企图将新旧关余一手把持。杨寿枬坚决不可，与部员张竞仁著论力辟其谬，安格联联络各报指杨为破坏公债，而杨始终不为所动，结果安格联之议遭到全体内阁会议的反对而未成。²⁰

杨寿枬对北洋政府常恃借债度日，积至后来几占全国岁入的十分之四，深为忧虑。尝谓外国发行公债以补助财政之不足，而中国发行公债则以国库岁收移充抵押，这不啻以财政交给银行，自失平衡调节之权。此时他看到军阀混战时起，对北洋政权感到灰心。从1923年后，他结束了政治生涯，转向实业方面谋求发展。

早在1919年，杨寿枬已被公推为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华新原是袁世凯执政时拟议在北方5省官商合办纱厂所建立起

的唯一一个厂，且因营运资金无着，久未开工。杨主持华新，着力解决了三个重要问题。第一，采用“包工制”的办法，以争取时间加速投产。“包工制”促使承包者挑选熟练工人，费用精打细算。华新从招工到开车，仅花了3个多月即顺利生产。2.5万锭纺机日夜运转，产品销畅，年终盈利150余万元。^⑫次年，一面派员学习，一面训练艺徒，抚循工匠，而将原有包工头渐次淘汰。第二，利用金融资本解决资金问题。华新初期，商股认缴仅50万元，加上财部拨出80万元，资金匮乏。杨筹设大同银号，吸取社会游资，以作纱厂“活本”，利用金融资本来为产业资本争取更大利润，对扩大生产起了活跃作用，第一年纱厂和银号即获巨利，华新同时增招商股200万元，扩大资本。第三，组织资本集团，发挥资本协作。华新获利丰厚后，相继建成青岛、唐山、卫辉三厂，虽资本各自独立，而连成一气，相互协作，又成立兴华资团，取得互相挹注之效。

1927年华新改组，杨寿枬乃退居“专董”。他早岁即以诗文著称，尤擅骈体文，用典贴切，词藻工丽，颇为时人所推重。公余之暇，常和僚属以吟咏唱和为乐。“九一八”后，东北沦陷，他作《秋草》诗四律以寄感，海内诗人争相传诵，和者百余家，辑成《秋草唱和集》。时人称他为“杨秋草”。

1935年后，杨寿枬寓居天津，息影林泉，常与故友结社倡酬，以诗文鸣当世。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北洋旧官僚纷纷参加日伪组织，旧日同僚颇多挽他出山。他拒不接见，不问外事。晚年辑其自撰古文、诗词、笔记和书札，印行者有《云在山房类稿》、《云在山房骈文诗词选》、《云蓬漫录》、

《云蘧书札》等书。

1948年12月7日杨寿枬因肺炎病逝于天津，终年80岁。

注：

- ① 杨寿枬初名杨寿铤，至1894年始改名杨寿枬。见《苓泉居士年谱》。
- ② 制义，即八股文；试帖诗也是清代科举考试的诗。
- ③ 五大臣出洋，原定在1905年8月19日，启程登车时，革命党人埋藏的炸弹爆发，绍英受伤。徐世昌旋改任巡警部尚书。改期另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充任，其余三人照旧。
- ④ 清制，部属称本部尚书、侍郎曰“堂官”。
- ⑤ 崇陵，清光绪帝陵墓名。
- ⑥ 《苓泉居士年谱》。
- ⑦ 奕劻封庆亲王，故称其党羽曰“庆党”。
- ⑧ 《苓泉居士年谱》第20页“乙卯、四十八岁”条。
- ⑨ 杨景燧等《趋庭隅录》记：“民国四年财政部呈明考核各省财政成绩，列山东为第一。”
- ⑩ 据杨寿枬所撰：《张少轩将军文》，载《云在山房类稿》；并见《苓泉居士年谱》。
- ⑪ 《苓泉居士年谱》；又见《云蘧书札·复议员某君书》。
- ⑫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354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薛 明 剑

朱复康

薛明剑初名萼培，后改明剑，亦名民剑。江苏无锡县人，1895年12月8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生。父亲薛华阁，民国初年曾充炮兵第二团军需长，属冷遁部。四弟薛萼果，后改名孙冶方，著名经济学家。

薛明剑6岁入塾读书，13岁改入无锡东林学堂。1911年报考上海复旦中学堂，因家乡水灾，无力负担学费而辍，乃在本乡德馨小学执教，旋升校长。10月武昌起义，不久无锡光复。薛劝乡人破除迷信，倡导焚毁本乡寺庙偶像6处。后投入学生军，开赴镇江等地。

1912年，薛明剑入无锡县立单级师范传习所进修，毕业后改任寨门经正两等小学教员；旋任无锡县立第六高小教员、青城市立十一小学校长等职。1915年被选送去上海入江苏省立体育传习所训练，翌年毕业后，任泰伯市第一小学校长，并被推为县立教育研究会主任。他在这期间热心乡村教育，除担任学校教职外，常组织同事分赴各乡宣传普及教育，开展识字运动。他主张革新教育事业，学生在读书之外还应接受新事物，广泛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他经常举办学生成绩展览，举行学生演讲会，率领学生参观展览会，组织学生春、秋季旅行，倡议组织童子军团，举办全县各校联合运

运动会、文艺观摩会等，颇为地方人士所赞许。

1917年5月，黄炎培等人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薛明剑亦参与活动。他在江苏省教育会学习“职业教育”后，回无锡改就江苏省立女子蚕桑学校教员，又被聘为育蚕试验所事务主任。翌年，薛主持筹建无锡县立公共体育场，10月建成，举办全县联合运动会，受到省教育厅褒奖，并被委为体育场场长。体育场全年经费仅600元，薛四出筹集，添办各种运动器材，并设宣讲、编辑、卫生、阅览四科，竭力宣传提倡体育事业，唤起民众的重视。

1919年，薛明剑参加了无锡商会组织的实业研究会。他在一次会上独抒己见地谈了对振兴实业的看法，受到工业资本家荣德生的赏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忙于战争，我国民族工业获得发展，荣氏所办的茂新、福新面粉厂和申新纺织厂都大获其利，扩展生产。此时，荣正在无锡筹建申新第三纺织厂，遂邀薛担任该厂总管。

申新三厂是抗战前荣氏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厂，拥有纱锭7.5万多枚，布机1600台，职工4000多人。虽然它的开办已在大战结束之后，遭到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市面上花贵纱贱，有些棉纺厂停工减产甚至倒闭，然而申新三厂生产业务仍然正常发展，年有盈余；在危机过去，市场好转的时候，则不断扩展，历年业务蒸蒸日上，在申新各厂中名列前茅。薛明剑在该厂任总管直至1937年，18年间建树甚多。

早期我国纱厂的生产技术，大都依赖外国工程师和工匠，申新三厂的发电机也是通过慎昌洋行向美国订货的，由美国工程师白朗和几个工匠到厂安装。这些人不但工资高，还要

供给最优等的生活待遇，住特备的花园洋房，吃的面包要每天派专人从上海运到无锡，还备汽艇专供他们游览太湖之用。可是他们的技术并不高明，见到电机间房屋已建成，硬说不合规格，需要重建。与之辩论了几句，则蓄意刁难，提出种种条件。结果试车不灵，纺厂势将延迟开工。薛明剑与荣德生商量，决定摆脱外国工匠，另请本国机匠，并访求精通电机的技术人员协助检修，找出毛病，得以顺利发电生产。从此，申新三厂生产技术完全由我国技术人员接替掌握。

申新三厂开工初期，沿袭旧式的工头制管理，全厂机工（技术工人）及生产技术管理权皆操在工头手中，检修保养不及时，工人操作困难，生产效率不高。薛明剑力主改革，取消工头制，录用工程师及新职员来掌握生产技术管理大权；并仿照日商纱厂办法，订立奖惩考核制度，实行科学管理。薛的这些改革，引起工头不满，他们煽动工人阻挠、对抗，酿成殴打、驱逐新职员的风潮。薛明剑不为所动，除严厉处置肇事工头外，对受蒙蔽工人则以谈判说服，风潮遂告平息。申新三厂率先取消工头制，提高了生产效率，同业闻风响应。

1924年9月，直系军阀齐燮元与皖系军阀卢永祥爆发江浙之战，奉军乘机南下，无锡地当沪宁铁路要冲，备受溃军劫掠，职工纷纷迁避四乡。薛明剑留厂与部分工人组织保卫团护厂，日夜轮值，以备不虞。时无锡城被围，电厂停顿，薛受地方公团委托，由申新三厂发电，藉以维护居户照明，有裨社会治安。

1926年，薛明剑东渡日本，考察工厂经营管理，认为举办工人教育和生活福利事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很有好处，归

来建议荣德生拨款筹办。申新三厂1930年成立“劳工自治区”，先办职工医院、消费合作社、女工养成所、职工子弟学校等作试验；以后逐步扩大，先后办单身女工宿舍、工人晨校和夜校、食堂、茶室、剧场、储蓄部、自治法庭以及“尊贤堂”、“功德祠”等等。薛明剑举办这些劳工教育和生活福利设施，其目的原为提高工人劳动生产效率，获取更大的利润；但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工人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些许改善，曾被报纸评为“劳动界仅见之成就”。薛因办理“劳工自治区”颇著成效，被中华职业教育社委任为劳工服务部副部长。

薛明剑办事干练，甚为荣氏器重。1934年上海申新纺织总公司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资金周转困难，几乎搁浅。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乘机提出“整理”方案，企图攫为“国有”。薛衔荣德生之命，利用同乡关系，要求吴稚晖出面反对，并联合各地同业及地方团体通电呼吁，最后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矛盾，申新幸免被吞并。次年，申新七厂因借汇丰银行押款到期，无力偿清，汇丰悍然将价值500万元以上之全部厂房机器，以225万元之低价拍卖给日商丰田纱厂，引起上海各界的震怒。在荣氏一筹莫展之下，薛明剑主张从激发群众爱国心理来反对汇丰这一行径，遂动员组织申新数千职工集会游行，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号召工商界与外商银行断绝往来，并敦促国民党政权予以制止。上海各界也给予声援，报纸连日揭载、谴责汇丰的非法行径。汇丰慑于中国民众力量之可畏，乃解除拍卖，签订押款转期合同，申新七厂赖以保全。

薛明剑在申新三厂任职的同时，以积蓄所得，陆续投资创办了一些化学工业、农业和家庭日用品工业的中小工厂。如大中国实业公司，制造药棉、纱布、羊毛物品和骆驼绒等；允利化学工业公司，生产石灰、砖瓦、纸麻筋等建筑材料，并制造碳酸钙、镁、电石、漂粉等；我华工业社种植除虫菊，制造灭蚊香。他还创立无锡蚕种制造场，自任场长。抗战前夕又与陆费逵等合资组织上海保安实业公司，制造防毒面具及橡皮艇等备战用品。

1935年，薛明剑当选为江苏省国货工厂联合会理事长，曾赴青岛、济南、天津等地参观工厂，便道访冯玉祥于泰山，相互甚为敬慕。1937年8月抗战军兴，冯玉祥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设司令部于无锡，委薛任办事处处长。11月，冯调赴第六战区，又委薛为六战区驻京沪线办事处处长，负责征集10万套军服及各项慰劳品运送前线。

无锡沦陷前夕，薛明剑携带亲属流亡至汉口，再溯江而上至重庆。在渝筹设同心酿造厂制造酱油等，自任经理。又受荣氏委托，兼任由锡迁川之公协、复兴两机器厂经理。该两厂共设分厂6处，代兵工厂制造地雷及迫击炮引心等军火，颇有成绩。薛还与无锡允利化学工业公司部分股东集资10万元，成立允利实业公司，自任总经理，陆续办起了机器、铁工、化工、面粉、碾米、纺纱、营造、锯木等20个工厂。公司及诸厂采取合作经营方式，全体职员和大部分工人都有股分，盈利照分；各厂会计独立，盈亏自负。总公司投资于各厂，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企业。在迁川工厂联合会的产品展览会上，该公司生产的面粉和机械出品共获得超等和特

等奖状6张。当时重庆、桂林等地报刊曾介绍这种特殊经营方式。

薛明剑先于1936年当选为国民大会候补代表，1938年递补为正式代表。1941年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大会上提出了请政府与人民彻底合作，加强团结，改进统制，安定物价等提案。1945年继续被选为第四届参政员。

抗战胜利后，薛明剑回到无锡，先后兴办允福面粉厂、允利米厂、允中冰厂、允丰堆栈、允新锯木厂、允固机器厂、允大化工厂、允友联橡胶厂、允慎粉厂等，职工总数约800人。1946年10月薛并发起组织工业协会，被选为全国工业协会苏南分会第一任理事长。这期间，他又被推选为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立法委员。1948年被推为立法院粮政委员会召集人。

薛明剑对于家乡的改进和建设，颇为热心。1946年以玉祁、礼社等二镇三乡为“自治实验乡”，从教育、实业、水利三方面着手，陆续建立了自治中学、鍾瑞图书馆、文燾大礼堂、火力小电厂、芙蓉圩排水工程等，为当地乡民所称颂。

在从事工业和社会活动之外，薛明剑还经常利用空隙时间去学校教课，先后兼任无锡公益工商中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职。他曾主持出版过多种刊物：抗战前发刊《无锡杂志》，1935年参加出版《上海染纺织周刊》，1938年在重庆编印《江苏乡讯》，1941年担任民主建国会《国讯》发行人，1942年任《复苏月刊》发行人。抗战胜利后，又创“工业通讯社”于无锡。他还编印过有关家庭实用和农村副业的小丛书，如养鸡、养兔、养蛙、养鹌鹑、养鸽、种菰、种竹、种苧麻、

种月季花等。

薛明剑除其四弟孙冶方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外，还有三个女儿参加了新四军或地下党工作。他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对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颇多掩护，对被捕的革命者更多方营救；还曾购运纱布及医药用品送往解放区。1949年1月无锡成立人民公私社团联合会，薛被推为召集人之一，组织各厂护厂队伍，迎接解放。

1949年5月，无锡、上海次第解放。薛明剑应邀到上海协助接收官僚资本工厂事宜。他在上海市工业协会上提出了工商界对新形势应具的正确态度，并对如何解决原料、运输、工资等问题发表了意见。6月，薛与在沪的前国民党立法委员萧觉天、葛敬恩等53人联名发表宣言，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诚心诚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通电系薛起草，发表于全国及海外报刊，影响较大。7月，薛以军属身份至北平、沈阳等地探亲，并晤见董必武等领导人。回锡后被选为无锡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0年薛移居上海，开设允一文具公司，并任衢州勤业蜡纸厂董事。1956年3月起，任上海文史馆馆员，编写和整理了《中国辞典目录提要》、《上海铁业史料》、《黎元洪年谱》等。

1980年4月12日，薛明剑在上海病逝，终年85岁。

主要参考资料

薛明剑：《五五纪年》（1951年油印本）。

《无锡杂志》1946年复刊第1期。

《荣家企业史料》，上海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薛禹言纂：《薛明剑先生事略》（复印本）。

叶 鸿 英

程庸畴 宋紫云

叶鸿英，名逵，福建同安人，1860年5月6日（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六日）生。其父叶丽水在沪经商。叶鸿英7岁时随父母迁居上海，就外傅读书。14岁在其父自营的大昌杂货店学徒。满师后，随父执张尚德赴日本北海道经商，往来于北海道与长崎，采购海味杂货运上海销售。叶学会了日语，熟悉了商情。

1877年，张尚德等集资在长崎开设丰记号，经营海味业，叶鸿英在丰记号任职员，经营有方，深为业主器重。越年，叶协助丰记号在朝鲜的釜山、仁川、元山各埠扩大贸易，进行顺利。

1881年，叶鸿英辞去丰记号职务，回上海开设源润昌行。生意有了进展之后，又往长崎、海参崴组织货源，扩充外贸业务。1889年，叶鸿英筹集巨资，开设源来号，经营进出口业务，直接从日本进口海参、鲍鱼、鱼翅、干贝、虾米、海带等商品批发给“行家”（小型批发商），并经营出口木材、棉花、海蜇、金针、木耳等商品。叶从日本大批进货时，由上海的日本银行开出信用证，对方凭信用证办理货物出口并结算货款，有时是对方开来押汇，货到付款。当时进口商品的利润可高达100%，出口商品的利润也有50%左右，源来号

生意越做越大，资财越积越多。1895年，叶鸿英周游日本四岛，调查市场情况，在长崎、神户、横滨三地设源来号联号，进一步开展业务。叶发现生粉在长崎销路不畅，但生粉是上海适销的热门货，就通过联号包销长崎一部分的生粉。长崎、神户、横滨华侨甚多，华侨爱吃四川榨菜，叶即通过联号打开了四川榨菜在日本的销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源来号从日本源源进货，由于日元价格不断下跌，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利润。

1923年，叶鸿英在大连开办升源机器油坊。由于就近采购东北大豆，又利用大连港海运销国内外，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1924年叶被北洋政府农商部聘为名誉顾问。

1931年，叶鸿英又在上海开设元兴行，并在香港开设分号，由其长孙叶元和任经理，向南洋群岛开展贸易。开始时专营进口印尼海味，继又进口南洋群岛土特产如栲皮、石花菜、胡椒、生粉、大米、食糖、檀香木等，出口布匹、绢丝等，还兼营南洋华侨来货代销业务，得到了南洋华侨的信赖。

叶鸿英经商起家，拥有巨资，在上海先后投资的工商企业有：申大面粉厂、立大面粉厂、永豫纺织厂、荣大织布厂、永茂轧花厂、华商电气公司、华兴保险公司、华安保险公司、华成保险公司、源裕花行、源丰花行、源盛花行等；投资的金融事业有：通和银行、正利银行、正大银行、正华银行、正义银行、国安信托公司、元大钱庄、福泰钱庄、信康钱庄、泰康钱庄、源安钱庄、明德钱庄、怡丰钱庄、晋德钱庄、瑞元钱庄等多家。

叶鸿英是个热心教育事业和地方公益的人。他曾于1906

年捐助并筹募资金在上海办起私立女子中学，妻苏本清曾在该校执教；1933年，他拨款50万元（约合黄金1万两）成立鸿英教育基金会，以10万元专办乡村教育，以40万元扩充人文图书馆，该图书馆遂改称鸿英图书馆。是年9月，鸿英教育基金会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代办鸿英师资训练所，于次年秋筹设沪郊乡村教育实验区，开办4所鸿英小学，兼办民众学校，便于学龄儿童及失学成年人都能受到教育。他对于水旱赈灾、地方公益等，或自捐资财，或劝募巨资，甚为热心，曾被推举为旧上海城厢总工程师局议董、上海县总商会会董、公断处评议、泉漳会馆董事、东洋杂货业董事，以及红十字会、济生会、仁济堂、贫儿院、残废院、公立医院、广益中医院、南洋慈善会等慈善团体的董事。

1937年2月17日叶鸿英病逝于上海，终年78岁。

主要参考资料：

闽南同安《叶氏支谱》。

《上海县志》。

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资料选辑》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出版。

《服务与学习》第27期，中国民主建国会1982年编印。

《人文月刊》第4卷第10期，人文图书馆1933年发行。

访问叶鸿英之长孙叶元和谈话纪录。

马 应 彪

熊尚厚

马应彪，1864年（清同治三年）生，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他父亲在家乡靠种田和捕鱼为生，家境贫困。马应彪少年时与其弟马焕彪跟随乡亲远渡重洋，前往澳洲雪梨（今译悉尼）谋生，初时在果菜店当杂工。后来自己设摊，做水果蔬菜杂货买卖，数年间获利颇厚。

1891年，马应彪扩大营业与人合股开设永生公司，3年间在经营方面增长了许多知识。他见西欧来的侨商开设大型百货公司，职工数以千计，营业发达，遂决心回国如法炮制。1894年回到香港，开设永昌泰金山庄，经销进出口货物。那时，香港和内地的商店仅售两三种商品，沿袭旧习讨价还价，于买卖双方都十分不便。马乃倡议创办以“不二价”相号召之百货商店，经过多方联络，说服许多友人，卒得澳洲华侨蔡兴、马永烁、郭标、马祖容，美洲华侨林敏良、郑干生及香港的李月林、王庆昌、黄在朝等人赞助，集资本25000元组成股份公司，在香港皇后大道购置铺面。为使顾客确信其买卖“完全公平”、“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马提议取《中庸》的“君子诚之为贵”之意，定英文 Sincere（诚笃）之中文译音“先施”为商店的名称。马应彪被推为正司理（即经理）、李月林任副司理。1900年1月8日，香港先施百货公司

正式开业，有职工 25 人，是为我国华商创办的第一家近代化百货公司。

马应彪在香港创办的先施公司，在我国和远东最先树起了西方资本主义大型商业的模式。它力图扫除我国商人历代相传讨价买卖的旧习，实行买卖不二价；首倡以妇女任营业员；又因马应彪为基督教徒，职工亦参加礼拜，故星期日停业休息。由于种种革新办法均属首创，开办伊始即毁誉参半。部分股东提出非议，谓星期日休业徒耗时日，录用女营业员有伤风化。是年 8 月又遭台风，公司二、三楼被吹塌。多数股东主张歇业，马力主革新，坚持开办，说服众股东不要中途折伙。翌年，先施公司榜标的“不二价”逐渐取得信誉，“明码实价”为广大顾客所欢迎，营业额日增，盈利渐丰，遂取得众股东的信赖，仍由马应彪主管营业。他重建铺面，扩大规模，于 1904 年再加改革，除营业员取消妇女全用男子外，还在公司内先后设立德育部、智育部、惠爱会等，培养和训练职工，提高其经营和服务水平，使营业更有起色。年终股东分得一笔股息，遂再无歇业之议。此后营业更加发达，年终除分股息外，至 1907 年尚有盈余 9 万元。嗣后，马应彪提议将先施公司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获众股东赞同，马被推举为公司正监督兼司理。

1909 年 2 月，先施公司向香港当局注册，资本额增至港币 22 万元。马应彪勇于开拓，又于香港德辅道与康乐道通联处之四层楼设置货场，规模宏大。初以其地处新区，商店寥寥无几，电车初设，行人稀疏。有人颇为担心，但马认为新区发展前途很大。不一年间，附近大商店纷纷崛起，游人日

夜熙攘，马遂将先施之门面更加装璜，货物陈列璀璨夺目，数年间获利倍增。

当马应彪着手改组先施公司的同时，即计划筹办广州分行。1910年经董事会决议，在广州长堤大马路购地六亩建筑五层大楼，集资港币40万元。1912年大楼建成，6月正式营业，以马祖金为首任司理。除经营环球百货外，更在楼顶辟有先施游乐场，设茶室、酒菜部、照相部、理发室、电影院及剧场等，供游人和顾客玩耍。1914年再增设设备华丽的东亚大酒店，附设酒吧、餐厅。此外，为了广辟货源和降低商品成本，又先后兴办了化妆品、汽水、皮革、制鞋、饼干等10个工厂，工人逾千；并于市区设立支店两所。广州分行资本扩大至120万元，正式向香港当局注册，获利颇厚。

接着，马应彪等筹谋在全国最发达的大商埠上海开办大型百货公司，乃于1914年集港币60万元，仍向香港当局注册，沿用先施之名在上海闹市区南京路择地十余亩，建造五层大楼（当时上海楼房最高仅三层）。次年。因建筑工程浩大，又增资至120万元；及1917年10月公司开业时，更增至200万元。董事会举马应彪任董事长兼监督，由黄焕南任司理。上海先施公司继续坚持“不二价”，以“始创不二价，统办环球货”为广告招徕顾客；并且仿效广州，除有规模宏大的百货商场外，也在楼顶辟“先施乐团”供人游乐；还附设东亚旅店、东亚酒楼。为了自制有特色的商品，赚取更多的利润，又设立工厂，所出产品不仅有中西家具、儿童玩具、保险柜等，且有车床、钻床，还承包修建工程，有职工300余人。上海先施公司后来居上，营业状况优于港、粤，亦为当时上海和

全国百货公司之冠。英商在上海开办的两家最大的百货商店惠罗公司、福利公司顿即被挫，降成第二流商店。其后虽有新新、大新、永安等公司异军突起，但先施一直跻身于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列。

马应彪在向广州、上海扩展业务时，对于港行的经营和扩充仍十分尽力。1913年港行资本增加到80万元，于香港德辅道通连永和道、康乐道地区，又建筑六层大楼为新址。1916年再增资本至200万元。1917年1月新厦落成，门面宏丽，货场宽敞，中西货品陈设缤纷，屋顶亦辟有天台乐园，设酒菜、茶点和演唱、杂耍供人取乐，顾客如云，为港岛游乐场地之一。

先施拥有港、粤、沪三大公司，规模之大为国内首屈一指。但三行仅为联号，其财权、人事均各自独立，殊感窒碍。1918年，马应彪倡议三行统一，得沪、粤两地董事同意，三方开股东大会决定共同成立先施总行。资本额为港币700万元，以香港为总行，设董事会领导全公司业务，沪、粤两地为分行，各设参事会辅助经营业务。翌年1月16日，总行正式成立，马应彪任总监督，陈少霞为总司理。先施公司统一后，资本雄厚，事权统一，金融互通，人才调用，货物联合采办，商品合一疏销，营业更臻发达。至1927年，即拥有职员2000，工人数千。

马应彪主持先施公司，在扩大经销中西百货商品的同时，还先后创办化妆品制造业、保险业及银行业，以扩展其经营范围。先是1915年5月，马提议港、粤、沪三公司各投资40万元，筹办先施保险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向香港当局注册，专

营水火保险、股份产业买卖及汇兑业务，举蔡兴为总司理。7月开业后，营业发达，遂相继在天津、上海、广州、石岐、江门、梧州、福州、汉口及新加坡、暹罗（泰国）、越南等地设分公司。1921年，马应彪与汤信、蔡兴等发起创立香港国民商业储蓄银行，资本额为港币200万元，后增至500万元，马任董事兼监督。1922年春，马应彪等以先施粤行化妆品厂为基础，于香港设立化妆品制造总厂，生产花露水、生发油、雪花膏及牙粉等产品。1926年该厂资本额增至130万元，改组为独立公司，相继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汉口、长沙、九江、南昌、重庆、奉天、哈尔滨及新加坡、吉隆坡、柔佛、檳城等地设庄，有代理店数百家，于上海设制造分厂，成为我国民族资本化妆品制造业之巨擘。1922年11月，马应彪又与董事会商定，投资港币200万元，创设先施人寿保险公司，以林瑞书为总司理。因系新兴事业，一时无人问津，马等以“储蓄保寿”为号召，营业渐有进展，3年间营业范围扩大，先后在上海、天津、广州、石岐设分局，于南京、南昌、九江、宁波、汕头、江门、澳门、福州、汉口、济南等地设代理处；并在海外华侨中广为宣传，使其有效保险额增至800万元。

马应彪创办和经营先施成功，成为国内及海外华侨中的著名商业资本家。他热心教育事业，曾任岭南大学、世光女校等校董。他与社会名流时相过从，1921年参加竞选香山县县长，结果难以与吴铁城匹敌而落选。

马应彪在先施公司有极高声誉，因其年近花甲，所任总监督一职于1921年交蔡兴接任，在1921年至1927年间任总公司名誉总监督。1928年，马为了重振因“沙基惨案”受英

帝封锁而使港、粤两行营业萎缩之局面，再次出任总监督。他将公司盈余所积，除照常派发股息及红利外，另加派红股，每10股分派3股，再由股东加认新股9000股，翌年使总公司资本额增至港币1000万元。1930年再次扩建总行。1931年于香港增设总务局，聘蔡兴、马永烁、郑千生、王国璇为顾问，推行其营业新计划。如开设“一元货商店”，将残次和积压商品廉价搭配成价值一元一包，任顾客选购；又如举办国货展览、时装表演、教育展览等，为港地别开生面。马还对先施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及人事大加改革；在营业方面则扩大招徕，因之业务蒸蒸日上，有效保险额超过2000万元。1932年又于澳门筹建先施分行及东亚酒店，兴建八层大楼，为濠江最大的百货店和餐馆，于1935年9月建成开幕。澳行除经营百货、餐馆外，还兼营银业、信托、保险、人寿联保等业，盛极一时。

正当马应彪重振先施卓有成效之际，香港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余波的影响发生金融风潮，市面挤兑，银根吃紧。先施银业信托公司首受冲击，1935年9月香港国民商业储蓄银行一度停业；香港总行及澳门分行随遭袭击，营业萧条。此次风潮使先施公司营业损失甚巨，其后虽得英商汇丰银行借款暂渡难关，马应彪重振营业的愿望则因之夭折。1936年，他再次辞去总监督职，仍任名誉总监督，退休养老。

1944年7月15日，马应彪病逝于香港，终年80岁。

主要参考资料：

《商界名人传——马应彪先生》，上海《商业杂志》1927年第2卷5号。

《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25年版。

《一九七五年香港先施公司钻石纪念册》1975年版。

孙碧奇：《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沧桑》，台湾《传记文学》第32卷第6期。

蔡 昌

汪泽仁

蔡昌，1877年11月2日（清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一贫苦农民家庭。父亲耕种打渔为生，生计困顿。兄蔡兴早岁离家去澳洲雪梨（今译悉尼）谋生。蔡昌14岁时随兄至雪梨，在其兄供职的永生行水果档当杂务工。

1899年，蔡兴携带数年所蓄回国探亲，应澳洲归国侨商马应彪之邀，共12人集资2.5万元港币，合伙在香港开设先施百货公司。不久蔡昌回国进香港先施公司当职员。数年后与人合资，在香港开设一家小型百货商店。其时先施公司业务发达，已在广州设分行，蔡兴任该公司董事，交游甚广阔。

1912年，蔡昌在其兄的支持下，向归国华侨等筹得资金港币400万元，赁得香港闹市区德辅道中的狭长铺面，开设大新百货公司，英文取谐音：The Sun，寓意如日上升，并用出云旭日为商标，由蔡昌自任经理。蔡自幼失学，识字不多，但遇事认真，工于心计。每晨4时即起，筹划当天事务。此时德辅道中商店林立，相邻同业先施、永安等近在咫尺。大新以铺面商品陈列整洁，备货充足，给人以面目一新的印象。他亲自掌握进货业务，讲究商品质量，不销残副次品，保证货真价实，因此信誉日著，营业兴盛。1916年设分店于广州

城内惠爱中路，数年后又在广州西堤觅地建造南方大厦，8层高楼，为当时广州最大的百货公司，屋顶辟大新乐园，左邻附设亚洲旅馆，设备齐全。商场开业后，顾客纷至，营业额为同业冠。

蔡昌为了进一步扩展他的事业，继香港、广州之后，谋求在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开设大新公司联号。经数度审慎考虑后，先在沪地设立办庄，遣人来沪初探商情，然后开始着手筹备，于1934年招股集资600万元（其中100万元为广州大新公司先行拨款占股），蔡昌亲自到沪筹划一切。他在闹市中心观测来往行人车辆流量，择定南京路上西藏路至劳合路（今六合路）一片为设店地点。其时此处多系里弄房屋，产权分属数个业主，蔡昌恐业主知情后哄抬地价，乃暗中分头购得，颇费周折，终于买进该处6亩见方的地基，招标营建。正待打桩兴工，不料北邻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出面阻挠，声称该处建造大楼，将危及同乡会大厦。虽几经解释，虞仍执意不允，最后诉之于法。蔡昌通过市长吴铁城的关系，并向租界当局申述设店后可繁荣市面，增加市政财税收入，因而获得支持，终于胜诉，得以施工。历时13个月，新厦落成，建筑费耗资150万元。10层高楼全部用浅黄色瓷砖敷面，外观壮丽。但新厦落成，内部装修费用浩繁，所集股金耗用甚钜，乃商于英商麦加利银行，以新厦作押，陆续获得巨额贷款作为流动资金，购进各类商品，其中进口商品占60%左右。

1936年1月10日大新公司正式开张营业，蔡昌自任主席董事暨总监督，弟蔡慧民任经理，子蔡乃诚任副经理。地下室及一至三楼为百货部，面积达1.7万余平方米，为全国

百货业之冠。商品琳琅满目，摆设新颖整洁。全公司职员八九百人，除少数从粤港调来外，皆系登报招聘及经人介绍而来。营业员服式一律，男的黑色呢制服，职员中山领，部长开口领系领带（夏天白帆布西服）；女的玫瑰色旗袍，食品医药部者外罩白大衣。室内装有冷暖气设备，调节气温；除设有多部电梯供代步外，又从美国沃的斯公司购进电气自动扶梯，为远东第一部。在沪地各大报刊的广告上，以“推销中华国产，搜罗美备；选办环球物品，总汇精华。本公司自建十层大厦，设备电动扶梯，无劳跨步；装置冷暖气管，四时如春”相招徕；尤以电气自动扶梯，引起市民好奇，皆以捷足一试为快。开幕之日，南京路上人山人海，顾客如潮。为了避免拥挤，开幕期间除印发入场请柬外，并发售兑货券，凭券入场，按值兑货。新厦4楼辟为画厅展览室及总办公室。5楼设大新舞厅及大新酒家，供应中西酒菜筵筵。6楼至10楼为大新游乐场及屋顶花园。由于适应了当时租界上寄生性社会畸形发展的需求，大新公司遂跻身于沪上四大环球百货公司，且后来居上，营业额逐步超过比邻之先施及新新公司。此时沪、粤、港三家大新公司会计分开，各计盈亏，而以沪行为主。蔡昌大权独揽，定居沪地，每年往来粤、港多次，进行巡视。

1937年7月抗战军兴，广州南方大厦屡遭敌机轰炸，损失惨重，翌年10月广州沦陷，粤行业务遂告停顿。沪行由于地处租界，形成畸形繁荣局面，蔡昌善于经营，营业蒸蒸日上。又因战时货币贬值，所欠麦加利银行贷款得于1940年一次偿清。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大新

公司被日方派监督官进店监督。日军占领香港后，香港大新公司亦受日本军方的管制。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沪地曾一度出现虚假繁荣景象，大新公司营业兴隆，获利颇丰。此时，全体职工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成立了工会，曾多次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而举行罢工斗争。1945年底开展的“花红息工斗争”，迫使公司发还历年扣发的职工应得花红。1946年起，美国商品源源涌来，充斥国内市场，上海百货商业濒临绝境。此时港行营业则日见好转。1947年，蔡昌携眷定居香港，沪行委托蔡慧民等管理，制定多销货、少进货的方针，逐步将资金抽调至香港。1948年沪行又经国民党政府“限价政策”的变相掠夺，元气大伤，内部空虚。迨至解放前夕，几名资方代理人又先后去港，蔡昌则专注于港行的经营管理，沪行遂形成既无资方、又无资金的局面，由职工组织“企业维持委员会”，维持商店营业。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大新公司职工于1950年2月推派代表赴香港，向蔡昌宣传政府政策，希望他回沪与全体职工共同经营企业。蔡昌表示可予考虑，遂先行电汇上海大新公司港币3万元，但后来由于年老体衰，犹豫不决，终未成行。迨至1953年夏，因病在香港去世。上海大新公司则在国营日用百货公司的委托代销及职工的群策群力下，克服重重困难，至1953年11月经申请核准改为国营上海第一百货商店。

主要参考资料：

唐家俊：《一幢大楼的变迁》，《文汇报》1965年4月2日。

原大新公司职工唐家俊、麦朝宇、卢旷、梁文宇、林树芳等的访问记录。

吴 晋 航

袁嘉新

吴晋航名国琛，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出生于四川仁寿县。原籍浙江，祖父入川定居。父亲吴懋庚任过梁山县沙河铺县丞，清末从事警务。吴晋航以此渊源，于1909年考入四川警务学堂。

辛亥革命后，吴晋航在重庆警察局工作，由巡官、署员、科员而科长，1916年升任重庆警察厅厅长，次年卸职。其后，吴在大邑系军阀陈洪范、刘湘、刘文辉部任职，还任过丰都、梓潼、江安县县长。他在刘文辉部时间较长，与之关系甚深。北伐战争开始后，川军先后易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刘文辉被任为第二十四军军长，吴晋航奉派与张笃伦一道任第二十四军驻汉口代表。1929年间，吴同冷杰生一道任二十四军、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驻南京代表，与戴传贤、张群等交往，又挂上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头衔，为刘文辉联络各方。

1930年间，刘文辉与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各拥重兵10余万，为争霸全川，剑拔弩张。吴晋航及两军部分高级部属主张二刘合作，先安定川局，再于适当时机向云、贵、陕、甘、湘、鄂扩展。吴曾为二刘合作奔走联络。但二刘利害冲突不可调和，终于1932年秋兵戎相见。吴迭电刘文辉，劝其停战议和。刘文辉直到1933年秋败退万源，才由他大哥刘升廷出

面，以亲族情谊请刘湘留点余地。吴晋航衔命去走刘湘的“神仙”军师刘从云的门路，刘湘方允刘文辉回驻雅安。

“二刘之战”后，吴晋航感到自己并无政治资本，决意弃政从商。经反复考虑，认为金融业路子宽，发展较大。1934年初，他与掌握全川财权的第二十一军财务处长刘航琛相商，取得刘的支持，被邀先任川康银行总务主任，以熟悉业务。吴进川康银行工作不到一年，即由主任而升襄理、经理。后因不满于刘航琛恣意提款，与刘失和，1936年离开川康银行。

吴晋航在川康银行工作时，与第二十四军原驻渝代表宁芷村共同发起，约集旧日袍泽，筹组和成钱庄。原拟集资15万元，因入股亲友缺乏信心，不愿多认股额；吴晋航自己宦囊也不充裕，所认2万元股本还是以他成都住宅向川康银行抵借而来。结果只筹集了13.5万元。

和成钱庄于1934年5月开业，因股东多系军政人员，外界不免猜疑，初期业务清淡。然而吴晋航接近地方上层，消息灵通，不久即从吸收机关存款、做申汇、向地方银行领钞（当时地方银行准以四成公债六成现洋十足兑领地方钞，而在市面上公债只以二三折便可收进）等方面推进业务，获得厚利，头年结算盈余10多万元。1937年和成增加资本为60万元，改组为银行，吴晋航任总经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和成于西南各重镇遍设分支行处，以汇兑为重心，大力发展业务。又开办沦陷区汇款，便利后方人员寄钱沦陷区赡养家口。和成附设和益公司，从沦陷区购进纱布等物资运销西南，经营亦颇得手。不十年间，和成跻入川帮银行前列，被目为“后起之秀”。

吴晋航经营和成，一开始便注意物色人才。他认为有无一个主持业务的能手，是关系事业成败的关键。为此，他虚心求教于商界前辈，多方物色，郑重挑选，请来在重庆巨商汤子敬开设的正大永钱庄从事金融业有年的陈诗可。陈勤奋朴实，经营稳慎。陈主内，吴主外，配搭得当，当家得人。

吴晋航经营的和成银行，以稳健著称。在经营中，他注意市场动态，留心时局变化，力避大的风险；在通货贬值时，力求保本保值。同时，他通过投资结交四川畜产公司、民生轮船公司等大型企业；还把积累的百万美金，部分存储于上海商业银行，显示资力，增加资信，在头寸周转上取得有力支持。

吴晋航比较开明，肯用青年。和成职工 700 多名，大约有 80% 是招考来的青年，其中还有不少女青年。经过培训和业务实践，步步提升，分别担任总分支行处经理、副理、襄理、主任等职，人称和成为“青年银行”。吴晋航对青年职员不摆大老板架子，多以老弟相称，同在一个食堂吃饭，常个别交谈。凡写信给他的，他必亲笔作答。青年职工结婚，他亲往道贺，不在一地的，总要照顾关系，调到一处工作。青年职员中的中共地下党员遭遇危难的，他出于对青年的爱护，辄加以营救和掩护。

吴晋航在金融业打开路子后，即向其他方向发展。早在 1936 年初，和成开庄不久，卢作孚出任四川建设厅厅长，筹组四川生丝公司，吴晋航被荐为总经理。何北衡担任董事长的华通公司（后易名华懋公司），亦邀吴任总经理。随着和成银行的发展，对外投资日增，吴还担任了四川畜产公司、民

治毛纺织公司、四川桐油贸易公司、民生轮船公司和《新民报》等企事业的董事长、董事等职。1943年，吴晋航被推为重庆银行业同业公会主席、重庆银钱业放款委员会副主任，已是重庆金融界有影响的人士。

吴晋航雄心勃勃，一心要把和成由一个地方性的金融机构，办成一个全国性的，再进而成为国际性的金融机构。抗战胜利后，他将和成的经营重点移往上海，并于广州、南京、汉口、宜昌等处广设分行。1949年又在香港设立和成分行。数年间，分支行处几遍布南中国通商要地。

1948年，吴晋航同四川美丰银行经理康心如相偕赴美，考察银行业务。其时，和益公司已改组为和彝公司，并在香港、纽约等地设立机构，把业务伸向海外。吴晋航到纽约，便以和彝名义，与美商英科公司签订代售契约，和彝长期存桐油300吨于纽约作保证，英科提供1000吨油价的长期信用券，以便和彝陆续运油去美销售。

吴晋航弃政从商，但并未绝意于政治。抗战初起，他一度出任四川贸易局副局长。抗日战争中民主浪潮兴起，吴晋航受到进步影响。1942年周恩来初会刘文辉，即在吴晋航的住宅。抗战胜利后，民盟总部迁往上海，张澜由川去沪，吴均给予资助。他还接纳张澜在上海和成分行的小院居住。其后，张澜等民盟负责人到香港，他继续给予支持和帮助。1947年他被选上国大代表，参加了国民大会。

1950年元旦，吴晋航从香港启程回北京，途经汉口，得到共产党员赵忍安帮助，进一步明了共产党的政策，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其时，和成各地经理会议于汉口举行，遂决

定将各行内外账目悉向当地人民银行申报。5月，吴晋航向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南汉宸陈述和成业务情况，表明愿为新中国服务的意向。8月，吴被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金融会议。会后，和成银行即申请公私合营，1951年9月参加联营联管，1952年进入金融业全业合营。吴晋航任公私合营和成银行副董事长，同时还任公私合营民生轮船公司副董事长。

吴晋航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民主建国会第一、二届中央常委，晚年参加文史资料撰写工作甚勤。1965年6月15日在北京病逝。

何 北 衡

袁嘉新

何北衡，名恩枢，四川罗江县人，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父何庆联，系光绪年间候补同知，民初任过罗江县团练局长。

何北衡早年就读于绵阳中学堂，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常在四川会馆与同乡聚会，结识了四川军阀刘湘的驻京代表乔毅夫、张斯可，并参加了北京各大学一些川籍学生组织的“诚学会”。1920年他还未毕业，便经乔、张介绍，与北大同学范崇实、陈学池等相继进入刘湘戎幕。1924年又回北大学习一年，毕业后返川，在政界、商界从事活动。

1926年何北衡任巴县知事，并在川东川南团务总监部兼任处长。北伐战争开始后，刘湘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何北衡为该军政治部科长。

1928年刘湘打败杨森，防区扩大到下川东20余县。为加强对川江的控制，刘湘设置川江航务管理处，任命经营航业已见成效的卢作孚为处长，何北衡为副处长。半年后，何北衡升任处长。何主持航务处期间，除查阻他军运输军火外，还迫使以往横行川江的外轮凡进出港口也必须向海关和航务处结关，航务处可派兵到中外轮船上检查，开中国兵登外轮检查之先河。

1936年春，何北衡接任重庆警察局长职，次年又接长四川省建设厅，并兼任省水利局长。1939年交卸建设厅长职。1940年全国粮食管理局成立，卢作孚出任局长，何北衡任副局长。1944年再次出任建设厅长，继续兼任水利局长，直至解放。

何北衡任四川省水利局长之初，往灌县瞻仰李冰太守遗迹，羨其利溥人群，千年永生，于是有志推广李法于全省，普建水利工程。他在西南实业协会发表过《四川水利建设概况及其对工矿业之关系》的专题讲演，主张“建设四川，首在水利”，“四川河流，计百四十，可发电二百万匹马力”，吁请实业界协助建设。为筹集工程费用，他经常去农民银行洽办水利贷款，曾叹说，“农民银行的门槛都被我踏断了”。经多方延揽技术人才，在川西、川北及川东巴县等地先后修堰开渠。他1942年所著《建设四川水利复兴中华民族》一书说：“自民国二十七年迄今，川省采用现代技术，运用大量资金，开辟及改良之自流渠堰30余处，新建堵水坝230处，可灌田土约70万亩。根据此5年之艰苦经验，吾人对现代技术之效用，益具信心，对大量资金之贷放，益感必需。”他提出，为迅速推广水利工程，应准备大批技术人才，筹集大量资金，确立政策，规定制度。他认为：“应引导人类与自然争无穷无尽之利，建设水利，即人类与自然争利之伟大而显著事例。”他主张利用外资外技，曾邀美国农复会的贝克博士一道去川西北参观水利工程。

何北衡与重庆工商经济界的关系颇为密切，有他担任董事长、董事、监察等的官办、商办企业不下数十。他与卢作

孚为莫逆之交，很敬重卢，遇事常以卢居前，而自处于辅助地位。1926年卢创办民生公司，开办重庆至合川轮船客运。航线必经之北碚，居于二十一、二十八两军防区交接之间，土匪出没，航行经常受阻。经何北衡与人奔走联络，促成两军在北碚地区的谅解，设峡防局于北碚，并推荐卢作孚任局长。卢乃组织武装，消除匪患，使航行畅通无阻，同时将北碚建成了风景区。

何北衡在民生公司有投资，并任董事。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书中称何是“始终帮助公司最多的董事”。在民生公司业务发展中，卢每有重大主张，遇有不同意见，何皆尽力调和，助其实现。当民生公司航线伸展到长江下游后，何联络友好，组成由他担任董事长的华懋公司（初名华通），将经营有年在申、汉、宜、万已没有机构的大川通报关行并入，对内称华懋运输部，对外仍用原名，使原为外商日清公司等招揽货运的大川通，从此改为民生公司服务。

何北衡接长四川省建设厅后，即与卢作孚、财政厅长刘航琛支持范崇实从事蚕桑业，将四川省政府投有资金的四川生丝公司改组为四川丝业公司，何任董事长，范崇实任总经理。由于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及农本局等于增资中投入了资本，三行一局的负责人进入了董事会，宋子文当上了常董，大有进而占有丝业公司的趋势；接着张群任董事长的川康兴业公司也大量投入资金，并以母公司自居，准备派人接替总经理职。何北衡、范崇实急谋应付，决定由何北衡让出席位，请张群兼任董事长，范崇实的总经理才得以保留不动。后张

群离川，何北衡又回任董事长。

抗战军兴，需要输出商品，换取军用物资。1937年9月，国民政府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四川贸易局亦相继设立，叶元龙（代表重庆行营）任局长，何北衡（代表省政府）任副局长。何北衡督促原经营猪鬃、桐油等的出口行号，按行业合并组织公司，先后组成了四川畜产公司、四川桐油公司、四川药材公司，化零为整，以增强实力，有利经营。桐油、药材因绕道运输费时，资金周转发生问题，他协助向中国银行洽办贷款。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沿海工厂纷纷迁至武汉，何北衡去汉敦劝各厂迁川，申述四川急需纺织、炼钢、机器、玻璃、制革、造纸、酸碱及其他化学工厂。何北衡的辞令，当时很能感动厂家。接着他与愿迁四川的厂家代表，就运输、厂地、电力、劳工、原料、销场、金融、捐税等问题，一一详加研究。

重庆的长江和嘉陵江原以木船为渡江工具，1937年冬筹组轮渡公司，以适应战时后方的需要。何北衡至渝召集有关方面商讨决定，省政府先拨给10万元资金，由建设厅所属的川江航务管理处负责即日着手筹备。不久，便租妥民生公司两只小轮，于次年元旦行驶储奇门至海棠溪航线。一面先行营业，一面招募商股。7月，重庆轮渡公司正式成立。10月，何北衡具呈省政府：“筹备轮渡，旨在提倡，原非为利，拟请将筹备期间所有盈利，除提缴省府资金月息一分外，余利提作备用金移让公司，以期挹注，而示奖掖。”由于优惠鼓励，轮渡公司陆续添购船只，增辟航线，使两江交通得到改善。

1939 年底，中国西南实业协会在重庆成立，张群任理事长，何北衡任总干事。该会主办的星五聚餐会，常邀请中外名流、实业界头面人物作专题讲演，或就经济事业有关的问题进行座谈讨论。何北衡在星五聚餐会上作过专题讲演，并参加一些座谈讨论。1942 年 5 月两次讨论纳税问题，有国民政府主管税收的刘振东、高秉坊参加。何北衡在会上几度发言，说：“吾人对于税捐，非不拥护，仅求得一合理之规定。在今日病态复杂之环境下，应求税收之增加而病不增加，若税收数字增加而病益严重，则危险殊甚。”他指出，“因沿途关卡林立，所予吾人痛苦之大，不可言喻”。“人民不怕苛而怕扰，深望今后一切杂卡均予取消”。1945 年 9 月，何北衡主持工业座谈会，讨论解救工业危机问题。他首先发言说：“今天在后方的工厂都是随政府西迁的，用尽了劳力财力人力，维持了七、八年，为的是要求胜利，现在胜利得到了，工业界自己倒濒于绝境。不但工业界如此，农村亦受其影响，粮食跌价，平均跌落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如此情况，社会如何能安定？因此，我们的座谈会虽然偏重于工业，我们也应该顾到整个社会安定的问题。”他在座谈会最后归纳意见中指出：“这个危机是由于政府用通货膨胀的方法以后而又紧缩通货的结果，所以政府应负维持的责任，我们有权要求维持。”

何北衡常为人排忧解难，友朋对他多有好感。1946 年他 50 岁生日时，畜产、丝业等几家公司约同送给他一笔礼金，他将此款转赠予公益事业。四川畜产公司成立时，贸易委员会所属富华公司等投有资金。抗战胜利后，畜产公司业务迅速扩展到国内外，商请何北衡代为洽退官股，他因此几次去南

京。事成之后，畜产公司酬谢他相当数额的股票，他谢绝未受。

在解放战争时期，何北衡曾为掩护和营救中共地下党人出力。1948年4月，其亲戚刘国志住在他家被人出卖，特务去他家诱捕，刘请出何妻吴静淑与之周旋，而趁机脱险。绥署参谋长肖毅肃立即下令包围何宅，严密搜查；一面打电话去成都找何北衡，指责其妻窝藏、放跑共产党，并威胁说：“如果抓不到刘国志，只好请你太太坐班房。”何北衡说：“我太太是个妇道人家，她懂什么？要坐班房嘛，我辞职回重庆抵案好了！”加以抵制。不久，刘国志在荣昌被捕，何北衡又多方设法营救。但反动统治当局假意敷衍，于重庆解放前夕，将刘杀害于渣滓洞。

四川解放前夕，何北衡去香港，拒绝张群游说，不去台湾。1950年全家回到北京。

何北衡曾任水利电力部参事室参事、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72年在北京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童少生：《回忆民生轮船公司》，《重庆文史资料》第17辑。

王世均：《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造船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曾紫霞：《刘国志》，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西南实业通讯》1942年第5卷第6期、第6卷第5期，1945年第12卷第1、2期。

周 宝 箴

张钧陶

周宝箴，四川江北县人，生于 1864 年（清同治三年）。清末民初经营复兴和炭厂达 20 余年。

复兴和炭厂初名甲子洞，乃其先世周世瑜从湖南原籍来川，于 1741 年创办，矿在江北县二岩，煤藏丰富，煤质尤佳。周氏子孙世代相传，后改名兴隆公炭厂。百来年间，获利颇丰，先后开办了窑罐厂、酿酒厂、织布厂、造纸厂，以及贩运粮食和木船运输等业务，置田产 1 万余亩。然子孙管理不善，加以同、光年间嘉陵江两次洪水为害，炭厂冲毁，损失不资，生机濒绝，一筹莫展。这时，以周宝箴为首的一批有钱有势的族人，组织策划，另谋出路，于 1904 年把兴隆公租赁过来，改名复兴和，继续经营。

周宝箴经营复兴和，资本总额为 8500 两，外股约三分之一，大都是原来兴隆公预收煤款及所欠米账的债权人，以债权转为投资；其余三分之二，均为房族股东。当时重庆工业渐兴，航运需煤日增，井下采掘的煤层亦转丰厚，营业开始兴旺，年年获利。经营了 10 年，到 1914 年，增资为 15300 两，牌号加上崇记，工人增到 1000 以上，日产煤 200 余吨。有 10 家行商组织代销，进入了复兴和的黄金时代。1924 年资本总额再增到 18500 两，易牌号为竣记，排挤了外姓股东，增加

了新的家族股东，再度独占了煤矿。

周宝箴经理崇记复兴和，正值封建军阀混战时期，散兵土匪，四处窜扰，他为维护周氏家族利益和炭厂的经营，买枪招兵，保厂保族，迅即以办剿匪驰名江北县。当时遍地匪警，但是二岩周围几十里，由于他的势力，无匪来犯，许多地主都来二岩居住，借以得到保护。他掌握了整个北碚所辖区域的地方团防武力，为军阀办招安，号称江防司令。他照每挑煤炭抽办团费 50 文，以团防武装力量替地主豪商们保镖，护送货船到合川一带，颇有声势，成为军阀防区的风云人物。

周宝箴与当时地方军阀声气相通，互为勾结，尽管处在混乱局面，崇记复兴和继续垄断了铜元局和川北一带的销场，平均年利润在 30% 以上。1920 年川滇黔军阀在四川混战时，铜元局为黔军袁祖铭占据，将全部煤船劫持军用，煤商损失甚重。上游来重庆买煤的木船不敢再来，川北销路遂告中断。但周宝箴凭借封建势力，善于应付环境，且为军阀策划军费，因而业务并未受到很大影响。

1919 年周宝箴拨巨资与川军二十八军邓锡侯部旅长林翼如、二十一军刘湘部军需处长洪渊泉等大小军阀，伙办同人益炭厂、开采合川麻柳坪隔蚤孔煤窑，自任经理，企图胜则锦上添花，败则大家分担损失。结果因距离较远，兼顾乏力，亏本 2 万多银元。1923 年周又与上述诸人组织嘉陵汽船公司，买汽船 2 只，开办重庆至合川的短航客运，又因不谙业务，照料不周，折本 1 万余银元。由于他与上述诸人关系密切，在折伙算账时，都由他应付了事。他在经理崇记时，还

通过四川省政府驻渝办事处主任刘国华，获得由实业厅发给的临时矿权执照，以便于大量开采，不受任何阻拦。

周宝箴经营复兴和时，其经营方式已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然其封建时代的经营遗风犹在。所沿袭下来的“把头”制度具体发展，将“磺头”（即采煤工作面）部分出租与“把头”和技术较高的矿工，由他们去招雇工人。周氏族及其在职亲信，大多充当了“把头”。每个“把头”掌握矿工由几人到几十人，他们直接结付工人工资，自负盈亏，自取厂名，称为租客厂。于是由原来直接生产的“包箱”制，一变而为与矿主直接发生租赁关系的“把头”制，“把头”与矿主按产量分成，主佃双方各得50%。工人出力，“把头”渔利，矿主赚钱。矿工的待遇极苦，终岁勤营，不得温饱。其有“跳厂”（即由甲厂跑到乙厂工作）者，动辄非刑吊打，比军队惩办逃兵尤酷。

1926年周宝箴病故。其子周雨槎接任经理，于1934年将复兴和改组成为复兴隆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参考资料：

周家鼎等：《复兴隆煤矿史略》。《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二辑。

虞 洽 卿

汪仁泽

虞洽卿，名和德，以字行，1867年6月19日（清同治六年五月十八日）生于浙江镇海县。父虞晓峰在家乡开设小杂货店。虞6岁丧父，家贫，在私塾就读3年后即辍学。15岁时经族人介绍到上海，进瑞原颜料行当学徒。不久升任跑街，业余从西人学习英文。

虞洽卿善于推销商品，于1892年进德商鲁麟洋行任跑街，后升买办。该行除进口颜料外，兼营西药、军装（包括军火、器械等），出口豆粮、桐油，虞所得薪金及回佣甚为优厚。1896年，虞捐资清廷得候补道台衔，旋买进闸北升顺里等处房屋，开始跻身于绅商之列。

1902年，虞洽卿谋得华俄道胜银行买办的职位，遂辞鲁麟洋行职。翌年又转任荷兰银行买办。1905年，上海发生大闹会审公堂案。^①地方官员着朱葆三、周金箴、施子英、虞洽卿四人与租界当局交涉，初无成效，其余三人畏难辞去，独虞一人继续奔走，日夜邀集各界代表商讨对策，在民众支持下，受雇于洋人的华工纷纷辞退，华捕罢岗，迫使租界当局让步，交涉告胜。虞翎顶朝服随同官员步行南京路挨户劝告开市，遂名闻于沪上各界。事后，虞与胡寄梅等仿效外人在沪的武装团体，发起筹组“万国商团华人队”。1906年，虞奉

派以随员身份参加官方代表团，赴日观操，考察商务，结识了明治维新重要人物大隈重信、涩泽荣一等。目睹日本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因此萌志回国兴办实业。

回国后，虞洽卿和宁波同乡朱葆三、周晋龢等人，加速四明银行已筹备两年的创建工作。虽困难重重，虞出力甚多。1908年该行开业，资金150万两，取得钞票发行权。但不久即遭外资银行的倾轧，发生钞票挤兑风潮，虞洽卿等人发动甬人所设钱庄、商号一律代为收兑，使四明银行渡过了难关，树立了信誉。

1908年，虞洽卿等人复倡议在沪集资设立宁绍商轮公司，虞被推为总经理，买进“宁绍轮”，行驶于沪甬间。先是，该航线为外资太古、东方两轮船公司及国营轮船招商局所垄断，统舱票价从5角提高到1元，使旅客蒙受损失，虽经虞洽卿等多次交涉，但“始终无效，于是有自立公司之举”。^②宁绍公司筹办时，宁绍同乡纷纷入股，因此小额散股股东甚多。“宁绍轮”行驶后树牌“立永洋五角”，表示永不加价，服务态度亦好，营业颇佳，因而太古竟放空船。太古公司凭借其雄厚的资力，把票价降为2角，并随送毛巾、肥皂等日用品，想压垮宁绍公司，宁波同乡遂组织“船票维持会”，票价降为3角，每票由该会贴补2角，宁绍同乡也宁愿多出1角票价，乐于乘坐“宁绍轮”，终于两年后迫使太古等屈服，票价一律回升为5角。

1909年，虞洽卿等人向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建议筹组国货展览会性质的全国“南洋劝业会”，以资提倡实业，得到端方的赞同，并经奏准清政府拨款筹备，官民合办，端方

任会长，虞等任副会长。翌年在南京开幕，盛况空前，会期6个月，观众达20多万人次。虞随会赠送精印会址及摄政王载沣、端方、张人骏等人以及自己照片的杭纺手帕2万方，借以广扬名声。不久张人骏继端方接任会长，耻与商人为伍，遇事掣肘，劝业会期满即告停办。由于张人骏盛气凌人，随着反清浪潮的不断高涨，虞的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虞自称“自经劝业会之后……蓄心革命事业”。^⑤

辛亥革命上海起义前夕，虞洽卿在沪地同盟会秘密会所结识陈其美等人，资助起义经费8000元，并提供租界内的秘密集会场所^⑥以及购办军械等。上海光复后，苏州绅商在上海影响下，要求巡抚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程以缺乏军饷为借口，犹豫观望。11月4日，虞代表沪商界携银100万两赴苏劝说，程遂宣告独立。虞继又赴南京游说张人骏，遭拒绝后，曾亲自单身由沪送弹药至南京前线天堡城接济革命军。上海都督府成立后，虞被委为首席顾问官、外交次长及闸北民政长等职。袁世凯任大总统后，虞曾表示支持，并反对“二次革命”，电阻浙江都督朱瑞参加反袁阵线，因此受到革命党人的警告。^⑦袁称帝之举，受到全国各界的斥责，大势所趋，虞又转而反对帝制，资助陈其美等人的反袁活动。

1914年，宁绍公司董事会决议以6万两出售较为陈旧的“甬兴轮”，拟另购新船；虞洽卿表示反对，认为该轮尚可行驶。但董事会坚持原议，虞当场加码5000两承购，转手以每年30万元之租费，租与洋商获取暴利。股东们闻讯大哗，乃集股东大会决议：（一）撤销虞洽卿总经理职务；（二）委托监察人盛丕华诉之于法。虞终因理屈，被迫退还甬兴轮。此

后，虞为挽回声誉，全力经营其独资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原设浙江镇海三北，名为“三北轮船公司”，是年迁沪，更名、增资），增添船只，开辟航线，扩大规模；后又盘进英商鸿安轮船公司。时值欧战期间，外轮多奉调回国，货多船少，水脚上升，三北、鸿安业务得以迅速发展。虞不断购进轮船，并在沿线各埠添设码头、堆栈等。1917年虞又买进“宁兴轮”，另组宁兴轮船公司。此时虞独资经营的三北、鸿安、宁兴三公司已初具规模，成为可与外资轮船公司抗衡的民营航运集团。但虞的资金毕竟有限，不断投资不动产，以致资金周转困难，债台高筑，债主无日不盈门坐索，虞每日陷于应付债务的窘境之中，移东补西，捉襟见肘。他除利用荷兰银行买办身份开出远期本票贴现抵债外，拖欠四明银行债款最高时达300多万元。对于其他客户的债务，也常到期换票转期，因此在金融界中信用甚差。这时，虞还“越穷越买船”。原来按当时惯例，买船到埠后，只须先付30%的现款，余款可分期拨付，而随即可向银行押借船价70%的贷款，这样40%的差额就可暂时移作周转之用。且新船行驶前又可从买办到茶房（即服务员）收取押柜（保证金）。以宁兴轮为例，茶房每人要缴400元，全船可收10万元之巨。因此虞虽欠了巨额债务，但却一再添船增资，到“抗战前夕，三公司有船30余艘，总吨达9.1万余吨，为民营冠”，^⑥约占全国轮船总吨位的七分之一。^⑦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全国响应。上海总商会于5月9日发表通电，主张撤开巴黎和会，就青岛问题单独与日本交涉，为全国舆论所反对，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

因而辞职，虞洽卿曾一度以商会议董身份代理会务。6月3日在工人、学生影响下，沪商会共同参加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斗争。6月10日曹汝霖等人被撤职，消息传来，12日晨虞等陪同地方官员上街劝告开业，但应者仅十之二三，直到学生列队劝说，全市始告复业。

1920年，虞洽卿与张澹如、闻兰亭等人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虞当选为理事长。是年4月，全国工商协会改选，虞当选为会长。1924年，上海总商会改造，傅筱庵与宋汉章互争会长，相持不下，形成僵局，经会董商议，改选虞洽卿为会长。此时虞仍任荷兰银行沪行买办，直至1941年他离沪时传给其子为止。荷兰银行在华发行纸币，吸收存款，经营汇划、进出口等业务。虞的月薪200两，加上年终分红及佣金结算，年收入在二三万两左右。

1925年1月，虞洽卿应北京临时执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之邀，以善后会议专门委员身份，赴北京参加会议。同虞前曾支持段的马厂誓师和对德宣战，晋京后备受礼遇。2月初，被段任命为淞沪商埠会办（督办孙宝琦）。4月，虞在京当选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会长，后递补为副会长，继续留京活动。

5月30日，上海发生英国巡捕枪杀群众的五卅惨案，6月1日起全市工人、学生和绝大多数商店参加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北京临时执政府委任在京的虞洽卿为谈判代表之一，于6月3日兼程返沪。他在总商会属下成立以他为首的“五卅事件委员会”，通电表示“若人权不得保障，即牺牲亦何足计”，愿意“协同各界誓为政府后援，决以全力拥护公理”。^⑥并提出根据当时形势，分化敌人，集中力量打击英帝

国主义势力的斗争方针，认为“此案与法美等国无关，即对于英日两国亦有分别。日领事已主张纱厂罢工风潮由中日两国自行解决，以免牵入其内。以英国言，此事与英商无关，完全由领事与工部局负责”。^⑧但他的建议未受到领导三罢斗争的工商学联合会的重视和采纳。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了同有关各国交涉的 17 条谈判条件，北京政府交涉员看后认为“过激”，就商于虞洽卿。次日“五卅事件委员会”讨论时，委员们认为与其条件太高而导致谈判失败，不如缩小范围以期速决，因此另提 13 条，删去“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军队”、“解除万国商团和巡捕武装”等条款，将保证工人有“组织工会和罢工自由”一条改为“优待工人”，因而遭到上海 10 万群众集会抗议。六国委员会在谈判中则借口各国意见冲突而对十三条亦拒绝接受。总商会经同工商学联合会磋商同意后，于 6 月 26 日复市，^⑨同时决定继续抵制英日货，筹款援助罢工工人。9 月初，上海总工会决定在保障工人既得利益及经济要求的条件下逐步劝令工人复工。^⑩此后，虞洽卿代表总商会参与协调复工谈判，进行保证和监督复工条件的实施等工作。^⑪是年 10 月直系军阀孙传芳进占上海，虞洽卿被迫辞去淞沪商埠会办职务。

1926 年 5 月，虞洽卿率领中华实业参观团一行 60 人赴日考察实业。6 月上海总商会改选，傅筱庵在孙传芳的支持下当选为会长。虞洽卿落选后，与王晓籁等人另组“上海商业联合会”与之抗衡。是年春，宁波旅沪同乡会改选，虞当选为会长，后又担任上海航业公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等职。7 月，广东国民政府电邀上海商界推派代表赴粤

参观，虞推荐其女婿盛冠中陪随代表王晓籁去广州，试探在广州执掌军政大权的蒋介石的实意。盛返沪后称蒋颇重乡谊，不忘过去在沪时受虞接济的旧情，使虞放心。

1927年2月，北伐军节节胜利，东路军已抵达江浙一带，虞与江浙资本家陈光甫、李铭、张嘉璈、叶琢堂、孙衡甫等人密商，如蒋能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则将全力予以支持。陈、李等对蒋的意图不明，不愿出头露面，因此由虞介绍，推派与陈果夫有乡谊的四行储蓄会副主任钱新之去南昌与蒋洽谈。蒋即于3月初密令各军将“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中国”。虞及时在沪商界散布蒋已答应条件的消息。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选出临时市政府委员19人，由于虞曾反对孙传芳支持傅筱庵夺其总商会会长席位而参加过后来的倒孙活动，因此也被选为委员。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虞当夜即前往会晤，商谈甚久。次日虞在商业联合会上作了传达，并推选代表吴蕴斋、穆藕初等29人于29日偕同往见蒋介石。蒋在接见时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⑨此时蒋拟委虞任财政部次长为其筹款，虞借口忙于本身业务而婉辞，但允尽力支持；并保荐张寿鏞、钱新之先后任财政部次长以自代。3月31日，虞又为蒋组成筹措军费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自任委员。接着上海工商、金融各界在“四一二”政变前后分4月1日及25日两次各给蒋300万元。国民政府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后，三次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共7000万元，大多由江苏省兼上海

市财政委员会向工商、金融界摊派。

蒋介石上台后，内战不断，军运频繁。军队扣船拉差，乘机敲诈勒索，三北公司营业大受影响，亏损累累，处于困境。虞洽卿取得蒋的照顾，一面申请获准发行八厘公司债 350 万元；一面于 1930 年索得历年军队所欠轮船租费，得以渡过难关，站住脚跟。在此期间，虞开辟了川江航线，创设了三北轮船机器厂。

虞洽卿平时重视家乡的建设，早期经营镇海、龙山，在当地设轮埠、筑海堤、置轻便铁道等。又经虞申请获准，当地的农副产品直接装运出口，可免缴转口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虞投资集股修建的“甬观出路”（宁波到观海湾）和“镇骆、镇大公路”（镇海到骆驼桥、大碇头）分别于 1932、1933 年落成通车，方便了浙东地区的交通。他历年用于家乡建设的投资约在 200 万元以上。

1936 年虞洽卿 70 岁时，上海租界当局应总商会等团体的请求，决定将横贯沪市中心南北通衢大道、宁波旅沪同乡会所在地的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并举行盛大的命名典礼。

1937 年“七七”事变后，8 月 13 日淞沪抗战爆发，3 个月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难民麋集，虞洽卿等人在各方面配合下，筹组“上海难民救济协会”，虞被推选为理事长。他利用闲置的三北船只，遣返 2 万多同乡回籍，留沪尚有各地难民 10 多万人，分别安置在全市 30 余处难民所内。此时沪地四郊遭日军封锁，粮食供应日见困难，升斗贫民及 10 余万难民更有断炊之虞。虞倡议举办“平糶会”，向各界募得大批捐

款后，由虞分批从西贡、仰光、爪哇等地运来大批洋米，约170多万包。其中大部委托米店照市价7折，差额由捐款中贴补，办了30多期平糶；部分充作难民口粮；其余由平糶委员分摊，高价抛售市场，牟得厚利。时值战时船少，运费较平时猛涨数倍。虞利用三北公司留沪船只，另组公司，取得有关方面同意，悬挂意、挪等国的旗帜，运米进口，又以压舱为名自办洋米；出口时满载土特产，除运费外，加收小费；且平糶米不交进口税，虞多方设法赚钱，每月盈利以数十万计，总共约赚500万元，^⑧还去旧债后，手中犹握大量游资，购进重华新邨、大上海电影院等大批房地产业。

日军占领上海后，谋组汉奸政权，多次拉拢虞洽卿出任伪职，为虞所拒绝。1938年2月20日虞接到附有子弹的恐吓信，警告他不得参加伪组织，否则将以真弹对付。虞召集家属商议，从老妻到幼孙，都劝虞切勿事敌。但虞亦不敢得罪日伪，曾多次表示“亲善”。^⑨虞的暴发及其政治上的暧昧态度，引起各方注目，处境危殆。后经家属的劝说及在重庆的女婿江一平等人来电催促下，遂于1940年秋离沪经香港赴渝。^⑩

虞洽卿抵重庆后，舆论骂他是发国难财的米蛀虫，因此他常避居他地。内地物资匮乏，他出资与王晓籁等合组三民运输公司，自任总经理，并取得蒋介石的“手谕”，特许运输物资。虞从国外购进大型卡车数十辆，除部分“捐献”当局外，其余全部用于运输物资。时值日军侵入缅甸，曼德勒、仰光等地的商人急欲脱货求现，竟以整个仓库的商品估价求售，仅及市价的二、三成，虞因而获巨利达二三亿元。此后，他

在西南经营多种企业，在昆明、成都、贵阳等地都设有运输公司，在内江创办酒精厂，在湖南设纱厂等。

1945年4月24日虞洽卿突患急症，两天后病逝重庆，终年79岁。

注：

- ① 1905年有粤妇黎黄氏，曾随夫旅居四川，夫死回籍，途经上海，带有婢女十多人，被公共租界巡捕误认为贩卖人口，拘解会审公堂审讯，中国审判员命暂押看守所，英籍陪审员则主张关入监狱，双方发生争执，西捕头竟动手殴打华员，扯碎朝服，激起旁听者公愤，与西捕发生冲突，被捕多人。消息传出，租界全体华商罢市抗议，事态扩大。详情参见《大闹公堂案》，载《上海通志馆期刊》第一卷。
- ② 《虞和德通告宁绍公司股东》，《时报》1917年5月14日。
- ③ 方腾：《虞洽卿论》（中），《杂志》复刊第17号（第12卷第3期），1943年12月出版。
- ④ 汪北平、郑大慈编：《虞洽卿先生》，上海宁波文物社1946年版。虞洽卿特设“宁商总会”于公共租界六马路（今北海路），向香港政府注册，取得“特别照会”，掩护革命党人在此秘密集会，可免受租界当局搜查。
- ⑤ 《新闻报》1913年9月3日报导：8月28日有人在虞宅放置定时炸弹，房屋家具被炸坏，幸未伤人。
- ⑥ 三北轮埠公司在1949年所填《航运事业调查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轮船业史料，卷22。
- ⑦ 据严中平等所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所载，1935年我国轮船总吨位为67.5万吨（该年是抗战前的最高年份，1936和1937年都低于此数）。
- ⑧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第153卷。
- ⑨ 《上海总商会议案录》（民国十四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上海总商会》，宗卷第11卷。
- ⑩ 《热血时报》1925年6月24日报道：6月23日下午工商学联合会举行联席会议，会上工商学联合会代表鉴于当时形势的变化，坚持罢市无益，同意忍痛开市。

- ⑪ 《上海总工会会议记录》(1925年)。
- ⑫ 参阅1925年9月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等有关报道。
- ⑬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联合会》档案，卷6。
- ⑭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第168卷。
- ⑮ 1940年春，袁履登投敌后，虞洽卿与日本驻沪领事往来密切，友人劝其少与日方接触，但他却说：“我们从前一向碰头的，那有什么关系。”是年虞嫁孙女，汪精卫送来一大花篮，虞将其放在礼堂正中，有人认为不妥，虞却不以为然。参阅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第169卷中魏伯桢、胡治藩等人的回忆记录。
- ⑯ 虞洽卿离沪前，敌伪方面李士群等对虞多次敲诈，诛求无厌，意在逼其投敌。而重庆方面在沪的特务组织也因虞有亲日活动而拟予以制裁，经电重庆请示，蒋介石复电但令劝虞去渝，不允暗杀。而虞却称需蒋亲自来电方去渝，因此其在渝的女婿江一平除多次电促外，并通过有关方面，冒用蒋的名义电虞称：“留沪徒滋各方疑虑”，劝他早日离沪去渝。虞离沪前夕，一面将蒋的来电向人夸耀，一面语人：“李士群要寻找我（与我为难），我要走了。”参阅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第169卷，严服周、严澍声、魏伯桢等人的回忆记录。

苗 杏 村

王家鼎

苗杏村原名世远，字杏村，山东桓台人，1875年3月15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初八）生。父苗仲九务农。苗杏村早年因家贫未能上学，目不识丁。十五六岁时充当“赶脚”，于家乡桓台索镇和小清河下游羊角沟之间驱赶小驴代客驮运，故当其发家致富后，辄以“两条腿的本钱”自诩。^①

清末，胶济铁路尚未兴修以前，索镇得濒临乌河水旱码头之利，手工作坊、商业和过载栈（运输行）比较繁盛。1894年前后，苗杏村的长兄苗世忠以经营煤炭所得，与本街荣种森合伙，在索镇开办恒聚油坊。不久，苗世忠病死，由苗杏村次兄苗世厚继任油坊副理。苗家经过数年经营，兼放高利贷牟利，颇有积蓄，遂逐步向外地拓展，于1906年与人合伙，在济南泺口创设了恭聚和粮栈。苗杏村即随兄前往泺口，辅助经营。旋又由恒聚油坊出资，在泺口开办恒聚和粮栈，苗杏村出任经理。因泺口粮业有利可图，^②1910年苗家复独资在泺口创设公聚和粮栈，苗杏村任经理。翌年苗世厚病死，苗杏村继其产业苦心经营。时值辛亥革命山雨欲来，索镇荣家惧于形势动荡而提出分伙要求。双方协议：苗杏村在恒聚油坊的股权归荣家，荣家在恒聚和粮栈的股份则归苗。

1911年，苗杏村眼看津浦铁路修筑工程行将竣工，济南

商埠必将取代泺口为贸易中心，乃收束公聚和、恒聚和二家粮栈，集中经营公聚和粮栈和设于济南的恒聚成炭栈。1912年，为扩大粮栈业务，苗家在济南经一路纬四路修建30余间门面的楼房建筑，并改恒聚成炭栈为粮栈。是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南北客商云集济南。苗杏村多方结交应酬，广为招徕，致使恒聚成驻客经常有200余家。他又派人南下徐州、蚌埠等粮食集散地，兜揽客商，生意日隆。至1913年底，已获纯利4万余元，为恒聚成原始资本的50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帝国主义各国无暇东顾，我国面粉业乘时发展，粮食市场随之活跃。苗杏村为扩大经营，将粮店职工由23人增至46人，在津浦、胶济沿线设坐庄30余处，代客买卖并自运自销。

1915年10月，广州部分出口客商和丹麦宝隆洋行买办罗叔羲等人来济南大宗采购生米、生油，运销南洋、欧洲。苗杏村不惜重金殷勤款待，并以“回扣”相笼络，同时又严密封锁消息，使同业无可乘之隙。与此同时，他采取坚守信用，质量第一的方针，以取得广东客商的信赖。他垄断了“广帮”生意，每年获纯利4万元上下，直至“七七”事变后海运中止，长达22年之久。其间，恒聚成不仅垄断济南的生米市场，而且博山、泰安、滕县、徐州一带的生米行市亦唯其马首是瞻。

同年，无锡茂新面粉厂资东荣宗敬派人到济南采购原料，苗杏村办得既快且好，引起荣宗敬的重视。当年，荣宗敬到济南调查小麦产销情况，苗全力与之结交，后又赴沪访荣，过从甚密。嗣后，荣宗敬在济南筹建茂新四厂，苗倾力协助选

址、购地、建房、装机，使该厂得以于1920年3月顺利开办。荣力邀苗出任经理，以示酬谢，苗不愿为他人作嫁衣，婉辞不就。但恒聚成、公聚和却从此取得为茂新四厂代购小麦的专权，每年获佣金2万元，直至“七七”事变爆发，茂新厂停机。

苗杏村在经营粮栈的同时，还从事工业和金融投资。1918年他向其儿女亲家穆伯仁创办的惠丰面粉厂一次投资1.5万元，任该厂董事。1919年又投资穆伯仁所办的晋丰面粉厂、通惠银行和晋泰公司。后来，苗、穆之间因惠丰厂协理职位问题发生争执，苗一怒之下，撤出在穆所有企业中的全部投资，以股权和房产一举偿清通惠银行的巨额贷款。

1921年10月，苗杏村联络同乡苗星垣、王冠东等人，集资发起成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苗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苗星垣为董事兼经理，王冠东为监察人。因资金不敷，苗杏村赴上海转托荣宗敬向国外赊购了一批机器。该厂1922年8月投产，日产面粉5200包。1924年再度增资，6月在北洋政府农商部核准注册。同时新设永丰祥麻袋庄，并建筑恒聚成粮栈仓库，一面办理银行外仓抵押，一面代客货办理押款，收取栈租。同年，京、津面粉市场为进口外粉所夺，成丰厂滞销，周转陷入困境。由于董事车百闻邀得东莱银行经理于耀西投资和贷款支持，始克度过难关。1929年再次扩大生产规模，自设铁工部，制造部分磨粉机器。1930年投产，日产面粉8000余包，成为当时济南面粉业中首屈一指的厂家。此时，成丰厂的人事和经营权，为苗星垣等所左右。苗杏村任董事长徒具虚名，遂决意另起炉灶。

苗杏村为了开拓其经营门径，曾不断结交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当局，参预社会政治活动。民国初年，他首倡成立济南商埠粮业同业公会，任会长。1916年7月，任商埠商会会董，旋任常务董事，垂20年。1924年任山东省督办公署咨议。1925年苗以重金与张宗昌部第九军军长兼运输司令朱子芹相结纳，常假“军运”之名运送粮货，俾能吞吐及时，在同业竞争中独占鳌头，大获盈利。1930年韩复榘主鲁后，他与其实业厅长王芳亭时相过从，并得韩复榘赏识。后经韩提名为国民会议代表，出席1931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1934年7月任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济南分会会长。1935年任山东省政府参议。^④因此，他的实业活动曾长期得到统治当局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支持。

1929年，济南民安面粉厂因经营不善，宣布倒闭、清理。^④苗杏村乘机租用其全套设备，组织成记面粉厂。双方议定机器修理费由租金中抵拨，民安厂在一年半内无法得到租金。这时，民安厂因无力偿还债权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6万元欠款本息，经法院判决，拍卖其抵押的部分固定资产。苗杏村以8万元购得其仓库和地皮后，转而以部分产权变更为由，要求重议租价。逼得原资东张怀芝等人走投无路，将全部股权100余万元折价37万元让渡给成记，^⑤苗杏村终于蚕食了民安厂的全部财产。1934年组成成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苗杏村任董事长，其侄苗兰亭（苗世厚之子）任常务董事兼经理。为控制企业，厂内各要职，均由恒聚成旧人充任。此时市场粮价因受国民党政府“麦棉借款”影响暴跌，成记厂原粮耗尽，资金枯竭，无法开机。苗杏村奔走求援，得到山东省政

府财政厅长兼民生银行董事长王向荣支持，取得该行 80 万元信用贷款及抵押透支，低价购进大批小麦备用。次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制，刺激了物价回升。当年成记获纯利 35 万元。苗于 1936 年开设恒聚成北记面袋厂，以适应成记需要。

1932 年 6 月，苗杏村鉴于济南已成为当时国内主要棉花市场之一，发展纺纱业有利可图，遂与苗星垣等人再度合作，发起组织成通纺纱有限公司。7 月议决推苗杏村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苗海南任经理兼总工程师。苗杏村广为募股，凑集 75 万元，并亲赴上海托荣宗敬担保，向英商怡和洋行赊购 1 万枚纱锭的全套设备，向安利洋行赊购 1500 瓩的发电机一部，连同成丰厂铁工部的自制机器，于 1933 年 5 月开机投产。到 1937 年时，该厂扩充到 19600 枚纱锭，年产量达到 14000 余件。但苗星垣等从建厂伊始就凭借其雄厚的技术实力控制了企业，“二苗”之间的矛盾随之加深。

1935 年底，济南规模最大的鲁丰纱厂因经营不善、无力抵制日本纺织品的竞争而停业倒闭。^⑥1936 年 2 月，韩复榘迫于该厂失业工人请愿的压力，授意苗杏村接办整理并派军队“保护”。^⑦苗遂代表成通纱厂，以月租 3000 元与民生银行签订承租合同，改名成通纱厂分厂。1936 年 9 月因经营失利，亏损 9 万余元而再度停业。此时苗星垣等人坚主退租。但苗杏村却仰恃韩复榘的支持，为摆脱苗星垣等人的羁绊，决计倾家以赴独自承租，遂签订租赁合同，改名为成大纱厂。苗集资 30 万元，又取得民生银行信贷透支 80 万元，于 1936 年 11 月 7 日开机投产。他采取提高工资、扩大福利设施等缓和劳资矛盾的措施，提高了产量和质量，由鲁丰时期日产十六支

纱 60 件提高到 73 件，所出凤山牌、工农牌棉纱畅销各地。

1937 年 7 月，民生银行以原鲁丰纱厂积欠旧款无力偿还提出起诉，经法院判决，拍卖鲁丰全部固定资产。苗杏村遂认价承领，以 85 万元的代价取得了鲁丰价值 200 余万元的全部产权。

“七七”事变后，苗杏村一度拟迁成大、成通二厂于内地，但又认为“日本人也得做买卖”，迁厂遂告中止。12 月济南沦陷后，日军军管成大，随后半年内，成通、成丰、成记也相继军管。此时苗杏村尚保有恒聚成粮栈、恒聚成北记面袋厂，但其业务已捉襟见肘。1938 年初，马良等人组织济南治安维持会，暂代伪政府职权，苗杏村被推为评议员。3 月，筹建商会，初拟推苗为商会会长，因其抱病体衰，会长职遂由其侄苗兰亭出任。1939 年，苗力促苗兰亭出资创立鲁兴银行，推行伪钞，进一步走上附逆道路。

苗杏村热心参预慈善活动，先后担任华洋义赈会董事、山东省赈务会委员、惠鲁工商中学董事等职。1937 年秋，任历城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曾设立收容所四处，捐资设立小学三所。^⑥

1940 年 12 月 14 日，苗杏村在济南病故。

注：

① 《五十年来的桓台苗家资本集团》，《济南市志资料》第 2 辑。

② 据 1914 年 4 月 15 日《山东公报》载：涿口在 1912 年（民国元年）初，津浦铁路未通车前，尚有粮栈三十余家，足见当地粮业之兴盛。

③ 至少在 1936 年底以前，苗杏村已取得国民党“特别党员”身分。见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档案。

- ④ 民安面粉厂系北洋军阀靳云鹏、张怀芝、王占元等在1920年创办，其管理人员多是校尉军官出身，因经营不善而倒闭。
- ⑤ 此数字依据山东省档案馆藏《苗杏村致民生银行函》，1935年7月12日。
- ⑥ 鲁丰纱厂成立于1915年，由北洋军阀潘复等人创办，历任董事长有王占元、庄乐峰、田中玉、潘复等。
- ⑦ 1936年3月28日，山东省政府第四七五次政务会议决有鲁丰纱厂“先由通成纱厂承租，其法律问题由省府解决”等语。见《山东省政府公报》第378期。
- ⑧ 《苗杏村先生讣告》、《哀启》。

刘 海 楼

邢汉三

刘海楼，湖南长沙人。1875年（清光绪元年）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是清代进士，在河南居官多年，宦囊充裕，在开封、武汉、长沙等城市广置田产。刘海楼自幼苦读经史；稍长，目睹清王朝政治腐败，丧权辱国，加以受戊戌变法影响，遂不再留恋仕举，转而研读西学，醉心于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为救国救民的第一要着。1912年，他与当时在武汉电业公司任职的好友魏子祥合作，在开封创设普临电灯公司。由武汉电业公司分派技术人员，并调拨各种应用器材，作为股金，数额占全部股金三分之一，余额由魏、刘各出半数。魏子祥任经理，刘海楼任副经理，武汉电业公司派人任技术主任。普临电灯公司作为武汉电业公司的子公司在开封创设后，营业相当兴盛，刘海楼以后成为河南实业界知名人物，从此打下基础。

刘海楼当时在政治上也相当活跃。民初南北议和期间，为促成和议成功，北京有人组成国事共进会，呼吁南北团结，并号召各省成立分会。刘为在河南组成分会，多方奔走，后被选为该会参议。他还创办了《开封实业日报》，以经济报道为主，面向商界，受到河南工商界的欢迎。报纸编写以白话文为主，曾受到孙中山和黄兴的赞赏。

以后数年中，刘海楼相继在开封新创设的面粉厂、卷烟厂等企业中投入大量资金，同时独资创办大中火柴厂，自任总经理。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经营火柴厂，由于管理得法，工厂发展很快，利润倍增。他被选为开封商务会副会长及河南全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

1925 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举国愤慨。河南全省各界人士迅速组成沪案后援会，反击英日帝国主义，支援上海受难同胞。6 月 19 日，开封各界以学生为先导，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发起募捐运动，接济上海受难同胞。各校青年学生推出代表 20 余人，要求商会捐款 5 万元。刘海楼出面接待，对学生要求慷慨承诺，表示愿追随青年及各界人士之后，与敌人周旋到底，不获胜利决不罢休。

1927 年国民党政权在南京成立后，官僚资本逐渐侵入河南。刘海楼因在开封经营多年，颇著成绩，在开封市商会及河南工商联组织中仍能保有一定地位，普临电灯公司和大中火柴厂等也均照常营业；但营业额及利润已大不如昔，他在工商界的发言权也不断削弱，已有形势日非之感。为另谋发展，他得悉西安火柴业生产技术比较落后，产量少，供不应求，乃派其亲信冯尚文到西安，筹建陕西中南火柴厂，投入大量资金，除由开封大中火柴厂调拨一部器材外，又从上海、武汉等地购入不少新设备。中南火柴厂开业后，生产率及年产量均超过大中火柴厂。刘海楼经常往返于开封、西安间。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华北地区岌岌可危，刘海楼为确保资产安全，设法将一部分资产调往长沙。时刘虽已年逾花甲，但对其在开封的部分资产，仍未忘情。1938 年秋曾潜

至开封，欲收回被日本军管的大中火柴厂。但不敢公开露面，经月不得要领，又秘密返回西安，勉维旧业。

刘海楼于 1949 年初返回长沙，在长沙解放前夕病死家中。

主要参考资料：

河南《实业日报》。

《晨报》1925 年 6 月 21 日。

开封市轻工业志总编室调查材料。

邹韬奋

宗志文

邹韬奋，原名恩润，江西余江县人。1895年11月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出生于福州。他的祖父曾任福建延平府知府，父亲邹国珍清末在福州做候补官，北洋政府时任过财政部的科长，家庭经济每况愈下。他5岁由父亲启蒙教读《三字经》，稍长在家塾读“子曰”“诗云”。1909年入福州工业学校学习，开始接触现代科学知识。父亲希望他长大做工程师，1912年送他进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属小学学习。他在这里由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但是他对数理化没有兴趣，喜欢语文和历史。开始他还想满足父亲的愿望，读到电机工程科二年级时，微积分等课程使得他困窘不堪。1919年暑假后转学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外国文学，选修教育学。

圣约翰大学是当时上海有名的贵族学校，学费很高，邹韬奋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1921年暑假他大学毕业，到上海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这里待遇比较优厚，但他对这种工作没有兴趣。1922年春进中华职业教育社，参加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和丛书，同时在中华职业学校兼职教英文。不久，他又参加刘湛恩组织的职业指导运动，在上海和江浙一带的中学里举办职业指导运动周，对那里的学生进行选择职

业的指导，并编著《职业教育概论》、《江苏中等以上学校投考须知》等书。

1925年10月，《教育与职业》月刊改为《生活》周刊，内容主要是报道职业教育的消息，每期印千余份，大部分赠送职业教育社的社员，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1926年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力求改进，定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①内容包括时评、短论、社论和通讯、随笔、游记、传记等，注重“趣味化”“有价值”的材料。文风提倡“短小精悍”“明显畅快”，文章长的不过一二千字，很少长篇大论。编排上“极力独出心裁”，力求活泼新颖。编辑部在一间小小的过街楼里，发行部、广告部、总务部也都在此，工作条件很差。编辑一共三人，其中一人是兼职。投稿的人很少，大部分稿子都是邹韬奋一人撰写的，他不得不用六七个笔名。每期有“小言论”，都是他执笔，根据当时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虽然只有数百字，很受读者重视。这时，《生活》的政治观点，还是“力求政治的清明与实业的振兴”^②之类的改良主义。从第2卷开始，设有《读者信箱》专栏，开始只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问题，后来转变到讨论社会问题。邹韬奋很重视读者来信的答复工作，每天差不多要用半天时间看信，除选小部分在《生活》上公开发表和解答外，大部分直接回信答复，有的复信长达数千字。

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除了撰稿，还要跑印刷所、看校样，以至封面设计、广告、发行，都要自己动手。每期校样看三次，他说：“看校样时的聚精会神，就和在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使它没有一个错字，

……至少能使它的错字极少。”^③由于他的努力,《生活》办得很有生气,销数逐年增加,到1929年每期增至8万份。他摆脱一切兼职,全力以赴,常常“做到深夜还舍不得走”。他的妻子有一次笑话他“恨不得要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④他因为日夜伏案工作,劳累过度,胸部时常剧痛,数年不愈。

《生活》周刊不断揭露旧社会的黑暗。1930年11月第6卷第1期中,邹韬奋写了一篇《民穷财尽中的阔人做寿》,揭露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花10多万元为他母亲做寿,极尽奢侈之能事,斥之为“丧心病狂的举动”。1931年8月《生活》揭露交通部长王伯群用贪污来的钱娶小老婆,挥金数10万元。稿子付排后,王派人携10万元见邹,说是给《生活》的补助经费,他当场拒绝,坚持发表该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使邹韬奋的思想起了急剧的变化,他开始积极地寻求解决“世界的大势”和“中华民族的出路”问题。他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说:“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后,我想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⑤9月26日出版的《生活》周刊上,他写了四篇《小言论》,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以后各期,皆以宣传抗日救国作为中心内容,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1月,《生活》周刊两次发动募捐,援助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抗日,第一次收转读者捐款12万元。

“九一八”事变初期,邹韬奋对国民党政府还抱着幻想,随着国民党当局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内独裁专制,压制

抗日活动，他的幻想破灭了，不再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这时，他开始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政治觉悟迅速提高。1932年他说：“作者自己和自己作前后的比较，自觉思想上的方向日趋坚定，读者于前后各文中或亦可看出一二。”^⑥1933年3月，汤玉麟不战而退出热河后，《生活》发表邹韬奋的《惩汤声中的推究》一文，对汤大加鞭挞，更进一步责问：“中国的军阀们谁不是积满了私财？”“军阀们不干鸦片害人的生意而从中发财的有谁？”并指出，“身负军事重责，一向安居后方逍遥的，试问有多少？不过逃的形式不同罢了”。他“推究”出这一切“逃”的祸首是国民党政府。

《生活》周刊鲜明的抗日立场，博得了广大读者的爱戴，同时也触犯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帝国主义不许有抗日内容的《生活》在租界内发行，国民党当局对它软硬兼施。1932年初，胡宗南找邹韬奋谈话，两人就抗日问题和《生活》的主张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胡企图说服邹改变立场，拥护国民党政府。邹回答：“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⑦邹韬奋坚持抗日的立场，国民党政府就想方设法限制《生活》发行。开始是不断检查扣留，1932年7月，以“言论行动，毁谤党国”的罪名，禁止邮递。但《生活》周刊不胫而走，仍然传遍全国。它继续宣传抗日，教育启迪了许多追求进步的读者，特别是青年。当时社会上流传许多谣言，对邹韬奋进行中伤。他顽强不屈，明白地说：“我的态度是一息尚

存，还是要干，干到不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⑧他预料《生活》周刊随时有被封禁的危险，于7月正式建立生活书店，以备《生活》被封禁后继续作为服务进步文化事业的中心。还预先写好一篇《与读者诸君告别》的文章，准备在《生活》被封禁时发表，重申“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的决心。

1933年1月，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邹韬奋参加后，被选为执行委员，参与营救被国民党政政府逮捕的革命者和爱国群众。6月20日民权保障同盟的秘书长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时，邹韬奋也经常被特务盯梢，社会上传言他已被列入黑名单，朋友们一再劝他暂时躲避。7月，他被迫流亡海外。他说，“此次离国，实带着苦闷和憧憬而去”，“最伟大的莫过于大众意志的力量”，“深信大众必有光明的前途”。^⑨他的苦闷，是找不到“世界大势”发展的方向和中华民族的出路，但他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

7月14日邹韬奋从上海乘轮启程，历经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苏联、美国，对那里的社会进行了考察。在英国停留的时间最长，有14个多月，除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讲外，大部分时间在英国博物馆里的图书馆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经过对资本主义欧美各国和苏联的实地考察，以及对马列主义的刻苦研读，他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目睹中国国际地位的低下和侨胞遭遇的惨苦，使他“痛心彻骨”。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世界大势”发展的方向和中华民族的出路。他认为，“世

界大势”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同时肯定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他说，这种斗争的“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这样的中心力量才有努力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因为他们所失的就只不过一条锁链”！^⑩显然，他在这里所指的中心力量，是指我国的劳苦大众和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经摆脱出国时的苦闷，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了。

1935年8月，邹韬奋回国。《生活》周刊已于他出国的当年12月16日被国民党政府密令封闭。1934年生活书店创办《新生》周刊，以接替《生活》周刊继续宣传抗日，在他回国前两个月《新生》也被迫停刊，主编杜重远被捕下狱。他回上海的当天，从轮船码头直接驱车漕河泾监狱探望杜重远，两人互相鼓励，决心为抗日救国继续奋斗。

邹韬奋回国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华北各省，8月1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这个号召的影响之下，他于11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重新擎起《生活》周刊的旗帜，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宣传抗日救国，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大众生活》每期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运动发展情况及响应这一运动的文章，鼓励学生再接再厉，继续开展救亡运动。12月18日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邹被选为执行委员。《大众生活》继承《生活》的传统，与读者保持密切的联系，读者来信平均每天约100封，发行量每期20万份，对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

用。国民党故技重演，一方面限制《大众生活》发行，一方面对邹韬奋施加压力。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和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一起找他谈话。他们先是“好言相劝”，见他始终不肯就范，刘健群恐吓说：“老实说，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邹韬奋不过白死而已。”他义正辞严地回答说：“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①不久杜月笙又出面约他到南京和蒋介石“当面一谈”，他婉言拒绝。这样一来，《大众生活》很快于1936年2月被勒令停刊，他被迫再度流亡。

3月，邹韬奋出走香港。7月，他在那里和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直至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②在此之前的6月，他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坚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内战的立场，日销2万份。他为了办报日夜辛苦，但仍然困难重重，不仅经费困难，印刷条件差，而且政治上很受限制。香港的新闻检查很严，连帝国主义这个词都不能用，只能写“××主义”。他不得已，《生活日报》只办了55天，于8月1日停刊。

不久，邹韬奋返回上海，积极筹备《生活日报》在上海复刊。国民党政府在登记问题上制造种种麻烦，他只得将《生活日报周刊》改名《生活星期刊》在上海出版，一面积极参加救亡运动。他与救国会的几个负责人，为支持上海日本

纱厂工人的反日大罢工，多方奔走，并组织了罢工后援会。抗日救亡运动已进一步向前发展，国民党当局却继续采取镇压的政策。

救国会的抗日活动，虽然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仍然遭到镇压。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共7人，时称“七君子”之狱。全国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各界人士纷纷向政府提出抗议。次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⑨罗织成十大罪状，向7人提出公诉。6月开庭审讯时，邹韬奋等人宣称他们救国无罪，对审判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义正词严的驳斥。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风起云涌，不可遏止。7月3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将7人释放出狱。

邹韬奋出狱时，正值“八一三”前夜。他立即着手筹办《抗战》三日刊，8月19日在上海创刊。它一再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抨击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政策。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的宣言》提出后，26日邹韬奋在《抗战》上发表时评《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盛赞这个宣言“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该刊还发表中共负责同志所写的一些文章，报道八路军在敌后战斗的情况等。

11月上海沦陷后，邹韬奋到武汉，继续编《抗战》三日刊。1938年7月，《抗战》三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

合并，改名《全民抗战》三日刊，邹任主编。创刊号上发刊词《全民抗战的使命》中说，这个刊物负有两个使命：“一是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传达解释政府的国策，剖析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际之情势，为教育宣传的任务。另一是使政府经常听到人民的声音，民间的疾苦，动员的状况，行政的优劣，使政府在领导抗战、实施庶政上得到一种参考，为我们的政治任务。”《全民抗战》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每期销30万份。该刊还编印战地版，大量分送抗日部队，以激励士气。这时，邹韬奋已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7月6日至15日在汉口举行第一次大会时，他提了三个提案：一是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二是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三是改善青年训练以解除青年苦闷而培植救国干部。他为了争取言论自由，在讨论第二个提案时，据理力争，几经辩论后，他的提案勉强通过。但大会刚刚闭幕，国民党当局就公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钳制抗日言论。

同年10月邹韬奋到重庆，继续主编《全民抗战》。由于他在参政会上大力进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他主持的新闻出版事业，更加遭到国民党的忌恨。《全民抗战》的送审稿件，常常遭到故意留难，有时无故被“免登”，有时文章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他为了挽救“许多读者所急迫需要的好文章”，几次“走几十里山路”，跑到审查机关去“据理力争”。^④尽管他有时被那些审稿者弄得十分生气，还是坚持将杂志办下去，不愿“自动撤退阵地”。

生活书店从“七七”事变后，大量编印了一些抗日救亡

读物和马列主义书籍，并在重要城市建立了五十多个发行点。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日益猖狂，对生活书店也横加摧残。1939年4月，西安分店被封，工作人员被捕。7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开强迫邹韬奋将生活书店与他们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同时要求他加入国民党，并许以高官厚禄，都被他严词拒绝。接着，生活书店各地的分店不断被封闭，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时，除重庆外，其他50多个分店都被封闭。邹韬奋本人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他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2月25日化装潜离重庆，经衡阳、桂林到达香港。5月，他在香港恢复了《大众生活》周刊。《复刊词》中表示，要不惜一切牺牲，鼓吹宣传进步的、有利于民族前途的措施，对于退步的、有害于民族前途的现象“不能默尔无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邹韬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帮助下，于1942年1月9日离开香港到东江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国民党已密令各地特务搜索他的行踪，“就地惩办”。^⑤4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帮助下，离开东江根据地，匿居广东梅县乡间。9月，他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离开梅县，10月到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他已患耳疾，发病时痛得坐卧不宁，但仍坚持参观访问、调查研究，还写文章，发表演说，赞扬抗日根据地的光明，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

194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对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大扫荡。这时，邹韬奋的耳疾日益严重，经诊断发现患的是癌症，乃秘密赴上海治疗。经过手术和放射治疗后，1944年2

月病情稍轻，他坚持在病床上写《患难余生记》。一个多月写了约6万字，因病情恶化不得已搁笔，未能尽稿。6月1日他口述遗嘱，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并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追认为共产党员，将其骨灰移葬延安。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去世。9月28日中共中央电唁邹韬奋逝世并追认他入党。

邹韬奋一生著述极多，生前大都已编印成书。解放后编辑出版了《韬奋文集》，共3卷。

注：

- ① 《生活》周刊第2卷第1期，1926年10月。
- ② 《本刊与民众》，《韬奋文集》（1）第6页。
- ③ 《经历》，《韬奋文集》（3）第75页。
- ④ 同③，第76页。
- ⑤ 穆欣：《邹韬奋》第66页。
- ⑥ 《韬奋的思想发展》（代序），《韬奋文集》（1）第12页。
- ⑦ 毕云程：《邹韬奋五周年祭》，《世界知识》第20卷第6期，1949年7月22日。
- ⑧ 《不相干的帽子》，《韬奋文集》（1）第64页。
- ⑨ 《萍踪寄语》（初集），《韬奋文集》（2）第9页。
- ⑩ 《萍踪寄语》（三集），《韬奋文集》（2）第219—221页。
- ⑪ 同⑤，第161页。
- ⑫ 《生活知识》第2卷第6期。
- ⑬ 《“七君子”事件》，时代文艺社1937年8月版第15页。
- ⑭ 《抗成以来》，《韬奋文集》（3）第192—193页。
- ⑮ 胡耐秋：《韬奋的流亡生活》第93页。

马叙伦

宗志文

马叙伦，字夷初，号宦香，浙江杭州人，1884年4月27日（清光绪十年四月初三）生。他的父亲马琛书是一名秀才，多次乡试不举，很不得志。马叙伦幼年入塾读书，十岁时父亲去世，靠母亲作女红和父亲的朋友资助继续上学。1899年进杭州养正书塾学习。1901年养正书塾改为杭州府中学堂，加设师范班。他入师范班，在这里一面继续学习，一面教刚入学的新生。课余则博览群书，阅读西方的《天演论》、《法意》、《民约论》和反清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明夷待访录》等，逐渐萌发了推翻清廷统治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想，立志毕业后到日本学习陆军，从事革命活动。不料1902年临毕业前两个月，因为学校无理开除同学的事，他打抱不平，帮同学说话，触怒了学校当局，被学校除名。

同年夏天，马叙伦到上海，先是帮助维新派蒋智由编辑《选报》，不久又参与编辑《新世界学报》，两者皆带有反清革命的倾向。他还常常参加蔡元培创设的“爱国学社”在张园举办的讲演会，听章太炎、蔡元培等人的演说。这些人大声疾呼推翻清廷统治的主张，更加激发了他的革命思想。1904年他回杭州结婚，在新房中挂了一副自撰的对联：“卿桴独立鼓，我揭自由旗”，大胆地表示了自己争取民主，反对封建的

愿望。婚后，他在杭州、江山、诸暨等地教书。1906年到广州，先后在两广师范馆及两广方言学堂教书。1909年回到杭州，在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杭州这时已有反清秘密组织，他的朋友有不少人参加。他时常参加他们的秘密会议，一起议论国事。同年底加入“南社”。这时，他读到一本孙中山的传记《孙逸仙》，革命情绪更加高昂。翌年春天与朋友游西湖，在游船里吟诗，他在一首诗里抒发自己对反清革命必胜的信心说：“一击满湖烟雨破，谁家天下举杯看。”

1911年夏天，马叙伦随老同学汤尔和去日本游历。马的目的是“要找章太炎先生”，与章相见后“谈得火热”。不久，马经章介绍参加同盟会。9月马回国，适逢江浙人民反对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马和几个同盟会员一起，乘机扩大事态。他们借得几个股权，参加铁路局召开的股东大会，控制会场，取得了反对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的胜利。

武昌起义后，马叙伦和几个同盟会员在杭州筹办民团，准备响应起义。11月5日浙江光复，马被邀担任都督府秘书。他刻了一颗“浙军都督府都督之印”，携带封条，将大清银行、布政司、盐运司等前清衙门次第查封了。次年他任都督府印铸局局长。不久，因与该局公报总纂杭辛斋等人意见不合而辞职，仍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他的辞职，也还有思想上的因素。他过去读《高士传》、《独行传》、《逸民传》，又受到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产生了“超然物外”的思想，“想做一个高人逸士”。辛亥革命后他认为：“现在满清被推翻了，革命的目的达到了，以后是怎样建设中华民国了，应分让‘学有专长’的人们去做，我还是做教书匠，在我的岗位

上工作吧。”^①

1913年春，马叙伦到北京，在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当国文教员，随后又到北京大学文学院教课。“二次革命”失败后，8月章太炎在北京被袁世凯软禁。马叙伦经常去探望他，两人“一谈就是一天”。特务监视的时候就谈孔孟，谈老庄，谈佛学，谈理学；特务一放松监视，他们就商量倒袁的事。章太炎有一次消极绝食，还是马叙伦劝过来的。1915年初袁世凯图谋称帝的消息传出后，马曾动员从前在两广方言学堂的学生廖容回广东组织武装力量起兵讨袁。廖回广东后，马写了一篇讨袁檄文寄廖。云南起义后，这篇檄文曾在香港报纸上发表，对起义起了声援作用。年底，马辞去北大和医专的教职去到上海。

1916年6月袁世凯败亡后，马叙伦再回北大任教。他授课之余，潜心著述，写了《老子校诂》、《庄子义证》，还着手写《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五四运动爆发后，马积极支援学生运动。他走出书斋，参加社会活动，被推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会联合会及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两个组织的书记，不久被推为主席。马曾代表教职员会联合会看望被拘禁的学生，向他们发表演说，鼓励他们进行斗争，并代表教职员会联合会同政府当局进行谈判，呼吁当局释放被捕学生。

1920年春季，北京大中小学教师因北洋政府长期拖欠薪金，向政府发起索薪运动，组成“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会联合会”，马叙伦又被推为主席。在他主持下，索薪运动不断发展，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1921年6月3日，北京各校教职员上万人前往总统府，要见总统徐世昌，

要求政府发还积欠薪金。马叙伦走在队伍前列，在总统府门外遭到军警毒打，头部受重伤，被送进医院。徐世昌还扬言要向法院控告马叙伦毁坏他的名誉。大家设法将马迁入东交民巷德国医院。不久他出院，仍然主持北京教职员联合会的工作。后因头部伤未痊愈，年底请假回杭州休息。

马叙伦回到杭州时，正值浙江第一师范闹学潮，无人愿任该校校长，浙江教育厅再三邀请马担任，他只得应命。马任一师校长后，推行北大“教授治校”的一套办法，受到全校师生的一致拥护，学潮遂平息。当时，浙江教育相当落后，马有意进行改革。1922年夏，经蔡元培等人推荐，马任浙江教育厅长。他认为办好一省的教育，首先要办好各县的教育，曾亲自到萧山、绍兴等县视察。9月，王宠惠署理国务总理，汤尔和入阁任教育总长，马叙伦应汤尔和之邀任教育部次长。11月王宠惠被迫下台，马叙伦亦随之辞职。这时，国民党在北京已开始公开活动，马叙伦被任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的宣传部长。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马因事未能参加，曾建议孙中山为国民党掌握政权早作准备，设立调查和研究机关，免得将来措手不及。

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黄郛任国务总理，易培基任教育总长，马叙伦第二次出任教育部次长。不久临时执政府成立，段祺瑞任执政，马叙伦任国务员，代理教育部部务。当时他不愿在军阀政府任职，有人劝他说：“教育部关系革命很大”，不应放弃，他才继续干下去。年底，教育部收到一份内政部要查办“共产党首领”李大钊的密件，他有意压下，使李大钊幸免被捕。

1925年3月，段祺瑞任命唐继尧为教育总长，唐派他的代表王九龄到京赴任，马叙伦辞去教育部职务，仍回北大任教。五卅惨案后，马联合各界人士组成北京五卅惨案后援会，积极响应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11月，一部分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自行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通过一系列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决议。北京的国民党分裂。马叙伦站到西山会议派一边。他说：“我虽然信仰社会主义，却不赞成暴动政策……我因此也参加了西山派。”^②1926年初，北洋政府的教育经费仍然常常无着。马叙伦提出教育经费独立的主张，和一些朋友拟定了一个教育特税提案，交到国务总理许世英那里，得到许的赞同，并经国务会议通过，还发表马任督办教育特税事宜。不久“三一八”惨案发生，马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被迫躲进东交民巷。随后化装离开北京回到杭州。此后，他脱离了西山会议派。

北伐战争开始后，马叙伦动员他的老朋友浙江省长夏超参加国民革命，并代夏到广州与国民政府接洽，国民政府委夏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理民政事宜。夏超宣布独立，马叙伦出任浙江建设厅长。不久夏超兵败，马遭孙传芳通缉，逃到上海。

1927年2月，北伐军进入江浙一带，浙江省政府成立，马叙伦被任命为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民政厅长。他有心改革浙江吏治，很重视县长和警察所长的挑选。为了防止这些人贪赃枉法，他主张增加他们的薪俸，增加行政经费。当然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后来他认识到必须“从制度上根本解决”，曾说：当局“无明察之才，公平之度，恳挚之情，严峻之刑，不

掣之权，皆不足以矫枉而反正；且如堂高廉远，不与百姓相接触则亦不能济也。”^③1928年底，马叙伦任教育部次长。因国民党当局不经国民政府行政院一再直接发命令到教育部，马叙伦不满，1929年冬辞职而去。事后赋诗一首：“袍笏登场又一回，未酬素志鬓丝衰。身无媚骨难谐俗，从此柴门不再开。”表示不愿再作国民党政府的官了。1930年暑假后，再回北大教书。

“九一八”事变后，马叙伦痛感河山破碎，极为悲愤，常常写诗抒怀，排遣内心郁闷。1933年“九一八”国耻纪念日时，他写了一首七绝：“可怜歌舞弃金城，边月仍圆岁月更。我自年年歌当哭，旁人错认绕梁声。”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华北，在北大教授举行的抗日问题讨论会上，马叙伦积极主张抗日，与胡适等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2月，马约集当时北平高等学校一些主张抗日的教授，组织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被推为主席。适逢“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他为了支持北平学生的抗日活动，日夜忙碌，终于累病了。胡适等人乘机要他休假一年，实际上是要他离开北大。他愤而辞职，回到杭州。

“七七”事变后，马叙伦带着家眷避乱到上海，在之江大学（由杭州迁沪）教课。上海沦陷后，他改名邹华孙，隐居上海，从事著述。他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30卷，约240万字，就是在这个时期定稿的。1939年12月，汪精卫、陈公博等在上海筹划降日卖国。陈是马叙伦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他义不容辞地找陈谈了一次，劝他停止卖国活动。陈多方狡辩，还请马叙伦出来帮忙，他断然拒绝说：“我是决定不出来

的。”后来他在上海贫病交加，陈多次派人送米送钱，他都拒绝接受。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叙伦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发动内战大失所望，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他撰写文章、发表演说，大声疾呼：“我们中华民国过了三十四年，仍然是独裁政体，我们老百姓享受的生活仍然是不民主的。”^③1945年上海一部分进步的文教界人士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不久，以他领衔的上海文教界61位著名人士，发表了《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要求美国人民推动美国政府协助中国建立包容全国各政治党派在内的政府。随后，他又和郑振铎一起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提出八点要求，主张立即停止内战，实现政治民主。马叙伦的正义言行，遭致了国民党当局的痛恨。1946年5月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时，民主促进会排斥在会外。6月23日，以马叙伦为首的十人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车到南京下关车站，几百名暴徒蜂拥而至，殴打代表团成员，马叙伦受伤住院。

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马叙伦异常悲愤。他说：“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它好象春天的草，生生不绝”。^④还说：“我的历史一部分正和李、闻两先生相同，我自然预备接受一颗子弹，但是我也预备还他一个原子炸弹”。^⑤他继续在大学里演讲，抨击国民党当局。有一次他说：“我知道今天台下有许多带手枪的特务，我不怕，我还要讲话。”^⑥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非法解散中国民主同

盟，环境异常险恶，马叙伦随时有被暗杀的可能。他接受一些朋友的劝告，暂时转移到香港。他在香港同王绍鏊等筹划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港九分会。1948年10月，马叙伦转入东北解放区，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1949年9月，马叙伦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被任命为教育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外，他还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

1970年5月4日，马叙伦卧病十多年后，在北京逝世。

马叙伦的著作有：《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老子校诂》、《庄子义证》、《石屋余沈》、《石屋续沈》、《我在六十岁以前》等。

注：

- ①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44页。
- ② 同①，第94页。
- ③ 马叙伦：《石屋续沈》，上海建文书店1949年版第175页。
- ④ 《马叙伦言论集》山东新华书店1946年版，第2页。
- ⑤ 周建人等：《爱国革命不断奋斗的一生》，《民进通讯》1980年第5期，第5页。
- ⑥ 同④，第51页。
- ⑦ 同⑤。

侯 德 榜

熊尚厚

侯德榜，字致本，1890年8月9日（清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生，福建省侯官（今福州）人。父亲以种田为业，家境贫寒。他7岁入塾读书，课余帮助家里做些农活，从小养成刻苦耐劳，勤俭朴实的作风。二年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在家帮助父亲种田。嗣后得开药店的姑母资助，于1904年考入福州英华书院。他聪敏好学，成绩门门优秀，尤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最浓。1906年他在英华书院毕业，升入上海闽皖两省铁路学堂，学习铁路土木建筑专业。1909年毕业后，分配到安徽符离集津浦路工务段工作。那时，铁路大权掌握在帝国主义者手中，中国人受其任意摆布。具有爱国心的侯德榜，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社会思潮影响下，暗下决心要走“科学救国”的道路。1913年他考取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翌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赴美，入马萨诸塞州（即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1917年毕业，随入普郎特专科学校深造，专修制革，取得制革化学师证书。翌年，又升入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系为研究生。1921年撰著《盐铁鞣皮法》论文，获博士学位。

当时，天津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范旭东正在塘沽开办永利碱厂，由于不能掌握长期为国际碱业垄断集团所控制的苏

尔维制碱法，建厂中困难重重，遂派永利碱厂筹办人之一陈调甫前往美国考察碱业，并物色技术人才。陈到美国后，经湖南钨矿出口商李国钦的介绍，与侯德榜结识。侯倾听了陈调甫讲述永利在建厂中的困难，激起了他长期抱有的“科学救国”的夙愿，毅然接受永利公司的聘请，由制革转而从事制碱业。他同徐允钟等人参照美国工程师孟德（W·D·Mount）提供的制碱厂蓝图，结合国内的实际，先在美国完成永利碱厂的设计，并向英美等国订购碳酸气压缩机等设备，随后即回国参加安装。范旭东请他担任永利碱厂技师长（即总工程师）兼制造部部长。从此，侯以永利为基地，为祖国的化学工业辛勤奋斗了一生。

侯德榜到永利碱厂后，立即废寝忘食地工作。面对故障重重而无法正常运转的制碱设备，他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日以继夜地调试各种机器，寻找种种故障。对于碳酸氢钠堵塞在碳酸塔内，或是湿碱在干燥锅里结疤等现象，一一探究其原因。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对机器的许多部件加以掉换、改进或重新设计制作，反复试验，排除种种障碍，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

永利碱厂于1923年首次投产，但质量仍未过关。经过侯德榜等继续努力试验和改进，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永利红三角牌纯碱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冲破了英商卜内门公司的垄断，出口日本。1926年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获金质奖，随后又在美国建国150周年举办的国际博览会上得奖。永利制碱的成功，振奋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奠定了我国民族

化学工业发展的基础。

侯德榜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后，又在塘沽做了大量实验工作和数据的整理，将制碱各方面的化学问题详加分析研究，决心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给全人类，遂总结自己的经验，写出书稿。1931年，他去美国考察与进修，翌年在纽约以英文出版了这部科学专著，书名是《Manufacture of Soda. Monograph Series No. 65》（《纯碱之制造》）。此书的出版轰动了国际化工界，他系统地将制碱技术公诸于世，为世界的创举。美国化学家E·O·威尔逊称：“这是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所作的重大贡献。”^①

1932年，侯德榜从美国考察回国，又为永利设计和主持新建了苛性碱厂和机械厂。苛性碱用永利所出纯碱和石灰石为原料，初因缺乏经验，产品质量欠佳；他同几位技师日夜研究改进，结果所出产品也大受国内市场的欢迎。在这期间，侯德榜曾在天津北洋大学兼课。

1934年3月，永利、久大等扩充成立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决定在南京卸甲甸兴建硫酸铔厂。为此，侯德榜等一行6人于4月赴美。他与美国氨气工程公司反复商讨硫酸铔厂的设计方案，又购运器材设备，安排人员实习培训，还亲至各地硫酸铔厂考察，每天工作达十一二小时。在谈判设计合同时，凡有损自主权的苛刻规定，均加拒绝，力求技术设备上的自主与学术上的独立；在采购机器与器材时，对于国内能自制的机械均不订购，非买不可者，则细心比较，择其质地优良而又适合国内需要者取之；凡秘密的专利，又为工程所必需者，则不惜高价收买。直至1936年3月，始将此项任务完成。

他被永利公司同人赞为工程师的“祭酒”。^②中国工程师学会1935年在广西南宁开会时，决定授予他荣誉金牌；翌年该会又授予工程金奖章。

侯德榜回国后，专任南京硫酸铔厂建厂指挥之责，工程进行极度紧张，他团结国内外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奋战，对已安装的机器一一亲自检查。1936年底，主要工程顺利竣工，翌年2月开始试车投产，日产硫酸铔200吨，硝酸40吨。这座东方最大的第一流现代化联合化工企业的建成，对我国民族化学工业的发展和壮大，具有重大意义。

南京硫酸铔厂开工未及半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向我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1937年冬，铔厂3次遭到日机的低空轰炸。当时，南京金陵兵工厂急需硝酸铵制造炸药，侯德榜立即在技术上解决难题，转产硝酸铵以供抗战军需。他时常在敌机空袭警报未解除时，冒着生命危险进厂，工厂被炸后又立即指挥员工进行抢修，坚持生产。上海沦陷后，南京告急，他组织技术人员将图纸资料及重要仪表、小型设备及器材赶运内地，将工厂蓝图埋在厂内团山下。直到南京陷落前夕，他才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厂，撤往四川。

1938年初，侯德榜在范旭东的支持下，在四川五通桥等地筹建新的化工基地。在战时人力、物力、财力均感困难的条件下，他含辛茹苦，以艰难的步履开始了新的历程。在四川，制盐的原料是卤水，成本比塘沽的海水高许多倍，如果沿用苏尔维法制碱，成本太高。为了寻找新的制碱工艺，提高盐的利用率，他与几位工程师随同范旭东一起前往德国考

察，旋又去美。他在美国进行合成铵工业和制碱工业联合成一体实验与研究，首先从实验入手，根据德国察安法的要点逐一进行实验，复核其数据，进行新的探索。1939年，他派人在香港设立实验室开展工作，自己仍在纽约埋头于研究。经过500多次的反复实验，分析了2000多个样品，大致确定了这种联合制碱技术的新工艺。翌年又在纽约和上海租界进行扩大实验。1941年终于完成了联合制碱技术的研究工作，随即聘请美国氨气工程公司（N. E. C）进行川厂合成氨及氨气加工等车间的设计，在四川五通桥建厂。他与在纽约的工程师一起，共同做了大量设计、采购等工作。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学识，他还前往美国机械工程学会（A. S. M. E）的夜校去进修机械学、电气及结构工程学。

侯德榜发明和创立的联合制碱技术，是把合成氨工业和制碱工业合成一体，把间断生产改成连续生产，缩短了工艺流程，提高了原料利用率，能同时生产出纯碱和氯化铵，降低了生产成本，是世界化学工业的一项重大发明，使苏尔维法和察安法皆相形见绌。1943年3月，永利厂务会议决定将这项联合制碱技术命名《侯氏制碱法》。同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荣誉会员的荣衔。以后他又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荣誉会员、美国化学工程学会荣誉会员、美国机械工程学会终身荣誉会员等称号。1944年巴西政府聘请他前往指导建设碱厂，其后印度塔塔公司制碱厂也聘请他去解决重大技术难题。他还为南非建设纯碱厂进行勘察与设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侯德榜急往南京察看硫酸铍厂，又去塘沽碱厂视察。面对惨遭日本侵略者摧残的各厂，

他决心加倍努力恢复和重建我国的化学工业。10月，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在重庆病逝，他接任该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翌年，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整个社会经济还没有得到恢复又陷入战争境地，侯德榜领导永利职工惨淡经营，备尝艰辛，费了两年时间，才使各厂先后开工生产，但产量未能达到战前水平。南京铔厂经过他和副总经理李烛尘一再催促国民党政府，才向日方索回被劫往九州的成套设备，但由于焦炭和电力的不足，产量仅及原设计的一半。在此艰难处境之下，他仍力图实现范旭东建立十大化工厂的遗愿。1946年3月，他再度赴美，一面争取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一面为新建湖南株洲等十大化工厂进行设计和采购。由于美方对贷款及技术设备的蓄意刁难，使他在美国的奔波收效甚微。

侯德榜对美国的资金、技术及物资设备所抱希望落空后，决心立足于自身的力量，恢复和发展永利的事业。1948年7月，他回到国内，以年初同李烛尘等发起成立的“久大永利黄海永裕协进会”作枢纽，对企业进行一系列的革新：在南京铔厂扩建化学试验室，成立致本化学馆，加强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于总管理处设置事务管理委员会，加强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充实塘沽、长沙、青岛、南京等地企业的设备和技术。8月底，他前往四川指导川厂的生产及深井工程，对键为的深井工程寄予希望，以为只要再打几口井，运到了进口的机器，就可用侯氏制碱法大踏步前进了。他表示：“若今日中国尚有一枝可栖，宜应如何埋头苦干，以求生存于万一，得自助以苏生。”^⑩然而，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于1948年8月

实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发行金圆券，公开搜括全国人民的资金，加速了社会经济的总崩溃，民族工业处于毁灭的境地，侯德榜“自助以苏生”的愿望，亦同样地落空。他说，“瞻望前途，长此兵争不息，通货膨胀无穷极，有何工业可言？欲求国家强盛，人民生计充裕，尤缘木求鱼。”^①

1949年春，侯德榜应印度塔塔公司的邀请，再次前往印度指导制碱技术。当获悉南京解放的消息时，他感到无比兴奋和喜悦。6月，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派专人前往召请，他立即由印度启程回国，排除万难，经香港绕道南朝鲜到达北京，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接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侯德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继续为我国的化学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撰写了80多万字巨著《制碱工学》，将其一生的制碱心得贡献给人民。195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工业部技术顾问、化工部副部长；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代表；并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二、三届常委。他还先后担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科学协会副主席、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等职。

1974年8月26日，侯德榜病逝于北京。

注：

① 转引自姜圣阶等：《化工先驱 功业永垂》，《人民日报》1984年11月1

日第3版。

- ② 《范旭东先生所经营的三大事业》，《新世界》月刊1944年第7号。
- ③ 侯德榜：《为李直卿先生加入本团体敬告同人书》，《海王》旬刊1948年第33期。
- ④ 《海王》旬刊1948年第33期第514页。

谢 无 量

杨伟立 马宣伟

谢无量，原名蒙，号希范，字无量，1884年6月28日（清光绪十年闰五月初六）出生于四川乐至县。他的父亲谢维楷，系拔贡出身，先后在安徽当涂、桐城、芜湖等县任知县。谢无量4岁时随父母去安徽，由父亲教他读唐诗，日课五绝一首；也读经书，学作八股文。12岁时，他已经阅读了许多中国古籍，特别爱好史书，喜论古今兴亡成败史事。1896年，具有维新思想的汤寿潜携马一浮到安徽，谢拜汤为师，与马结为朋友。汤熟习时务，研究经世之学，对谢启发甚多。

少年谢无量具有强烈的求知欲，读书之外，还想到外地游历，开扩眼界。1900年6月，他第一次出游，取道上海转北京。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谢目睹慈禧、光绪出奔时沿途骚扰情况，后来回忆说：“此次以数月之时间，所历途程数千里，经过黄河、太行之险，游踪所至，饱看北方民生疾苦，及满清封建统治种种对我民族摧残之事实，第一次启发我革命意识，是为我少年时代的一件大事。”^①

1901年，谢无量绝意科举，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特班学习。课余，与马一浮等创翻译会社，编辑出版《翻译世界》杂志，内容多系世界名著，也有社会主义书籍，月出一册，共出了6册。这时期，他颇受新潮流影响，结

识章太炎、邹容、章士钊诸人，为《苏报》撰稿，参加“爱国学社”举办的讲演会。1903年6月“苏报案”发生后，谢离开上海去日本学习。不久，马一浮从美国到日本，送谢《资本论》第一册，这是谢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开端。1904年3月，谢从日本回国，欲觅山水秀丽之地读书，先后寓居镇江焦山、杭州西湖，也在当地学校任教。1906年7月，谢重游北京，担任《京报》主笔，每天撰写社论一篇，评论时事。

1909年，谢无量被聘为四川存古学堂监督（即校长），兼授词章一科，潜心研究文学。时年25岁，在教师中最为年轻，与尊经书院的年长者廖季平、吴伯揭等人结为忘年之交，深相契合，人称他为“小谢”。

同年10月，四川成立咨议局，谢无量常和蒲殿俊、张澜等一起参加立宪运动。他曾受托撰《国会请愿书》，指出：“天下情势危急未有如今日之亟者，内则有盗贼水旱之警，外则有强邻逼处之忧。”“当局宜博咨天下之贤士，群策群力，急起直追，以救危亡于万一。……亟盼速定大计而开国会以顺人心。宗社安危，在此一举。”^⑤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并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合同”，向帝国主义拍卖铁路主权，激起全国特别是湘、鄂、粤、川人民的愤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6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成立保路同志会。8月下旬，成都开始罢市、罢课、抗捐、抗粮。谢无量和蒲殿俊、杨沧白、张澜等人加强联系，参加保路运动。

1912年夏间，谢无量离川赴上海，为中华书局编书，陆

续出版《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1917年经杨庶堪、熊克武介绍，谢无量曾在上海谒见孙中山，谈论颇为融洽。五四运动爆发后，谢无量对新文化运动持支持态度，经常在《新青年》发表诗作，并开始用白话文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国学小册子数种，其中《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收入《万有文库》时改名《马致远与罗贯中》）一书颇为鲁迅所称道；连同《楚词新论》、《古代政治思想》三种为孙中山所赞赏。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筹议北伐及改组国民党。谢无量适于此时游粤，先受聘在广东大学教书，不久受孙中山委任为大本营参议。同年秋，谢奉孙中山派遣，与孙科、陈剑如到沈阳见张作霖，商量讨伐曹锟、吴佩孚问题，达成讨直协议。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5月谢任大元帅府特务秘书（即机要秘书）。11月，随孙中山北上。

1926年7月，谢无量转入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任教，兼历史系主任，讲授“历史研究法”，“以唯物史观为主，痛驳梁启超之历史研究法，是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第一讲座”。^⑩1927年9月谢转入上海中国公学任教。1930年，谢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谢无量在上海办《国难月刊》，主张改组政府，彻底抗日。1932年“一二八”事件的第二天，谢即把《国难月刊》改为《国难晚刊》，每天著文痛诋蒋介石、汪精卫的不抵抗主义。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蒋、汪退让，民情益愤。在抗日救亡声中，谢无量写成建设四川的《意见书》。他认为中国有两个致命弱点：（一）中国的经济和

政治中心都集中在沿海一带，一旦发生战争，敌人在短期内即可从海空轰毁，制我于死地；（二）中国没有大陆上的交通干线，国际交通全靠上海、天津等几个重要商埠，对外作战期间，易为敌人封锁，使中国坐困以毙。他说，要排除这两个弱点，中国必须在内地建设工业基础，同时开辟贯通大陆的铁路干线。在此基础上，再以四川为中心建设西陲（包括川、滇、黔、康、藏、青、新7省）。西陲的建设，应从建设大规模的工农业着手，农业包括粮食及工业原料的生产，工业包括轻重工业、化学工业及军事工业等。如此，西陲进可以成为建设整个中国的基础，退可以作为复兴中国的根据地，这是一条民族生命线。《意见书》中还提到开辟新的大陆国际交通干线和新的经济中心——大成都市的建设问题，以及如何宣传教育、集中民间财力、设立银行网、推行信用制度、吸收康、藏、新、青的金货投入建设等问题。谢无量关于建立强大后方的见解是卓越的，但是当时四川的军阀正忙于内讧，没有采纳这些意见。

1936年1月，沈钧儒等在上海组成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谢无量参加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谢去香港，原打算游历南洋，未能成行，在香港卖字为生。不久辗转取道广西，经衡阳回四川。1940年，谢无量到成都，任四川大学城内部中文系主任，仍以卖字补贴生活。常与乐山乌尤寺所办复性书院的马一浮以诗歌相唱和。

1947年，谢无量当选为国大代表，在南京开会后，住在上海以卖字维持生活。1949年2月回到重庆，应熊克武之邀担任中国公学文学学院院长，暑假后回到成都，静候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无量先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文史馆研究员，1960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3年12月10日，谢无量因病在北京逝世。

谢无量一生著作甚多，主要有：《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佛学大纲》、《伦理学精义》、《老子哲学》、《诗学指南》、《诗经研究》、《楚词新论》等。

注：

- ① 谢无量：《自传》（手稿本），陈雪涓藏。
- ② 陈雪涓提供之资料。
- ③ 谢无量：《诰授中宪大夫谢公绶嗜行状》，《乐山县志》。

陈 达

汪仁泽

陈达，字通夫，1892年4月30日（清光绪十八年四月初四）出生在浙江余杭县的一普通农民家中，父母都不识字。陈达7岁时，在村里的私塾就读，14岁进余杭县立高级小学，学习勤奋，3年毕业。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杭州府立中学（后来改名为杭州第一中学），插班读二年级。

1911年，陈达在杭州考取清华学校公费留美预备班。次年赴北京，在该班学习4年，1916年毕业后，由该校公费保送到美国留学。先在立德学院学习两年，获得学士学位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系。鉴于我国人口众多而国家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他抱着谋求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愿望，选择了该系的人口和劳工问题专业。1919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在该校研究院深造。其间他发表了有独特见解的论文多篇，引起美国学术界的注意，并得到好评。1923年，该校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此时曾有人以优越的待遇请他在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但是他本着“人口救国”、学以致用、学以致用的初衷，决定回国。

1923年秋陈达回国后，任教于母校清华学校，讲授《社会学原理》。他宣传国人应节制生育，降低人口出生率，以摆脱贫困的现状，始自此时。他调查了清华园内校工的生活状

况，在校刊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为文科的研究方法作出了良好的先例。1925年美国学者发起筹组“太平洋学会”，在夏威夷火奴鲁鲁召开成立大会，陈达以个人会员的身份出席，会后赴福建、广东调查劳工问题。1928年，清华改为国立大学，陈达就任该校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聘了著名学者潘光旦等人到系任教，以加强该系的师资力量。1929年春，再次到闽粤等地搜集劳工问题资料，著《中国劳工问题》一书出版。同年冬，被邀往夏威夷大学讲学，回国途经日本、朝鲜，曾考察当地劳工状况。1931年5至8月，陈达在上海、无锡调查工人的生活概况，并研究工厂法。次年他与友好数人在北平组织妇婴保健会，成立节育指导所，在报刊上创办“人口副刊”，加强了节制生育和提倡晚婚的宣传。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标榜“教授治国”，任命陈达为内政部户政司司长，陈达视事数月，以官场人事关系复杂悄然离去，仍回清华执教。

1934年冬，陈达去爪哇、邦加岛、马来亚、新加坡、暹罗、柬埔寨等地，从事南洋华侨问题的研究达半年。1935年夏，他趁休假一年之机，先至苏联、后又去西欧诸国考察，特别注意调查了德、意等国的劳工状况，以及苏联的国营工厂和集体农庄的工农劳动情况。他在参观苏联教育委员会所属的中央研究院后，曾在纪念簿上题词：“关于苏联的教育工作，留给我极深刻的印象，苏联的教育家无疑的要陶冶（年青一代的）新人格，应付新生活。”^①表达了他对苏联教育制度的向往。其后又去印度，调查加尔各答地区的农民状况。经过这一年的考察，他发表了多种调查报告和有关专论。

陈达在人口和劳工问题上认为：达尔文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学说是不可移的定律。他以之运用于我国，提出了生存竞争和成绩竞争的理论，认为只有取得生存竞争的胜利，才能进一步求得成绩竞争的胜利；反之，如果能够取得成绩竞争的胜利，一般讲，也就更容易求得生存竞争的胜利。针对我国人口众多、贫困落后的状况，他认为要达到国富民强，必须对人口的增长加以控制：“生存竞争与人口数量有密切关系，因人口有大量的增加，或增加率太快时，对于人民的谋生，当然要发生恶劣的影响。”^②对于劳工的就业问题，他也认为如此，因此：“人口的数量务求减少”。^③他主张实行“对等的更替”，即一对夫妇生育子女不超过二个。同时他还主张不断提高人口的质量，人口品质愈提高，社会的经济、文化也就能愈加发展。他这时的人口、劳工理论，还远没有认识到与社会制度、国家性质的关系，因此他的“人口救国论”在当时也和“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一样，是无法实现的。

1937年抗战爆发后，11月陈达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在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学合组的临时大学继续任教社会学。1938年初，又随校绕道广州、香港，经海防迁到云南。三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蒙自上课，陈达除任教社会学外，又兼任清华大学所属的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直至抗战胜利。该所设在离昆明20公里的呈贡县城内的文庙里，陈达携眷住在该庙的后院。该所从1939年初成立后，曾在呈贡县先后举办人口普查试验、人事登记、农业普查（逐户调查耕地面积、灌溉方式、作物种类，然后再选样调查使用肥料、农具及收获

物市价等)、户籍及人事登记调查等多项学术性的调查研究工作。每次调查,从拟订调查计划,与各方联系洽谈,训练调查员,巡视、检查工作,直到统计、总结等,陈达都亲自参加。当时交通不便,有些地区尚须骑马代步,有时他一天要骑行8个多小时;同时每周还需上课一、二天,因此备极辛劳,曾因劳累过度,在工作途中昏倒两次。^④1942年10月至1943年7月,作为学术研究,国情普查研究所又与国民政府内政部、云南省政府合办云南环湖市县户籍调查工作,动员了工作人员达千余人,调查对象涉及一市三县的60万居民。

抗战胜利后,陈达进行大规模的工人生活现状的调查。1946年,他在上海选择沪南、闸北等5个区,先普查了1500多家工厂、14万多工人;然后进一步深入调查了纺织、面粉、卷烟等40种工业的240家工厂。调查的项目包括工人实际收入、计件和计时工资、工人生活史等12个方面。

陈达治学谨严,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坚持调查实际的科学态度。他对所有调查资料,都要经过审核、复查、订正等步骤,然后再分类统计、列表。他为了弄清旧中国自然灾害对人口的影响,查阅了十几种古书典籍和近代资料,包括《图书集成》、《通志》、《通典》以及海关报告、华洋义赈会会刊、各种报刊杂志等,从而取得了从公元前200多年到抗战前共计2000多年来水、旱灾的发生次数,并得出比例数越往后越严重的规律性资料。在学术研究上他主张专一。他自从留美时选定社会学中的人口和劳工问题作为自己的专业后,半个多世纪锲而不舍,几乎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于此。他曾说:“我觉得一个人不容易通,我的办法是一条路,

要走一条路才有成绩和贡献。”^⑤1947年初，他应邀往美国参加普林斯顿大学成立200周年校庆，事后至芝加哥大学讲学。他在国际学术界中具有一定声誉，先后担任国际人口学会副会长、太平洋学会东南亚负责人、中国分会研究干事等职。

陈达长期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纯学术研究，是“清高”的工作，可以不问政治，因此常常自称：“我真是一个道地的无党无派者。”但是1946年7月15日，昆明发生了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使他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闻一多是他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在昆明的住所仅是一墙之隔。那天下午，两人同时出门，三小时后陈达回家不久，闻一多已被暗杀，陈达悲愤填膺。从此他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不论在平时或课堂里讲到国内现状时，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国民党是不行！”1947年2月，他参加了清华、北大13位名教授联合签名的抗议国民党当局侵犯人权的宣言。^⑥1948年6月，他又参加了北平各院校教授104人联名抗议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对开封平民滥施轰炸，残杀师生的反动暴行。^⑦1948年底，他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用飞机接他南下的企图，坚持留在清华园，迎接北平的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陈达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社会学的研究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为指导，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好的一部份应加吸收，不好的部份要加以批判”。^⑧1952年他改任中央财经学院劳动经济专修科教授，一年后转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专修科教授。次年又改任中央劳动部劳动干部学校教授兼副校长，并被任命为中央劳动部保护司副司长，当

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刊《教学与研究》以及其他杂志上发表了《上海工人的生活费（1929—1948年）》、《上海的劳资争议与罢工（1937—1947）》、《如何进行专题调查与研究》等多篇调查报告和专论，提出在大专院校恢复社会学系科的建议，并多次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的主张。后者与马寅初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的主张不谋而合。1957年5月，他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节育、晚婚与新中国人口问题》一文，再度论述推行节育和晚婚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并附列了“20个国家最近出生率”，“日本出生率的下降”、“云南呈贡结婚年龄”等国内外各种统计表共18张以资说明。^⑨是年7月，“反右斗争”开始，他和马寅初同样受到错误批判。此后他不能上讲台和发表著作了，但仍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衔，后来又担任了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委员。他继续从事人口和劳工问题研究，孜孜不倦地埋头整理和撰写，一直工作到他去世，完成了150多万字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史》、《解放区的工人生活状况》等多种著作。1975年1月26日，他在家沐浴时突然病逝，终年84岁。1979年7月，他和马寅初同时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

陈达一生培植了许多社会学人才，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研究成果。已发表的著作有《Chinese migr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Washington D·C·1923），《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New

York 1940),《浪迹十年》(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6),《节育、晚婚与新中国人口问题》(《新建设》1957 年第五期)。其他学术论文、调查报告约 30 余篇用中、英文发表,散见国内外有关刊物上。

注:

- ① 陈达:《浪迹十年》,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第 139 页。
- ② 陈达:《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第 302 页。
- ③ 同②,第 430—431 页。
- ④ 同①,第 301 页。
- ⑤ 全慰天:《记陈达教授》,《观察》杂志第 2 卷第 8 期(1947 年 4 月 19 日)第 19—20 页。
- ⑥ 《观察》杂志第 2 卷第 2 期(1947 年 3 月 8 日)。
- ⑦ 北平《新民报》1948 年 6 月 29 日。
- ⑧ 《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座谈记录摘要中所记陈达的发言,《新建设》1957 年第 7 期第 40 页。
- ⑨ 陈达:《节育、晚婚与新中国人口问题》,《新建设》1957 年第 5 期第 1—15 页。

凌 鸿 勋

娄献阁

凌鸿勋，字竹铭，祖籍江苏常熟，1894年4月15日（清光绪二十年三月初十）生于广州。凌家先祖中有数人为官。父亲凌佩秋多年执教，善长经史，曾得中乡举。凌鸿勋五岁起识字，稍后读四书五经，尤爱好《孟子》、《左传》。他家贫寒，父亲曾书“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贱不足恶，可恶是贱而无能”，^①予以勉励。

1905年初，凌鸿勋考入广州府中学读书。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其前身为越华书院，先后由名儒陆尔奎、邱逢甲等任监督，学制五年，课程除国文外，还有英语、数学、地理、博物诸科。凌在班上年龄最小，开始尚不知用功，两年后学业猛进，跃为全班之冠，1909年毕业时，名列优等。翌年春参加复试（相当于全省会考），被奖以优贡。父亲对他抱有很大期望，在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毕五年蛾术，起万里鹏程。”

1910年夏，凌鸿勋由广东省官费送上海高等实业学校（属邮传部，原名南洋公学）就学。先入附中4年级，补习英文，一年后进土木科学习。民国成立后，上海高等实业学校改名南洋大学（一年后又改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隶属交通部，监督（后称校长）唐文治比较开明，拥护辛亥革命与共和政体，并极力提倡各种新学。凌在该校读书5年，刻苦勤

奋，从未请假缺课，成绩突出，每个学期均被评为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时获第一名。此外，他还积极参加课外活动，一度任学校体育会的书记；又两次参加国文会考，得银牌、金牌各一枚；并发起南洋学会，印行南洋学报，被推为总编辑。

1915年凌鸿勋自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得校长唐文治推荐，由交通部派往美国桥梁公司实习。一道赴美实习的还有同班同学陈体诚。他们先后在费城桥梁工厂和纽约总公司参与绘图、设计、厂内装配、工地建筑等项实际训练。工余，凌曾在哥伦比亚大学选修两门功课。这期间，他还两次参加美东中国同学会年会，结识了黎照寰、胡适等不少中国留学生；又同张贻志、吴承洛诸人发起组织中国工程学会（后迁回国内，与中华工程师学会合并为中国工程师学会）。1918年6月，因父亲病故归国。

同年7月，凌鸿勋抵北京，由交通部派任京奉路唐山段工务员。1919年，调回交通部路政司考工科，不久补为技士，并署副科长。考工科主管各条铁路的工务、机务、电务及材料的购备等，凌在工作中开始接触全国铁路的技术事项。当时交通部为将先前向英、法、德、日等国借款修筑之各路的技术标准、运输规章及会计制度加以统一，特设一个铁路技术委员会，由交通部技监詹天佑任会长，凌奉派兼任该会委员。他在这项工作中得以窥知各路建设和运用的概况，同时常偕外国顾问赴各路实地视察，获益甚多。

1920年2月，凌鸿勋应唐文治之邀，南下至母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任教，讲授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桥梁设计、混凝土学等数门课程。同年秋，唐因病告假，凌奉命代理校务。

不久，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邮电学校及交通传习所合并成立交通大学，他被任为筹备委员和沪校副主任。

翌年春，凌鸿勋复返北京，继续在交通部任职，5月出任京汉铁路桥梁工程师，专办加固桥梁事宜。由于京汉铁路黄河铁桥屡次出现险情，交通部决定重修，特设黄河新桥设计审查会，凌兼任该会工程师，协助美国顾问华特尔博士（Dr. J·A·L·Waddell）进行审核计算等工作，后因经费无着而作罢。1922年3月，凌受交通部派荐任技正，仍为考工科副科长，并兼任铁路路线审查会会员，曾赴上海接洽修建沪杭甬铁路曹娥江桥及前往踏勘龙烟铁矿专用线，复勘京奉铁路锦朝支线。同年6月，鲁人高恩洪接长交部，部中凡籍广东者均被免职，凌也是其中之一。遂举家南移上海，帮助华侨办理实业与地方建设，同时着手编撰《市政工程学》和《铁路工程学》两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3年9月，凌鸿勋再次至母校任教。时成立未满一年的交通大学又分为唐山、上海两校，沪校改称交通部南洋大学。他初任教授，自1924年12月起接任校长。他办学认真负责，力求保持学校已有传统，“程度维持日渐提高的水准”。^②凌十分重视教学秩序，提高学生学业，严格考勤，按期考试；但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1925年五卅惨案时，曾一再劝阻学生罢课和上街游行。他对学校建设甚为热心，为筹措经费四出奔走，迅速主持新建了体育馆、游泳池和疗养室，并着手筹设工业研究所。1926年10月，为纪念建校30周年，举办了一次工业展览会，除陈列各种机械仪器外，还铺设了

一条小铁路。凌任南洋大学校长 2 年多，行政上隶属于北洋政府交通部，1927 年北伐军进占上海前，他不愿为保持校长位置去与南方接洽，只想到时候再行引退，以全终始。5 月，该校由李范一接收，凌交卸后即离校，在家从事编写《桥梁学》及《工厂设计学》等书。

同年秋，凌鸿勋应邀到广西梧州，任市工务局长。此时桂省正值休养生息，颇着力地方建设。凌在梧州 1 年多期间，努力进行市政改良和建设：首先拆除全部旧城墙，开辟和扩展了几条主要马路，全铺柏油路面，同时建有下水道系统；其次是整顿电厂，安装了新发电机，由仅能夜间发电改为全日发电；再是着手兴办自来水厂，以电厂收入作抵向德国西门子公司订购器材。同时，他很注意同学术界的联系。桂省在梧州筹设广西大学，凌被邀为广西大学筹备委员；他还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工程师学会梧州分会。

1928 年 10 月，南京国民政府新设铁道部，以孙科为部长，并聘华特尔博士任顾问。凌鸿勋应召于 1929 年春离梧州到南京，任铁道部技正，参加旧有线路的整理事宜。他奉命组织平汉路桥梁勘查队，逐一检验北平到保定间 280 余座钢桥。7 月，凌被派为陇海铁路工程局长，负责赶修灵（宝）潼（关）段，并筹划潼（关）西（安）段工程。陇海路原系借比利时银团款项修筑，因受战乱影响长期停工，此时利用比利时退还庚款购买了一批材料，重新复工。他到职后立即沿线视察，确定在潼关城下凿 1070 米隧道，解决了铁路如何通过潼关的难题。10 月，蒋（介石）冯（玉祥）冲突加深，西北军东进，唐生智亦在郑州通电反蒋，灵潼段工程难以进行，凌

遂携带文件、帐册暂回南京铁道部，在工务司代理工程科长职。

1930年7月，凌鸿勋奉铁道部与工商部派遣，偕铁道部工务司帮办孙谋等赴欧洲，考察比利时、德国、英国有关机车车辆、钢轨、桥梁、号志等制造情况，并出席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三合土会议、工业教育会议和在瑞士召开的国际应用力学会议；嗣后又去美国出席第六届国际道路会议，历时5个半月，于12月中旬回国。

凌鸿勋回国后，重返西北陇海线主持灵潼段工务，经过1年的努力，至1931年12月终于竣工通车，使陇海路进入了陕西的大门。前此铁道部已决定兴筑潼关至西安间的铁路，并另设潼西段工程局，任凌为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该段工程工款全部自筹，不受过去陇海铁路向比利时借款合同的约束，完全由中国人设计、修建，不雇用任何外国人。测定路线后，即于1932年上半年首先在潼关至华阴间开工，但因工款不济，工程进展迟缓。时凌对开发西北颇为热心，曾与陇海铁路管理局长钱宗泽一起发起陕西实业考察团，亲赴秦岭、安康、汉中、宝鸡等地察看农、林、矿产、交通情形，筹谋铁路通达西安后如何进一步推动陕西建设。

同年11月，凌鸿勋奉调任粤汉铁路株（洲）韶（州）段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粤汉路由广州至武汉全长近1100公里，早在清末即已开工，南北各修若干公里，而中间株洲到韶州共有456公里之遥，停工长达13年之久。铁道部为了及早接通这一南北重要干线，决定借用英国退还庚款作路费，遂于1933年7月正式同中英庚款董事会达成协议，限期4年修

成该段。凌鸿勋受此重任，很快赶到工地，先用半年时间修建了韶州至乐昌间 50 公里路程，然后南北对向施工。为便于指挥，他把工程局由广州迁到衡阳，全力以赴，专心工事，并提出“一人做两人的事，一日做两日的事，一个钱做两个钱用”^③的口号。他对工程质量也很重视，始终严格按照部颁技术标准之最新规定行事。株韶段在湘粤边界处有 100 多公里为南岭山脉，系长江和珠江流域分水岭，地形复杂，经过细心选线，最后尚需开凿大小山洞 16 座。凌主持株韶段有责有权，他带领全体工人和技术人员，想方设法以最好的技术、最快的速度、最经济的方法进行兴筑，终于提前一年于 1936 年 4 月完成铺轨任务，9 月 1 日正式通车，对沟通湖广、促进沿线建设以及后来抗日战争的军事运输都有重要作用。

1936 年，粤汉全路管理局成立，凌鸿勋被任命为第一任局长。他继续留该路一年，除进一步整理株韶段路基及补充有关设备外，又在广州将粤汉路和广九路接轨，使两路客货可以直达通过。同时，凌还兼任湘桂铁路工程处处长，筹划修筑衡阳至桂林铁路，以便使广西与粤汉路相连。他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测量队，出发勘察路线。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对日全面抗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不久，又先后占领上海、南京。鉴于沿海港口已被敌人封锁，必须在内陆开辟国际交通线，铁道部决定将湘桂线由桂林延长到镇南关（今友谊关），分衡（阳）桂（林）、桂（林）柳（州）、柳（州）南（宁）、南（宁）镇（南关）4 段加紧施工。凌鸿勋为南镇段工程处长兼总工程师，翌年夏又兼管柳南段，后桂柳、柳南两段合并为桂南工程局，仍由他

任局长兼总工程师。正当工程顺利进展之际，不料广州、武汉于1938年10月相继沦陷，广西形势转急，日军不断派飞机至南宁、柳州一带骚扰。凌多次遭到空袭，但仍不顾个人安危，指挥所属技术人员和工人日夜赶筑，南端至1939年10月在国境之内修竣80公里，抵达明江，北段到1939年12月已迅速铺轨到柳州（柳州以南工程因日军入侵南宁而停顿），使抗日军队能沿新修之路源源南下迎敌。

1940年1月，凌鸿勋调至成都，任天成铁路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在他主持下的6个测量队，经过一年勘测，最后定线由天水到成都全长为750公里；同时并奉令勘测成都至康定、至西昌线路。但由于无法筹措巨额筑路经费，各种材料亦难以获得，因此未能兴工，大量资料皆束之高阁。

同年底，凌鸿勋被派兼任西北公路管理处处长，移居天水，半年后改任西北公路工务局局长，统管陕甘宁青4省4000余公里公路的修筑维护、行车监理与养路费的征收，曾走访西宁、宁夏、兰州、武威、哈密等地接洽有关事宜。为了减少夏季山洪暴发时交通被阻的状况，他还主持修筑了一些永久性的桥梁。

1942年1月，陇海线宝（鸡）天（水）铁路工程局成立，凌鸿勋仍任局长及总工程师，同时继续兼管西北公路事，稍后又被派为甘新公路会办。宝鸡至天水约150公里，地处渭河峡谷，线路曲折弯绕，工程艰巨，须开凿山洞120余座。时值抗战相持阶段，筑路的经费、材料和其他物质条件都十分困难。重庆政府当局不肯如数拨出资金（甚至一度下令停建），只能“就款计工”。在人力物力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工

程时断时续，一直拖延到1945年底才勉强通车。这期间，凌还派队测量天水至兰州、兰州至西宁、兰州至宁夏铁路线，并进一步勘测规划兰州到新疆乌苏全线铁路，亲至中苏边界霍尔果斯（今霍城）进行视察。时以罗家伦为首的西北建设考察团组成，凌作为考察团一员陪罗等到新疆、甘肃、宁夏许多地方，对发展西北交通提出了不少建议。

凌鸿勋自1929年至1945年从事筑路达16年，经手兴建新路约1000公里，测量路线约4000公里，管办公路约5000公里，对民国时期的铁路公路建设，尤其是在开发西北、西南交通事业方面，成绩显著。他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工程界享有相当声望，曾被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美国工程师学会会员等。

1945年2月，凌鸿勋升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先后在部长俞飞鵬、俞大维手下分管铁路、公路、电讯等行政事务。随着地位的变化，凌依附于国民党统治集团，政治立场渐趋反动。抗战胜利前后，为适应国民党反动派复员、运兵、抢夺胜利果实、准备打内战的需要，凌除积极参与筹划水运、空运外，对修复铁路、恢复交通之事亦甚效力。在负责督修津浦路的过程中，他曾多次奔走重庆、南京、北平之间，并亲自沿路查察。1946年上半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主持“军事调处”，凌曾代表国民党政府方面参加有关交通问题谈判；同年11月，他又当上了国大代表，涉足所谓制宪活动。

此后，凌鸿勋在交通部的职责逐渐加重，常代表部长出席行政院会议，曾去东北和台湾视察交通实况，以谋解决交

通统一管理等问题；又赴欧出席在瑞士召开的国际铁路协会第十四届会议，被推选为大会副会长和第四组出席，会后并访问英、法、比、意诸国。1949年1月，他改任交通部政务次长，代理部务，为南京反动当局疏散和迁移而调拨车船日夜操劳。3月下旬，因国民党政府改组而辞职。

国民党统治集团自南京逃往广州后，凌鸿勋亦暂居广州，旋至九龙，一度在华侨工商学院任教。同时替王云五筹办的华国出版社翻译《科学与战争》、《现代武器与自由人》等书。1950年10月，应傅斯年之邀到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又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1951年并充“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后改称“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同年3月，凌转业石油，任台湾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连任20年之久。1971年退休，1982年8月15日病死台北。

凌鸿勋撰有中文著作16种、英文著作2种及短文多篇，主要著作是《中国铁路志》、《中国铁路概论》、《詹天佑先生年谱》、《十六年筑路生涯》、《七十自述》等。

注：

- ① 凌鸿勋：《七十自述》第4页，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版。
- ② 凌鸿勋：《交通大学十年忆旧》，台北《传记文学》第1卷第5期，第23页。
- ③ 凌鸿勋：《十六年筑路生涯》第40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

严 修

姜献阁

严修，幼名玉珪，字范孙，1860年4月2日（清咸丰十年三月十二日）生于顺天府三河县（今属河北省）。祖籍浙江慈溪，先辈于顺治年间定居天津。严出生时，正值英法联军入侵，全家避难三河洵阳，1862年仍迁回天津。严家世代营商，祖上曾有数人得诰赠光禄大夫，其祖父以经营盐业致富，父严克宽（字仁波）曾任长芦总盐商多年。

严修自幼受到良好家教，5岁开始入塾，读《龙文鞭影》和四书五经，并学作诗文。1873年，当严13岁时，经院试选入府学，除继续攻读儒家书籍外，还习数学等自然科学。翌年，岁试得一等第七。1877年夏再应院试，补禀膳生。他长期跟名儒张文达学习，成为张的高足，同时又广交陈奉周、宋少南等名士，互相切磋，学问日增。

严修1879年起参加乡试，1882年中举。期间他谒见过军机大臣李鸿章与大学士徐桐。1883年会试后，严得授庶常吉士，但仍回籍自修，进一步深造。1886年入京，任翰林院编修，不久补国史馆协修，1889年充会典馆详校官。他在京供职8年有余，多次从事试卷磨勘等工作。

1894年严修参加大考，名列二等，受到光绪帝的召见，被实授贵州省学政。严于11月抵贵阳后，积极着手整理该省学

务。他在黔任职3年余，努力进行学制改革。不仅常到各地考选人材，更将省城学古书院（南书院）改为经世学堂，选40名品学兼优者住校学习。除“购沪楚书籍运黔”^①外，还开办官书局，刊印各种新旧图书。他颇为崇敬张之洞，将张“所著先正读书诀辅轩语，书目问答分饷远近，使识门径”。^②严对贵州士子多有嘉惠，任可澄、刘显世等均出其门下。

甲午战败之后，全国上下要求维新变法之声日亟，严修亦感到必须学习西方，注重时务。1897年9月，他毅然上书清廷，请仿照康、乾两朝召试博学鸿词例，开经济特科，“以广登进，而励人材”，^③得到清廷允准。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此举庶有得人之望，梁启超甚至称它是新政最初之起点，却遭到管学的徐桐的反对。翌年春，严学政任满，返京复命，曾晤康有为、梁启超，又与袁世凯相识，后与袁成为莫逆之交。当时严修踌躇满志，很想在学制改革上一显身手，而徐桐竟拒绝见严，且解除了他翰林院的职务，只留编修一个空衔，严无奈只得告假回籍。不久戊戌政变发生，他和康、梁等新党没有更深的关系，故未受到牵连。

严修隐居在家，颇有怀才不遇之感。面对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形势，他出于强烈的爱国之心，立志兴学，以图自强。1898年11月，他礼聘张伯苓在自己的寓所设馆，教其子侄与戚友子弟，最初只有学生5人，不久增加到11人，通称“严馆”。该馆表面上同家塾无异，但教学内容已由明经帖括改为英文、算术和理化等科学知识，实乃新式教育的开始，成效甚佳，其中佼佼者如陶孟和等，日后成为国内第一流的学者。

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京津，翌年强迫清廷签订丧权辱国

的辛丑条约，中华民族处在被宰割的灾难之中。残酷的现实给严修以极大的刺激，进一步增强了教育救国的信念。他怀着“终年但忧国，……想望太平时”^④的心情，从挽救危亡必须加快人才培养、改良教育的认识出发，与好友林墨卿及张伯苓等商量有关办学事宜。1901年，严开设义塾，并亲自改订课程。1902年得津绅王竹林、李子赫捐资，严在灯笼公所再设蒙养学塾两斋，不久移至会文书院扩大成五斋，经改组定名为民立第一小学堂，开天津民办小学之先河。嗣后天津府尹凌福彭、天津知县唐则瑀等均请严出面办学，相继成立官办小学堂多处。严还得到直隶总督袁世凯拨地拨款的支持，得以从容发展教育，逐渐使天津学校为全省之模范。

1904年春，严修被袁世凯任为直隶学校司督办，赴保定视事。翌年，学校司改名学务处，移天津办公。袁治直之策，一练兵、二兴学，兵事自任之，学则听严修所为。严修主管直隶教育一年余，成绩显著，如在保定设初级师范学堂、改保定校士馆为普通科学馆，在天津改校士馆为师范学堂、改官立中学堂为天津府中学堂、收回法人所设之如意庵普通中学堂，以及筹建北洋师范学堂和高等法政学堂等，都是由他一手经办的。严更规划每府设中学堂与师范学堂各一所，注意奖励办学有成绩的州县官，在各县设劝学所以筹集经费，派卢靖率官绅出洋游历以振兴士气，并发行《学务报》，组织同人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刊印《国民必读》等著作，竭力推动全省教育。翌年，卢靖向袁世凯提出废止科举的建议，得到了严的热心赞助，他认为此乃排除障碍、加速兴学根本之图，极力促成袁与张之洞联名上书清廷，终于废除了这一流传千

年的旧制度。

严修在主持直隶学政期间，仍自办学校不辍。他曾率张伯苓等赴日本考察教育，购得理化教具多种，并聘日人来华任教。回国后，严先将自办的“严馆”与津商王奎章办的“王馆”合并为私立中学堂，由张伯苓任监督。该校第一期招收学生 73 人，分成 3 班，并附设一师范班。旋改名敬业中学堂，又改名私立第一中学堂，是为天津南开学校之前身。当时，严还在家设有女子小学堂、幼儿园及保姆科。他先后共创办私立学校五处、工厂二处，由于捐资助教有功，受到清廷五品卿衔的嘉奖。

1905 年 12 月，清政府新设学部，由荣庆出任尚书，熙英为左侍郎，严修得袁世凯推荐，以三品京堂候补署右侍郎。不久熙英死去，严实授右侍郎，兼署左侍郎。因学部初创，而荣庆很少管事，政务主要靠严来辟画，所以十分忙碌。他既主张革新学制，又有保守的一面，工作中则力图沟通内外新旧、调融欧化与国粹。当时严修曾奏请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端为教育宗旨，就是新旧杂揉的典型，得到清廷认可，于 1906 年 3 月正式颁行。由于学制已为奏定章程所限，不能大有更张，他便从实施入手，在学部采取一系列措施，诸如裁撤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司，规定提学使到任前先往外国考察 3 个月；派卢靖、沈曾植、刘廷琛等任直、皖、陕提学使，派张謇、王先谦等为苏、湘学务公所议长；确定女学教育章程；办理考试毕业归国留学生，授予进士头衔；咨各省举办法政及实业学堂等，均有利于教育的发展。同年，他还联合王益孙、徐世昌、卢木斋等集资银 26000 两，用以兴

建南开校舍，为该校的扩大提供了条件。

1907年9月，清廷令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管理学部事务。在张的支持下，严修的工作越发有起色，不仅陆续成立京师督学局统一都中教育，组织专门班子编辑教科书及有关参考书，创建京师图书馆搜罗古籍，在京设女子师范学堂；积极筹办经学、法政、文学、格致、医、农、工、商等分科大学。他对留学生的管理工作也十分注意，曾以学部名义咨各省：选派出洋学生须择有中国学问根底者；又派员调查留日学生状况，添设欧洲游学生监督，会同外务部组织游美学务处主办学生赴美学习事宜。严还重视延揽人材，其时用人全归部荐，经他提拔的人有张元济、范源濂、罗振玉、戴展诚等，一时群英荟萃，为人瞩目；后来用人改为廷推，则生气渐失。

1908年，严修兼任考验询问各省保荐人材大臣，翌年又被派为宪政编查馆咨议官。不料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遭摄政王载沣等排斥，于1909年1月黜回河南原籍，严颇为不平，大胆上书替袁辩护，且送行至卢沟桥。严修这番表现被视为袁党，并遭皇室要人刁难，后赖张之洞调护才勉强自安。同年10月，张之洞病故，严顿觉事不可为，托病请辞，于1910年4月获准开缺返回天津，决心从此不再做官。他当时心神郁闷，在其《五十述怀》诗中叹道：“大地江山几破碎，中兴将相偏凋零，河清人寿嗟何及，但祝神狮睡早醒。”又云：“不惭高位腾官谤，可有微长适事机？”“百年分半匆匆去，差向人前忏昨非。”^⑤

严修不仅政治上不得志，经济上也很拮据。由于长芦盐

运使借口偿还外债乱征苛税，使包括严家在内的盐商陷入绝境，加上他多年出资赞助教育，耗费甚钜，亏累很多。他无奈只得将引地租于郭家，而郭氏不久反悔，使严处境十分狼狈，后赖人奔走告贷才度过难关，保全了家产。1911年，严修停止向南开中学堂捐款，经提学使改为公立，并把天津客籍学堂及长芦中学堂归入该校。严办的其他私立学校或停或并，只剩两处初等小学堂附蒙养园的经费继续由他承担。迨辛亥革命之后，南开应领公款无继，其所需少量维持费仍靠他暂时垫付。

1911年10月武昌首举义旗，各省纷纷响应。天津绅商为维持社会治安，决定成立保卫局，推严修为首。有人拟拥严为都督，策动直隶独立，但严不愿置身革命，竟躲到北京。他虽对清室不抱希望，但认为中国也不能遽跻共和。他主张君主立宪，赞同张绍曾、蓝天蔚等提出的在本年行宪的12条政纲，说这是清廷存亡之一大转机。面对行将覆灭的命运，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于同年11月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荐严任度支大臣，而严以“非所素习”为借口坚辞。袁与南方议和，委唐绍仪为全权代表，严修、杨士琦为参赞，严再次谢绝。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参议院选袁世凯继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不愿离开北京，阴谋制造京津保兵变，天津绅商组织治安会（后改称官民联合会），严修被举为会长。当时袁欲拉严出任直隶总督、国史馆总裁、教育总长等要职，他均未接受。

民国初年，严修的思想稍有变化，对共和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尤希望袁世凯、孙中山、黄兴、梁启超携手，同

策中国政治之进行，但见现实绝无可能，因此遇事便以韬晦的面貌出现。

严修与袁世凯的关系一直很好，辛亥革命前袁就把几个儿子送到天津托严帮助教育，严为袁氏诸生聘定了教师，并一再建议派遣出国留学。1913年7月，严得袁世凯同意，亲率袁氏三子赴欧，漫游俄、比、德、法、荷、瑞士等国，最后将袁子安排在英国学习，自己于翌年夏返回天津。

旅欧期间，严修多次寄信友人谈论国事，谓：“窃以为欧洲程度吾国数十年内恐无躐躐之望，而欲学欧美先学日本，欲强国家先善社会，实皆一定不易之序也。”“市政良则社会良”，“欲社会之进步，非讲求市政不可。”又说：“吾国今日财源枯竭，固无大举兴学之望，然于已设之学校加意整顿正今日之急务。”^⑧他曾提出一个学界游历方案，还建议拟订小学教员应读书目和设俱乐部（附小博物馆及小图书馆）“为小学教员息游之所”，以陶冶性情，补充学识。这些想法虽有可取之处，只是当时很难办到。

1914年2月，严修在英国得电传被授为教育总长，他立即电袁世凯推却，并请中国驻英公使代辞。严回国后，袁仍挽其出山，于同年6月和9月先后任严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参议院参政，他均未就职。不过严终于在冬季至北京，留居北海，替袁世凯照料儿子读书事宜。1915年4月，严出席了在天津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会后遵袁嘱托赴河南辉县察看建大学地址。并去上海观光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往杭州、南通参观各学校。

此时，袁世凯谋帝制日亟，筹安会的活动已公开化，严

修为此于8月面见袁陈述利弊，郑重指出：在二十世纪中，帝制决难存在，“若行兹事，则信誓为妄语，节义为虚言，……各派人士恐相率解体矣”。^⑨但袁一心要当皇帝，严谏净无效，遂绝迹于北海。袁世凯称帝后，封严为中卿，他既不辞也没就。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号，严修4月曾至北京晤袁。同年6月，袁世凯死去，严进京吊唁，8月奔赴河南为袁送葬。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严修希望不另生枝节，但是由于国务总理段祺瑞和督军团再次毁弃约法，府院之争及北洋派内部矛盾加剧等，社会动荡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严越发不愿从事政治。1917年6月李经羲组阁，邀严修任教育总长，他毅然拒绝。不久，北京政府拟重新成立临时参议院来代替旧国会，有意请严为议长，他也没有同意。

严修仍热心教育和公益事业，1917年8月河北洪涝成灾，他曾去北京参加河工讨论会工作。前此，家中女学增开小学高等班，又在其对门设立贫民义塾。1918年4月，他偕范源濂、孙子文赴美国考察，与先期到美的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相会，共同研究了美国的教育和私立大学的组织问题。严等于12月一起归国，立即加紧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春他与张伯苓前往山西、江苏进行募捐，以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经过努力，教室迅速建成，第一期招收学生96人，分文、理、商三科，仅用半年多时间便正式开学。同年，家中女学中学班也告成立。

严修关怀青年学生的成长，对在南开中学学习的周恩来尤为器重，曾赞扬周有宰相之才。严多方支持张伯苓对周恩来的照顾，使周得到过免交学杂费的优待，后又获准免试入

南开大学文科学习的特殊待遇。周恩来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成为天津的学生领袖，1920年1月因率领南开等校学生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被反动当局逮捕，但是严修和张伯苓仍未改变对周的看法。周于同年7月出狱，严、张等决定用“范孙奖学金”派周赴欧洲深造，严先后拿出7000元给周，使他得以在欧勤工俭学和从事革命活动。尽管有人向严修进谗言，说周恩来已加入共产党，不要再帮助周了，严则以“人各有志”作答，丝毫没有动摇资助周的初衷。

自1920年起，严修不断受到病魔的缠绕。他得了一种很奇怪的肿瘤病，全身长了上百个瘤子，有的深入腹内，右偏痛苦不离身，左半时时患不仁，几次割治，反反复复，总不能去根。医生和亲友均劝他少看书、少会客、少说话，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不顾体虚神衰，照旧手不释卷。严在病中更以极大兴趣流览古籍，并引经据典，逐条注解张之洞的《广雅堂诗集》，列书满案，终日搜检，写成批语十万余言，其热忱与毅力非常人可比拟。

严修在病中还广邀华世奎、章钰、林兆翰、陈诵洛等好友，定期举行同人聚餐会，饮酒行令，吟诗唱和，借以自娱，并发思古之情。聚餐会规模不断扩大，1922年改名为城南诗社，参加者多达数十人，良莠不齐，其中华、章都是遗老，也有复辟派和后来堕落成汉奸的。在这些人包围之下，严的思想逐渐趋向保守。他在《寿林墨青六十》的诗中表示：新学与旧学，文言或语体，“我思宜并存，不必相丑诋”。文言乃“数十圣留贻，数千年积垒”，绝不能弃如敝屣，“语体为通俗，补助功亦伟”，同样不可缺少。严十分注重：“国要张四维，礼

义与廉耻；人要守四勿，言动与听视；孔曾道忠恕，尧舜道孝弟；东西有圣人，此心同此理”，^⑤他当时虽然还抱有贯通旧新的想法，但更关心的则是如何卫道，如何维护所谓稀世之珍的国粹，已经倒退到复古的路上去了。

严修晚年仍是爱国的，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甚为忧虑，对北洋军阀统治与战乱表示不满，他在诗中写道：“与我相亲乃禹域”，“犹念神州怕路沉”。“已信剖瓜谋渐协，犹闻煮豆急相煎，虎狼宁肯忘吞噬？鹬蚌焉能独幸全！”^⑥他深感：“军阀时代，无理可讲，无事可作。”^⑦但是由于受时代和认识上的局限，看不清社会发展规律及新的力量，常常发出：“陆沉谁与挽神州”、“时危寸土暂相安”、“得为太平之世之幸民”一类感叹。他颇推崇顾炎武、黄宗羲等爱国文人，尽管年过花甲尚坚持参加教育改进社，积极支持林兆翰在天津办社会教育。严于1924年发起存社，1927年创立崇化学会，也都抱着为斯文、名教、“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⑧的宗旨，然而时代已经前进，他却还在向后看，所以是不足取的。

1928年6月，国民党势力接管京津，10月下旬突然逮捕了长芦纲总李赞臣等5人，且电令南解。严家数代盐商与此案不无关系，严修焦虑异常，病情加重，1929年3月15日病故于天津。生前曾预作自挽诗，并在避寿词中谓：“便活百岁，不作生日”。^⑨此外他还拟有家训及丧礼各八款，内容多循古制，虽有其消极的一面，惟主张勤俭，讲求实际，反对嗜经、糊冥器、焚纸钱和大办丧事等则无可非议。

注：

- ① 陈宝泉：《严先生事略》，见《严范孙先生手札》，文化学社 1930 年 12 月版。
- ② 高凌雯：《诰授光禄大夫学部左侍郎严公行状》，见《严范孙先生自定年谱》附录。
- ③ 见王芸生：《严修与学制改革》，《文史资料选辑》第 87 辑第 101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
- ④ 陈诵洛编校：《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卷一第 8 页，协成印刷局印。
- ⑤ 同④，第 9 页。
- ⑥ 严修致筱庄的信，见陈宝泉编：《严范孙先生手札》。
- ⑦ 同①。
- ⑧ 同④，卷二第 25 页。
- ⑨ 同④，卷二第 13、25 页。
- ⑩ 童家祥：《记严范孙（修）先生》，《晚清及民国人物琐谈》第 222 页，台北学生书局 1972 年版。
- ⑪ 同③，第 116 页。
- ⑫ 伍禄青辑：《严修亲拟之家训及丧礼》，《民国名人轶事》第 109 页，台湾学生书局 1981 年版。

钟 荣 光

李 坚 余齐昭

钟荣光，字惺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866年9月7日（清同治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生。父钟玉龙原务农，后往香港从商。钟荣光自幼随父居香港。十余岁回广州，随岭南国学家吴道熔学习。17岁中秀才，1894年中举人。后在广州设馆教徒。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许多人感到非革新不足以图存，特别是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尤为激切。钟荣光受到中日战争失败的刺激和反清思潮的影响，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结识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郑士良、区凤墀等。在他们的影响下，于1896年加入兴中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同年，钟荣光与友人创办广东最早的报纸之一《博闻报》（后改名为《安雅报》）。以后他又创办《可报》，发表了不少针砭时弊、抨击朝政的文章，不到两年，报馆即遭封闭。1898年钟荣光响应孙中山的主张，尽释家中的婢女和侍妾，并供他们读书，^①一改过去纳妾蓄奴的旧习俗。次年钟荣光受美国牧师、格致书院监督尹士嘉的聘请，任该院汉文总教习。^②当时史坚如是该校学生，参加1900年10月孙中山发动的惠州起义，在广州谋炸署理两广总督德寿，不幸事败被捕。钟荣光闻讯后，曾通过尹士嘉转请美国驻广州

领事等人多方营救。

1900 年格致书院更名岭南学堂，迁澳门。这时沙俄出兵侵占我国东三省，举国哗然。钟荣光在澳门联合海外名流 150 人，致电中俄谈判代表李鸿章力主拒绝签约。1904 年岭南学堂复迁广州，开始招收女生。女生没有宿舍，钟荣光让出自己的住宅二间给她们寄宿，积极支持大学男女同校。1907 年钟等代表岭南学堂赴日本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组织会议，顺道往华北考察教育，在天津被清政府以革命党图谋不轨罪名逮捕，拘押 35 天之久，经同乡营救，始得出狱。

钟荣光于 1908 年任岭南学堂教务长。这时，学校正在用纽约董事会的捐款兴建图书馆。他不愿仰赖外国人资助，于第二年往世界各地，向华侨宣传募款建校，并号召华侨子弟归国升学。募得款项后，建造学生宿舍和添置图书仪器。

1911 年武昌首义后，11 月 9 日广东光复。为了支援革命，钟荣光极力支持岭南学堂学生组织“岭南学生协助军政府筹饷队”，出发劝捐、宣传演说、演戏，捐得五六万元，上缴军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钟荣光以老同盟会员的身份出任广东省教育司司长。他大力推行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民主办学方针，改革旧学，提倡新学，废除尊孔读经，成立中小学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改革教学内容。他还增设公共体育场，设立图书馆，派巡回演讲队到各县宣传科学常识，破除封建迷信。袁世凯篡夺了民国政权后，于 1913 年 9 月派龙济光任广东都督。龙残杀革命党人，打击革命势力。钟荣光亦被列入黑名单，幸事先得知消息，藏在美国友人地窖中，黑夜逃到

沙面，后乘美舰往香港转美国。^③

钟荣光在赴美途中，感怀时局，痛惜革命事业遭受挫折，撰《广东人之广东》一书，叙述民初要政及革命党人的新精神，揭露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暴政。此书在美国出版后，使海外华侨了解到袁世凯统治的真象，增强了支援革命的信心。

钟荣光抵美国后，入哥伦比亚大学选修教育学。1915年任纽约国民党支部长，并创办《民气报》，团结华侨，宣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岭南文理科大学成立，钟荣光于次年年初返国后任该校副监督，为该校第一个中国领导人。1918年，钟荣光去南洋各地向爱国华侨募捐，为岭南大学兴建归国侨生的宿舍筹集资金。即于是年特设华侨班，招收回国华侨子弟百余人入学，为我国大学招收华侨学生返国就读之滥觞。

五四运动时，钟荣光兼任广东教育会副会长。他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广州学生示威游行，岭南学生组织的军乐队走在最前头。学生有被捕者，他设法进行营救。校内演出歌颂十月革命的话剧，他从不阻拦。

钟荣光有感于我国以农立国，而农业落后，广东农业人口占全省人口八成以上，而粮食不能自给，决心设立岭南农科大学，以培养农业人才。他得到广东省财政厅长廖仲恺的支持，由省财政厅拨款，于1921年成立岭南农科大学，任校长。校内设教学、试验、农业、推广四部分；分蚕桑、园艺、田艺、畜牧等系，校本部并附设果木种植场、实验农场。为在校外设分农场，钟荣光亲自勘察省内外许多地方，最后在潮安、香山（今中山）、海南定点。农场注意培植优良品种，

出产的水稻、木瓜、柑桔、荔枝等，享有盛誉。农场还由澳洲引进桉树和银桦，大力推广。农具方面，也引进一些美制割草机、手扶播种机、手扶除草机、手扶中耕机和手扶单铧犁等^④。钟荣光还提倡在校内种竹，共种 130 余种。其中有一种白粉单竹后来被命名为“荣光”竹，以纪念钟荣光对种竹事业的提倡。岭南农科大学对于造就农业专门人才，推广农业科学知识，介绍优良品种，改良蚕、稻品种，都有一定贡献。

孙中山很支持钟荣光的事业，早在 1912 年 5 月就到岭南学堂作《非学问无以建设》的讲演。1922 年 6 月 16 日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事先退至永丰舰。宋庆龄脱险到达沙面友人家后，打电话请钟荣光帮助，钟立即派船接宋到岭南，后又转送至永丰舰会见孙中山。宋庆龄在钟的协助下，安全出走香港转往上海。^⑤7 月初钟荣光还到永丰舰给孙中山传送信件。^⑥1923 年孙中山返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又先后在该校作过两次讲演。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钟荣光积极支持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黄埔军校建成后，不少岭南大学的学生参加军校。军校与广州之间的交通，主要靠水上轮渡，钟荣光将岭南大学的码头提供军校共同使用。孙中山在广州其他学校宣讲三民主义，钟常常让岭南大学的学生整队前往聆听。

1925 年 6 月沙基惨案发生时，岭南大学师生参加示威游行，教员区励周和学生许耀章惨遭屠杀，岭南大学开始出现爱国反帝热潮。英籍副监督白士德发表为帝国主义暴行辩护的言论，受到学生的强烈谴责，被逐离校。这时钟荣光在美

洲。次年6月他返国，适值沙基惨案一周年。他在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愤怒谴责帝国主义，积极支持师生的爱国行动，引起学校美籍人士的不满，说他反对美国人。这时，爱国师生又提出收回教育权，钟荣光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在大革命风暴的影响下，纽约董事会被迫将岭南大学交回我国人自办。1927年1月成立私立岭南大学校董会，钟荣光被选为校长兼校董会主席。1930年，外国教会创办的博济医院并入岭南大学，为纪念孙中山而改为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钟荣光积极筹款扩建医院，经各方奔走，医院于1935年建成。

抗日战争爆发时，钟荣光已年逾70。1938年他宣告退休，担任岭南大学名誉校长，迁居越南海防。同年被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后曾多次到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1940年日军进犯越南，钟荣光迁居香港。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钟荣光身陷敌境，心脏病日重，于1942年1月7日因病去世。

注：

- ① 《纪念钟荣光先生特刊》第4页，岭南大学1947年印。
- ② 陈序经：《有关岭大与钟荣光的几点回忆》，《广州文史资料》第13辑第42页。
- ③ 祝秀侠：《钟荣光与岭南大学》，《中外杂志》。
- ④ 谭锡鸿：《我所知道的岭南大学农学部》，《广州文史资料》第13辑第172页。
- ⑤ 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 ⑥ 罗翼群：《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余年间粤局之演变》，《广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29页。

主要参考资料：

《南大与华侨》第1—12卷。

《岭南大学校报》第1—126期。

刘 湛 恩

陈 敏

刘湛恩，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出生于湖北阳新县山区的一户贫苦农家。6岁时，其父贫病交迫去世；族人逼嫁遗孀，其母被迫带领他和尚在襁褓的妹妹，弃家步行百里，逃到举目无亲的汉阳，进汉阳医院当佣工。刘湛恩挎篮沿街叫卖烧饼油条，贴补家用。由于他母亲心灵手巧，在医院勤劳苦干，努力学习文化和护理技术，逐步从杂役升为护士而护士长，刘湛恩得以有上学的机会。

刘湛恩12岁时从汉阳小学跳级到九江同文书院学习。5年后毕业，被保送进苏州东吴大学。1915年，刘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吴大学医预科，并获得奖学金，赴美国留学。他于横渡重洋之际，心潮澎湃，反复思索国家民族的富强之道，并与关心国事的同伴讨论。他受“教育救国”思想影响，认为救国首先要发展国民教育，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抵美后，他放弃学医，改入芝加哥大学教育系。1918年毕业后，又进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研究院继续深造。^①

刘湛恩在美留学期间，经常打零工，以维持日常开支。由于他自幼惯于艰苦劳动，不论打字或当家庭教师、佣工、饭店侍役，乃至农场季节工、洗衣擦鞋、修枝刈草，均不以为苦。他借在唐人街做工的机会，深入华侨社会，结交华侨朋

友。他还积极参加留美学生运动，团结中国留学生进行爱国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各国在巴黎和会上进行交易，竟将德国非法强占我国胶东半岛的权益转归日本帝国主义。巴黎和会将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华盛顿对公众发表演说，宣扬会议的成就和美国的“公正无私”立场。刘湛恩在人群中振臂用英语厉声责问：“我们的山东省怎样啦？”“我们决不同意！”他严正激烈的爱国行为，遭到美方特工人员的嫉恨，以致被捕。后经中国留学生及侨胞联名抗议，始获释放。

1922年，刘湛恩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次年上海，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部总干事，同时还在几个大学兼课。他鼓吹“教育救国”、“公民教育”，宣传杜威的教育思想^②，提倡举办职业学校和文化补习学校，并任上海职业指导所主任。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内，中国师生集会升半旗以示哀悼，美籍校长卜舫济竟当众撕毁中国国旗，全校爱国师生愤而退出该校，自行组织光华大学。刘湛恩虽身为基督教青年会领导成员，却全然不顾教会的反对和阻挠，积极协助建校，并担任光华大学校董兼教授。

全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怒不可遏的形势，迫使各教会学校不得不改革体制，调换外籍校长。1928年，32岁的刘湛恩接受上海沪江大学校董会聘请，接替美籍校长魏馥兰（F·J·White，传教士），担任该校第一任中国籍校长。刘就任后，立即对这所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创办的宗教气息浓郁的大学，

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他竭力削弱宗教对学校的影响，强调教学工作的独立性，避免教会对教学的干预，改革陈旧的规章制度。他压缩宗教课程，改为选修课，并不计学分。每星期日的礼拜活动，改为自愿参加。他聘请涂羽卿、余日宣、徐作和、蔡尚思等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任教。还增设了许多新的专业课程，如商科的工商管理、国际贸易、银行、会计等专业；化学系外又另设生物系，与协和医学院挂钩，协和承认沪江的学分，学生在沪江读几年后经考核及格，就可进协和医学院，实际上成为协和医学院的预科。他多次出国考察、募款，在沪北扩建校舍，购置了第一流的实验仪器设备。当时沪江大学的经济大权仍掌握在代表教会利益的美国人手，刘经常为学校购置设备等与美籍财会人员力争。

刘湛恩认为学校不应专为中上层人士的子弟服务，也应面向贫寒子弟。他在沪江大学设置了多种奖学金、助学金的名额，并大力提倡半工半读，以帮助家境贫困、学习勤奋的学生修完学业。有的学生因参加爱国民主活动，校方企图以不让毕业来阻挠。刘湛恩与校方进行说理斗争，保证这些爱国学生得以毕业。个别学生寒假期间因路费困难无法回家，他让学生住在自己家中。他还非常关心这些学生毕业后的出路，为他们介绍工作。

刘湛恩特别重视课堂学习和实际工作的结合，注意加强商科各专业与上海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的联系，并建立自幼稚园到高中一整套教学实验体系，于杨树浦附近工厂区和农村设立社会服务和调查中心，以便于学生接触实际和进行社会调查。他力排众议，在接近上海市区商业中心的圆明园路创

办“城中区商学院”。不久，又将杨树浦校本部的商学院迁并于城中区。^③商学院除大学本科4个系外，并为在职青年设置大学专修科、普通科和单科训练的特科。商学院还为照顾在职青年学生和兼课教师时间上的冲突，充分利用夜间业余时间授课。这种打破传统高等教育模式的创举，实为以后我国夜大学的发端。由于这些改革，使沪江大学在当时私立大学中以学风纯朴闻名，较少教会气，更多中国化。^④尤以商科和化学系，在教学水平上居上海各大学之首。

城中区商学院的建立，受到在职青年的欢迎，入学人数迅速增加。第二学期即达500多名，占沪江大学全校学生半数以上，超过了校本部。上海工商界徐寄庠、刘鸿生、吴蕴初、王志莘等著名人士也给予赞助和支持。他们捐资充作基金，提供师资、教材，鼓励自己企业中的青年职工报考，并设置奖学金。商学院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商企业管理和财会人才，也扩大了沪江大学的社会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刘湛恩在校内外各种讲坛上，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并利用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会议等机会，在欧美各国和南洋各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行径，号召侨胞团结一致，支援国内的反侵略斗争。刘的演讲慷慨激昂，感人至深，在华侨中引起巨大反响。刘还邀请力主抗日的冯玉祥以及陶行知、李公朴等爱国人士到校演讲，并参与声援东北义勇军等活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沪江大学校本部并入城中区商学院，与东吴、圣约翰大学组成教会联合大学，继续开课。刘湛恩除主持联大校政外，还积极从事抗日活动，被全市人民推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和上海

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他广泛联系在沪的国际知名人士和外国记者、作家，发起组织“国际联欢社”，积极开展国际宣传工作。他主持支援前线、救护伤病号以及困居于租界的难民救济工作。他还通过上海青年会发起组织“上海学生救济委员会”，负责安顿平津等地流亡来沪学生的食宿。

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汉奸、暴徒横行无忌，暗杀、绑架事件层出不穷。刘湛恩置一己安危于度外，日夜为抗日工作而奔忙。翌年春，日伪酝酿在南京组织傀儡政权，汉奸温宗尧在准备粉墨登场之时，妄图拉刘湛恩落水，担任伪“教育部长”。刘严词拒绝，并晓以大义，劝温悬崖勒马。他还一再劝阻另几个态度暧昧的熟人，保重晚节，万勿事敌。刘的抗日爱国言行被日伪视为眼中钉，曾多次接到谩骂和威胁恫吓的电话和信件；住所周围经常有形迹可疑的人，并被投掷手榴弹。他还收到一筐注入毒药的水果。这时，不少友人劝他离沪暂避，但他表示留在上海的抗日协会负责人已所剩无几，沪江大学行政也必须有人主持，决不能临危退离。他曾对他夫人刘王立明说：“我生平教导学生应为祖国献身，自己就应当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你如能带领孩子离开这里，我就无后顾之忧了。”^⑤

1938年4月7日晨8时半，刘湛恩携子出门，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口公共汽车站候车去圆明园路学校时，突遭日伪收买的暴徒狙击，当即牺牲，年仅43岁。刘湛恩为国捐躯的噩耗传出，各界震惊。特别是在上海知识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数千人不顾日伪威胁，毅然参加送葬，形成当时对日伪暴行的一次抗议示威。^⑥

注：

- ① 《时人汇志·刘湛恩》，《国闻周报》第10卷第20期。
- ② 杜威，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实用主义教育学家。他的教育理论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学方法的原理是“从做中学”，以儿童的活动为中心。1919—1921年间曾来中国，他的学说通过胡适等人的传播，在旧中国有一定影响。
- ③ 刘王立明：《沪江大学始末简记》，《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
- ④ 徐铸成：《刘氏三杰》，香港《大公报》北美航空版1980年11月9日。
- ⑤ 刘光华：《前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抗日殉难》，香港《新晚报》1981年11月20日。
- ⑥ 《译报》1938年4月8日；《我的母亲刘王立明》（《人物》杂志1981年第6期）；《国民政府公报》海字第42号。

周 鯁 生

虞崇胜

周鯁生原名览，湖南长沙人，1889年3月18日（清光绪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出生在一位塾师家里。周鯁生家境贫寒，4岁时母亲去世，10岁时父亲亡故。他幼年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跟读，父亲去世后，在父亲的朋友资助下，1900年进了谭延闿在湖南创办的省立第一小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1906年被送到日本留学，先学实业，后来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辛亥革命爆发前，周鯁生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不久从日本回国，撰写文章，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积极投入反对清王朝的斗争。

1912年元旦，湖南都督谭延闿拨款，由黄九言、曾毅、杨端六等主办的汉口《民国日报》创刊，^①周鯁生与李剑农等受聘任编辑。“二次革命”前后，该报由于抨击军阀专横跋扈，反对袁世凯推行独裁统治，不久被查封，编辑人员遭通缉。周鯁生等在国内无法立足，于1913年7月由上海出国。周先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政治经济，获得硕士学位，后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正在法国学习的周鯁生，参与了巴黎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包围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住所，阻止和会代表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爱国活动。

1921年，周鲠生由巴黎回国，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翌年应蔡元培之聘，担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在这期间，周除教学外，潜心于国际法和外交史的研究。1924年末，全国掀起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为了配合这个运动，周一方面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讲稿整理出来，以《不平等条约十讲》为名出版；另一方面在《东方杂志》、《太平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论文，力陈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危害，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是年底，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决定召开御用的善后会议，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对于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周鲠生开始时抱有幻想。他在《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一文中说：“老实不客气的说，我们对于现在的执政府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对于他的解决时局的诚意和能力也是怀疑的。但我们究竟不能因此就连他所准备召集的、而我们认为有召集的必要和成功之可能之‘善后会议’，也一概的反对或冷视。反过来，我们认为对于这种会议应予以充分的注意和督实。”^②可是，善后会议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希望，会议是开了，和平民主的秩序并没有实现。周鲠生的幻想破灭了。他在《时局的危机》一文中说：“总之，今日时局的危机已经是很明显的，执政府和善后会议似乎全没有应付这个危机的决心和能力。国人最初对于段政府召集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的希望，一天薄似一天。”残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根本的方法，是在民众势力的组织上做工夫。无论时局变化如何，毕竟国事还须得国民自己来负责；非到人民觉悟到自己责任和利益，而

其努力有确实的组织时，恐怕特别势力总不会消除，政治总不会上民治自由的轨道的。”^③

1926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筹备改组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周鲠生参加了筹备工作。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后，他到南京担任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后来他被聘参与制订宪法的工作。由于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几个月后以“不愿从政”为辞自动退出。

1929年9月，周鲠生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1935年1月担任该校法科研究所主任，同年10月改任法律系主任。1936年任该校教务长兼法律学系主任，直至1939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周鲠生除了讲授宪法、外交史、国际公法等课程外，仍然致力于国际法和外交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期间，他先后写成并出版《国际法大纲》、《近代欧洲政治史》、《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国际法问题》、《国际政治概论》、《国际公法之发展》、《万国联盟》、《领事裁判权》等专门著作以及《近代国际政治小史》、《法律》等小册子。在这些著作中，《国际法大纲》一书是他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国际法的教学编辑出版的。书中内容繁简适中，要点俱备。书首附有基本参考书目，书末附载文献资料，是各大学和法政专科学校的基本教材。《近代欧洲外交史》一书出版后，由于供不应求，很快增订再版三次。全书夹叙夹议，从维也纳会议开始，将近百年来国际风云，各国外交政策，著名外交家的活动，尽收书中，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之一。还有《现代国际法问题》、《国际公法之发展》等书，对现代国际法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现实问题及发展趋势，均有详尽论述，且见解

独到。

周鲠生研究国际法，不只是停留在评介国际法典及国际法的发展变化上，也很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他曾就自己的研究成果，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为维护祖国的尊严、民族的独立和国际和平秩序，在《东方杂志》、《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国际法及时评的文章。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英法等国操纵的国际联盟，借口调解中日争议，派出一个调查团，花了7个月的时间，草拟了一份歪曲事实的《国联调查报告书》。对于这个报告书，全国报刊几乎一致反对，同声指责。周鲠生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连续五期以《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为题，从国际法的角度，叙述了国联处理中日争议的经过，揭露了国联所谓调解的骗局。他在文章中指出：“国联自身并无组织的实力，全靠会员国，尤其是强国如英法者之实力以行动。”“东省事件发生以来，快到一年有半的时日，中国自始即依赖国联，不但迄今尚无解决，日本的暴行且有加无已。所以中国人对国联的失望，甚至唾骂国联……亦在情理之中。”^④

不久，某些国家企图通过吸收日本扶持下的伪满洲国加入国联，以取得与日本的妥协。周鲠生对此非常气愤，他在《所谓满洲国之承认问题》一文中，根据国际法关于一个国家所应具备的条件，引用国联调查报告书中称满洲国“其主要政治及行政权，均操诸日本官吏及日籍顾问之手”，揭露了那种企图将伪满洲国作为独立国家吸收入国联的阴谋。他呼吁

全国人民坚持不承认伪满洲国，以“对于日本的侵略政策构成一个法律的大阻碍”。^⑤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对下，国联终至不敢吸收伪满洲国加入。

1939年，周鲠生赴美讲学，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1945年4月他担任旧金山联合国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在美国期间，他根据自己多年对国际问题的研究，结合世界各国学者对太平洋战争的研究成果，写成《赢得太平洋上的和平》一书，在国外出版。

1945年夏，周鲠生回国，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他为抗战取得胜利而振奋，准备为繁荣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武汉大学三五年级同学毕业纪念册上，他写下“以日进不已之精神，做继往开来之工作”的题词，^⑥以示对学生们的嘱托和自己的决心。可是，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挑起内战，人民的和平愿望破灭了。此后，国民党政府因战争经费激增，大量削减教育经费，武汉大学每月的教育经费不够支付水电之用。为了使学校教育工作不致停顿，周鲠生动员全校师生员工想方设法，维持学校工作照常进行。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周的政治态度开明，对于进步学生所组织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反蒋爱国运动，表示同情。1949年4月，白崇禧对周鲠生说：武大有几百名共产党员，要注意。周说：“武大的情况我清楚，说那里有几名共产党员还差不多，说那里有几百个中共党员，那不可能。”^⑦他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企图搬迁武大的阴谋。在学校安全互助团、学生自治会联合召开的团结应变座谈会上，他明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迁校”，并号召全校师生员

工“群策群力，团结联防，互助应变……共渡难关。”^③使武汉大学的教研设备和图书资料基本上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全国解放后，周鲠生继续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到北京担任外交部顾问，以后又兼任外交学会副会长，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人大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代初期，周鲠生虽已逾七旬高龄，体弱多病，仍然不辞辛劳，抱病坚持著作，在原著《国际法大纲》的基础上，写成了《国际法》一书，约60万字，新著概括了近代和现代国际法学的研究成果，旁征博引，详为论证，对后学者启发尤大。

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注：

- ① 参见刘运祺等编《辛亥革命诗词选》第18页注①，长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 ② 《现代评论》第1卷第2期，1924年12月20日。
- ③ 《现代评论》第1卷第13期，1925年3月7日。
- ④ 《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3卷第3号，1933年3月。
- ⑤ 《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5卷第1号，1935年1月。
- ⑥ 《国立武汉大学民三五级同学录》。
- ⑦⑧ 转见吴仲炎：《武汉大学在解放前夕的应变斗争》，《武汉文史资料》第1辑第110页。

附注：本文的写作曾得到周鲠生的女儿、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周如松，周鲠生的同事燕树棠，周鲠生的学生、武汉大学法律系姚梅镇、李谋盛、杨鸿年等的帮助和提供资料，特此说明。

聂耳

查建瑜

聂耳，原名聂守信，字子义（紫艺），笔名黑天使、红孩儿、浣玉、噪森、王达平，云南玉溪县人，1912年2月15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于昆明。父亲聂鸿仪，原在玉溪县行中医，后至昆明市行医兼营成春益药铺。聂耳4岁时，父亲弃世。他还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全靠母亲彭寂宽袭夫业，供他们上学。聂耳1918年入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读书，1922年转入求实小学，1925年春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1927年夏初中毕业后，因家境困难，考入当时云南唯一的公费学校——云南省立第一师范高中部外语组，攻读英语。

聂耳幼年受家乡民间音乐、滇戏、花灯等的熏陶，爱上了音乐，10岁时跟一个木匠学吹笛子、拉二胡，又学会弹三弦和月琴，是小学生音乐团的骨干。入中学后他学小提琴和钢琴，经常到风景如画的西山美人峰、翠湖练提琴，萌发了想当一名音乐家的愿望。他积极参加读书会、戏剧研究会及游艺晚会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吹奏乐器，还饰演过《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角。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他为自己确立了“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①的奋斗目标，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济难会”，经常探望、接济被反动当局囚禁的革命志士。

1928年秋，聂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年冬，滇军第十六军到昆明招兵，他们打着“国民革命”的旗号，欺骗中学生“参加学生军是进军官学校，将来为民众谋利益”。聂耳与一些同学报名参军，离昆明经海防、香港、广州，及至被编入湖南郴州新兵队当兵后，才知上当受骗。他化装逃离新兵队，被一个当营长的同乡收留在营部当文书。次年3月被送到军官团受训。不久，该团奉命调赴广州与燕塘军校合并，他被遣散，流落广州。

聂耳在军营数月，对当时一些军阀政客高唱的“国民革命”大失所望。1929年5月，他回到昆明，继续在第一师范高中部读书。这年他写成《薄暮》、《碎礼》两部小说和一篇《在轮船上》的散文。

聂耳在昆明一师求学时，发起成立“七一一青年救济团”，^②受到反动当局的注意，被列入黑名单。1930年7月他在一师毕业后，离开云南，到上海谋生。他先在一个同乡开办的商店云丰申庄帮工，还秘密参加了上海虹口区反帝大同盟。次年春，云丰申庄倒闭，他考入联华音乐歌舞学校为练习生。联华是黎锦晖领导的“明月歌舞社”扩大改组而成的，对外演出仍以明月的名义。在首席提琴王人艺的帮助下，聂耳刻苦学艺，每天苦练小提琴。不久他又跟随意大利籍小提琴教师帕杜施卡（Podashka）学习。他为歌舞伴奏，也兼舞蹈演员，从此改原名守信为聂耳。他勤奋学艺，一年后即由练习生升为正式琴师。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人民抗日爱国的斗争如火如荼，聂耳经常参加群众示威游行活动。1932年春，他认识了共产

党人田汉，受革命思想熏陶，在艺术上树立了“为大众呐喊”的革命思想，以音乐谱写人民的心声。

当时的音乐界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提倡西洋音乐的所谓“学院派”，宣扬艺术至上，埋头搞正统的古典音乐，严重脱离时代和社会实际；另一种是以明月歌舞社一些人为代表的“毛毛雨派”，大演“妹妹我爱你”、“桃花江是美人窝”等低级庸俗的歌舞，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犯中国领土、民族危急的形势极不相称。聂耳几次向明月歌舞社领导提出严厉批评，并以“黑天使”、“浣玉”等笔名发表《批评杂谈》、《中国歌舞短论》、《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等文章，要求“明月”领导摒弃毒害青少年的音乐歌舞节目。^⑧他还竭力主张“明月”到苏联演出，吸收新的艺术思想，创造出新的艺术。他提出的意见未被采纳，便愤然脱离“明月”，8月底离开上海前往北平。他参加左翼剧联领导的新剧活动，在抗日独幕剧《血液》中任主角，并在北平各界群众举行“九一八”周年的隆重集会上，用小提琴演奏被禁演的《国际歌》。同年11月，聂耳回到上海，进入联华影片公司，从事音乐创作。

1933年2月，聂耳与夏衍、田汉、洪深等31人被选为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执行委员。他和任光、安娥、吕骥等人成立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经常在任光、安娥家里聚会，交流创作思想，研究音乐艺术。他提出“什么是中国的新兴音乐”应该是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解决的课题。^⑨他创作了《开矿歌》（田汉词，电影《母性之光》插曲）、《小工人》（安娥词）、《饥寒交迫之歌》（董每戡词，独幕剧《饥饿线》插曲）、《静夜曲》等作品。同年，聂耳经田汉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被百代影片公司请去组织国乐团，并协助任光搞录音工作，为电影《渔光曲》配音。6月14日，《渔光曲》在“金城”公演，上海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赞许。11月，他又被“联华”请回主持音乐工作，并兼顾艺华影片公司和新开办的电通影片公司的音乐工作。是年，他共创作歌曲22首。他与田汉合编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他负责配音并谱曲《码头工人歌》、《苦力歌》等4首歌曲，当时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能准确而又深刻塑造工人阶级形象的作曲家。苏联《国际艺术》也刊登了聂耳的照片。他的《毕业歌》（田汉词，电影《桃李劫》插曲）充分表达了中国青年慷慨激昂的反帝爱国精神。他的《开路先锋》（孙师毅词）、《大路歌》（孙瑜词）也因节奏深沉、刚毅，对劳动阶层的痛苦、怨恨以及反抗精神展示无遗，获得强烈的社会效果。嗣后，他为艺华公司的电影《飞花村》谱写了《飞花村》和《牧羊女》两首抒情插曲（均为孙师毅词），以及为话剧《回春之路》创作的《告别南洋》（田汉词）、《慰劳歌》（田汉词）、《梅娘曲》（田汉词）等插曲，是鼓舞各阶层人民奋起抗战的精神食粮。他还根据民间乐曲整理改写了《金蛇狂舞》、《山国情侣》、《翠湖春晓》等4首民族器乐曲，旋律优美动人，感情色彩浓郁，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他还创作了《前夜》、《时代青年》两个剧本，撰写《看俄国歌剧杂谈》、《一年来之中国音乐》等12篇论文，以及短篇小说、散文、通讯等。

1935年，聂耳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主题歌《新女性》

(孙师毅词)，为电影《逃亡》创作了《塞外村女》、《自卫歌》两首插曲。他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和《铁蹄下的歌女》(田汉词)在国内引起轰动。

短短两年，聂耳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传遍中华大地，他的作品灌制成唱片，被抢购一空。人们赞誉他为乐坛巨星，冼星海评价他为“划时代的作曲家”，“民族呼声的代表者。”^⑤

1935年4月初，聂耳得到上海反动当局要逮捕他的消息，经过党组织同意，决定赴苏联学习音乐。4月15日，乘长崎丸离开上海，准备先到日本学习一年。4月17日抵神户，次日上午到达东京。他确定了在日本的学习计划，抵达东京的第二天，便开始了紧张的学习。6月2日，他出席东京中华青年会馆举行的中国留日学生艺术界聚餐会，发表《关于中国新兴音乐》演说，在听众热烈掌声中演唱了《码头工人歌》和《大路歌》。6月16日他出席留日中国学生诗歌座谈会，并提出“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作为下次座谈会的研究题目。

不久，聂耳认识了一位在日本新协剧团从事灯光工作的朝鲜籍人李相南，两人很快成为朋友。新协剧团这时正准备赴外地演出，李邀聂耳帮忙。聂耳想到既可以观摩演出，又达到旅游目的，便欣然同意。他与李先行出发旅游，7月8日上午到达神奈川县藤泽町，借住在李的朋友滨田实弘的姐姐家。当时正值盛夏，聂耳和房东滨田一家每天赴鹄沼海滨场洗海水浴。7月17日午后，他们前往鹄沼海滨，聂耳独自一人在水深至胸部的海水里作跳浪活动。一小时后，李相南和滨田的姐姐携孩子先后上岸，遍寻聂耳不见。第二天早晨聂耳的遗体从海底打捞上来，嘴里流着血，头部也有血迹，据

当地医生检验，聂耳系窒息死亡，年仅 23 岁。

聂耳突然去世的噩耗传到祖国，人们惊疑、叹息不止。8 月，上海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田汉、郭沫若致悼词。日本东京、千叶县等地也先后举行了追悼聂耳的大会，出版了《聂耳纪念集》。藤泽市民在聂耳去世的鹄沼海滨建了一座聂耳纪念碑。

1954 年 2 月，中国政府在云南昆明市西山、园通山分别修建了聂耳纪念碑和纪念亭。郭沫若撰写的碑文有“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不能明焉”之句，表达了人们对聂耳惨遭不幸的疑惑与惋惜之情。

注：

- ① 汪毓和著：《聂耳详传》第 6 页，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7 年版。
- ② 同①第 3 页。
- ③ 聂耳、冼星海纪念文集《永生的海燕》第 113 页，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7 年版。
- ④ 同③，第 198 页。
- ⑤ 同③，第 88 页。

冼星海

查建瑜

冼星海，广东番禺县人，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生于澳门。父冼喜泰以捕鱼为生，在冼星海降生前半年即病逝，时仅35岁。母亲黄苏英以帮人浆洗衣裳为生，孤儿寡母依赖外祖父黄锦村做散工扶助而勉强度日。1912年，冼星海7岁时，外祖父病故，冼母被迫携冼星海赴新加坡谋生，在养正学校帮佣，供冼星海上学4年。1915年，冼星海入英语学校学习，次年入岭南大学新加坡分校高小部，1920年毕业后入养正中学半工半读。1921年，广州岭南大学派人到新加坡募集经费并挑选优秀生回国深造，冼星海成绩优秀，首批被选中回国。不料岭大附中学费昂贵，冼星海虽有“成绩优秀”的转学证，也不能免交学费，被迫辍学。后经人介绍，入岭大基督教青年会办的义校念书。义校免收学费，只晚上上课，冼白天则去岭大食堂打工。

冼星海自幼酷爱音乐，能吹奏多种乐器。他喜欢听妈妈唱的广东民歌，并且跟着学，后来对人称赞妈妈是他的第一个音乐老师。他在岭大打工时，经常挤出休息时间，在校园僻静处，潜心吹奏黑管。秋去冬来，他那坚持不懈，凝神专注学艺的神情，感动了每天路过他身旁的一位留德教授，表示愿意义务辅导他。从此，冼在这位教授指导下自学和声、对

位、曲式、指挥等，音乐知识和技巧很快提高。17岁那年，他登台表演单簧管独奏，在广州音乐界崭露头角，获得“南国箫手”的美称，被岭大管弦乐队聘为队员兼指挥。同时他以做工的收入在岭大附中上学，于1923年毕业。他没有钱升入大学，便休学做工，并埋头自学，除主攻音乐外，对绘画、书法、诗词也广泛涉猎，这为他后来的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冼星海入岭大预科学习。这时北京大学创办了音乐传习所，他闻讯北上。1926年，冼在北京图书馆任助理员，同时入北大音乐传习所学习音乐理论和小提琴。不久，北京政府教育部以“音乐有伤风化”为借口，勒令全国音乐院所一律解散，冼星海被迫辍学返回广州。他应培正中学和岭大华侨附校之聘任教；还被聘请担任岭大军乐队队长、广州青年会事业部音乐主任。在此期间，经他主持举办的各种音乐会盛况空前，吸引了不少音乐爱好者。

1927年11月底，中国第一所正规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在上海创办，院长是蔡元培，他立即辞去在广州的职务，只身前往上海投考被录取入学。

1929年夏，上海国立音乐院放暑假，有些学生因家境贫困，没有路费回家，住在学校里，学校当局要他们补交住宿费、练琴费，断电断水，封锁琴房，迫使这些学生成立请愿团，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愿。借住在“南国社”的冼星海闻讯后，激于义愤，参与组织请愿团的活动，事后被校方以“鼓动风潮”的罪名开除学籍。这时他认识了在法国学音乐的马思聪，在马的鼓励下，他决心去巴黎深造。

1929年秋，冼星海离上海前往法国。他没有旅资，只得在货船上日日夜夜干着繁重的体力活，累得又黑又瘦，终于在1930年春到达巴黎。这时他身上仅有7个法朗，只得露宿在巴黎街头的屋檐下，达半个多月。有一次，他饿得昏了过去，被巴黎的警察误以为是尸体，装上汽车送往火葬场，幸亏途中经风一吹苏醒过来，才避免被活活烧死。后来得到一位东北籍华工的照顾，先在餐馆当跑堂，又在浴池替顾客修指甲，还看守公共电话、照顾孩子、打扫卫生等。他在各种低贱的劳役之余，仍挤出时间练小提琴。天长日久，他的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一次给客人送菜时，两眼发黑，栽倒在地上，气得老板娘大喊大叫，因而被逐出店门。

冼星海经常怀抱提琴到咖啡馆卖艺，忍受着仆役们的辱骂。后来终于找到了马思聪，在马的积极协助下，跟世界著名小提琴家保罗·奥别多菲尔(Paul Oberdoeffler)学习提琴。奥别多菲尔听说冼星海千辛万苦来到巴黎学习音乐的经历后，破例不收学费，还经常送给他昂贵的音乐会入场券。冼在奥别多菲尔的辅导下，以自己亲身熬过那不眠的冬夜为素材，写成三重奏《风》。这首曲调凄楚，旋律悲怆的乐曲，获得巴黎音乐界的好评，广播电台为他录音播放。嗣后，经奥别多菲尔推荐，冼星海跟法国作曲家、巴黎音乐院教授诺埃尔·加隆(Noel Geallan)学“和声”学、“对位”学，“赋格曲”；跟巴黎音乐学院作曲教授保罗·杜卡(Paul Dukas)、巴黎圣咏学院作曲教授梵生·丹地(V·D'Indy)学作曲；跟巴黎圣咏学院院长拉贝(Labey)学指挥。两年后，冼星海以优异成绩考取巴黎音乐院高级作曲班，成为该班第一名中国

留学生，并获得荣誉奖。

冼星海在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的学习成绩突出，是杜卡教授最得意的学生。杜卡很同情冼星海的处境，给予多方关怀和照顾。

1935年春，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毕业。这时，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方面进一步控制华北的无理要求，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冼星海在法闻讯悲愤异常，思念祖国之心更切。是年秋，他经伦敦回到上海。上海各报纷纷报道这一消息，人们热烈欢迎他归来。但是，上海几个乐队的指挥职务已都被外国人占据。冼星海几个月找不到工作，还要靠当佣人的老母亲养活他。他先是收几个学生教小提琴，后来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做配音工作。他这时创作的《运动会歌》（田汉词）、《我们要抵抗》（田汉词）、《战歌》（俯拾词）、《救国军进行曲》（田汉词）等8首作品，都充满振奋、战斗的激情，受到舆论的好评。

1936年，冼星海进入新华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为《壮志凌云》、《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等影片配曲，并任上述各片音乐指导。同年，他创作了《热血》（田汉词）、《救国军歌》（塞克词）等16部作品。他创作的《战歌》收入“百代”唱片集后，打破了“百代”唱片销售额记录。他拒绝以重金聘请他创作靡靡之音的歌曲。当时，广州中山大学提出以高于影片公司4倍的月薪，请他担任音乐部主任，他亦未去，认为自己从事音乐事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金钱，艺术家有自己的人格。他为进步文艺团体演出《大雷雨》、《日出》谱写插曲和配乐，不要分文报酬。他很赞赏聂耳“为大众呐

喊”的创作方向，经常到农村、工厂、学校了解学生、农民、工人的喜怒哀乐，也到舞厅倾听歌女唱歌，记下她们的曲调和情绪，以丰富自己的创作灵感，更准确地谱写出被压迫者的呼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冼星海创作《保卫卢沟桥》（塞克词）、《女性的呐喊》（安娥词）、《抗战先锋歌》（塞克词）、《国防军歌》（俯拾词）、《我们不怕流血》（安娥词）等20多首抗日救亡歌曲，动员和鼓舞群众团结抗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冼星海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参加“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洪深领导的演剧第二大队，到外地进行抗日宣传。经江苏、浙江、湖北数省到达武汉，沿途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热血》等活报剧，举行大小音乐会数十次，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在一个多月的巡回演出宣传中，冼星海在各地组织起数十个救亡歌咏队，鼓舞无数爱国群众走上抗日战场。

1938年春，冼星海在武汉参加郭沫若主持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任美术音乐科主任科员，与张曙共同负责领导全国的抗日音乐运动。在冼星海主持下，武汉地区先后成立救亡歌咏团体60多个；先后举行救亡歌曲音乐会数十次，其中有十余万人参加的“火炬水上歌咏大游行”和名震全国的“歌咏大检阅”。冼星海在武汉创作了《保卫大武汉》（百鲁词）、《赞美新中国》（光未然词）、《祖国的孩子们》（赵启海词）、《游击军》（先珂词）、《华北农民歌》（张永福词）、《我们的队伍往前走》（廉殷词）、《救亡对口唱》（艾芜词）、

《反侵略进行曲》（侯甸词）、《长期抵抗》（季纯词）、《在太行山上》（桂涛声词）、《到敌人后方去》（赵启海词）、《江南三月》（施谊词）等34首作品。这些优秀作品对全国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鼓舞前方战士的斗志，以及坚定人民对抗战必胜的信心，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限制，使冼星海的歌咏创作工作陷入困境，他与张曙建立起来的数十个歌咏团体也先后合并、取消，“全国歌咏界协会”也夭折了。这时，他收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信，恳请他去鲁艺音乐系任教。与此同时，驻武汉国民党某军长也送来聘书，高薪请他担任军乐队总指挥，并授予上尉军衔。他在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他决心奔赴延安，追求革命真理。

1938年10月1日，冼星海偕新婚妻子钱韵玲离开武汉，经西安，于4日到达延安。他全身心地投入了音乐教学、研究和创作，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中国女子大学和其他一些干部学校教音乐课，讲授作曲、歌剧、理论、指挥，亲手修改学生的作业，为培养和造就革命音乐人才做了许多工作。

冼星海很快习惯了延安的政治生活，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音乐上的许多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他非常主动地和工农群众相处、交谈，体察他们的情感。他认为“他们命定要做新世界的主人翁，把世界变成大同社会。这样他们

的气魄是很大的，力量是深厚的。”因而“他们的声音感情是充溢着热爱和亲切、真诚和恳挚。”1939年6月14日，冼星海在鲁艺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

冼星海对于鲁艺在音乐创作的大众化和民歌形式方面的成绩十分重视。延安有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鲁艺的“民歌研究会”向他们收集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民歌土调。冼星海把各地区各民族的民歌小调以及大鼓、京调加以整理后，进行精心改造和提炼，吸取其风格、特点，使自己的作品向着民族、民主、大众化、科学化的方向大步前进。

从1938年10月到1940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冼星海创作出大量体裁多样、结构多变、乐思深远、取材广泛的优秀作品，其中有《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和《九一八大合唱》等6部大合唱，2部歌剧，近百首歌曲，并继续谱写1935年开始动笔的《第一（民族解放）交响乐》。《黄河大合唱》场面雄伟，气势磅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坚强，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勇敢、顽强和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他的另一部大型作品《生产大合唱》在音乐创作的大众化与民族化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1940年5月，冼星海经中共中央决定，承担抗战记录影片《延安与八路军》的作曲配音工作，并去苏联考察电影与音乐。在由延安出发前往苏联途经西安时，因时局的变化耽搁了几个月，于次年1月抵达莫斯科。他为影片的配乐工作进展顺利；同时他继续写《第一（民族解放）交响乐》，并为《黄河大合唱》编写交响乐队伴奏谱，每天从晨至夜伏案不辍。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侵苏战争，苏联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冼星海也被卷入残酷的战争生活。他决定用自己的音乐去谴责德国法西斯，着手创作《第二（神圣之战）交响乐》。莫斯科全城疏散，冼星海先至阿拉木图，后又转移至乌兰巴托。他曾试图从蒙古回国，受战时交通封锁未能如愿。在蒙期间，他化名孔宇，为乌兰巴托中国工人俱乐部义务讲课，教授各种乐器，并组织音乐会，受到当地华侨的欢迎。他在蒙期间共创作60多首作品，其中《乌兰巴托的早晨》（小提琴独奏曲）等作曲，富有蒙古人民的生活情趣，被当地群众尊称为“了不起的音乐家”，“我们最好、最值得敬爱的老师”。1942年12月初，冼星海离开蒙古返回苏联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后又至库斯坦。这时，战争进入艰难岁月，冼星海忍受着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仍然积极从事创作活动，在防空洞里完成了《神圣之战》这部歌颂苏联红军英勇抗击德国侵略者的交响乐。他还创作了《第一组曲·后方》、《第二组曲·牧马词》、《第三组曲·敕勒歌》、《第四组曲·满江红》以及《中国狂想曲》等管弦乐作品，被苏联音乐界公认为天才音乐家，莫斯科计划举办冼星海管弦乐作品音乐会。

由于战争环境的折磨，冼星海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先后染上肺结核、心脏病、肝肿大、腹膜炎等多种疾病，而未能得到很好的治疗。直到1945年5月，战争快要结束时，他的病才被人们发现，转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但这时他已病势垂危，每天要抽出好几立升腹水。在生命即将结束的前20多天，他还要苏联朋友给他送来谱纸，说要创作一部歌颂卫国战争胜利的大型作品《交响诗·胜利》。可惜病

魔夺去了他的生命，10月30日去世。

1983年1月，冼星海的骨灰从莫斯科顿斯柯依教堂移回祖国北京安葬。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近现代音乐资料丛刊·冼星海专辑》第（一）、（二）、（三）、（四）册，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1962、1984年版。

马可：《冼星海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聂耳、冼星海学会编：《永生的海燕》，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

张 恨 水

宗志文

张恨水原名心远，笔名恨水，安徽潜山县人。1895年5月18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江西。他父亲早年在江西作税务小吏，他的童年是在江西度过的。他7岁入塾。11岁开始读小说，《残唐演义》《三国演义》都偷着看，看得津津有味，是个小说迷，还喜欢读《千家诗》。十三四岁时，什么小说都读，不但读本文，而且读批注。小说中风流才子高人隐士的行为，给了他很大的影响。15岁时，家里请了一位先生教他读书。这位先生是不应科举、不作官的。这种作风，又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因之他对于传统的读书作官之说，素来鄙笑。

1910年秋季，张恨水进入南昌大同小学堂，开始受到新式教育，读新书，看报纸，“一跃而变为维新的少年”。但他依然日夜读小说，依然爱读风花雪月式的词章，“这两种人格的溶化，可说是民国初年礼拜六派文人的典型”。^①他读《西厢记》，学会了许多腾挪闪跃的文法。一年后，他考进南昌甲种农业学校。学校里数理化逼得很紧，他只有在假期中看小说。这时，他已改变过去把看小说当作看故事消遣而作为文艺欣赏，而且兴趣很广泛，既欣赏《小说月报》上翻译的短篇小说，又陶醉于词章小说《花月痕》上的诗词小品，乃至各

章回目。

1912年秋，张恨水因父亲去世辍学，随家人回到老家潜山，终日读书吟诗。次年春天他去上海，不久考入苏州蒙藏垦殖学校。这所学校因为经费不足，常常停课，他乘暇大读《随园诗话》、《白香词谱》、《全唐诗》等，还写过两篇短篇小说，投寄《小说月报》。这两篇小说虽然没有刊登，却收到编辑恽铁樵鼓励他的复信。他晚年说，这封复信“对我的鼓励却很大，后来我当了50年的小说匠，他的这封信是对我起了作用的”。^②

垦殖学校是国民党办的，曾经参与反对袁世凯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解散。张恨水家庭经济困难，不能继续求学，又回到潜山老家，闭门读书。夏天晚上蚊子咬，他把双腿泡在水桶里苦读。还模仿《花月痕》的形式，撰写了他的第一部长篇白话章回体小说《青衫泪》。故事是虚构的，每回里都插进些词章。当时他还不懂词章，只是根据《随园诗话》、《白香词谱》写诗填词，偶用几个典，也无非是耳熟能详的字句。

1915年春天，张恨水离开老家，外出谋生。在汉口一家小报馆里当过编辑，写点杂文；在剧团当过临时演员；还流浪江南一带卖过药，也试写过几篇小说。这段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生活，使他对世态人情有许多体会，为后来写作打下了生活基础。1918年春季，他经朋友推荐，到芜湖《皖江报》任总编辑，每天写两个短评，编一版副刊，暇时写小说，给《皖江报》写过一篇长篇连载《皖江潮》，给上海《民国日报》写过两篇短篇小说：《真假宝玉》和《小说迷魂游地府

记》。这是他正式写作章回小说的开始。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恨水感到非常兴奋。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观点，可是有一颗爱国的心。看见别人示威游行，我们三两个人，手上拿了小旗子，站在报馆门口，跟着喊口号。在我的倡议和主持下，在报上办起了周刊一类的东西。”^④正当运动高潮时，他因事到上海，亲眼看见那里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心情激动，因而十分向往北京的革命和学术气氛，加上朋友的鼓动，决心到北京上大学深造。当年秋天到北京，在上海《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秦墨晒那里帮助处理新闻材料，工余苦攻《词学全书》，学习填词。北京《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看到他填的词，大为欣赏，辗转托人把他请到《益世报》当编辑。两人常在一起饮酒吟诗，互相唱和。1924年4月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张恨水到该报主编副刊《夜光》，并为该报撰写长篇连载小说《春明外史》，每天刊登五六百字，直到1929年1月才登完，全篇约100万字。

《春明外史》是张恨水的著名长篇小说之一。书的主角是新闻记者杨杏园，以他的恋爱故事为线索，旁及各个阶层的人物，对20年代北京官场和社会的种种怪现象，进行辛辣的嘲讽，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半建封制度的罪恶，是一部谴责性小说。全书穿插许多诗词，特别是每回的回目，用辞藻丽工整，很为人所称道。不少人认为书中人物都有所指，当时就有人索隐。《世界晚报》因连载《春明外史》，发行量大大增加。北京几家大报纷纷请张恨水写连载小说，他就同时给《益世报》、《晨报》写小说《京尘幻影录》、《天上人间》。这

两篇都是随想随写，随写随登，为的是多拿稿费。1925 年他开始写《金粉世家》，在《世界日报》上连载，1932 年才刊完，全书近 100 万字。

《金粉世家》也是张恨水的名著之一。它写的是一个所谓金铨总理一家悲欢离合的故事。全书以金铨的小儿子金燕西和一个小康人家的女儿冷清秋为主角，以他们的恋爱、结婚、反目、离散为线索，写这个总理家庭成员的骄奢淫逸，以及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暴露北洋军阀政府中官僚荒淫无耻的面貌。全书人物一二百，布局精心，情节曲折，大大投合了当时社会上一般小市民阶层之所好。尤其是妇女，包括老太太在内，最爱看这部小说。直至若干年后，还不断有读者跟他议论《金粉世家》中人物处理的问题。

《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相继在报纸上连载后，张恨水名声大噪，全国许多报刊和出版部门约他撰写小说的书信纷至沓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1929 年他开始为上海《新闻报》撰写《啼笑姻缘》。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可以说是他一生中写作最忙碌的时期。他每天同时为六七家报刊写连载小说，平均一天差不多要写 5000 字。《啼笑姻缘》也是以爱情故事为线索，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大学生樊家树和北京唱大鼓书的姑娘沈凤喜相爱，被一个军阀拆散，最后沈凤喜被逼疯的故事。在《新闻报》连载后，轰动一时。解放前该书前后印过 20 版以上，印数近 10 万册，还被搬上银幕和舞台，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因为故事的矛头是指向北洋军阀的，许多人索隐，说某某是影射某人，甚至引起过某人的误会，张恨水差点被抓起来。故事的背景是北京天桥，张

恨水曾经一连好多日子出入那里，为他塑造的人物搜集素材，还结交过各阶层的朋友。

“九一八”事变后，张恨水鉴于民族危机严重，激于义愤，开始撰写抗战小说，以唤起人们抗敌御侮的决心。但当时国民政府不许公开反对日本，他的小说也就只能“吞吞吐吐”，不能畅所欲言。他的第一部抗战小说是《热血之花》，写的是我国人民和海寇的搏斗，以海寇喻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写《东北四连长》，是东北抗日御侮的故事，其中三位连长在长城线外牺牲。他的目的是想藉此讽刺当时南京方面消极抗战的大人物。1932年他出版短篇小说集《弯弓集》，“都是些鼓吹抗战的文字”。他在序言中说：“吾固以作小说为业，深知小说之不以国难而停，更于其间略进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矣。”

1934年5月，张恨水到西北游历，耳闻目睹了民间疾苦，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从西北回来后，他接连写了两部“描写西北那些惨状”的小说：《燕归来》、《小西天》，分别在上海《新闻报》和《申报》上连载，引起了人们对西北情况的关注。

1935年秋天，张恨水应成舍我之邀，到上海担任《立报》副刊《花果山》的编辑，约期3个月。期满拟回北平时，值华北危急，他已被日本侵略者列入北平文化界人士黑名单，不得已转道南京。次年4月，他出资和张友鸾创办《南京人报》。他任社长，兼编副刊《南华经》，并为该报写两篇连载小说。一篇《鼓角声中》，写受日本帝国主义威胁的北平，是抗战小说；另一篇《中原豪侠传》，是武侠小说。同时写的连

载小说，有上海《新闻报》的《夜深沉》，《申报》的《换巢鸾凤》，《晶报》的《锦片前程》，《立报》的《艺术之宫》。当时，《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周帮式再三要他写稿，他写了一篇义勇军的故事《风雪之夜》，在该报连载四五个月后，“奉命停刊”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恨水和报社职工为了抗战，坚守岗位，“咬着牙齿”将《南京人报》办下去。直至11月南京沦陷前夕停刊。次年1月张恨水携带家眷到重庆，在《新民报》工作，编副刊《最后关头》，并为《上下古今谈》专栏写散文。散文的内容多半是讽刺国民党统治的种种黑暗。为了躲过重庆当局的新闻检查，他常常采取影射的办法。他说：“社会上每有一个问题发生，我就在历史上找一件相近的事谈，或者找一件大自然的事物来比拟”，“而《上下古今谈》当时能被社会注意，就在这一点”。^④他几年中写了1000多篇，约上百万字。

抗日战争时期，张恨水还写了将近30部小说，其中以《八十一梦》最有代表性。《八十一梦》是一本寓言体小说。他以第一人称写了十几个梦，各梦自成段落，以荒诞不经的寓言，揭露国民党官僚豪门的贪污腐败和投机商人的巧取豪夺。其中《忠实分子》一篇，写一群鸡狗通过钱眼登天，钱眼的横额上有“孔道通天”四个大字，直接讽刺了当时“四大家族”之一的孔府，以至他几乎被国民党特务投入监狱。《八十一梦》是抗战时期销数最多的一本书，延安曾翻印。1942年秋天周恩来在重庆会见《新民报》编辑部工作人员，张恨水在座。周恩来针对《八十一梦》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

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春张恨水回到北平，担任《新民报》北平版经理，兼编副刊《北海》。当时社会上流传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之说，即这些人不择手段地攫取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等。他耳闻目睹，不胜愤慨，1947年写了一篇《五子登科》的小说，揭露国民党官僚政客的贪污腐化。1948年秋天他辞去报社职务，专事写作。到北平解放前，共写中、长篇小说十四部，先后在北平和上海的报纸上连载。其中《五子登科》直至1956年始续完，也有几篇解放后未续写下去。

解放后，张恨水被聘为文化部顾问，1959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于1949年夏患脑溢血，一度瘫痪在床，经多方治疗，病情渐渐好转，恢复了部分写作能力。1954年后，他根据民间传说改写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秋江》、《孔雀东南飞》等，还应中国新闻社之约，为海外侨胞写了《重起绿波》、《男女平等》、《凤求凰》等小说。为描绘解放后北京城郊变化，他写了一组《冬日竹枝词》。为了写好这组词，他逐一观看了北京13个城门附近的变化。

1967年2月15日，张恨水因病在北京去世。

注：

① 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第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② 张恨水：《我的创作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第155页。
- ③ 张晓水等：《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第88页。
- ④ 同①，第92页。
- ⑤ 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第83页。

王 云 五

熊尚厚

王云五原名之瑞，小名日祥，族派名鸿祯，后改字云五，号岫庐，笔名出岫、龙倦飞，晚年自署岫庐老人，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1888年7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生于上海。王家世代耕读，父亲王光斌弃农经商，到上海开设一分小店。王云五8岁时在家由长兄王日华（秀才）课读，两年后长兄病故，乃改入私塾就读。

王云五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因其长兄早逝，父亲不愿他再走科举的道路，14岁那年受父命去一家五金店当了学徒。王云五上进心强，不甘于就此辍学，白天在店里学生意，晚上进夜校学英语，同时还阅读一些自己喜爱的书。当他读了科学发明家《富兰克林传》一书后，更增添了自己苦读成才的信心，半年后即离开五金店，入美国教会主办的守真书馆学习英语。16岁那年，父亲又命他在一家洋行仓库当助理，再次被迫辍学。但他仍不甘心，半年后又入同文馆学习英语，次年春还兼任该馆的教生（助教）。同文馆附设有图书馆，使他有机会广泛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亚丹、斯宾塞及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

1906年冬，王云五被上海益智书室聘为英语教员，兼授数学、史地课，18岁即开始步入教育界。翌年春，他任振群

学社社长，10月转入中国新公学任英语教习，胡适（时名洪驊），朱经农等为该校学生。嗣后中国新公学并入中国公学，他继续任教历时4年。他曾一度想出国留学深造，就读于美国所办“万国函授学校”土木工程专科，又由于二哥的病逝而放弃。1909年，江宁提学使李瑞清开办留美预备学堂，他又兼任该校教务长。

辛亥武昌首义后，上海革命军兴，学校停课，王云五为李怀霜主办的《天铎报》撰稿，并任《南方日报》译述。12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国，香山县的旅沪同乡会在扈虹园设宴欢迎，王为宴会主持人，受到孙中山的青睐。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王云五被孙中山聘任大总统府秘书。此时他就改革教育问题写信给教育总长蔡元培，因而得以在教育部兼职。3月教育部迁北京，他任专门司第一科科长，不久被荐为佥事，随即又兼北京国民党人所办《民主报》主编、国民大学法科英文教授。同年9月加入国民党。1913年3月，教育总长由农林总长陈振先兼任，王云五任主任秘书兼专门教育司司长。5月辞去教育部任职，8月任中国公学大学部专任教授，讲授英文修辞学、英国文学史及英法通论等课程，历时3年。其间一度兼任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处编译股主任。1916年春，他离京至沪，7月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此后他在上海从事编译工作，1920年为上海公民书局主编《公民丛书》，开始步入编译出版行列。

1921年9月，王云五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接替高梦旦担任编译所长。上海商务印书馆为国内最大的近代化出版企业，“五四”以后力求出版有关新文化运动的书籍以适

应时代潮流。王云五接任后，以“教育普及”和“学术独立”为出版方针，改组机构，延聘朱经农、杨杏佛、周鲠生、竺可桢、陶孟和、何炳松等专家学者，分别主持各部工作；创编各科小丛书，为日后编印《万有文库》作准备；扩充原附设的英文函授科，改名函授学社；加强与各大学及学术团体联系，增出《大学教科书》。从1922年到1929年王主持编译所的8年间，先后编译出版有《教育大词典》、《动物学大词典》、《英文大词典》、《英文习语大全》，影印《四库全书》，出版《说文解字诂林》、《四部丛刊》、《百科全书》、《万有文库》第一集以及《王云五大词典》、《王云五小词典》等等。

王云五在主持编译所期间还从事辞书检索的研究。他在高梦旦探索多年的号码检字法的基础上，参考陈文的号码检字方案，着手四角号码检字法的研究，于1928年10月完成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同时，为使商务涵芬楼藏书的公开阅读，他又运用杜威的十进分类法，于1927年4月写成《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

王云五在商务的这些成就，使他在出版界开始显露头角，除兼任商务东方图书馆馆长外，还先后任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主任、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中国公学校董等职。但因商务连年发生劳资纠纷，王云五为商务工会和职工所不满，1929年10月辞去编译所长职离开商务。经杨杏佛向蔡元培举荐，转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法制组主任兼研究员。

1930年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去世，经夏小芳、张菊生、高梦旦等商议，再聘王云五回商务担任总经理。王云五到职后先往日、美、英、法、德、意等9国考察企业管理，

9月回国后向董事会提出实施科学管理的计划，推行科学管理以整顿商务。他针对商务各科问题与积弊，先后公布改组编译所和总务处的方案，组设编译评议会，推行总经理负责制，施行《编译工作报酬标准试行章程》等。这些“科学管理法”，尤其是编译工作按时计算、按字数付酬的办法，使职工工作量陡然较前增加二三倍，也不合脑力劳动的特点，因而遭到商务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和总务处四个工会的强烈反对，提出19条要求迫其答复。嗣后经上海社会局出面调解，王云五口头上表示撤回改革方案，而实际上于无声无息中坚持改革整顿，避开编译计酬及人事改革的阻力，先对成本核算和计划财务管理方面，分项分步推行。

1932年1月，日本侵略军袭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发生，商务总馆、总厂在战火中被毁，损失奇重。王云五宣布总馆、总厂停业，职工一律解雇，组设特别委员会和善后办事处处理善后。在经营管理上分别加强北平、香港分馆分厂的经营，同年8月宣布总馆、总厂复业，新订雇用契约重新录用职工，陆续公布各种章程、规则，全面推行“科学管理”的改革和整顿。王云五以总经理兼生产部长及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总揽编译、出版、印制全权。经过加强对工厂的管理，实行职工三班工作制及其它种种的改革，商务生产增加，成本降低，大量重版旧书和增出新书，达到日出新书一种，还创立“星期标准书”向读者推荐新书。从1932年到1936年的4年间，商务增出新书近6000种，出版总数达12024册，比“一二八”事变前超过4倍，^①其中包括《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万有文库》第二集、《四库全书珍本》、

《四部丛刊》续编、《幼童文库》、《丛书集成》、《四部丛刊》三编、《中山大辞典》、《国学基本丛书》及《中山文化史丛书》等。许多书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中国近代文化和教育事业的贡献颇大。王云五在出版界、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声誉隆起，执全国出版界牛耳，成了国内最著名的出版企业家。他除任上海市图书馆协会主席，书业同业公会主席、温溪造纸公司董事长。中国经济学会理事及全国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外，还任国民党政府行政效率委员会委员、工商部工商法规委员会委员、国难会议议员。

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王云五决定商务以香港分厂为生产中心，坚持仍以出版业务为主的方针，亲自驻港督导一切。他曾计划在长沙增设分厂，将主持人分配于上海、长沙、香港三地，分头开展商务的经营。嗣因长沙遭日机轰炸和沪地职工不愿去长沙而未实现，乃改变计划，于昆明、重庆、桂林、西安及江西赣州筹设分厂，在香港设总管理处驻港办事处，于重庆设编审处和印刷厂，仍以香港为出版重心，分区印刷供应教科书和参考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王云五改在重庆设商务总管理处统辖后方各分厂，其出版方针转以一般用书为主，用丛书方式出版各种抗战读物，继续编印《大学丛书》及其它专门著作，并新印和重印许多有价值的一般图书。到1946年止，商务出版各种文化学术新书达16725种，35664册。^②

抗日战争时期，王云五除主持商务业务外，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动，在政坛上日趋活跃。从1938年7月到1946年6月，他连任国民参政会四届参政员，1942年10月

起任驻会委员，1943年1月兼参政会经济策进会滇黔办事处主任，还任参政会第四届第一、二次大会主席团成员。此外，他还兼三青团设计委员会委员、中训团党政班讲师、中国访英团团员、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委员等职。

王云五虽然在1912年加入过国民党，但因在1927年国民党党员登记时未办手续，所以此时成了一位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但他一直自称为“二无党党员”，^⑧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在参政会上极力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王云五无端指责此为开了“恶例”，事后自称这是“从侧面协助政府以打击中共，较诸简单责备中共者手段实更厉害”。^⑨在他担任参政会主席团成员时，对有利于蒋介石的议案，都竭力予以匆匆通过。1946年1月重庆政协会议召开时，他又为会议代表。在讨论“国大代表”问题的激烈争论中，他帮助国民党说话，谓战前由国民党定下的900名代表“是依法选出的”，应该有效。^⑩

王云五以“社会贤达”身分四出活动，所言所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因而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器重。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他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一跃而成了国民党政府大员。王云五辞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编审部部长职务，同时还辞去了参政会参政员和主席团成员的名份，喜形于色地宣称自己“来自民间，最知民间疾苦”，同时又“了解政府的困难”。^⑪他以经济管理专家自任，表示自己“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⑫他标榜经济部的施政方针是要将全国经济由官营为重心向民族工商业转变，统筹辅导“国营

事业”的改良；并于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分设工商督导处，负责民营工商业的调查、调整、辅导及扶助，对有竞争性的舶来品采取限制办法。他还打算设立计划委员会为其咨询机构，企图帮助国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笼络和欺骗。但因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经济部无力管制，王亦束手无策。

同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王云五任国大代表及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中，他与莫德惠等具名提出反共的“关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积极活动于大会内外，被国民党报刊捧为“国大之宝”、“主席团发言人”、“说明专家”等等。为此，蒋介石对之“信任有加”。^⑧当王云五辞去经济部长后，1947年4月又升为行政院副院长；后又兼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预算委员会和赔偿委员会主任委员、善后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7月，他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务会议，极力支持所谓“厉行全国总动员戡乱方案”进行内战。1948年4月，任“行宪国大”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5月行宪内阁成立，王云五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

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之势，蒋介石力图挽救危机，指示王云五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共同策划币制改革。王云五于8月初提出“统一财政经济决策机构”和“行政业务计划方案”，随又草拟了“金圆券发行办法”。蒋介石采纳了王云五的币制改革方案，于8月19日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收兑民间的黄金、白银和外汇，限制物价，以行政命令抢夺人民手中的财富。王自鸣得意，“长饮龙门”^⑨。9月，他前往美国出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第三届联合会，大吹其币制改革，以图讨好美国而获取贷款。可是，发行金圆券不过3个月，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金圆券形同废纸，全国民怨沸腾，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破产。王云五本非最高决策人，但一时成了众矢之的，遭到各方面的弹劾，于11月被迫引咎辞职，悄然离开南京去广州。其后，仅任行政院顾问。

1949年2月，王云五前往香港，创办了国华两合公司出版社，又回到了出版界。翌年冬发行《自由人》三日刊，并增编出版《王云五综合词典》。1951年1月，他在台湾设国华出版社分社，定居于台北。

王云五到了台湾后，重新活跃于政坛上，先后任“行政院”设计委员兼改制组召集人、“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公务员高等考试典试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国大”一届三次会议主席团主席等职，1963年7月一度代理“行政院”院务，仍为台湾政界大员。他还任台湾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中华文化复兴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西文化经济协会常务理事，台湾商务印书馆业务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1963年12月，王云五在台湾退出政坛，仅任“总统府”资政，重新回到出版界，于1964年7月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他大力整顿改革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经营出版。头两年续出旧书，随后大量印行新著及译本，先后出版《万有文库荟要》、《四库丛刊初编》缩本、《丛书集成》简本、《各科研究小丛书》、《人人丛书》、《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古籍

今注今译》和《中山自然科学大辞典》等书，平均日出新书约5种。^⑩

王云五在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之余，还整理旧稿，从事新著，先后出版《谈往事》、《纪旧游》、《王云五新辞典》、《十年苦斗记》、《岫庐八十自述》、《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二千五百余年来中国治学方法的综合研究》、《岫庐最后十年自述》等；并有译著《企业组织与财政》、《苏联工农业管理》、《美国全史》等；还编有《王云五大辞典》、《王云五新词典》、《中山大词典一字长篇》、《中国史地词典》等。

1979年8月14，王云五病逝于台北。

注：

- ① 王云五：《八十自述》上册第22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9月版。
- ② 徐有守：《伟大出版家王云五先生》，台北《出版界》第1期（1979年）。
- ③ 张道藩：《读〈我怎样认识国父孙先生〉有感》，台北《传记文学》第2卷第1期第19页。
- ④ 王云五：《谈往事》第6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
- ⑤ 《划时代的会议——政协会议》第49、56、60页，新时代印刷出版社1946年版。
- ⑥ 上海《新闻报》1946年5月16日。
- ⑦ 同⑥1946年6月9日。
- ⑧ 王寿南主编：《我所认识的王云五先生》，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
- ⑨ 当时上海《申报》载文讽刺他常穿着长袍，前往龙门饭店得意地独酌。
- ⑩ 徐有守：《王云五先生与商务印书馆》，台湾《东方杂志》复刊第7卷第1期。

汪 康 年

汪仁译

汪康年初名灏年，字梁卿，后改名康年，字穰卿。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1860年1月25日（清咸丰十年正月初三）。父亲汪养云，清咸丰举人，初授教谕，后纳资为广东候补知县。汪康年幼时随父在粤就读私塾，1882年丧父，回里谋得书局校对工作，不久往汉口开馆授课。

1889年，汪康年入京应优贡考试，入选。初选主考为瞿鸿禨，遂结师生之谊。旋复考取八旗官学教习。是年秋返浙应乡试，中举人。次年受两湖总督张之洞聘请，赴武昌教读张的孙辈，成为张的幕宾。不久又兼任汉口自强书院编辑、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1892年汪入京应会试，中式。但因足疾骤发，不及应殿试，遽返湖北。1894年入京补应殿试，并谒见主试翁同龢，执师生礼。

甲午中日战起，汪康年关心战局，遍阅京、沪各地报刊，见内容殊多失实，乃萌自办报刊之念。甲午战败，割台赔款，全国震动，汪深受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影响，亦认为“洞明时事之流，已金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且“非将教育、政治、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改弦易辙，不足以变法”。^①遂创议组织“中国公会”，往来于沪、汉间，“讲求中国之所以贫弱，西国之所以富强”。^②但中国公会一时难以成立，因有

先办报馆“而寓学会于其中”之议。^③

1895年夏，康有为等人在京、沪先后成立“强学会”，汪康年应康之请至沪主事，并携家迁居上海。不久北京强学会受劾被封，上海强学会也随即解散。汪康年、黄遵宪等人谋再振之，商议以报馆为倡始。次年春与梁启超共同商讨创办《时务报》的宗旨及章程，以上海强学会结余款项移作办报经费，不足之数再向外募捐。1896年8月9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时务报》在上海创刊，石印旬刊，月出3册。梁为主笔，汪任经理，掌财政、人事，间亦执笔论著。先后延请麦孟华、徐勤、章炳麟等人为撰述；张坤德、郭家骥及日人吉城贞吉分任英、法、日文翻译。报设论著、上谕、奏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西电照译等栏，传播维新救亡思想，成为宣传变法图强的主要刊物。初期梁启超等人议论新颖，文字通俗，以犀利的笔锋“去塞求通”，深受时人欢迎，阅之“心气勃豁，顿为之喜”，“论不变法之害，沉着痛切，言言扼要”。^④因此不数月风靡海内，印数达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⑤在当时推动变法，制造舆论方面，作用显著。张之洞乘机邀誉，札飭以公费购发全省官员及书院诸生阅看。

汪康年先师事翁同龢，复与梁启超同事，与谭嗣同亦时有书信往返，在师友的影响下，“以为民气之郁久矣！宜重民权、浚民智，用以明目而达聪”。^⑥故于《时务报》第4册上发表《中国自强策》，提出“复民权”的主张；继在第9册上《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中称：“天下之权势出于一则弱，出于亿兆人则强，此理之断然者。”“若夫处今日之国势则民权

之行尤有宜亟者。盖以君权与外人相敌，力单则易为所挟；以民权与外人相持，力厚则易于措辞。”^⑦虽然他的民权论仍不脱“君民共治”的范围，但发表后立遭顽固势力的指责非难。张之洞授意僚属，以民权文字触犯封建纲常为辞，嘱其“以后文字真要小心”，“实做经理二字，千万不可动笔”。^⑧汪原是张的旧属，《时务报》又受张的资助，此后遂不敢再侈言民权。但梁启超等人的论著仍不断侵及洋务派的利益，为张之洞等所不容，曾以停发该报相胁迫，并一再通过僚属促汪转而干涉笔政。适值梁启超离沪去湘，汪兼代笔政，乃擅改梁自湘发来论著，引起梁的不满。此时维新派拟推龙泽厚进报馆，以“稍分汪氏之权”，但汪视《时务报》似“一人一家所开的生意”而拒之。^⑨嗣后梁启超辞去《时务报》笔政，汪遂总揽一切。从此《时务报》转而成为洋务派张之洞集团的喉舌。

是年11月，汪康年与曾敬貽等在沪创设“蒙学会”并发刊《蒙学报》，“以启蒙为主”“开通锢蔽”为宗旨。12月汪偕曾敬貽东渡日本，遍游东京、横滨、大阪等地，采访政治风俗，联络朝野名流，匝月而返。1898年1月汪康年等在沪设立“东文学社”，招生开课，授以日文，议拟于毕业后送日留学。

《时务报》虽已风行全国，但旬日一册，对于时事评论往往不能及时，汪康年遂与人另行集资，在沪创办《时务日报》，日出一期，锐意经营，改革版面，仿照西文报刊，用白报纸两面印刷，分版面为四版两栏（当时沪地《申报》等尚用有光纸一面印刷，书册式不分格栏）。1898年5月11日创刊，与《时务报》同时发行，记载中外要闻，评议时政得失，

并重在摘译西报，沟通商情。汪欲“联气类，宣上德，达下情，转圜时务，广牖见闻”，使“壅蔽顽固之俗一变而洞澈，而愤励”。^⑨该报采访、论述皆由汪一人担任。7月沪地发生旅沪甬人抗议法租界当局持强欲毁四明公所义塚事件，该报全力声援，获得好评，销路渐广。

是年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7月经言官奏请改《时务报》为官办，派康有为为督办。汪康年以“商款仍旧商办”为由，将《时务报》“暂行停止，俟康工部到申，再由其筹办，本报特改名《昌言报》，仍与从前《时务报》蝉联一线”。^⑩此时汪与梁启超的矛盾已公开化，梁诋汪私据《时务报》。但汪得张之洞的庇袒，仍占用《时务报》馆址，自办“商报”——《昌言报》。汪自任总理，聘梁鼎芬为总董。同时汪将《时务日报》改名为《中外日报》继续发行。《昌言报》在戊戌政变后总董改为日人安藤虎雄，出至第10册（11月19日）亦停刊。

1900年，义和团运动事起，《中外日报》诬之为“邪民拳乱”，并提出“乱民必宜剿，必不宜抚；宜急剿，必不宜缓”的反动主张。7月东南各省督抚勾结各国订立“东南互保”，汪为之奔走联络、制造舆论。次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军久驻奉天（今沈阳）不撤，并胁迫清廷签约。汪康年闻讯激于义愤，与蒋智由等召集会议，力陈其害，演词慷慨激昂，闻者动容，并摘登报端，沪地西报亦竞相转载。汪又腾电中外，并上书张之洞等督抚，请为力争，引起当局注目。由于朝野舆论一致抗议及全国民众掀起拒俄运动，卒使东北俄军分批撤出。

1904年春，汪康年暂委他人代理《中外日报》，入京补应朝考，授职内阁中书，^⑩此后经常往来于京沪间。次年在京浙人筹建浙省铁路，公推汪康年等为代表，由汪持公函到沪邀集同乡，组成商办浙江铁路公司。此时清廷以科举既废，教育趋向犹待商议，于1906年特设学部咨议官，汪康年与名流陈宝琛、张謇、严复、汤寿潜等33人入选。

汪康年于1907年在京筹设《京报》，以为“报馆与政府距离既近，见闻自较确实，不致有捕风捉影之弊，……较之设在外省，虽言之力竭声嘶，而政府仍不闻不见者，其效力实有大小之殊”。^⑪《京报》于5月10日（三月二十八日）发刊。其时军机处内首席大臣奕劻与大学士瞿鸿禨对抗，相持不下。汪康年既是瞿的门生，又有姻亲关系，《京报》遂成为瞿的政治斗争工具，多次揭载奕劻父子卖官纳贿的贪污秽行，奕劻、袁世凯一伙恨之入骨。西太后对奕劻的作为亦有所闻，一日单独召见瞿鸿禨时，微露有罢奕劻之意。瞿喜甚，退而告汪康年，汪即转告在京友人、英国伦敦《泰晤士报》记者高某，不料高某遽发电伦敦，在该报上刊出消息，外国公使纷至宫廷询问。西太后既怒瞿的泄密，奕劻、袁世凯复落井下石，乘机策划言官，罗列“交通报馆”、“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罪名劾瞿，瞿遂被免职，着即开缺回籍。《京报》亦于7月17日接巡警总厅一纸公文被勒令停闭。汪康年颓然返沪，继续主持《中外日报》，仍持君主立宪派立场，拥护清政府实行“新政”。

1908年6月《中外日报》刊载来稿《金陵十日记》，极言南京军警政绩之腐败，致获咎地方当局。两江总督端方电苏

松太道蔡乃煌，盛气诘责。蔡与汪康年本系旧交，并曾资助该报，是该报股东，蔡乃以地方长官及股东身份代拟认错书稿一纸，交人转饬汪康年照抄。汪答以此腕可断，此稿不可照缮。后在蔡的压力下，汪被迫将《中外日报》售予蔡乃煌。次年，汪康年与清廷驻比利时使署职员王慕陶创办“海外通讯社”，并参加中国新闻常会。

1910年11月汪康年复办《刍言报》于北京，5日一期，月出6册。在创刊例言中称：“本报义取询于刍蕘之意，……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供人研究为主”，间及摘登要闻，补充漏刊消息^①。此时清廷已病入膏肓，而《刍言报》仍持顽固的保皇立场。

1911年8月各地保路运动如火如荼，汪康年惊呼：“聚集无数人妨害官吏之行动，阻社会之生活，即大乱之道也。”不久武昌起义，震撼北京，汪康年避居天津。11月3日晚得在京友人来书密告：清廷将起用袁世凯。汪阅毕叹息不已，称：“今方主张共和，然是人可为拿破仑，不能为华盛顿。”遽起就寝，夜半忽发呻吟声，家人往视已昏迷不醒，延至次晨去世。

注：

- ① 汪诒年：《汪穉卿先生传记》卷2，1938年版。
- ② 同①。
- ③ 此时友人邹沅帆来书劝告：“若能先译西报，以报馆为名，而寓学会于其中较妥。”汪康年深以为然。
- ④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陈立三《致汪康年书》及同年八月十六日纪钅维《致汪康年书》，《汪穉卿先生师友手札》。

- ⑤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
- ⑥ 唐文治：《同年汪穉卿先生传》，《茹经堂文集》二编第6卷。
- ⑦ 汪康年：《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时务报》第9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出版。
- ⑧ 梁鼎芬：《致汪康年书》，《汪穉卿先生师友手札》。
- ⑨ 梁启超：《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汪穉卿先生师友手札》。
- ⑩ 汪康年：《论设立时务日报宗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时务日报》第1号。
- ⑪ 汪康年：《昌言报跋》，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昌言报》第1册。
- ⑫ 清代沿明制，在内阁设中书若干人，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诸事，官阶为从七品。
- ⑬ 汪康年：《京报发刊词》，刊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京报》创刊号。
- ⑭ 汪康年：《昌言报第一期小引》，清宣统二年十月，《昌言报》第1期。

赵 紫 宸

寿祝衡

赵紫宸，1888年2月29日（清光绪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德清县一个小商人家庭。少时敏思好学，先就读私塾，诵读四书、五经等古籍，并学习联句吟诗，期望考取秀才求得功名。惟因家境贫寒，乃辍学家居练学珠算记账，准备日后随父从商。由于鸿志难遂，精神空虚苦闷，相信了万般皆由命的迷信观念，常常求神拜佛，但企求上进的心愿并未息止。

1905年，赵紫宸闻悉苏州有一所基督教教会办的萃荣中学，不收学费，即离家去苏州求学。他入校后勤奋攻读，获得了新的科学文化知识，眼界逐渐开阔；同时也受到了宗教的熏陶，逐渐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1910年赵在萃荣中学毕业后，考入美国教会办的东吴大学。该校收费昂多，赵四处筹措，最后动用了他母亲多年节衣缩食积攒的全部积蓄，才勉强凑齐。在东吴大学，他勤勤恳恳地读了4年，成绩特优，1914年毕业后被选送去美国田纳西州万德比尔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社会系学习。他在美国半工半读，生活俭朴，仅有一套西装，衬衫是晚上洗了白天穿。经过3年刻苦学习，他出色地完成了学业，毕业成绩名列第一，获得金质奖牌。

赵紫宸于1917年回国后，在母校东吴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大纲、社会管理、十八及十九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社会进化、圣经文学及伦理学等课程。1922年任东吴大学教务长。

1926年，由美以美会的汇文大学神学馆和公理会的华北协和道学院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神科，改为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赵紫宸应聘到燕京大学任教授，不久继刘廷芳任宗教学学院院长。该学院招收文理科大学毕业生专门进行基督教的教育，标榜“发扬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基督教学术”，以培植学生在中国传布教义、建造教会、推广美国基督教思想和美国“友谊”，这个学院竭力在燕京大学维持宗教气氛，其教授都在文理各系兼课，以便把宗教学院的精神渗透到整个燕大。赵紫宸主持宗教学院，怀着“为基督尽忠心”的虔诚感情，期望培养出一批批人才在中国发展基督教事业，尽心竭力，整日奔忙。

当时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在宗教思想方面，是属于美国现代派、自由派的，与南京金陵神学院的正宗派、教会派相对峙。由于受到燕京大学美籍哲学教授博晨光的影响，宗教学院曾讨论过放弃圣经中的旧约，而以中国先贤圣训代替的问题。许多教授虽然知道旧约里讲些什么，却对中国文化的底蕴不甚了了，因而讨论旷日持久，不得要领。赵紫宸主持宗教学院后，由于他对基督教抱有“自传”的热忱，同时又对中国古代文化哲学思想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因而能把西方的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基督教哲学思想体系。他在宗教学院主讲系统神学和宗教哲学等课程期间，编著了一系列神学著作，贯串

着“自传”的精神，体现了他中西并重、物质与精神并重、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哲学思想体系，受到国内外基督教人士的高度评价。他的主要著作有：《耶稣传》、《圣保罗传》、《基督教进解》、《基督教哲学》、《耶稣的人生哲学》、《基督教中心信仰》、《基督教与我的人格》等。《耶稣传》既依据有关史料、传述和经典著作，又阐发他自己的心得体会和独到见解。《基督教进解》包括“知识与信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本身——耶稣基督”、“上帝论解”、“论救法”、“教会生活”、“基督教与世界”等论述，其中引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著述，阐发基督教教义，内容丰富，立论谨严。

赵紫宸自1928年起，兼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主办的《真理与生命》月刊主编计9年。该刊以登载阐发基督教美国现代派、自由派思想的文章为多，赵经常撰写一些阐述自己宗教哲学思想的文章。“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该刊也发表了一些宣传抗日爱国的文章。在1931年10月1日出版的《真理与生命》上，赵发表《基督徒对于日本侵占中国国土当持什么态度》一文，严正指出应当“将此次事实之真相，宣告于世界信众，并联合世界信众，特别是日本的信众，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扰乱世界的罪恶”，表明了他抗日爱国的立场。

由于赵紫宸对于我国古典文学有深厚的根底，特别是诗方面的造诣，在燕京大学曾兼任中国古典文学教授，讲陶渊明诗等课程。东吴大学赠予文学博士称号。1932—1933年他曾赴英在牛津大学讲授中国文学。他一生先后赋诗词5000余首，取材宽，含意深，既重格律又不受拘束；虽然带有宗教

色彩，但许多诗篇爱憎分明的态度以及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是鲜明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处于战争状态后，赵与燕京大学十几名教授被日本宪兵队囚禁半年多，他在被囚期间赋诗 170 余首，忠贞爱国的感情溢于言表。他的诗词已成集的有《南冠集》、《玻璃声》等。

赵紫宸任燕京大学宗教学学院院长，除 1946 年一度离职外，直至 1952 年该学院停办，前后达 20 多年。他为支撑萎靡不振的宗教学院，寻求经济上的支援，劳心焦思，不遗余力。他曾去美国向教会人士游说，争取捐款；也向国内入教的资本家募集；他走访金陵神学院不止一次，企望分得一点美国捐款；对于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颐指气使，他也竭力忍受。直到解放以后，宗教学院成了一些敌视新中国的人躲避和活动的场所，他仍怀着“为基督尽忠心”的虔诚心情，四出奔波募捐，筹集经费，冀图维持苟延残喘的宗教学院，而对师生此时的种种活动却无暇顾及。

30 年代和 40 年代，赵紫宸先后去过耶路撒冷和美、英、荷、日、印等 20 多个国家进行讲学和教会活动，受到各国宗教界的尊重。1947 年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赠予神学博士称号。1948 年参加世界教会协进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成立大会，被选为六主席之一。嗣因该会支持不义战争，赵愤而辞去主席职务，并在报上发表声明。他笃信基督教，但他热爱祖国，希望基督教能为中国服务。1948 年冬，美国协和神学院聘他为客籍教授，他不就，于解放前夕毅然回到祖国。

赵紫宸回国后，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代

表会议，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此后，他担任北京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常委等。他虽年逾花甲，但仍不倦地学习，乐于接受新事物，热爱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他和宗教界爱国人士一道，积极发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毒害我国人民和青年的种种事实，号召摆脱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教会的控制。晚年他对西方基督教教义继续进行了许多研究。

1979年10月21日，赵紫宸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91岁。

主要参考资料：

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

赵紫宸：《基督教进解》，青年协会书局1950年4月版。

赵紫宸：《圣保罗传》，青年协会书局1947年10月版。

吴芷芳：《记宸师点滴》，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12辑。

王瑾希：《基督教界爱国人士赵紫宸》，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12辑。

孟 目 的

寿祝衡

孟目的，名广义，字目的，北京人，1897年10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家庭。父亲孟继增，为公理会牧师。

孟目的少年时候在通县端蒙小学就读，以后入潞河中学、萃文中学，1918年毕业于华北协和大学（北通州）（燕京大学前身），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举办的留美学习班。毕业后，院方公布取消药科学生留美计划，经该院英国教授资助，去英国勤工俭学。1919年到伦敦后，先在爱兰伯利药厂实习，1921年考入伦敦皇家大学药学系，毕业后，取得英国皇家药学会会员资格，为该会第一名中国会员。

1925年，孟目的学成回国，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药房副主任。鉴于我国药学工作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当时药房的调剂人员少，知识水平低，孟乃联合同事冯志东、何鉴清等，于1927年创办了北京药学讲习所，以提高初、中级药剂人员的业务水平。20多年中，这个讲习所培训了2000多名中级调剂、制剂人才。

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署邀孟目的去南京，参加编纂《中华药典》，并任命孟为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物化学系主任、军区学校药科主任。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各国药品竞相倾销，伪

劣药品充斥市场。国民政府决定编纂一部药典，也无非是为了点缀门面，主要是参考外国药典加以译编。但是孟认识到药典是国家对药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的技术规定，是药品生产、使用、供应、检验、管理等共同遵循的法定依据；编订药典是一项政策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必须认真做好。他首先创议并厘定“药典”这个名称，明确这是药品的法典，是国家对药品的立法，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其次，初步统一了许多药品的名称。当时，药品多数是进口的，商品名、译音都很乱，孟等潜心考察了我国一些词汇，结合制剂的特点和拉丁名的音节，拟定了简明的剂名，如用酒精提取或制备的制剂，拉丁名称 *Tinctura* 的定名为“酊剂”，拉丁名称 *Spiritus* 的定名为“酩剂”；其他如 *Tabellae* 称“片剂”，*Suppositoria* 称“栓剂”等，比较简短、明确，沿用至今。

1935 年，中国药学会举行第七届年会，孟目的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及学会理事。年会对于加强药学教育问题展开了讨论。当时国内仅有少数医学院校设有药科，校方又都重医轻药，药学教育得不到发展。孟目的和一些年会参加者强调应当创设独立的药学院，学制应改 3 年为 4 年。会后，孟等四出奔波，据理力争，于 1936 年在南京设立了药学专科学校，孟任校长，并兼药剂学、调剂学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孟目的率领药学专科学校迁往武汉，1938 年又迁到重庆。孟悉心教学，培育青年，赞助爱国抗日的学生去延安，因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于 1939 年被免去校长职务。次年，孟去香港创办协和制药公司，一面筹设

药厂，一面为抗日军民选购药品器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占香港，孟辗转回到重庆，创办协和制药厂，自任厂长，生产磺胺、葡萄糖等原料及制剂。孟并兼任药学专科学校教授，每星期去讲课2天。他十分关心培养造就药学专业人才，于1943年冲破重重阻力，敦请中英友好协会与国民政府教育部交涉，选派6名药科毕业生赴英深造。

抗日战争胜利后，孟目的至上海主持接收7个日伪药厂。他不辞辛劳，将接收的药厂加以调整，成立了第一制药厂；他还准备调整组建其他药厂，发展我国的制药工业，但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排挤，未能如愿。1946年春，晋察冀解放区在张家口筹建制药厂，当时孟恰回北平奔父丧，解放区派专人迎孟前去进行技术指导，孟欣然前往，受到解放区领导人聂荣臻等亲切欢迎。孟建议根据解放区的具体条件，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充分利用当地出产的麻黄提取麻黄素，利用柴胡制造柴胡注射液等中药制剂。孟对生产操作要求严格，经常亲自动手洗安瓿、灌药液、焙封、检漏等，对别人操作的还要检查。孟还给技术人员讲授制药基础理论，给青年工人讲授制药操作知识；有时学生因事缺课，他还给补讲。药厂经过孟半年的指导，扩大了生产规模，改进了产品质量，职工提高了技术水平。

孟目的从解放区回到上海后，被聘任药品制剂厂厂长。孟为生产防治疾病的药品，发展我国制药工业不遗余力。该厂解放后称上海制药一厂，生产磺胺噻唑、葡萄糖酸锑钠等原料药。葡萄糖酸锑钠习称五价锑，是治疗黑热病的有效药物，对消灭华东几省流行的黑热病起了很大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孟目的继续为发展我国药学事业努力不懈。1950年，他由华东人民制药公司调任中央药品检验所（1962年改称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并任中国药典编纂委员会总干事、药理小组组长，1952年起任副主任委员。他对药典编纂工作非常认真细致，还亲自编写部分条目，逐字推敲修改文稿，并对规定的质量指标和检验方法进行复核试验，逐一修改订正，于1953年定稿出版。此后，孟仍不断修订充实药典，1957年主持编订了第一增补本；1963年版收载各类药品1310种，无论在结合我国医药生产实际，反映医药科学研究的成就，整理祖国医药使之逐步标准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粉碎“四人帮”后，孟继续被聘为药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耄耋之年，仍为编纂新版药典贡献力量。

孟目的对中国药学会的工作十分热心，藉以推动我国药学事业的发展。自1935年第七届年会上当选为药学会理事后，历任第八、九、十、十一届理事，第十二届理事长。药学会总会由南京迁到北京，在1952年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1958年起并兼北京分会理事长。孟经常到药学会主持会务，组织各种学术活动，为《药学学报》、《药学通报》、《中药通报》撰写和审改文章。

孟目的还先后被推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第八届中央常委。

1983年5月21日孟目的在北京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袁士诚、谢海洲：《热心药学事业的孟目的教授》，《药学通报》1981年（第16卷）第3期。

卫生部药典委员会提供的资料。

孟目的家属提供的资料。

《民国人物传》第一至九卷目录索引

(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列, 中文数字表示
卷数, 阿拉伯数字表示页数。)

二画			马寅初	八	401
丁文江	一	370	马福益	七	53
丁贵堂	九	85	马福祥	六	115
丁超五	八	180	马鸿宾	六	57
丁福保	六	348	四画		
三画			王 振	六	161
于 斌	七	567	王 泰	八	346
于学忠	二	99	王一亭	四	255
上官云相	九	206	王小航	四	315
卫立煌	九	137	王士珍	七	218
马 衡	六	324	王天培	六	140
马占山	三	108	王云五	九	453
马师曾	二	380	王文华	六	69
马步芳	八	284	王少堂	五	360
马应彪	九	306	王占元	二	211
马君武	七	13	王永江	七	109
马约翰	三	370	王正廷	七	37
马宗汉	四	12	王乐平	九	98
马相伯	一	360	王尧臣	四	217
马叙伦	九	364	王亚南	五	295

王光祈	三	326	孔伯华	四	390
王志莘	四	193	邓 铿	三	1
王伯元	六	308	邓宝珊	六	43
王伯群	七	45	邓初民	五	100
王希天	七	470	邓泽如	九	78
王国维	一	366	邓荫南	八	123
王和顺	七	71	邓演达	一	111
王金发	七	194	邓锡侯	九	166
王金铭	五	30	五画		
王宠惠	二	139	石友三	一	248
王性尧	六	232	石筱山	四	394
王闾运	七	531	左舜生	三	208
王荆山	七	371	龙 云	三	137
王造时	六	330	龙济光	七	235
王统照	五	265	龙鸣剑	五	25
王家烈	五	130	卢 汉	三	145
王家襄	六	76	卢兴邦	五	160
王陵基	九	190	卢作孚	九	273
井勿幕	三	80	田 汉	八	462
太 虚	三	381	田 桐	三	53
丰子恺	四	347	田耕莘	一	399
方声洞	四	7	田頌尧	九	179
方声涛	四	108	史量才	一	356
方椒伯	四	189	叶企孙	七	463
方液仙	四	166	叶楚傖	九	71
方鼎英	八	244	叶鸿英	九	303
巴布扎布	二	235	毛健吾	八	499

白 朗	二	153	伍廷芳	一	101
白毓昆	三	21	伍连德	五	366
包达三	五	210	伍朝枢	九	91
冯玉祥	八	1	任可澄	七	99
冯占海	七	188	任白涛	七	424
冯国璋	二	170	任鸿隼	七	484
冯治安	八	256	华之鸿	六	255
司徒乔	四	334	庄银安	八	119
司徒美堂	二	91	齐白石	二	363
六画			江 庸	五	107
老 舍	五	242	江亢虎	一	391
老洋人	九	243	江加走	四	357
达浦生	七	562	汤子敬	五	233
吕 超	九	160	汤化龙	二	21
吕公望	四	76	汤用彤	三	366
吕志伊	六	32	汤尔和	六	181
吕思勉	七	500	汤寿潜	六	63
师 复	四	397	许广平	三	292
朱 瑞	八	165	许云樵	八	480
朱执信	一	62	许世英	七	85
朱自清	一	349	许地山	三	346
朱志尧	四	236	许冠群	四	261
朱家宝	五	156	许雪湫	二	33
朱家骅	四	129	许崇智	八	195
朱培德	八	221	许鼎霖	五	183
朱惺公	七	437	刘天华	五	344
朱葆山	七	376	刘文典	五	308

刘仙洲	五	301	孙传芳	一	208
刘半农	三	333	孙道仁	九	131
刘成勋	八	309	孙殿英	九	258
刘师培	一	382	孙蔚如	三	125
刘茂恩	九	229	孙衡甫	六	270
刘国钧	五	203	阮玲玉	二	369
刘柏森	四	205	七画		
刘显世	三	169	劳乃宣	三	391
刘显潜	六	151	严复	三	286
刘海楼	九	350	严修	九	401
刘航琛	六	280	严宝礼	五	285
刘复基	六	1	严独鹤	八	505
刘桂棠	三	215	严裕棠	一	30
刘鸿生	七	339	苏炳文	八	251
刘道一	三	13	李弥	六	145
刘震寰	八	338	李铭	二	271
刘湛恩	九	418	李纯	一	198
刘揆一	三	47	李士群	五	166
刘静庵	八	101	李公朴	二	334
刘镇华	三	184	李书城	九	62
关伟林	六	280	李世甲	八	302
孙渡	七	167	李仪祉	三	300
孙震	八	315	李更生	七	514
孙大有	七	363	李良荣	八	323
孙中山	一	5	李延年	九	214
孙本文	五	330	李苦禅	七	540
孙多森 孙多钰	五	189	李国杰	八	384

李国钦	八	355	杨荃诚	八	105
李宗仁	七	128	杨衢云	九	42
李剑农	七	433	连 横	八	392
李叔同	三	317	吴 樾	二	46
李厚基	四	114	吴晋航	九	318
李根源	四	45	吴兆麟	五	53
李燠尘	九	281	吴克仁	七	183
李烈钧	二	105	吴奇伟	三	152
李康年	五	225	吴佩孚	二	200
李德全	六	37	吴铁城	七	29
李鼎铭	三	75	吴景濂	六	87
李鼎新	九	154	吴禄贞	二	12
杜月笙	一	314	吴鼎昌	二	145
杜定友	五	336	吴蕴初	一	274
杜重远	二	311	吴懋鼎	五	195
杜斌丞	八	146	吴耀宗	七	554
杨 杰	五	69	肖则可	八	362
杨 森	六	121	岑春煊	二	188
杨 铨	七	442	何 键	三	199
杨寿枬	九	289	何北衡	九	323
杨希闵	五	124	何成浚	五	135
杨虎城	一	119	何应钦	八	206
杨笃生	二	53	何香凝	二	67
杨振鸿	五	18	邱清泉	九	222
杨爰源	八	278	邱菽园	五	118
杨登鹏	七	269	余日章	一	402
杨粲三	一	309	余芝卿	五	229

邵力子	七	1	陈友仁	五	64
邵元冲	二	125	陈少白	三	41
邵飘萍	一	335	陈公博	七	305
邹容	二	17	陈布雷	八	66
邹鲁	一	377	陈朵如	六	275
邹韬奋	九	353	陈光甫	二	265
冷遁	四	62	陈其美	一	105
沈克非	七	549	陈果夫	八	21
沈钧儒	二	321	陈宝琛	六	166
沈联芳	四	251	陈绍宽	六	50
沈绶云	九	55	陈春圃	五	179
沈鸿英	七	251	陈炯明	三	161
汪笑侬	八	475	陈济棠	三	191
汪康年	九	462	陈家鼎	七	62
汪逢春	六	371	陈炳焜	七	242
汪精卫	七	284	陈望道	四	288
沙彦楷	六	284	陈焕章	二	393
谷正伦	八	267	陈嘉庚	二	241
宋则久	一	295	陈楚楠	五	42
宋庆龄	五	1	陈蝶仙	三	225
宋教仁	一	43	陆征祥	一	227
良弼	八	189	陆宗輿	三	179
陈达	九	385	陆荣廷	一	190
陈诚	六	93	陆费逵	三	230
陈三立	三	323	陆皓东	五	14
陈万运	四	180	阿炳	五	356
陈天华	一	48	张贞	七	274

张 勋	一	215
张 澜	三	66
张 继	二	114
张 榕	三	16
张 睿	一	259
张一麀	八	155
张之江	九	148
张云山	七	200
张开儒	六	25
张凤翔	三	61
张文光	二	57
张石川	六	364
张厉生	八	58
张本政	七	388
张百麟	六	19
张岚峰	六	194
张作霖	一	179
张伯苓	二	306
张君勱	二	409
张国淦	二	352
张治中	五	84
张宗昌	一	236
张知本	八	171
张恨水	九	445
张鸣岐	二	194
张振武	四	30
张振勋	三	253

张钰哲	八	441
张培爵	一	75
张难先	八	131
张敬尧	七	288
张辅忠	四	382
张煜南	八	351
张啸林	四	160
张嘉璈	三	237
八画		
林 文	二	50
林 森	二	119
林义顺	八	127
林文庆	三	387
林可胜	五	363
林白水	三	310
林述庆	一	89
林柏生	六	188
林觉民	四	1
林语堂	二	386
林康侯	八	388
林砺儒	三	360
武百祥	七	357
苗杏村	九	343
范光启	九	49
范旭东	六	200
范绍曾	九	185
范筑先	三	25

茅盾	六	316	冼星海	九	436
郁达夫	五	250	冼冠生	八	378
欧阳予倩	三	340	孟目的	九	474
罗君强	五	173	九画		
罗佩金	七	214	赵声	二	28
罗振玉	一	387	赵伸	七	105
罗家伦	五	149	赵倜	九	238
罗常培	五	313	赵凤昌	七	117
罗福星	五	36	赵尔丰	六	173
易培基	九	105	赵寿山	三	116
周凤岐	七	263	赵秉钧	二	181
周西成	六	134	赵紫宸	九	469
周作民	四	230	郝鹏举	九	266
周宝箴	九	329	荣宗敬	一	278
周佛海	七	315	荀慧生	六	359
周钟岳	七	92	胡适	七	394
周学熙	七	328	胡瑛	八	139
周鲠生	九	424	胡筠	六	228
周瘦鹃	五	276	胡文虎	五	199
金宝善	八	452	胡汉民	一	131
金润庠	四	211	胡若愚	七	256
竺可桢	七	453	胡景翼	七	206
庞元济	四	243	柯劭忞	六	344
郑正秋	四	376	项松茂	四	172
郑伯昭	七	382	钟荣光	九	412
郑孝胥	四	148	俞庆棠	五	324
郑振铎	五	257	俞佐庭	四	247

俞承修	七	522	夏 超	六	82
俞颂华	四	302	夏曾佑	四	321
侯西反	五	121	夏瑞芳	一	291
侯德榜	九	372	都锦生	四	185
段祺瑞	一	162	顾维钧	八	78
禹之谟	一	81	热 振	八	509
秋 瑾	一	52	倪映典	二	41
钮永建	八	111	徐 润	一	266
施从云	六	5	徐 堪	九	113
施今墨	三	378	徐 谦	五	112
闻一多	三	278	徐永昌	六	109
姜得春	八	373	徐世昌	一	156
姜桂题	九	233	徐志摩	三	353
洪 深	二	344	徐宗汉	四	34
洪式间	四	386	徐树铮	一	204
柔 石	四	282	徐新六	六	223
费 玕	五	290	徐锡麟	一	58
十画			徐镜心	七	57
秦润卿	六	212	殷 夫	四	275
秦德纯	一	253	钱玄同	四	307
聂 耳	九	430	钱新之	三	246
聂云台	二	249	郭 乐	一	285
莫觥清	四	223	郭琳爽	四	198
袁世凯	一	145	席尼喇嘛	二	61
袁祖铭	六	128	唐生智	三	90
袁履登	六	312	唐绍仪	一	126
夏 威	七	152	唐拾义	六	287

唐继尧	三	152	黄焕南	六	259
唐群英	七	77	黄展云	九	118
高星桥	六	244	黄琪翔	三	100
诸文绮	八	368	黄锡滋	黄明安 六	291
凌鸿勋	九	392	黄楚九	四	268
谈荔孙	六	264	萧友梅	八	470
诺那呼图克图	九	125	萧龙友	三	375
翁文灏	八	49	萧同兹	八	493
陶行知	一	342	萧耀南	八	329
陶成章	二	22	萨本栋	八	420
陶克陶胡	三	220	萨镇冰	四	69
十一画			梅兰芳	四	361
曹 锟	一	172	梅贻琦	八	412
曹汝霖	一	231	盛丕华	七	349
曹聚仁	七	418	盛世才	七	173
黄 兴	一	35	盛宣怀	二	256
黄 郛	一	140	虚 云	二	357
黄乃裳	三	306	章士钊	四	53
黄百韬	九	198	章太炎	二	276
黄远庸	五	281	章伯钧	五	92
黄仲涵	三	259	章宗祥	三	174
黄明堂	五	47	章鸿钊	七	476
黄金荣	七	575	梁 希	八	425
黄炎培	八	35	梁思成	八	431
黄泽霖	六	10	梁墨缘	五	214
黄奕住	六	218	阎宝航	四	39
黄宾虹	四	342	阎锡山	四	90

康心如	六	249	傅筱庵	四	154
康有为	一	320	舒新城	四	297
寇遐	三	86	鲁迅	三	263
续范亭	二	83	曾朴	二	302
十二画			曾绮	二	399
彭泽民	五	77	曾昭燏	八	448
彭家珍	三	7	曾俊巨	五	238
韩复榘	一	243	温生才	二	38
董显光	四	142	谢无量	九	380
蒋介石	九	1	谢晋元	四	17
蒋光慈	七	411	十三画		
蒋作宾	七	21	赖心辉	九	172
蒋梦麟	五	142	虞洽卿	九	332
蒋维乔	五	317	简照南	一	298
蒋鼎文	四	135	简玉阶	四	23
莫延芳	六	267	詹大悲	四	327
靳云鹏	六	102	詹天佑	九	250
辜鸿铭	八	396	褚民谊		
喻培伦	一	85	十四画		
程砚秋	四	366	蔡昌	九	313
程家桢	六	14	蔡锷	一	93
程德全	四	82	蔡元培	一	328
程璧光	三	33	蔡廷锴	八	233
焦达锋	一	72	蔡楚生	四	370
傅东华	七	526	廖平	七	537
傅抱石	五	340	廖磊	七	161
傅斯年	六	352	廖仲恺	二	1
			廖耀湘	七	143

谭人凤	二	78	颜惠庆	八	89
谭延闿	二	129	潘天寿	四	352
谭浩明	七	246	潘公展	八	484
谭曙卿	八	295	潘光旦	六	337
谭鑫培	五	350	潘昌猷	六	296
熊庆来	七	469	憨玉琨	六	156
熊成基	一	68	十六画		
十五画			薛明剑	九	296
樊钟秀	五	58	薛觉先	二	374
黎元洪	二	161	穆藕初	一	270
黎烈文	五	271	十七画		
黎锦熙	七	505	戴季陶	四	121
滕虎忱	六	237	十八画		
德穆楚克栋鲁普	二	222	魏 如	五	220

后 记

一、本卷《蒋介石》传，经李新同志审阅，作者谨表谢意。

二、本卷《易培基》传，娄献阁同志参加了编辑工作。